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文化場域變遷及其對臺灣文學的影響——

以臺北都市空間轉化為探討核心

The Influence of Transitioning Culture Fields on Taiwan
Literature : Ta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pei's Urban Space

as a Central Focus

張琬琳

Wan-Lin Chang

指導教授：梅家玲 博士

Advisor: Chia-Ling Mei,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December, 2009

本論文榮獲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7 年「臺灣文學研究論文獎助」



特此感謝

文化場域變遷及其對臺灣文學的影響

——以臺北都市空間轉化為探討核心

目錄

第一章 序論.....	5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序論.....	5
一、研究動機.....	5
二、問題意識.....	7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0
一、地圖、市誌、統計資料及歷史文獻.....	10
二、文學研究成果.....	11
三、調查報告.....	11
四、學位論文.....	12
第三節 研究範疇、論文架構與研究方法.....	13
一、研究範疇.....	13
二、論文架構.....	13
三、研究方法.....	14
第二章 臺北的文化身世：清代臺北文化圈的生成與變遷.....	20
第一節 「中心」如何被界定？從關涉「臺北」的幾個文化概念談起.....	20
一、凸透鏡視域：以「大臺南／府城」為中心的臺灣地圖.....	21
二、文化外力：大航海時代被列強推進的「海角臺北」.....	25
第二節 誰主導了文化：從清代大臺北地區文化核心場域變遷說起.....	26
一、八里坌與新莊的「中心」角逐.....	27
二、用空間爭取文化主導權：明志書院移址竹塹.....	28
三、仰賴民間權力文化網絡興起的艋舺.....	30
四、北臺「中心」爭奪戰：從族群對峙說起.....	32
五、經濟與人文共生：兩個文化圈的共構成形.....	37
第三節 「首都」的文化雛形.....	40
一、「城」：兩股文化勢力的緩衝地景.....	40
二、文教範式：中國傳統文化治理空間.....	41
第三章 建設？抑或隔離：壓抑的臺灣文化場域.....	44
第一節 打開城門：迎接日軍的經濟／文化意義.....	45
一、剷除族群對峙的文化地景.....	47
二、築立殖民者的文化腹地.....	49
第二節 差異的文化空間.....	60

第三節 在隔離／監控統治下迅速發展的文化核心區.....	67
第四章 戰後初期（1945~1949）的臺北：一個文化尚待重組的城市	78
第一節 日本人走了以後？.....	79
第二節 日本人帶不走的建設、臺灣文化的空間資產.....	87
第三節 交織而成的中國圖像：街道命名所隱含的文化意識.....	90
第五章 戰後文化主導場域之形成（一）：國家文化政策與軍中文藝.....	94
第一節 城南：以地方建構社會的範式.....	94
第二節 城南：主導文化政策的空間實踐.....	99
第三節 在空間支配中成形的文化核心區.....	103
第四節 以中國文藝協會為首的文化活動場域.....	107
第五節 「寫作班」帶動的軍中文藝風潮.....	117
第六章 戰後文化主導場域之形成（二）：民間文化界與文友圈.....	121
第一節 空間生產與援下的「有機」文化圈.....	121
一、促使文化事業興起的臺北空間經濟模式.....	121
二、城南知識分子的文化角色.....	125
第二節 一間客廳，等於半個臺灣文壇.....	127
第三節 文化扭轉：本省作家的語言困境與突破.....	134
第四節 以文化資本所涵養之城南菁英世代.....	138
第七章 戰後文化主導場域之形成（三）：大學與教育	142
第一節 政治／經濟操作下的文化主導場域.....	142
第二節 空間就是權力：臺北「文教區」的成形.....	147
第三節 從寄居到定居：知識份子的地方文化認同.....	152
總結.....	165
參考書目	166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序論

一、研究動機

論文的開始，要從一幢隱身於臺北都市角落的日式老房子說起。

2004年暮夏，我在城南金門街漾著綠蔭的小小巷弄中，接到城鄉所林育群學長的電話，這是我第一次與他相識，他告訴我在這城市角落，關於一間老房子和三十幾棵老樹的身世。就在離我住處不遠的地方，原來有一群關懷社區的居民及文學家，還有經常出入其間的臺大城鄉所師生，正在努力守護著它們，並且試圖為老樹與老房子所在的地方，找尋屬於這個城市空間的文化記憶。於是加入了研究團隊，就像是文學曾經在我青春時代的美麗召喚，另一個以文學關涉地方與城市文化資產的運動，在碩二那年鼓舞了我投身參與。

這是我北上求學之後，第一次感受到與這個城市有了親密的關連。而緊密牽繫起學院師生、社區居民，以及政府公部門人際網絡的這幢日式老房子，就是坐落在同安街底、等待這座城市重新賦予它關注與意義的古蹟「紀州庵」。

進行古蹟週邊資源調查的過程中，我觀察到居民如何透過對於文化地景的塑造、想像與空間再利用的期待，來關注社區公共議題，以及凝聚地方意識。同樣的，透過與居民進行文化操作的互動經驗，以及與公部門的接觸與溝通，我深切經驗到文化不是一個固定範疇的概念，而是經過人們不斷操演的過程，它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互動、意識型態的交涉，以及價值的判斷與意義的創制等多重面向，並且是一種開放、動態的實踐過程，會因為不同歷史時期的認知，和教育養成的不同而有所更迭。

回想大二的時候，我還未接觸文化理論，也不懂地方認同如何透過文化形式來建構之際，曾傻呼呼憑著一股年輕的熱情，在師長、學生會學長姐和學弟妹們的支持與協助下，四處募款、糾集了近百位大學生組成的文化服務團隊，打著想要為民雄鳳梨農推廣產銷，以及想為地方形塑一點可以令在地人感動的文化力量。於是，一個大型文化節慶，被賦予大學結合地方文化的意義，在縣政府、農會、鄉公所等公部門，以及各產銷組合、農民與學院師生之間，串起了密切的文化網絡，彼此真情映照，居民們更是對於這群各地來的大學異鄉遊子們備加鼓勵、關懷至切，各媒體也以「中正牌」鳳梨之譽，讚賞大學生和地方文化產業結合的成功推銷。多年之後我終於明瞭，此一文化意識之形塑所建構緊密的地方認同，原來就是促使人們即使離開多年之後，依然對它滿懷相思的重要因子。

於是深深體會得到戰後作家們對於臺北城南的反覆回望與吟索，也讀懂了反共年代在時空裂變裡的無盡鄉愁，當然也貼近了鄉土文學中的原鄉情感與召喚。在清大臺文所就讀期間，我在陳萬益老師的「臺灣文學史」及「現代散文專題」課堂，也經常為前人們所擘畫的豐富文學沃土而感動熱淚。而我於是開始認

真思索，人與社會之間、社會與文化之間，乃至於文化與土地／空間之間，如何存在著連續性交涉的問題，並且是否可能從臺灣文學史的角度來加以辨證？接著我試圖文學所關涉的文學及文化理論中著手，陳其南老師的「文化理論與政策專題」、劉紀蕙老師的「文化理論專題」，以及張志銘老師的「文化理論與文化政策專題」課堂，引領我從文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分析，以及文化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文化研究的脈絡，並促使我開始思考，如何將文化研究作為一個介入臺灣文學的角度，將臺灣文學放置於文學場域及其所牽涉的公共議題之中做探討。

梅家玲老師的「現代文學與文化」以及「文學研究專題」課程，更指引我從文學與城市之間的關涉之中，發現許多有趣的文化議題，並從文學流派的文本閱讀與比較，來探討每一城市風格對於該地文學作品與文化場域的影響。

執行紀州庵修復調查研究案的過程中，在城鄉所劉可強老師、博士班楊清芬學姐的帶領，以及碩班學長姐和同學們彼此鼓勵與貼心關懷下，我從起初對於公共行政、都市計畫、建築設計等議題毫無所知的茫然焦慮中，逐漸突破跨專業領域整合與對話的技術障礙，在每週一次的計畫案讀書討論會裡，從原本完全摸不著頭緒、只能當旁聽者的角色，在團隊夥伴們彼此激發下，逐步摸索出藉由各專業領域之合作，從文學視角主動介入探討空間的可能性。緊接著在與知心夥伴陳書吟一起進行紀州庵周邊資源的田野調查、口述歷史採錄、以及史料閱讀之中，我發現城南地區在戰後因空間政策結構，使大量聚集了作家以及文化界人士居住於此，且多為戰後重要的現代文學作家群。城南地區作家居住密集的程度，在戰後遠勝過臺北其他區域，直至今仍是全臺灣最多文人與作家頻繁活動文化核心區域。此一現象，與臺灣文學所關注的「文學場域」議題，有了對話延展的空間。在林育群學長的協助下，我們將戰後重要作家及文學團體所駐在的位址，「定位」進了臺北市地圖裡，文學場域經由實質空間化之後，我們發現圖上顯示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是城南地區點狀分布密集，它明顯比臺北市任何其他地區，聚集了最多的作家及文學團體。

此一初步成果，以〈主流文化場域轉移對臺灣文學的影響——二戰前後臺北城南之「地方」文本研究〉為題，發表在 2005 年「青年文學會議」中，論文在應鳳凰老師的評論之下，獲得了不少意見，會後須文蔚老師熱心提供了意見，並寄了參考書目給我，而本篇論文也有幸獲得會議優秀論文的獎勵。在師長們的意見及鼓勵下，激發我持續進一步思考，如何在進行的資源調查成果之中，介入文學史以及文化現象，來思索研究發展的可能性？

在修習歐洲研究學程的課堂中，Prof. Suitbert Oberreiter 和 Dr. Christian Hein 開授的德國文化課程，引領學生對於德國文化的發展、轉化以及對文學的影響做了詳細的討論，這啟發我認真思考，臺灣文學是否也可以嘗試用文化圈的概念，來探討文學的變遷與歷史過程？在期末報告中，老師要求我們從 *kultur*（文化）的角度，來討論臺灣當代現象。我於是從文化場域的概念，用圖表分析及簡單的德文，介紹了臺北文化場域變遷對於臺灣文學的影響。報告獲得老師的肯定與讚

賞，並且在評語中激勵我持續做相關的研究，讓外國也能關注臺灣文學和文化的发展脈絡。

1950 年代的臺灣文學，在文學史前輩的論述中，經常呈現一種官方、國族和霸權的文化形貌。可以理解前輩們如何在經驗本土長期政治壓抑下，對反共時代文學書寫的嚴厲批判，然而在我進行紀州庵研究案之際，發現當年城南文化氛圍和文藝風氣，其實蓬勃而興盛。不論是官方的、軍中的，或是學院的、民間自發的，文藝風尚在城南小小的巷弄之中交織而起，經常有詩人在河堤吟詩、也有作家在巷弄中踱步構思，寫作班總是排了滿滿的課堂，來了各地引頸盼望報名成功的文藝青年，各界人士無論是想學文學的、或想說故事的，都認真學著搖頭晃腦地唸詩誦文，或拿起筆桿嘗試創作。還有很多喜歡演藝的青年老少們，在河濱搭起棚子，組織了各類合唱團、歌樂隊、國劇團、崑曲會，還有各種地方戲友會等等。雖是因陋就簡，但總澆不熄人們對於文藝的熱情，他們舉辦各類歌唱表演文藝活動，在河岸居民蒙古烤肉的飄香之中，熱熱鬧鬧地活動著，一直到防洪的堤岸逐漸被高高築起、最後水源快速道路在都市計劃下將人們與水岸分隔才銷聲匿跡。

幾乎受訪的作家及文化界前輩，總都不約而同地提及此一情景，他們不論仰首激奮，或俯思沉吟，總難免不去懷想當年文藝界眾多有志之士懷抱單純而熱情的文藝年代，以及人與人之間毫無猜忌、相扶相持，那個真誠以對的時光。這對我衝擊尤深，使我開始嚴肅面對這文學史上爭議的年代。究竟是什麼力量，還有哪些人，讓文藝在這裡復興？也究竟是什麼因素，讓本土文化界面對這時代的文學，是如此警戒而焦慮？

本篇論文是我嘗試從自身長期對於文化現象及議題的關注，來探索臺灣文學關涉文化空間場域的議題。如果「文化」概念可以用複數來表達，也許可以更清楚地說明它的多元價值，像德文經常將 *kulturen*（「文化」一詞的複數）置入於學術性討論之中，並關注文化交涉及變遷的問題。文化是一個多元的概念，即各族群有其獨有之特色，擁有其自身的文化，沒有任何一個文化可以作為所有人類共享的生活價值，或者人類總體文化的代表。當然，臺灣文學研究的精采處也在於此，研究者在關注文學的同時，也能成為社會觀察及實踐的一種過程，並藉由跨領域的交流與對話，成為一個融攝多元文化、多音交響的豐富學門。

二、問題意識

「地理」、「空間」、「場域」這些與人類社會最直接關涉的因子，深刻牽繫著一地之文學發展與創作風格。文學中的社會價值與意識型態，透過空間範疇而運作，而文學書寫也揭示著空間如何被編派秩序，以及如何透過空間的聯繫，界定人類的社會行動。舉例來說，一個初生之犢的文藝青年，如果置身於臺北以外的地方，可能需要比臺北的文藝青年加倍努力地接觸文學作品、或經常逡巡於（可能整個鄉鎮僅有一家店面的）文學書店，以及參加各種（巡迴）文藝營，才能逐漸感受到什麼叫做「人文氛圍」；而居處於臺北的文藝青年，又可能因為生長

在大同區本土文化色彩較濃厚的場域、或在文化精英色彩強烈的大安區，或在信義、南港區等地成長，而有不同的文學認識與體驗。

因而我感興趣的第一個問題是，臺灣文學在其所處的時空斷代中，是否存在著一種主導的能量，它既受了空間秩序的編派，也影響了臺灣文壇的走向？就像現今臺北大安區一樣，不論鄉下來的文藝青年、以及臺北各地而來的文藝青年，最後在各自於各地經驗求學、謀職或經營創作之後，他們生命中總有一段時期，聚首在臺北城南這個人文氛圍濃厚的地區，就好像法國的文人，總會將生命中精華的文藝年代，浪擲於巴黎的蒙馬特區一樣。

臺灣文學及文藝界，是否也有一個主導的核心場域，那裡聚集了當時最優秀的文化界人才，無論是創作者或評論者，都在此一具有威信的文藝語言與典範系統中發揮力量，並引領著臺灣文藝界的走向與思潮？當文學評論者在書寫或回顧臺灣文學的歷史階段時，會發現文學界其實存在「十年一個階段」、「數十年一種現象」的文藝風潮，就像十年前的各大文學獎得獎作品，和今日受文學獎青睞的佳作，其所關注的議題經常大異其趣一般？每一時期的文化思潮，是否有一股文化界彼此交涉聯繫、並試圖引領社會思潮的文化主導核心力量在支持著？

第二個問題是，這些臺灣主導文化的能量，如何在社會及空間秩序中生成與變遷？從都市空間結構變遷的角度來看，一地之文化發展，並非初始即具有都市之形式與規模。從歐洲的都市發展來看，經常是一個以教堂為中心的村莊，循歷史的社會過程逐漸擴大而成的都市形式。「都市中心」是一「群體核心」，它不只是一個具有創造性與豐富內涵的空間環境，並且人們早已習慣聚集在象徵其信仰或生活理念中心的場所裡交談、休閒、集會、演講、狂歡或舉行活動。因而我們討論都市之時，除了強調其現代國家概念之形成，以及都市現代化的過程之外，應從都市史的脈絡，來回溯一地之空間轉變及其對於文化生成脈絡的影響。

第三個問題是，將文化置於地理空間的結構過程之中討論之際，其隱藏於背後的力量如何被揭示？權力與文化之間的交涉過程，在空間予以具象化之後，使其更能充分諭示了統治者的觀點、地方的勢力角逐、居民之間的衝突與融攝，以及人們文化選擇的過程。而不再是平面、文字化地看一地的發展歷史或文化敘述。不能否認的，臺灣的文化現象總是環繞著政治權力的影響，而所謂的政治權力，又包含族群意識、國族議題、社會網絡、教育資本與經濟利益等。

在現代化國家機器統治之下，經濟區位與資本利益不再是唯一的考量基礎，它可能是一種計畫性的政治辨異、種族區隔、政策行使或資源分配的空間支配過程的一環，而經由這些因素的運作，我們於是才能看到當代文化透過文藝家們接觸到整體社會氛圍之衝擊，將內心觸發與感動用心詮演、書寫後的各種樣貌，而這些多面向的樣貌，亦使臺灣文學及藝術呈現不同時代的多樣性，例如日治時期的反殖民文學、皇民化文學、古典詩文，以及戰後的反共文學、軍中文藝、現代文學等等。

當然我將面臨一個傳統文學研究觀念的挑戰，即當文化研究成為文學研究的主體之時，是否形同自我放棄了文學研究者的優勢？在我與城鄉所團隊進行「紀

州庵」修復調查計劃之中，深切感受到各學科訓練背景對於同一研究主體觀察角度及解讀結果，經常會有天壤之別的情形，因而文學觀點對於社會研究的介入，實不應被忽視。「紀州庵」案研究團隊的成員的學科背景多元，分別出身於心理學、都市規劃、建築設計、公共行政、社會學、文學等系所，因而許多爭議的焦點，在經過彼此論證與討論之下，經常獲得更開拓的研究視野及實踐經驗。跨領域團隊的經驗，使我一方面學習到論文跨領域交流與對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撰寫本論文所要表達的立場，即我一向認為，臺灣文學的觀點與專業，不能在跨學科的社會實踐與文化運動中缺席。

舉例來說，在紀州庵團隊甫受臺北文化局委託，開始進行古蹟初步調查、尚未著手進行總結報告之際，2005年6月一篇以臺北溫州街與臺北文學森林之文化地景形塑的碩士論文，大量引用團隊的調查資料，批判「紀州庵」本體及其周邊被塑造為臺北文壇重鎮、以及臺北文化局意圖將紀州庵設置為臺北文學森林所在地的規劃政策，並以溫州街一帶文化氛圍作為批評的對照。事實上，若從文學場域以及文化歷程的觀點來看，此一疑點是可以化解的，如何避免都市空間研究者對於文學的誤讀，是驅使我想從文學位置發聲，並期待能在臺北文學森林爭議中完成這篇論文的原因之一。

從建築景觀設計的角度而言，每一個實體空間，已被規劃者定位在一個有邊界、框限的位址當中；然而從戰後文學場域所聯繫的社會空間網絡來看，「文壇」及「文化場域」不是一個可以被框架、或停駐定位的空間範圍。就像文化流動的概念一樣，文學場域是一個抽象非實體的文學交涉行為，是文學家彼此交流、互動以及影響之下所形塑的一種氛圍，它所形塑的文化品味及氛圍可以延展，也可能因為都市空間的開發而擴張，也可能影響其他文化圈，或成為一種文化主流。

「文壇」並不是一個實體的「壇」，不應將公館溫州街一帶視為另一個獨立的文學空間，並以之與古亭同安街一帶的文學空間相互拮抗。從臺灣文學史的脈絡來看，官方的中國文藝協會、在副刊及純文學影響之下所形成的文學圈、以及臺大師大院中所形成的文藝思潮。此三個戰後臺灣文學的重要脈絡，在戰後形成文化主導氛圍，並在城南的各地蓬勃發展，溫州街所形塑的學院氛圍，當然也在其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文學場域是學院、民間，以及作家、文人和編輯之間彼此關照、融攝的社會網絡。住在古亭的林海音、王文興和余光中，當然也可能會在溫州街附近的曲徑巷弄之間構思創作或吟詠章句；而住在溫州街宿舍的臺靜農、夏濟安和葉慶炳先生，也可能在古亭一帶的文友和編輯家中，或在國語日報社、純文學與爾雅出版社附近徘徊。

從文學的觀點而言，城南是一個文化氛圍的空間再現，而不是一個可被分割為二的行政區位，因而利用位在此一文化空間裡一處閒置的古蹟空間及其周邊森林和水岸溼地，作為臺北文學森林的位址，有何不可？建築景觀本體設計需要以自然學科精準地描繪、測量及定位。然而文學場域所表徵的文化意義，不能用同一種研究方法來框架、限制它的空間位址與歷史價值。

位於臺南的「國立臺灣文學館」，其建築本體原先在日治時代並非是以一個

「文壇重鎮」的目的來建造，1916 年建造時是「臺南州廳」，戰後陸續為空戰供應司令部、臺南市政府所用。當古蹟空間被修復並再利用之後，將一個歷史上曾被作為政治中心和軍事要地的空間，重新在現今臺南市文教核心區的中西區被賦予當代文化意義，讓臺灣文學教育及推廣功能進場之後，不僅使臺灣文學在該地產生重要的影響，且市民的參予與認識，亦豐富、活絡了文學的內在價值。在臺北，將臺北文學森林設址在當代臺灣文學主導核心區的城南，有何不能？

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在秉持嚴謹的態度研究每一篇文學作品、或每一文學社群與文學現象之外。我想要試圖從文化脈絡來發掘文化生成的潛在力量，並揭示每一個時代激發出文藝生成的主要因素及空間場域，以文學研究基礎做為我支持、並將持續進行社會實踐的能量。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地圖、市誌、統計資料及歷史文獻

日治時期臺北都市計劃的研究，黃武達所主持之「都市史研究室」及其所撰著和編輯的《日治時代臺北市之近代都市計劃》、《日治時代臺灣近代都市計劃之研究》，以及由南天書局以大幅輿圖重製印刷《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等著作中，詳盡調查了殖民統治時期的各地都市計劃成果，內容多直接取材於臺灣總督府及各地方官廳發行之都市計劃之官方「告示」史料，其中館藏於臺灣文獻館的地圖不乏珍貴之孤本，另亦有南天書局及私人提供之地圖，完整呈現出日治期間的都市發展過程的面貌。此外，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的《臺北市誌沿革治・封域篇》，對臺北歷代之建置、疆域與街市沿革提供較為完整之資料，書中所附之歷代疆域簡圖，為日治時期都市研究提供詳盡的地圖資料。

在歷史資料方面，臺北市文獻會編修的全套 49 冊《臺北市志》、黃得時《臺北市發展史》等文獻，詳盡列列載了臺北歷代史料；陳正祥《臺北市誌》、《臺灣地誌（上中下）》，則從地理學的角度，分析臺灣各地及臺北發展的歷史，其另一本著作《臺灣的人口》，以及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編《臺北市十年來施政統計》，則提供詳盡的臺灣人口資料及各項社會統計數據。在行政沿革相關文獻，有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介紹各行政區發展歷史和路街沿革，臺北市土木課《臺北市土木要覽》，詳載戰前都市規劃官方資料，施雅軒著《臺灣的行政區變遷》，則完整介紹臺灣行政區的變遷的歷程。

此外，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於 1953~1954 年代出版之《臺北文物》1~3 期，對於艋舺、大稻埕、大龍峒及城內等區的歷史，做了詳盡的考察及報導。另外文獻會也曾邀集臺北百名耆老，進行臺北口述歷史採錄，相關資料集結於《臺北市耆老會談專輯》書中，這些史料兼具實證方法及在地觀點的學術價值。

本論文所蒐集的各式地圖及統計資料，多取材於上述史料，其中地圖資料多經翻拍及掃描處理，並依文中論述所需，以繪圖軟體加工處理，例如進行圖文疊

合、重繪、上色、標示等。本論文將會一一於圖表附註說明中，詳述圖面來源及加工處理方式。

二、文學研究成果

戰後臺灣文藝政策及文學場域的研究，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論析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中的「性別」與「家國」議題。在〈五〇年代國家論述／文藝創作中的「家國想像」——以陳紀澄反共小說為例的探討〉一文中，顯陳紀澄小說創作中的意識形態與傷痕見證，然同時也開展出「反共小說」在當時國家文藝政策下豐富多元的探討價值；在另一篇論文中，則以《文藝創作》與文獎會得獎小說為例，探討其中的性別與家國論述，同時亦啓發出與五〇年代文藝政策下之期刊、得獎作品對話的研究取徑。此外，梅家玲另一篇〈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一文中，則以臺灣戰後夏濟安所創辦的《文學雜誌》為例，提出「學院派」雜誌與臺灣大學之間，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對話的文化現象。

張誦聖在其論文集《文學場域的變遷》，首次引用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詮釋臺灣文學的發展，應鳳凰延續其論述基礎，撰著《五〇年代臺灣文學論集：戰後第一個十年的臺灣文學生態》，為五〇年代勾勒文學風貌，在其〈林海音與六十年代臺灣文壇——從主編的信探勘文學生產與運作〉一文中，從林海音作為副刊主編的角色，討論戰後文學生產的社會過程。

林淇濬《書寫與拼圖》從歷史與社會的面向，研究臺灣文學的傳播現象，在第六章〈打開意識形態的地圖〉分析了戰後到解嚴期間文學與政治的糾結，以及臺灣文學霸權爭奪的現象。此外，王德威在〈一種逝去的文學？——反共小說新論〉，王德威在〈一種逝去的文學？——反共小說新論〉以「國共分治」的角度切入反共文學，省思反共文學在五〇年代的傷痕意義。陳芳明在《聯合文學》一系列臺灣文學史的論述，提出反共文藝的再殖民史觀、現代主義文學的美學實踐，以及女性作家群對於豐富戰後臺灣文學的關鍵地位。

三、調查報告

與本論文相關之調查計劃報告，主要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市定古蹟紀州庵修復調查研究（含再利用構想暨保存區計畫）》，此案乃為臺大城鄉所受案於臺北市文化局，針對市定古蹟紀州庵及其週邊環境進行調查研究之委託技術服務案之調查結果。因本計畫案為城鄉所師生發起，為使文學研究者略知其由，故簡述此次古蹟保存運動過程如下：

日式建築「紀州庵」位於中正區同安街底與水源路交界處，日治時代是高級料理屋與宴客聚會場所，戰後成為公家宿舍，之後屢經祝融，居民在原建築上多次翻修違建，一度面臨被市府勒令拆除、闢為停車場的危機。2002年臺大城鄉所師生長期奔走，結合作家、地方人士與社區城南水岸文化協會之力量，為保存古蹟與鄰近之新店溪自然生態而努力之後。2004年紀州庵正式被指定為市定古

蹟，市府承諾將對於建築與週邊資源進行修復與再利用，並規劃為臺北文學森林，因而文化局委託臺大城鄉所針對週邊相關資源進行調查與研究。該案由臺大城鄉所劉可強教授主持，研究團隊成員為博士生楊清芬，以及碩士生林育群、葉鈺山、游千慧、張琬琳、陳書吟、朱慶大、柯恬伶等人。

除上述保存計畫調查報告之外，龍冠海主編《臺北市古亭區社會調查報告》，以社會學研究方法，於臺北市古亭地區進行社會結構及居家統計調查，提供本論文詳盡的古亭地區研究數據。另中央大學中文系受臺北市文化局委託執行的《臺北市文學資源調查計畫》，則完整提供當代臺北市作家和文學社團名錄及地址資料，為本論文進行文學資源研究及分析，提供完整的資訊。

四、學位論文

文化場域對臺灣文學的影響論述，清大中文所徐秀慧博士論文《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1945~1949）》以二二八事件為分界，探討臺灣戰後初期（1945~1949）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權力場域對文學生產的影響。臺大中文所楊佳嫻碩士論文《論戰後臺灣外省小說家作品中的「臺北／人」》（2004），則探討外省族群在臺北城市空間的人文互動，論文以白先勇《臺北人》作為分析外省族群和臺北城市空間互動為主軸的小說作品，觀察外省族群在臺北如何參與、見證了臺灣的發展。

在臺北市都市空間轉化以及都市意識形態之研究，臺大土木所廖春生碩士論文《臺北之都市轉化——以清代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為例》（1987）、城鄉所徐裕健博士論文《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臺北為個案》（1993）、以及社會所蘇碩斌博士論文《臺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2002，論文經作者修改後，以《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發行出版）等論著，在不同時期關注了臺北都市空間變遷的問題。

廖春生從臺北三市街之生產方式、政治干預、及社會衝突所組構而成的歷史脈絡之下，探討都市形式與歷史涵構的關係，及相互之間的轉化過程；徐裕健則從經濟壟斷及文化支配的角度，探討殖民時期差異空間的形成；蘇碩斌藉由比較傳統中國與近代日本對臺統治的技術及知識體系，說明日本如何造就近代化的臺北，但同時也指出近代化的意義，不僅是外在的建設，且蘊含了權力支配，並將清領及日治時期兩大部分相互對照分析。上述研究者所累積的論述成果，使本論文得以在都市研究的基礎之上，進行臺灣文化場域變遷的研究，而這些空間論述基礎，配合本論文撰寫期間所蒐集到的古地圖及史料文獻，更有助於本文分析文化變遷過程的空間轉化實證。

此外，臺大城鄉所葉鈺山碩士論文《保存運動與都市再發展——以紀州庵個案為例》（2004）、臺大城鄉所陳書吟碩士論文《榻榻米上的生活故事——日式房舍居住經驗研究》（2005），撰著者皆為參與紀州庵古蹟保存案的成員，分別從古蹟保存與都市發展，和分析日式房舍住宅空間來探討古蹟保存運動及居住空間經驗。研究者從建築系、公行系等不同領域的專業背景，共同關注一個社會議題，豐富

了學院實踐文化參與的面向，此現象可資為本論文仿倣之借鑑。

第三節 研究範疇、論文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疇

本文關注都市形式與社會變遷之間連續互動的歷史演化，並將文化場域放置於歷史脈絡中的城市轉化現象裡進行探討。因而所進行的方式為，從研究城市變遷的歷史與空間結構作為基礎，來探討文化核心的生成過程及其影響。論文各章節主要研究範疇及論述目標有三個方向：

- 一、探討臺北都市的空間過程，及都市空間形式與社會結構變遷之關連。
- 二、研究臺灣主導文化場域之變遷，並揭示權力與文化之間的交涉行為。
- 三、觀察在地文化主導場域的社會過程，以及文學生產的社會空間網絡。

臺北都市意義的生產及都市的空間轉化，指涉出臺灣當代的社會變遷與歷史轉變的過程，在日本統治臺灣以前，臺北並非是以一個特立於全臺的文化核心區域而成形，但在歷經各統治政權之後，它不但以首都的形象呈現，更於歷代被賦予島都、首府、文化之都的形象，並且城市內部的文化權力場域亦不斷地轉移、變遷。這促使本文從空間的角度，重新檢視臺北都市發展的過程，並從歷史脈絡中，來探討都市界域、都市核心，以及文化場域的變遷等問題。

二、論文架構

在章節架構分配上，本論文之論述重點，聚焦於探討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臺北文化場域之變遷過程及其對臺灣文學的影響，因而主要探討的歷史時期及地理空間為：一、日本殖民時代大稻埕、艋舺等臺灣人居住地，以及城內、城南等日本人居住地之比較與觀察；二、戰後以城中、城南地區為主的文化核心場域之生成與影響之探討。上述研究將於論文第三章至第七章中呈現，分別從政治治理、都市政策、國族意識、文化統治之角度，來分析臺北文化場域生成與轉變的社會空間過程；第二章為開展臺灣文化主導場域論述的前沿研究，將清領時期文化場域的變遷，做一全視性分析及研究。第一章為序論，說明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及文獻回顧。

文化場域的生成，與都市空間和都市形式，包含經濟、政治、行政區位考量等概念，都有緊密相關之處，在本論文的研究中，第二章將指出，在尚未邁入現代化國家以前，傳統社會是以經濟利益作為核心區位選擇的優先考量因素，因而傳統社會的文化核心區域經常伴隨著當時經濟優位的地區而生成，例如：最初的八里坌地區，以及乾隆年間的新莊，和雍正以後的艋舺等地。然而，有一個例外，即是同治年間因頂廈郊拼之械鬥，而形成的大稻埕一大龍峒文化核心區。這也是

研究臺灣文化有趣的地方，它經常存在著西方現代性或資本經濟邏輯所無法全盤解讀的文化現象，即臺灣本土文化，經常牽涉著居民的政治傾向、族群意識、地方角力等變因，而改變歷史必然的線性發展，以及都市的文化形式。這也是我為何我要以一個篇章的篇幅，來觀察清代臺北文化圈的轉變現象的原因，該篇章的目的，不在一一細數清代的歷史與行政制度，而是要在歷史的事件中，研究並揭示臺灣文化場域轉變的各種樣貌。

本論文第三章以後的研究重點，一方面延續第二章的結論，即都市形式是由傳統村落形成市街、由市街形成經濟圈、再由經濟圈造就文化場域的模式；另一方面則展開現代化的國家體系之下的文化場域論述。臺北文化場域在國家機制進入空間支配的進程之後，其主導核心背景生成的因素，不再像前述一般地容易歸納與理解，本文將試圖從各種文化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討。

三、研究方法

(一) 以文學作品作為研究都市空間與社會變遷的基礎文本

本論文在引用文學作品做為理解都市經驗的素材之中，特別注意戰後文學發展的結構性歷史限制對作品的一般性影響，並透過文本分析，來處理特定歷史階段的「作家都市經驗」。文學不僅可藉由作家的書寫，洞察當地之人文活動與生活日常，更重要的是，它引領讀者去了解當地的人們如何看待世界，並喚起住民的地方感。一般文學對於「地方」的討論常集中於文本、作家與地方的關係，即文本對地方的描述與作家對地方所產生的影響，而此所指的「地方」，原本屬於一種靜態的客觀外在，是一地理學之核心概念，但近期的研究取向，則關注「指涉了日常活動和互動的場景」，對於地方的理解需跨越文本本身，而取徑於交織在地方內部、外部條件互動的理解，並檢視社會網絡和過程網絡中不同的行動者如何型構了「地方」，從而理解地方是跨界、多重尺度的各種網絡交錯疊合而成的特殊組合或連結狀態。¹ 在此脈絡之下，文學因而在塑造人群的地理想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論是地方經驗的文學意義，抑或是地方意義的文學經驗，都是文化創造／破壞過程的一部份。文學的地理書寫，與傳統地理學關涉的內容大相逕庭，文學本身所關注的，不在於都市生活的描繪有多麼準確，而是都市如何被表達，以及作者如何透過文字，揭示每個變化中的時代所呈顯的人文氛圍與社會經驗。臺北文學的發展，與城市各區域的歷史發展、人口結構和人文氛圍，具有相當的關聯性。作為一個臺灣文學的研究者，對於文本的採用、歸納與分析脈絡，應有一定的掌握程度，並且在從事文化場域之研究之際，亦不能不關照文學家在當代文化場域中的關鍵性位置。

文學作品不僅描繪區域和地方，它亦協助創造了地方。故文學不應僅被當作用以描述地方的產物、亦不僅只是在地理學的客觀知識中提供情感性的主觀感

¹ 關於文本與地方的概念，可參考王志弘：〈地方意象、地域意義與再現體制：1990 年代以降的文山地區〉，《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8 期，2005，p.135-188。

受，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體察世界的方式，展示出住民品味、經驗與知識的廣闊地景。²是以本論文尤其關注戰後居住於臺北城南地區的作家社群，以及長期於該區活動的重要作家，以試圖從作家的空間經驗中，來重繪該時期臺北文化場域之圖像。文中主要觀察的戰後文壇要角有：余光中、王文興、林海音、白先勇、陳若曦、隱地等作家，和學院中文學前輩如臺靜農、夏濟安、葉慶炳、齊邦媛、林文月等學者的作品。此外，在文類取材上，除少數作家本身已自白透漏小說情節與其自身經驗之密切相關性，因而採用部分小說文本之外，其餘則盡量取材較貼近作家真實心靈、非虛構故事之散文創作、社論、日記，以及作家回憶錄等，以真實地探究作家的生活經驗。

(二) 社會科學研究

1. 意識形態與主導文化意識

關注臺灣現當代文化研究之際，無可避免的需要處理意識形態的議題，儘管此議題經常需要小心而謹慎地使用，以免又落入政治意識形態的指責當中。本論文討論臺北城市空間對於文化場域的影響，並非要論斷什麼政權是臺灣文化的施惠者或壓制者，也不是要評斷哪個政權時代下的文藝表現優劣與否，而是要從一個城市的空間轉變與歷史脈絡，來揭示臺灣主導文化場域之中所隱藏的各種權力活動之變遷，以及文學藝術與社會網絡之間的關涉與輔成之體系。

從馬克思的觀點來看，意識型態某種程度而言，是一種虛假意識（fake consciousness），是經由特定階層所鼓吹，並被人們所接受的一系列信仰。換言之，它可能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變成社會普遍信仰系統的一部份，也可能是某一民眾階級藉以激發集體認同，而進行文化信仰系統的操作過程。然而，為何臣屬團體在社會中為什麼如此地順從加諸於其間的文化操作與意識指導？根據 Louis Althusser 的觀點，乃是「主流意識型態」存在於文化之中的原因，這個主流意識形態的存在，造就了優勢主導文化的生成，他們將統治階級的信仰與理念，納入他們自己看待事物的常識之中。

從臺灣文學的角度來看，主導文化事實存在於每一個權力轉換的時空之中，在文化研究中，「主流」這個概念具有高度的爭議性，尤其是鑽研後現代論述的學者們，批判這個概念無法充分地解釋一個社群內部的多元性與差異性，然而此一爭議，亦是本論文在計劃撰寫之先，已經準備要接受論辯交鋒的精采挑戰之處。就論文內容而言，我對意識形態的概念採取一個相對開放的途徑，意即，我將意識型態視為文化的表意鬥爭，就像權力一樣，意識形態持續地被型塑，也永遠不會結束，並且在它型塑的過程中，也不斷受到挑戰。因而那些在當代文化中有其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仍受制於動態的文化力量，皆受各種內在與外在的論

² 關於文學與地理空間的繫聯，可參見 Crang, Mike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4），頁 76。

辯、挑戰與修正。

近年臺灣的政治的論述，容易面臨一個將臺灣族群的問題簡易二分的窘境，即將解嚴前的外省人形容為強勢、壓迫者，本省人則為弱勢、反抗者，彼此因權力分配不均而生成糾葛的情結。³ 這也是我所必須正視的警惕之一，本文所要努力的，是要將權力放置於文化場域生成的空間共性之中來討論，而非要指出誰是壓迫者、誰是被壓迫者的單線問題。二元對立的論述勢必簡化了臺灣文學的多元性，因而做為一個研究者，絕不能忽略文化互動的複雜性及其所呈現的豐富面向。亦即，我所要闡述的，不是透過對權力的批判指出族群對立的兩面，而是要從權力的雙面性，⁴ 來觀察文化場域如何生成與變遷，以及文化如何在空間權力的影響之中，產生的核心——邊緣現象。

每一個城市空間的生成，原本就不是鐵板一塊的，在其間必然分佈了不同的公共資源、人口數量、以及社群組織，它們有些是以政治的樣貌呈現、有些以經濟模式為中心，當然有些則是以文化勝場。本文所要凸顯的，即是一地之文化圈，如何在該歷史階段中獲得文化主導地位的問題。

如同我們對資本國家的批判的一樣，因而社會學經常關注的是，為何西方第一世界的文化價值總是主導了東方？同樣我想要發問的是，臺灣文學之中，是不是有一種存在於空間向度之中的主導潮流？因而我必須從都市發展歷史的考掘出發，透過人們在各空間場域之中的人文活動，來辨察文化的變遷過程，以及分析變遷背後的原因。

2.文化霸權的非霸權論述

所謂的文化霸權，是統治者藉以提高被統治者政治意識的方式，教育、領導被統治者之智識與道德，而形成集體意志，建立一套為人民所接受的意識型態。⁵ 而本文所要進行的，即是研究此權力行使的策略，及其對文學藝術場域的影響。當然在論述此一概念之際，尤其需謹慎小心地思辨，以免陷入另一反文化霸權的文化霸權論述之中。

權力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於各種領域之中，它們可以在家庭關係內、在社會結構內，或者在行政機關內運作，也可以存在於統治階級或被統治階級之間。知識與真理成為權力的工具，權力是一種策略，它無所不在，Michel Foucault 認為，權力將「規訓」內化為生活常模，對被統治者進行宰制與處置。⁶ 並且，唯有透過權力才能生產真理，意即只有透過真理的生產，否則無從運作權力。⁷ 因而在此脈絡之中，本文所要處理的，即為試圖透過文獻爬梳、空間分析與歷史驗證的

³ 范銘如〈臺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收入梅家玲編，《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臺北：麥田），2000年，頁54-55。

⁴ Faucult

⁵ James Joll，《葛蘭西》（臺北：桂冠，1994）。

⁶ 劉北成、楊遠嬰譯，Michel Foucault 原著，《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三聯書店，2003）。

⁷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edit by Goeden C. New York: Pantheon Book, 1980. p.103。

過程，將權力作用於文化的力量逐一揭示。只有理性才被認為具有權力，而這種權力乃是一種主宰和統治，⁸ 權力是無所不在的，制度決定了權力的實施，因而本文主要不在確定誰在發揮權力，而是確定「權力策略」是什麼，並在此前提下理解權力策略之中的文化現象，此時文化本身自然就不只是單純的文化，其間所隱藏的政治與權力的過程將逐一被揭示，而如此才能避免文化霸權論述的框架，而轉由臺灣歷史與政治的脈絡中加以理解。

本文試圖揭示意識型態在文學、乃至於臺灣文化主導場域之中的權力交涉過程，以及它與執政者在空間支配政策之間的關鍵性意圖。當然必須指出的是，文學作品作為研究文本對於本研究的吊詭性，即文本之生產，即已經從優勢文化的原有資源中被塑造出來，亦即，在閱聽成員之間已有一個高度認同文本的文本意義，故此一致性亦建構了一種「偏好」或「優勢」的文本解讀。因而在研究文化主導場域變遷之際，不能僅僅仰賴文學文本；同樣社會學科和文化研究角度的分析，也不代表絕對的權威性，因而從空間研究來分析文化場域是一種途徑，但不是一種絕對的霸權。我將以臺灣文學與文化的脈絡作為論述主軸，輔以多重角度的文學關照，除了有助於開闊文學研究的視野外，它同時也讓研究者發現西方理論在臺灣的適用與不適用性，而這些將成為豐富文學研究的輔助參照。

3. 以臺北為主體的都市空間論述

社會存在於時間與空間中，社會的變遷與城市的變遷有密切的連結。從 Manuel Castells 建構的都市意義 (urban meaning)、都市功能 (urban function) 與都市形式 (urban form) 等概念，我們可以安置既定社會之歷史行動者之間的衝突，也可安置都市規劃與都市設計的作用。換句話說，都市是被歷史的社會所決定，都市意義之界定為一社會過程，它關乎社會的結構，且社會亦環繞著生產方式而結構。

將臺北放在此一脈絡之中探討，可以發現臺北都市的發展，亦經常是歷史角色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與價值來結構出社會，因而在歷史的社會衝突動力之中，臺北被賦予空間形式各種結構性任務，而使都市意義伴隨不同生產方式及不同歷史條件而發生變化。臺北從清代以來，其都市形式即隨著執政當局的政策不斷變遷，同時居民所處的社會空間亦在此變遷之中，反應了都市文化的多重面向。

本文意圖將空間視為一種整合性與主動性的社會建構元素，如同被傳誦為都市改造經典的 Haussmann 改造巴黎的計畫案，其都市計劃的背後，其實諭示著更大的改造的社會效果，學者們可以透析出來的，是更深層的空間與權力之關係。而在此前提之下，本文亦試圖將都市變遷做為研究之基點，探討都市空間與社會之間如何透過權力的運作，彼此交相建構，而這個建構的過程，又如何指涉了文化場域的轉移與變遷。

⁸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中文譯本為莫偉民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三聯，2001)，頁4~12。

此外，我亦關注都市核心——邊陲的問題。「核心」與「邊陲」為一種關係，涉及不平等的交換關係、不平等的地理關係、以及壟斷與自由競爭的關係。而在都市中心的研究，若要採用社會學的角度，則必須進行一系列概念上與歷史上的澄清，以避免陷入意識型態的陷阱之中。

「都市中心」包含了地理上的位置及社會的內容，越靠「核心」越有壟斷權，而越近「邊陲」則需面臨越多資源不足的競爭。⁹ 日治時期的臺北，殖民政府透過權力的操作達成空間政策的文化支配意圖，將臺北規劃成一個現代化國家中的理性城市，並且劃設都市的「都心」概念，造就一個以殖民者生活圈為中心的城市空間。而這空間計劃的本質，基本上是一個空間戰略、一種權力關係的空間操縱，意在使都市核心——邊陲位置，在政治與社會過程之中逐漸彰顯。透過都市空間的研究途徑，有助於我們確立空間建構的主體性概念，除了有助於發問，並掌握社會／空間動力的行動者複雜之能動性。

4. 都市改造與行政區劃

區域是地方形塑過程的產物，故歷史的方法是區域地理的基礎之一，因而本文將透過歷史素材來處理區域形塑過程，並關注時間的多向度性。當然，區域的形成與消失，除了行政結構外，尚涉及機能經濟與社會聯繫，以及居民投入其中的意義與顯著性。即我們亦需關注到，一個別區域的存在係依賴某些社會族群在區域結構中的宰制，而區域的凝結則是肇因於權力關係的持續變化，形成與特定時間有關的現象。

日治時代近代都市形成之後，行政區具體化了抽象的區域空間，並透過語言及文字，制約了人看世界的方式。殖民當局藉由更換國號、重新劃分行政區域、更改地名，以空間手段展示新權力國度之開展。直至國民政府遷臺，亦同樣對於區域予以多次行政區劃及重劃，往往會將社會生活從原有的地方脈絡分割出來，並安置在抽象系統所建立的世界，即所謂的「掘出」歷程。本文將觀察臺北在歷代都市改造與行政區劃當中，居民結構所呈顯的社會及歷史意義，以及城市區域改造對於當代文化場域變遷的影響與關聯。

5. 地方與認同的概念

地方是人群與社區之間長期共同經驗的支柱，空間「歷久」之後，轉變為地方，而這些空間的過去與未來，亦連結了空間內的人群，臺北城南一地，在空間與歷史的連結之下，聚集了當時臺灣文壇上重要作家群，城南文風鼎盛的狀況，從文學作品中描述此一「地方」書寫，以及文人頻繁交游的情形可以窺探得知。

從文化研究的觀點而言，「集體記憶」是促成社會凝聚的動力，透過對歷史

⁹ Immanuel Wallerstein 著，郭方、夏繼果、顧寧譯，《近代世界體系 第三卷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擴張的第二時期(1730-1840 年代)》(臺北：桂冠，1998)。

記憶的選擇及有意識的重組，形成地方的集體記憶，則易於融聚人們的歷史認同與族群的認同。放置於臺灣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則地方經驗書寫與建構一地之文化認同，存在緊密的關涉。就臺北城市來說，文學作品書寫城市的意義，不僅在於描繪或敘述城市的事物，更重要的是，文學以不同於實體建設的方式，建構了城市。

本研究亦尤其關注戰後居住於臺北城南的作家群們，探討他們如何透過文學的地方書寫，表達了地方與空間的人文意識與社會意義？這些從大陸遷臺的廣大作家群們，他們居於城南、書寫其所居的環境，抑或以文化人自居，而臺灣大多數的讀者，其實是透過作家的書寫，來了解作家所書寫的地方，究竟這些城南的文人們，如何從其自身所處的時空意識來建構自己的城市，並又建構出一個主導當代臺灣文化的主流場域？本論文除了借鏡人文地理學的方法，探討空間與文學之間的連結關係之外，也試圖探討作家如何藉由書寫，來建構地方意識與文化主體。

(三) 歷史文獻蒐集及分析

由於本論文採取文學及文化的歷時性研究，因而歷史文獻的搜集尤為必要。有賴執行「紀州庵」周邊資源調查的成果，累積了不少珍貴的史料及口述紀錄之外，臺大圖書館館藏了豐富的日治時期史料、都市計劃地圖及早期與臺灣研究相關的期刊，皆提供本文進行相關研究之重要文獻佐證。

臺大臺文所齊邦媛圖書室收藏了大量本校教師如齊邦媛、林文月、柯慶明先生所捐贈的藏書，以及本所向文訊雜誌社購買而來的國民黨文工會書刊，透過這些珍貴的作家作品及手稿，使本文在進行戰後臺灣文學場域研究和探討文人之間構築之社會空間網絡之際，能有豐富的文本作品做為實證基礎，以進行當代文化現象的歷史對照及分析。

第二章 臺北的文化身世：清代臺北文化圈的生成與變遷

本章將從歷史的視角，來觀察清代以來臺北文化主導場域的興起及演變進程。研究都市的文化現象，首先我們無可避免地需從都市史的角度著手，以進一步理解並揭示城市歷史表面之中所隱涉的人文意涵。都市功能與形式的根源為歷史過程所塑造，城市不僅在歷史之中，並且重要的是，城市本身就是歷史。¹⁰ 都市與區域空間塑造的社會過程，是集合人們共同空間想像、經濟價值、政治意識，以及文化認同等複雜因素的歷史建構。在清代中期「臺北」概念尚未浮出歷史表面之前，事實上在此地卻已有頻繁的人文活動正在進行著，且居民彼此之間亦逐漸構築出一套區域的權力模式以及經濟活動型態，直至臺北界域正式定名、清帝政權逐漸意識到地方政治治理的重要性之際，臺北地區不但持續民間頻繁的文化活動，且在居民社會自然競爭的歷史過程中，亦歷經多次的文化核心之角逐，以及城市核心的變遷。

由於清代對於臺灣鬆散的治理態度，使早期臺灣社會因而在近代國家嚴謹、理性的科層治理邏輯之中被帝國全視性地治理。¹¹ 因而從清代臺北文化核心變遷的過程，有助於我們先屏除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介入城市空間支配的權力關涉，以爬梳早期大臺北地區文化場域生成的起源、過程以及自主變遷的因素。本章首先要發問的是，如何從「臺北」的空間變遷脈絡中，透過歷史的文化研究，來探討早期臺北都市空間的社會過程，以及民間自主意識對於城市核心空間轉變的影響？當然，本章並非要一一敘述臺北發展的歷史，而是要透過幾個關鍵性的事件，藉以脈絡化地分析大臺北早期民間文化權力的交涉網絡，以及各文化主導場域如何在大臺北空間裡產生競逐、轉移、變遷等現象，以做為接下來幾章本論文所要聚焦關注之「文化場域」與「文化核心」等概念之前沿討論與歷史檢視。

第一節 「中心」如何被界定？從關涉「臺北」的幾個文化概念談起

「臺北」作為一個文化研究的課題之前，首先需探討它在住民活動範疇中，歷來所被認定的界域概念。現今我們習慣認知的「臺北城區」，在清光緒元年（1875）以前，僅是臺島人們對於臺灣北部地區的泛稱的「地理概念」，而非官方所認定的「行政區域」。文獻中記載「臺北」之名，始見於藍鼎元的〈紀竹塹埔〉：「竹塹埔寬長百里，行竟日無人煙。野番出沒，行人過此，視為畏途。然郡城，淡水上下必經之地，其地平坦，極膏腴，闢田疇，可得良田數千頃。臺北民

¹⁰ Lewis Mumford 原著，宋俊嶺等譯，《歷史中的城市——起源、演變與展望》（臺北：建築與文化，1994）。

¹¹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

生之大利，又無以加於此。」¹²，然從文中可知，在當時所指的「臺北」，係指竹塹以北的臺灣北部地區，而非今日所指之臺北城區。

「臺北」成為一個有域界、有正史沿革的行政劃歸歷程，和「臺灣」這個地理概念歷來受清朝政府認可的程度息息相關。即使 1684 年（康熙 23 年）康熙皇帝將臺灣正式納入清帝國版圖，¹³ 但清廷對於臺灣的統治採消極政策，治臺政策盡量以較低的成本來經營建設。¹⁴ 清初至中葉，「臺北」之地理概念未有既定之界域，僅人們習慣將本島北部一帶稱為「臺北」¹⁵，即使臺灣本島的縣治歷經了數次的劃分，「臺北」的概念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才有了較為清楚的地理域界。在臺北尚未被定界、臺北城尚未築城以前，人們的「認同範疇」¹⁶，經驗了異常的變化，這些範疇持續地被擴大、縮減、重組、混合，以及重新編排順序。

然而對於一般常民而言，臺北在構成行政疆界之前，其社會功能是處於自發的分散、無組織狀態的，亦即，人們所認同的空間範疇，是一個複合的社會網絡環境：廟宇、水源、村落、市集、書院等等，而文化就在這種複合環境中開始發展、壯大且增加，最後才各自形成城市文化的各種組成成分的雛形，並交織集合成一個文化圈。此一城市變異而模糊的行政區域概念，其實亦指出了空間之文化形式本身具備的流動性，亦即我們不能全盤地將城市空間視為行政地理上的固定形貌，而應放在廣義關涉著人類活動的文化概念之體系中來檢視，如此將有助於我們更加理解城市空間如何在歷史變遷之進程中，被賦予一個融攝了住民共同生命經驗、地方認同與意識形塑過程的文化意義。

一、凸透鏡視域：以「大臺南／府城」為中心的臺灣地圖

在大臺北地區之人文活動尚未被清廷所劃歸，也未被當局以行政權力強勢處

¹² 藍鼎元，〈紀竹塹埔〉，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東征集》卷六（臺北：臺灣銀行，1958），頁 67。本書約於清康熙末年及雍正初年成篇。底線為筆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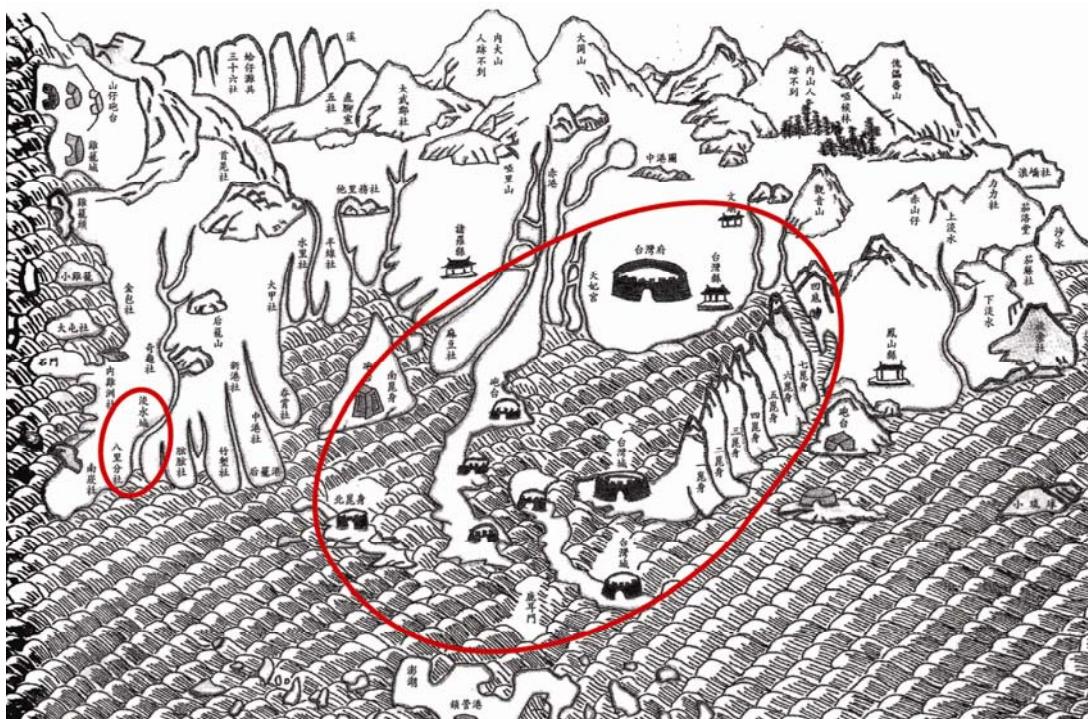
¹³ 康熙二十二年(1683)，鄭克塽降清，結束了明鄭在臺灣二十二年的統治。清廷內部經過一番棄臺留臺的爭議後，決定將臺灣納入版圖，於康熙二十三年設立臺灣府，此為中國政權史上第一次將臺灣納入版圖。關於臺灣早期開發文獻，在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 年）一書中論述詳盡，故在此不再複述，本處僅針對「臺北」此一概念，於臺灣開發史中之歷史位置及空間意涵進行論述。

¹⁴ 清廷攻臺目的在於消滅臺灣之抗清復明勢力，本無領有臺灣之意，因此對於臺灣的經營採與消極政策，只求安定防制臺灣再成為抗清根據地，於是限制人民渡臺，在島內亦定界禁止人民踰越界線開墾及通商。然儘管政府政策消極，但人民卻頗為積極，冒清廷禁令，偷渡來臺，越墾蓄界。

¹⁵ 康熙 23 年設置之臺灣府，隸屬福建省分巡臺廈兵備道，下轄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其中諸羅縣範圍為新港溪以北地區，包括嘉南平原北部、臺灣中部、北部及東部的奇萊（今花蓮市）等地。

¹⁶ 此處所指之「認同範疇」（identity categories），尤其強調地理上的意涵。概念出於查爾斯·赫胥曼（Charles Hirschman）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對殖民世界人口調查的研究做出的論述，赫氏從英國殖民地之人口調查及分類中，認為殖民者對於殖民地的種族調查，存在著殖民者所「想像的」（或者說本身就令人困惑）的分類心智（classifying mind），延伸此概念。原文引自 Charles Hirschman, *the marking of race in colonial Malaya: political economy and racial ideology, Sociological Forum*, 1:2, 1986, p.330-362。另外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步》亦提及此概念，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步》（臺北：時報，1999），頁 184-207。

置之前，究竟人們對於臺灣的概念為何？而大臺北地理位置又被安置於什麼樣的經驗空間裡？試看清代第一張較為完整的臺灣全島圖，即《福建通志》（1684）中的〈臺灣府三縣圖〉，此地圖資料和今日我們所熟知的實際地理位址差異甚遠，但其實它透露了當時人們對於臺灣地理概念所知解、勾勒的「經驗地圖」。從今日科學丈量地圖的角度而言，這張手繪地圖顯得怪異，它只能顯現地方性、而無法放置在廣大的地理脈絡中解讀。地圖表現出一個世俗的空間，用寫景式的符號及山水畫法，畫出印象式的經驗地圖。圖中有山有水，然這些山水卻缺乏科學量測比例，像是用傾斜的水平視角俯瞰大地，但又同時以類似雙眼高度的水平觀看地景。此圖為往後清廷官方修纂志書的原始參考版本，與之構圖相類似者，亦有後來康熙 31 年（1692）臺灣本地官方修纂的第一幅全圖《臺灣府志》中〈臺灣府總圖〉，以及《重修臺灣府志》（康熙 51 年，1712）、《福建通志》（乾隆 2 年，1737）中的〈臺灣府圖〉，皆模擬此一觀看視角。



圖片說明：據 1684 年《福建通志》之〈臺灣府三縣圖〉，重新繪製、標示而成，底圖來源為《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臺北：南天，2007），頁 136。

地圖以「臺灣府」（今臺南市）為中心，向外海延伸出數座崑崙及衛城，府城周邊的軍禦設施包含砲臺、城牆都清晰地標誌於地圖中。臺灣府的左右兩側，分別為比南崑崙砲臺略小的諸羅縣、鳳山縣城門，而府城以外的世界，例如諸羅、竹塹或淡水城，卻僅以簡略圖示標誌，且空間比例和實際地理狀況相去甚遠。圖中紅框內分別標示臺南地區與北臺灣區域，顯示當時臺南地區受當局重視的程度遠超過北臺灣。

地圖和實際比例的懸殊，指出了兩個重要訊息：其一，是中國傳統的治理知識系統不足，致無法有效且科學化地管理土地與人民。中國即使早已完成「早熟」

的政治大一統，但控制複雜龐大的基層社會之技術仍未純熟。¹⁷ 清帝國不願地方分權，解決之道即採用「間架式設計」(schematic design)，¹⁸ 以純粹理想的圖式套加在廣大地域之上，而不是實地去考察這個地域。其二，亦是本節首要探討之議題，即是早期臺灣「以臺灣府城」為中心的地理觀。當時清廷對臺灣本島認識最多的，就屬位於今臺南一帶的臺灣府，而此地的開發拓墾、經濟模式、人文活動，以及相關歷史記載亦較為完整，故官方以誇張的比例，來強調該地之重要性，相對於其它未被漢人充分開發的北部——如竹塹，以及東部——被稱為「人跡不到」之地，即隨筆帶過。

早期臺灣地圖以標誌南臺灣之臺灣府，以及以臺灣府為中心的各地方相對位置為主，尤其特別誇大臺灣府之行政、戰略、人文及經濟機能性，如行政隸屬之各廳、城垣、軍營、府學及廣大的港口等。府城作為控馭全島的首善之都，兼具了全臺地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首屈一指的機能。從人文發展的角度視之，在清末以前，擁有全臺第一首學的府城臺南，在當時各項天然及人文條件優渥的情況下，成為全臺的文化中心。儘管清代缺乏準確人口計量及人文活動的科學數據，然從清朝歷代地圖可以透漏一些訊息，即至清末以前，臺灣本島以首府臺南為文化活動中心，而臺灣北部尚未被充分開發，僅有淡水和雞籠一帶較有人口聚集的市街，在文化上亦較未受到應有之重視。

從清廷當局所繪製的經驗地圖中，我們發現權力者將地圖上所能見到的視野，聚焦在其可以掌控的地理空間之中，並且對於府城以外的空間存有不確定性的想像，這亦顯示出當局的治理焦慮，因而建構出一個想像的地理空間。Said 在《東方主義》指出，凡是有關異常事物的爭議，都極有可能是人為建構的。¹⁹ 人們對於熟悉的就說是「我們的」，對不熟悉的就說是「他們的」，這種方式，使得地理空間可以任意地被區分。某種程度而言，無論現代或原始社會，都是以此「非我族類」的文化思考方式，找到集體的認同。

當然清廷在治理臺灣的數百年間，並非全然對島內地理空間如此陌生。臺灣經過帝國漫長的統治之後，當局不再視臺灣為一個可以任憑著觀看者之空間經驗加以隨意開闊或壓縮的地理空間。意即，當臺灣的人文活動及空間界域被融攝於帝國的主體認同當中，它不再以一個異化「他者」的形象被曲解，而是開始由統治者去正視、管理，並貼近現實地加以規劃與理解。

試以行政區劃的角度來解讀臺灣民間在清領時期慣稱的「一府、二鹿、三艋舺」。從空間機能來看，「臺灣府」為設有行政官署之區位，並兼具統治、防禦、

¹⁷ 西方世界的科學技術，是啟蒙時代即培養而成的理性思維成果，但清帝統治下的傳統中國不願以民主形式下放地方權力，亦沒有能力實質清查地方。這種官僚行政以保住皇權架構為優先，統治的管理技術乃受到壓抑，將技術上的不盡不實之處壓至下端，既看不到空間，也看不到人民。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1998)，對於近代中國統治技術不足做了歷時性的詳盡批判，該論點有助於本文討論清廷繪製臺灣地圖時所呈顯比例不實、與風土社會不盡相同的情況。

¹⁸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119。

¹⁹ Edward W.Said 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1999)。

教育等機能，如府城、官署、官廳及學府；而「鹿港」及「艋舺」為人口聚集的市街，傳統的市街兼具對中國大陸的對口貿易功能、以及區域農產品的內陸集運地機制，其聚落形成模式多為經濟型功能取向，是仰賴港口經濟基礎而興起的漢人農墾市鎮。「府」有府城及固定城區及範疇，強調治理機能；而「鹿港」與「艋舺」是縣城內的「市街」，即人口集中區域，仰賴經濟機能。早期臺灣之人文活動，主要以府城地區為發展核心，清代中期以前，當局亦延續此一模式進行治理，將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集中於府城一帶，而位於中臺灣與北臺灣的鹿港及艋舺地區，則主要以經濟貿易做為區域發展的市街。

歷史學者一般較為關注臺北於何時成為全臺首府的歷史時間，²⁰ 但我想試著從治理者如何定義一地之文化核心的角度，來思考臺北／臺南兩地之間，在清廷實施行政區域劃歸的命名之下，所隱含之核心城市空間轉移的文化諭示。事實上，臺「北」的觀念，其實是相對於島內核心區域——府城以北的外圍地理空間的概稱。遲至清末光緒元年（1875）清廷將臺灣分為「二府八縣四廳」之後，臺灣官制上方首見「臺北」二字。當時「臺北府」之名即從相對於「臺灣府」以北之廣大區域，包含北部的新竹、淡水、基隆，以及東部的宜蘭等地而命名。從下表本文所整理的「清代臺灣行政區域演變」中可知，臺南原名為臺灣府，是以一個做為臺灣文化核心的位置來命名，因而臺北成為一個相對位置的行政區名。

清代臺灣行政區演變



1809年（嘉慶17年）增設噶瑪蘭廳

臺灣道						
臺灣府						
噶瑪蘭廳	淡水廳	彰化縣	臺灣縣	嘉義縣	鳳山縣	澎湖廳

1875年（光緒元年）設二府八縣四廳

臺灣道										
臺北府					臺灣府					
宜蘭縣	基隆廳	淡水線	新竹縣	彰化縣	水沙蓮廳	臺灣縣	嘉義縣	鳳山縣	恆春縣	卑南廳

²⁰ 歷史學者即試圖以口述歷史的採納與分析，來探討臺北何時成為臺灣最大的城市。參見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臺北市耆老會談專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0）。

1887年（光緒13年）設三府十一縣四廳一州，原臺灣府改稱臺南府。

臺灣省														
臺北府（北路）					臺灣府（中路）					臺南府（南路）			臺東州	
宜蘭縣	基隆廳	淡水縣	南雅廳	新竹縣	苗栗縣	臺灣縣	彰化縣	埔里社廳	雲林縣	嘉義縣	安平縣	鳳山縣	恆春縣	澎湖廳

光緒11年在當局有意識地發現臺灣在世界舞臺上的重要性而設省之後，劉銘傳於是奉命設臺北首，臺北正式成為全臺政治中樞。²¹ 到光緒13年（1887年）臺灣建省後兩年，在「臺北府」以南的「臺灣府」管轄區中，析出了「臺南府」，並將嘉義以南的地區歸為「臺南府」。意即，今日我們所稱之臺南，其實是在清末，一個意指臺灣島南方的行政區名。

從清廷設臺北首，以及設首之後兩年的行政區劃的演變中，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島內文化核區域逐漸轉移之端倪，即原本以相對位置命名的臺北府，在逐漸發展之後，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體系。臺北設首之後，「以臺北為中心」的文化主導概念成形之際，也同時宣告了清代舊有的臺灣核心城市「臺南府城」即將移轉至臺灣北部。

二、文化外力：大航海時代被列強推進的「海角臺北」

臺北的被定義，和臺灣逐漸受清廷重視的時局相繫，同樣是在世界列強發展資本主義之潮流中完成的。16、17世紀歐洲近代國家興起，一直到19世紀中，各國資本主義列強擴展海權，以世界為市場進行跨國貿易與殖民，於是紛紛寇擾中國邊疆地區，臺灣此時亦成為列強必爭之地，先後有荷（1624）、西（1626）、德（1860）、美（1867）、英（1869）、日（1874）、法（1884）等國的入侵。²² 列強中尤其以日本侵臺行動最為積極，經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以其強勢的軍國主義政策擴展海外勢力，1874年（清同治13年）日本議院提出的「臺灣蕃地處分要略」，要對臺灣「無主之地」的原住民地區，發動為琉球難民「報復」的軍事行動，即「牡丹社事件」。事件之過程，坊間臺灣史相關著作即多所記載，故不

²¹ 清廷政府將臺北城之統治中心，擇址於大稻埕（城北）與艋舺（城西）兩商業區塊之間，以控制與平衡兩區域的族群矛盾與發展。城內為清朝之府衙（巡撫衙門、布政司使衙門與淡水衙署）、文教建築（書院）與廟宇（天后宮、文武廟），而城東與城南則為大面積的農地與濕地，主要仰賴稻田灌溉。

²² 16、17世紀，西歐各國完成近代國家的統一，經濟資本亦已逐漸發達成商業資本型態之際，以其國家實力及經濟需求，進行有組織的海外殖民運動，向世界爭取更多的原料及貿易資本。而臺灣的命運亦從此繫於此海權時代、各國爭強的時勢之中。關於臺灣受各列強佔據之情勢，可參見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臺灣的佔據〉，《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海峽學術，1999），頁17~27。本文僅列列強侵入臺灣之紀年，不再詳述其過程。

再複述，本文提及此歷史點，主要呈顯在海權時代臺灣「地理 / 權屬」定位之模糊：即使近兩百年來已屬清朝版圖的臺灣島，然對於清帝國而言，僅有「在臺灣的中國大陸移民」，以及部分漢化的原住民「化蕃」²³方隸屬於其民；同時領土權屬亦只有其民所在之土，方屬清廷掌管之疆域，是故「化外」之原住民所引致之衝突，不歸清廷所掌理，亦消極無予處置，而清廷這消極的態度並無法有效解決與日本——這個近代國家——之間的誤解與衝突，於是爆發戰爭。

此事件是日本進入近代國家以後的第一次海外武力行動，也是在近代侵略中國的開始。日本第一次的出擊，即從近代地理的角逐場域開始發難，故此，一個「傳統的」政治權力，被另一個近代國家迫使劃出其領土內的「地界」。日本的出兵行動，改變清廷以往對臺灣的消極經營態度，促使清廷必須以近代國家的行政體制，重新整頓國土，以澄清海宇。於是光緒皇帝迅速派遣欽差大臣沈葆楨來臺，強化臺灣的防衛力量，並革新臺灣行政，並於當年創建臺北府，設府治於艋舺，並建築「臺北府衙門」（位於今中正區內。雖然臺北城的築城時期，已是中國內陸紛紛在拆城之時）。「臺北」在被世界列強開啓的近代化潮流中，正式被界定範疇，並賦予行政之意義。

第二節 誰主導了文化：從清代大臺北地區文化核心

場域變遷說起

臺北盆地早期的市街發展模式，高度仰賴經濟基礎，即需是與中國大陸的對口貿易港，抑或是區域農產品的內陸集運地，例如早期的淡水八里坌地區，以及新莊地區，即是仰賴此傳統經濟機能而興起。²⁴ 由於經濟基礎的充裕，這些市街漸漸有了新的文化面貌，而北臺灣第一個以經濟為基礎、並兼具行政及文化主導能量的區域，於是成形。

我想要探討的是，早期臺北盆地以市街為主的區域發展模式中，一個新興的市街如何在與其他地區經濟條件相似的傳統商業環境中，獲致文化主導的能量？歷史是由人類行動所建構的空間與時間之間的連續性互動，它是由行動者展現結構性任務與動力；城市的發展亦是如此，一個地區內的拓展，仰賴該地的行為者不斷地在社會中進行各種結構性任務，方能在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競爭之中獲得擅場。我認為一個傳統社會中聚合的小型聚落，要成為一地之文化核心區域，在發展的歷程中應逐一具備經濟資本——行政治理——教育文化等空間機能，而新莊取

²³ 清代「生」「熟」蕃之別主要在於漢化的深淺，而不在於種族的不同。生蕃遵從「教化」，輸餉應從，便可「熟化」列入編氓成為熟蕃。

²⁴ 早期臺灣市街的貿易與集散機能分離，乃因臺灣本島向中國輸出農產品，與中國內陸進行進行「單口對渡」之故，是以這些渡口逐漸興起，如淡水、八里坌港埠即具有此一機能。但隨著北部平原的開發，各地域半自給性的經濟體系亦逐漸成形，因而由物產所在地形成小市街，各自承擔小區域農產品集運或轉口的商業機能，新莊即為此一具有內陸集散新機能之市街。蘇碩斌認為艋舺的興起，因同時兼具上述兩種機能，故使臺北平原的中心市街花落艋舺，見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45-48。

代八里坌的興起，可說明文化核心如何在傳統社會中獲致主導位置的區位模式。過往以經濟角度探討港埠的興衰，咸由商港獲利多寡視之，然新莊與淡水八里坌兩地皆因臨淡水河之利，在傳統聚落中之經濟地位各具勝場，那究竟是什麼因素使新莊成為大臺北地區發展的核心區域？從文化的面向來看，新莊不同於八里坌地區全盤仰賴傳統經濟模式維生的村落，它是一個以經濟資本為基礎，逐漸發展出兼具行政治理與教育發展的村落。從北臺首學在新莊的設置過程，可以發現當一地之住民意識到文教之重要之時，也代表著此區人文風氣將逐漸興起，當然在此之際，地方的行政治理機構也首先在該地發揮行政效力。²⁵ 因而在北臺灣的傳統社會中，當經濟資本、行政治理與文化教育兼具功能之後，該地區即容易發揮文化主導的力量。以下先從兩個傳統聚落的興衰，來探討大臺北盆地第一次文化核心場域轉移的進程：

一、八里坌與新莊的「中心」角逐

八里坌以與中國大陸之「單口對渡」為主的貿易型態，缺乏與內陸臺北盆地各聚落間的開發與聯結，致人文發展侷限於港口經濟貿易，無法進一步提升至文化與教育之人文治理層面，故一旦港口淤塞、商業經濟效益驟減，本島其他聚落未予相應之經濟與行政支援，即迅速萎縮；而位於臺北開發區中央、連結桃園陸路要塞的新莊，同樣是仰賴淡水河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船舶可直接至新莊、大溪、新店等地，但由於有足夠可進行空間整合之腹地，加以位於各聚落間的地理要衝，故除有助經濟生產外，更利於人文發展。於是於乾隆嘉慶年間，發展為臺北盆地中最繁榮、文風鼎盛之市鎮。當時舟船熙攘，商賈聚集，「千帆林立新莊港，市肆聚千家燈火」而原位於淡水河口的八里坌巡檢為有效治理大臺北地區，故於乾隆 11 年，改駐新莊：²⁶

臺灣府淡水同知所屬八里坌，舊設巡檢一員。近來海口漲塞，無船隻往來。該員兼轄之新莊地方，商賈輻輳，且北連艋舺、大加臘，民番雜處，……應將八里坌巡檢移駐新莊……²⁷

巡檢司「改駐新莊」之舉，是藉由在淡水八里坌地區空間治理權力的退場，來正視當時人文活動核心的轉移現象。行政官署遷移到新興、位於盆地較為中心的市街，以有效治理該地的經濟、行政及人文活動，文武政治機構，從此移至臺

²⁵ 從乾隆 9 年（1744）開始，新莊士紳即積極四處奔走，規劃籌設地方義學，經過多年的努力以及各方人士合力捐田設學之後，北臺灣第一座書院於是在乾隆 28 年（1763）正式成立。在奔走設立書院的過程當中，書院即以義學的方式招攬學子，後八里坌巡檢又因逢災而遷入義學，改為衙署，之後書院歷經幾番變革後成立。

²⁶ 雍正十年（1732 年）臺灣府於淡水廳八里坌設巡檢，為清治時期專司臺北地區內政的地方官署，後因新莊的興起，故於乾隆 11 年（1746 年）遷至新莊。相關史料見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此改駐行動亦代表臺北市街中心的轉移，為有效治理地方，故隨市鎮的興起而遷徙。

²⁷ 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高宗實錄選輯》（臺北：臺灣銀行，1964）。

北平原，而新莊（乾隆 53 年改為縣丞）成為臺北第一個具文化規模的核心市鎮。據《新莊市志》記載，隨著新莊街的繁榮，文風也逐漸鼎盛，除民間設有書房及義學、地方多文苑賢士外，被譽為「北臺首學」的北臺灣第一座書院「明志書院」，於乾隆 28 年（1763 年）設置於此。人口與生活水平達到一定之程度後，文教需求日益增加，而有此共識者眾之後，則共同致力興學、從事文教事業，當地學子接受教育，春風化雨，乃至人文風氣隨之提升。而文教之事，多屬於經濟力較為雄厚的人所擁有，即使仕紳們帶起了該地區甚至北臺灣的文教，但仍是上層階級人士的活動。文教事業成效顯著，書院成立以後，北臺明顯收到教育的成效，科名屢出，從此可解釋北臺灣人口之增加，且文教人口亦相對增加。

教化人心最直接的方式是開辦學堂講經授業，使學生順從於當時的道德規範，而這些道德規範均服務於當時的國家機器，所以教化為最直接的意識型態控制方式。書院的設置，乃為達到此一目的，臺北既為北臺文教中心，後又主導全臺文教，學堂一類的空間設施自不可免，然而對傳統讀書人而言，若無提供晉身學官階級之管道，學堂之設置，則不足以吸引人受教，進而服從於國家意識形態，所以考棚之設置，乃為繼學堂之後必要的措施。因此，對士人而言，識字象徵地位與權威，統治者亦藉此力量藉以控制讀書人。²⁸ 而考棚的「民捐民辦」，象徵著商人欲轉換傳統的「土農工商」最低階層，在文治的社會裡，欲以他們的財富換取身分地位的提升，以進入崇高的學官階級。

二、用空間爭取文化主導權：明志書院移址竹塹

臺灣的書院，除兼具祭祀的意涵，更有象徵文化傳承的意義存在，尤其在涵養文風、培育地方人才方面，清代臺灣的書院，更是發揮最大的功效。文化機構的設置，可視為文化核心開展的前沿，清代臺灣各區域文教的發展，應以書院的設置作為文化場域生成的指標。毋庸置疑的，文教「機構」（institution）的設置，散佈並再現了文化，且影響了文化的形式，以及人們的思考方式。²⁹ 清代臺灣主要為漢民族移民墾居而成，各種典章制度，自是從中國大陸移植而來，文教制度中除科舉考試外，最重要當屬「書院制度」。而當時臺灣的書院制度，對臺灣整體的文教風氣，產生一定的正面激勵作用與傳承文化的意義。³⁰

在地方資本充裕、政府行政官制駐址之後，文化事業在新莊地區發跡，明志書院的創建，代表北臺移民社會的發展，邁入另一個階段，亦即在移墾完成之後，社會對文教機構的需求隨之而來，惟當時官方仍無能力興建儒學，明志書院設置，補足文教設施不盛的缺憾，促使地方文化素質之提升。

然而有一現象值得關注，即清代為臺灣由移民社會邁向文質社會之階段，地

²⁸ Stephon Fenchtwang, "City-temple and city god",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77, Standford. Cail.p581~6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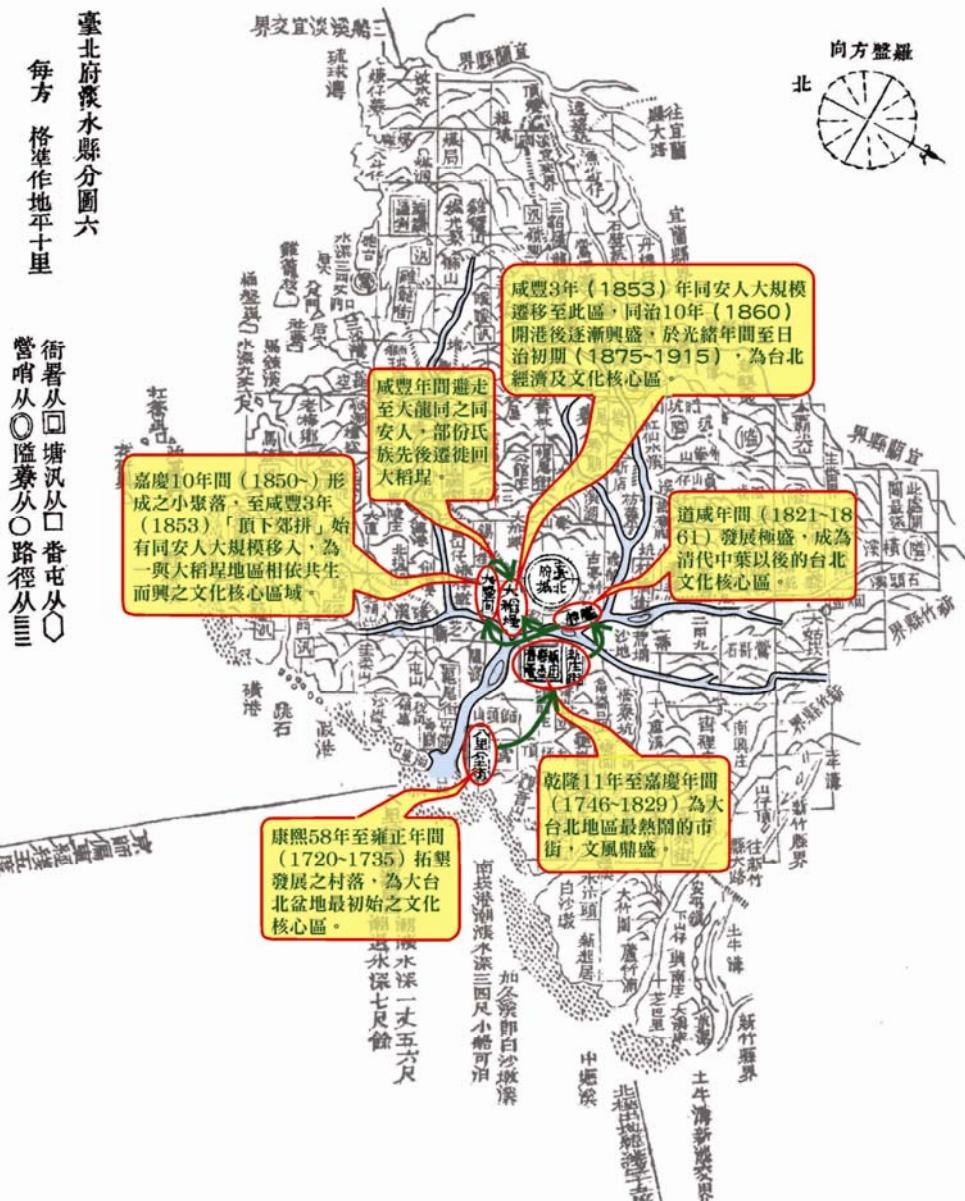
²⁹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³⁰ 關於臺灣書院及儒學教育，可參考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12~37；以及黃秀政，〈清代臺灣的書院〉，《臺灣史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 129~135。本文在此不復述書院教育的發展及儒教事業，僅就早期臺灣書院之設置於文化場域生成之間的關聯性。

方之文化勢力，經常由在地仕紳所主導，仕紳通常對於政治、社會、文教等地方事務的參與不遺餘力，且參與態度多半積極，一方面士紳藉由書院及文化教育的介入，推展地方文化事業；另一方面亦因此可以與官府有較多的接觸機會，以鞏固其社會地位。³¹ 明志書院在乾隆46年（1781年），在竹塹地方士紳極力爭取及捐資之下，遷移至淡水廳城內（即今新竹縣），使原址改稱為「新莊山腳義塾」。從此一事可知，當士紳們漸漸擁有經濟及政治勢力之後，隨即重視到文教的重要性，是以嘗試各種管道，或透過關說、或透過經濟捐輸，以競相爭取該區域文化主導權。而文化勢力的競逐，隨著區域和區域之間的角逐、族群和族群之間的競爭，甚至因城市與城市的消長與興衰，使文化核心在經濟、空間與權力的支配之下，不斷產生轉移、解構、擴張、生成等變遷，使文化場域呈顯出流動、詭變卻又活躍的豐富面貌。下圖以《臺北府淡水線分圖》為參考底圖，我所繪製之箭頭及標示，為大臺北淡水河流域文化活動核心區的轉移路線。本圖指出，臺北盆地的文化區位隨著經濟利益的開發，從出海口八里坌一帶，逐漸往上游發展，繼而新莊—艋舺—大龍同及大稻埕等地，先後因歷史、政治、經濟等人文因素之影響，而逐次形成大臺北文化的主導核心區域。



³¹ 擁有科名的士紳，亦受官署及地方人士的敬重，經常在地方訟案、具保陳情等事務上參與甚多，且士紳經常亦與地方商賈合作，從事經濟投資事業，這現象尤其在北臺灣特別明顯，這也是造成日後北臺族群械鬥，經常與士紳、商業利益牽涉有密切關係。



圖片說明：本圖以 1880 年《臺北府淡水線分圖》為底圖繪製、標示而成。

觀察歷來文化核心區域不斷轉移的變異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地之文化主導區位，並非恆常固定於特定空間中，而是具有流動與變異的特質，當然促使文化核心區位改變的因素通常極為複雜，包含著政治、經濟、歷史、族群等人文因素的交互影響，這些促使空間轉化的變因，以及歷經變異下之文化核心空間所呈顯的人文意涵，亦是本文接下來所要持續關注的焦點。

三、仰賴民間權力文化網絡興起的艋舺

繼新莊之後，臺北平原另一聚落隨之興起。位於淡水河中游的艋舺，因地理位置正當下游大科嵌溪、淡水河與新店溪等河川之匯流點，故從經濟面而言，擁有比新莊更具優勢的地理位置：同時兼備了與中國大陸對口貿易的商港，以及對

島內貨物集運或轉口之腹地機能。³² 蟬舺自古即為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的聚落，在清代以前即為漢人與平埔族的交易場所，雍正元年（1723），漳、泉墾民逐漸聚居於紗帽廚番社之故址大溪口（今貴陽街二段與環河南路二段交界），因正當水陸交通要衝，故貿易興盛，在乾隆初年始有商號匯聚，至嘉慶年間已是商機鼎盛，商人的同業組織「郊」紛紛出現。³³

中國市街的興起，Prsdenjit Duara 指出不只是市場因素而已。在傳統中國，市場經濟原則並不會單獨運作，而必定與廟宇、行會、宗族等各種組織原則融合運作，並在空間的某些節點上展現出來，這種節點稱為「權力的文化網路」。³⁴ 最早拓墾蟬舺一帶之居民，為泉州之晉江、惠安、南安等三縣人，通稱為「頂郊人」，居民以龍山寺為信仰中心，³⁵ 由信仰所組織的宗教事務，以及透過宗教所發起的團體結社，發揮凝聚人民對地方認同的力量，加以蟬舺地區聚集的各郊及宗族團體，促使以三邑人為主的蟬舺市街，在商業、信仰、宗族活動的交織下，益加繁榮。《東槎紀略》記載道光年間之蟬舺港埠繁華、景緻如畫的景象：「五里渡大溪至蟬舺，途中山水曲秀，風景如畫。擺接十三莊，在其東南，為北路第一勝境。蟬舺民居鋪戶約四五千家，外即八里坌口，商船聚集，閩閩最盛，淡水倉在焉。同知歲半居此，蓋民富而事繁」³⁶。蟬舺商郊雲集、經濟活動之興盛，由此可見。

從文化的面向來看，蟬舺市街主要任務即在流通領域中，達成對農業剩餘的掌握與佔有。³⁷ 藉由郊行組織的操作，一方面運用移墾的地緣及血緣關係，作為社會群體的主要組織方式；另一方面其行政管理機能，如社會救助、商事協調甚至擔任械鬥的指揮與組織，另外在交換過程中掌握與中國大陸對渡交通的管道，控制商業利潤的分配，並提供力墾者生活用品之服務。民間信仰團體、宗族結社、以及郊商勢力的錯綜連結網絡，構築出蟬舺一帶雄厚的經濟實力，於是該地移民逐漸增加，人口聚集，經濟及人文地位更形重要，嘉慶 13 年（1808）年，清廷原本打算將新莊縣丞移駐蟬舺，雖未完全實施，然益顯蟬舺重要性提高，漸勝於新莊，翌年清廷設水、陸軍備於此駐防。³⁸ 道光 17 年（1837）設立「文甲書院」，為繼新莊明志書院後，清廷在大臺北地區設置的第二座書院。³⁹ 道咸年

³²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 47。

³³ 黃富三編著，《臺北建城百年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5 年），頁 6。

³⁴ Duara 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 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1995），頁 122~127。

³⁵ 蟬舺龍山寺為泉州頂郊三邑人，於乾隆 3 年（1738）年，奉晉江縣安海鄉龍山寺觀音佛祖分靈來臺所創建，為蟬舺居民信仰中心。以寺為核心擴展之市街，包含今歡慈市街、大溪口街、舊街、新店街、龍山寺街一帶，為老蟬舺的發源地，亦是早期商行聚集的據點。

³⁶ 姚瑩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東槎紀略》，（臺北：臺灣銀行，1957 年），頁 90。

³⁷ 廖春生，《臺北之都市轉化：以清代三市街（蟬舺、大稻埕、城內）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頁 40。

³⁸ 隔年水師「臺協右營游擊」移駐，道光年間升為「參降」，成為北臺灣水路統管的指揮官；陸路守備方面，則設「蟬舺營陸路中軍守備」嘉慶 24 年（1819），始建營屬，道光 5 年（1825）升游擊為參將，於是成為臺灣北路政治與軍事中心。參考陳培桂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淡水廳誌》（臺北：臺灣銀行，1963），頁 172、204。

³⁹ 「文甲」為「蟬舺」之雅稱，文甲書院為道光 17 年淡水同知婁雲創建，至道光 23 年（西元

間，艋舺市況已臻於極盛，相較於當時僅為「大村市、居民近千家」⁴⁰的新莊，艋舺代之而興，大臺北的文化主導核心區，於清代中葉以後，從新莊轉移至艋舺，而成為北臺灣人文、經濟與行政治理之核心。

從當時城鄉關係及社會結構來看，艋舺具有實質的支配力量。此地為臺北盆地移墾管理與生產交換的中心，加以當時封建的自然經濟體制，亦成為北臺灣農業剩餘與中國對渡貿易的集結點。聚居在此地的人士，多為郊商、墾首、地主、埠圳主及官僚等上層階級人士，掌管北臺灣的政治與經濟，亦擁有龐大的文化主導權勢。

四、北臺「中心」爭奪戰：從族群對峙說起

北臺灣文化的中心，早期從新莊發跡，隨後由於港埠經濟模式的擴張，於清代中葉以後轉移至艋舺。然而艋舺的文化榮景持續到清末，卻有了重大的改變。一場在臺北地區發生大規模血腥事件「頂下郊拚」，扭轉艋舺文化核心的地位。

在討論艋舺文化核心場域之轉移之前，我們先從大稻埕⁴¹的發展談起，在康熙 36 年（1697）以前，均為平埔族居住地，番社名為「奎母卒」（或名「奇武卒」，後改稱「奎府聚」），後因陳賴章墾號⁴²開墾大加臘堡，大稻埕即其一部，使漸有漢人往來期間，從事開墾工作。自此至咸豐初年近一百三十多年，即使當時的艋舺已成繁華市街、大龍同亦已形成一聚落，然此地仍是一片寒村，人煙稀少。⁴³

大稻埕之名，最早見於同治 10 年（1872 年）陳培桂所修的《淡水廳誌》。⁴⁴此地開始有漢人在此經營，為咸豐元年（1851），林藍田自基隆移居大稻埕中街（今迪化街一段），建築店舖三幢，店號為「林益順」從事與中國大陸之貿易，然此時四處皆為水田，被稱為「小村」，人煙疏落，僅淡水河偶有船隻停泊。⁴⁵原本僅為小村的大稻埕，其發展的轉機，在原本被同安人視為舉族災難的「頂下郊拚」械鬥事件。戰敗的下郊人，奉護霞海城隍之金身，舉族逃離至大稻埕：

我霞海城隍爺，明朝武宗正德間賜以臨海門匾額，霞海即臨海門分廟……道光年間，海內陳金綫氏奉載來臺，初居於艋舺八甲庄，假店舖為祠廟。至咸豐

1843 年）由繼任同知曹謹續成。道光二十七年（西元一八四七年）閩浙總督劉韻珂巡視臺灣，易名學海，並題額曰「學海書院」。同治六年（西元一八六七年）所設艋舺義塾，及光緒五年（西元一八七九年）新置淡水縣儒學亦附設於此。

⁴⁰ 姚瑩，《東槎紀略》，（臺北：臺灣古籍），2003，頁 90。

⁴¹ 大稻埕為舊地名，地理位置屬今臺北市行政區域之大同區，在民權西路以南、忠孝西路以北、西臨淡水河、東至重慶北路一帶。

⁴² 「墾號」為清代以土地開發開墾為主、向清廷申請合法開發的合股團體。陳賴章為該綜合合股人姓名的該團體名稱，指泉州人陳天章、陳逢春、賴永和、陳憲伯、戴天樞於 1709 年為了合股開墾大臺北地區而成立的團體。

⁴³ 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7），頁 7。

⁴⁴ 當時農家每逢收穫，就把成捆的稻穗搬到淡水河岸曬，因而該大曬穀場地被稱為大稻埕，別名「稻江」。

⁴⁵ 黃得時，《臺北市發展史：疆域與沿革》（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頁 42。

三年漳泉民鬥，神座累災被焚，先是海內林礬氏等，急將金身護衛，遷徙於大稻埕之杜厝街陳金絨氏嗣陳浩然之金同利舖中，是時保護神像不願捐軀，除林礬數氏奮鬥郭圍外，餘竟遭禍陣亡者三十有八人。⁴⁶

下郊人在戰後一片悽慘之景下，落難至大稻埕另起爐灶，然此危機反而成為同安人翻身的契機，咸豐十年（1860）淡水開港，同治元年（1862），清廷允將淡水港界擴充，包括大稻埕在內，外商可溯上淡水河到艋舺、大稻埕經商，⁴⁷ 於是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外商，西方國家除在當地設置領事館之外，並沿河岸設立洋行、商號，與當地臺人合作經營茶與樟腦的貿易，貿易點擴展至北美、歐洲，促使大稻埕的經濟地位逐漸取代原本最熱鬧的艋舺地區，成為臺北最繁華的市街。在洋行經營與改進茶葉生產技術下，大稻埕出口的茶葉成為臺灣北部最重要的輸出品，臺灣茶的身價大漲，而輸出的茶葉全在大稻埕加工及外銷貿易，因而為此區帶來了巨大的財富，造就大稻埕經濟榮景。⁴⁸

自此之後，大稻埕茶商尤為風光，既擁有雄資，復有社會地位，一般行商莫不以茶商馬首是瞻，⁴⁹ 這亦使大稻埕有機會成為商業中心聚落，加以此時整個世紀環境在改變，大稻埕的商人亦了解這股世界潮流，將貿易對象從中國內陸轉為國際貿易，在1887~1889年間，茶葉的出口值佔了總出口的九成以上。⁵⁰ 大稻埕由於一改郊行之間的惡性競爭，而以郊行合作的方式從事貿易，並積極與洋商合作，一方面改善生產品質，一方面擴大生產規模及茶葉市場，因而使臺灣茶順利推銷到國際，獲利極為豐潤，一躍成為北臺灣的商業中心。械鬥敗陣的同安人，反而因禍得福地在大稻埕開闢全臺前所未有的商業榮景與文化版圖，1896，根據馬偕傳教士的估計，大稻埕人口達三萬人，繁榮程度已超過了人口約兩萬三千人的艋舺。⁵¹

一般習從純粹經濟的觀點，來理解艋舺沒落的成因，例如認為艋舺河港淤積，⁵² 致商船不易進入，使港口逐漸蕭條，或從大稻埕的興起，使資源支配權轉移至大稻埕地區，致艋舺失去經濟主導地位而沉寂。而本文之旨趣，將著重於

⁴⁶ 此乃1934年（日昭和9年），臺北霞海城隍派下海內會所編沿革誌所書，文見黃得時，《臺北市發展史：疆域與沿革》（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

⁴⁷ 清廷於1859年英法聯軍之役中戰敗，被迫履行1858年簽訂之「天津條約」中開放臺灣為通商口岸之規定，並於1860年新訂「北京條約」，闢臺灣四口通商口岸，淡水河港即其一。

⁴⁸ 咸豐11年（1861）以前，臺灣茶葉僅銷往中國大陸，雖當時茶盛，但僅栽培粗製茶的茶欒。大稻埕開港後，英國人杜德（John Dodd）來臺，見北臺各地茶欒品質優良，土質適合，於是從安溪輸入茶苗，貸款資金給農民，鼓勵農民栽培製造。因茶芳香馥郁，香味特殊，廣受外國人好評，進而投資，廣設茶館於大稻埕，著手精製，臺灣之烏龍茶於是濫觴於此。被稱為Formosa-tea的烏龍茶，成為臺灣茶的代表，一躍而入國際貿易舞臺，成為臺灣最重要的出口產品。

⁴⁹ 直至日本統治前後，臺北茶商之分布，除北門外街一家，府後街六家之外，餘均開設於大稻埕，計有252家。參見王月鏡主修，《臺北市誌卷六 經濟志 工業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13。

⁵⁰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8），頁88。

⁵¹ 溫振華，〈淡水開港與大稻埕中心的形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6期（1978.05），頁245-270。

⁵² 淡水河港之淤積，多為臺北盆地之原住民，因漢人之強勢移墾，故被迫退入附近山區，因實施火耕之故，伐砍森林，水土流失，加速河川淤塞。

探討傳統社會居民於空間資源爭奪下，產生之強烈地方感而形成之保守排他性，而此亦是致使艋舺失去經濟與文化主導權勢的主因。舉例來說，咸豐 7 年（1868）的艋舺英商寶順洋行事件⁵³，由於艋舺人的保守與排外，使洋商在此地亦吃了閉門羹，轉而至大稻埕發展商機。依天津條約的內容，淡水的開港，艋舺與大稻埕皆屬外商可及的通商口岸之範疇，但經濟資本較為雄厚的艋舺，卻將商業利益拱手讓出，反由長期與之對峙的大稻埕人捷足先登。

傳統臺灣的聚落，因移民社會所衍生之族群分類、紳商關係交織所形成之團體經濟利益，以及空間環境所引致之文化意識，使內部糾合成複雜的集合體，即所謂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⁵⁴，而這想像的社群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形成了各自體系之「認同」（*identity*）⁵⁵，是以兩個社群的接觸，就如同兩個不同論述（*discourse*）與認同之間的碰撞，在這個異己世界逐步連結的過程中，雙方以自己的方式定義著彼此，使得「族群意識」、「文化」、「地域主義」開始產生意義⁵⁶，是以即使艋舺長期穩居政經及文化地位主導中心，但地方紳商對於區域資源的運用卻保守而排外，不容資源共享，也不願與外人合作共榮，這種保守的排他性格，表現在咸豐年間多次的血腥械鬥，以及排拒外商洋行合作經營的事件中，這些事件才是導致艋舺在經濟上沒落、文化主導權逐漸喪失的主因。

咸豐三年的頂下郊拚事件並非使艋舺地區械鬥因此終止，反而因各地方之間的零星衝突與認同排斥，後續於咸豐五年、六年、九年、十一年皆發生大大小小的械鬥事件⁵⁷，艋舺皆牽涉其中，分類仇恨在此經常是一觸即發，接連烽火連綿，傷亡慘重，每見遍地悽楚：

君不見龍山寺口白旛浮，香壇煙繞風颼颼？是日陰霾匝地氣悽慘，新鬼故鬼聲啁啾。不知妻哭夫兮父哭子，但聞哭聲震天天為愁。去年蠻觸苦相怒，忽地烽煙不知故；朝驅子弟尋仇家，暮挺干戈逢狹路。生靈刈盡村為墟，碧血消沈萬骨枯；化作蟲沙歸未得，魂招何處徒嗟吁！嗟吁魂兮歸來些，莫向沙場猶醉臥！懺悔應悲殺業償，皈依且禮空王座。空王座下眾生愁，汝曹任俠夫誰尤！何不荷戈去殺賊，死為忠義猶千秋！⁵⁸

⁵³ 寶順洋行為蘇格蘭商人 John Dodd 於 1866 年在淡水設立的英國洋行，經營茶葉貿易。1867-1868 年間，為設廠製茶而發生艋舺租屋事件，引發地方衝突與外交糾紛，乃轉往新商業中心大稻埕開設行棧。

⁵⁴ 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步》（臺北：時報，1999）。

⁵⁵ Hall Stuart, *Minimal Selves Identity : The Real Me*, London : ICA, 1987.

⁵⁶ John and Jean Comaroff,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Boulder : Westview Press, 1992 : 33.

⁵⁷ 參考林偉盛，《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臺北：自立晚報，1993），頁 130~152。

⁵⁸ 作者林豪（1831-1918），字嘉卓，一字卓人，號次逋，福建金門人。相關資料可見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 80~81。林氏在 1862 年東渡來臺，在 1863 年秋天林占梅邀往潛園之前，都寓居在艋舺（今臺北市萬華區）期間恰逢龍山寺設道場追悼械鬥死難民眾（可能是在中元節），因而作有〈招魂曲〉一首，其自序云：「淡北自丁巳、戊午間連年分類械鬥，死亡者以萬計。事平，里人為道場於艋舺龍山寺，超薦亡魂。時陰雨連日，天色愁慘；余感之，為此詩也」。

從陳維英充滿惱怒與悲傷的作品，可知當時在族群分類意識下所造成的傷害，以及親不認親、以籍故論敵我的無奈：。「遏抑多方惱煞予，奈天降禍莫驅除！泉漳閩粵分偏合，翁婿舅甥親亦疏」⁵⁹，雙方長年敵對，今日血腥械鬥，造成生靈塗炭、屋毀人亡。此地哀鴻遍野的情景，令人鼻酸：「搆兵秦、楚十三年，今日干戈更蔓延；塗炭生靈灰屋宇，萬民雙淚一聲天！」⁶⁰。戰火蔓延中，敗走的下郊人於是扶老攜幼，舉族沿淡水河以北荒地倉皇而逃，一部份逃至奎母卒（即大稻埕），闢地而居，另一小部份則播遷至更北的大浪泵（即大龍同）⁶¹，這些逃亡的過程，以及各氏族最後安居的空間，其實也揭示了臺北文化場域的流轉與變遷。

從文化的觀點來看，彼此「血緣相同、語言可以相通的群體」其實亦可能存在著長期相互對立，這種文化分立，表現在生活各種人、事、物上，且是一種文化選擇過程，即個人的自主性容許個人對文化的接受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兩方人民在這種文化差異，則是長期緊張下「故意唱反調」所製造出來的文化分立，⁶²這也是我要探討的焦點，即究竟是誰在造成族群對峙與械鬥？而械鬥的原因除了族群認同以外，還隱藏著哪些權力因素？

艋舺地區的三邑人，因其長期在當地經營所積累的社會網絡與資本，不論在宗教信仰、資本實力及文化支配力上，都有穩固的領導基礎。透過集體的密切聯繫與活動參與，即使居住在相同地區的人和人之間，亦有地方感屬性的差異，但也因為這些個體之間客觀而真實的差異，讓每一個獨特的意識構成累積之下，構成異中取同、以廣義意識型態相互連結的地方感，⁶³而這「廣義的意識型態」，經常是以現居地的利益，夾雜祖籍地的標記，所產生的集體感覺結構，即個體和群體在特殊歷史情境，參與時空與結構歷程的產物。⁶⁴

即使先於艋舺開發的三邑人，與後來此地拓墾的同安人，兩者皆來自於中國泉州，但因文化選擇所形成之意識型態，加上強烈地方感所造成之排他性，引發

⁵⁹ 陳維英，〈癸丑八月八日，會匪激成分類，蔓延百里，誠可哀也〉其一，《偷閑錄》（臺北：臺大影印本，未出版）。

⁶⁰ 陳維英，〈癸丑八月八日，會匪激成分類，蔓延百里，誠可哀也〉其二，《偷閑錄》（臺北：臺大影印本，未出版）。

⁶¹ 據史料記載，原逃至大浪泵之下郊人為數較多，初抵之時，以保安宮為中心，興建攢寶輪形之居宅，距料興工未久，即遭兩度之「四九日黑」，霪雨霏霏，數月不清，致使蜃壁坍塌，無法重建，故此批下郊人除部份留居於此外，餘多退回大稻埕，以謀發展。參照黃得時，《臺北市發展史：疆域與沿革》（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頁 40。

⁶² 林美容，〈族群關係與文化分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 (1990.06)，頁 93-106。

⁶³ 文中關於「地方感」之理論，參考 Allen Pred ”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Behavior*, Vol. 13 No.1, March, p.45~68.中文譯者為許坤榮，文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1993），頁 86~92。

⁶⁴ 參考 Allen Pred ”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Behavior*, Vol. 13 No.1, March, p.45~68.中文譯者為許坤榮，文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1993），頁 94~95。

大規模械鬥，致使下郊來的同安人，被迫離開頂郊人居住的空間，另覓歸屬之地。在空間與利益的爭奪，形成兩地文化分立，於是臺北文化圈形成一南一北各自發展的型態。陳其南認為，清代臺灣從 1639 到 1899 年的兩百多年中，是臺灣漢人從移民社會（immigrant society）走向「土著化」（作者註：或為「本土化」）（indigenization），變成為「土著社會」（作者註：或為「本土化社會」）（native society）的過程，初期的臺灣漢人移民社會，可說是中國大陸傳統社會的連續和延伸，而「移民社會」的性質就是原傳統社會的移植和重建過程，⁶⁵ 即移民從「認同祖籍地」，轉而為「認同現居地」。頂下郊以族群、祖籍之分類，所引發的械鬥，而械鬥的結果，使得兩方人各據一方、各自發展各區域的文化，形成更穩固的地方認同感。

械鬥成員之首，多是地方鉅富、舉人及科名之士，且排拒洋人者，亦為擁有豐厚經濟及文化勢力之三邑郊商及士紳。比較臺灣其他時期及其他地方的械鬥成員，艋舺地區文人聚眾滋事、干戈起義的情形尤其顯著。⁶⁶ 掌握經濟與文化主導權勢的富商與地方文教之士相互結合，保護「地盤」——所謂核心主導區域，將「我們」之外的所有力量強拒於外，意圖以核心—邊緣之優勢，企圖持續鞏固核心勢力。

清廷對於臺人械鬥的態度，採取表面知悉關切、實質上卻放任其滋生之態度，地方官可以故意不去理會民間的械鬥，以減低治理成本，並有效分化地方勢力、消耗臺灣島內民間資源與氏族力量，官方檔案記載：

臺灣地方向分漳、泉、粵三庄，伊等類聚群分，遇有事端，彼此轉得互為牽制……，該處民情不睦，亦只可聽其自然，倘有械鬥仇殺情事，地方文武原可隨時查拿，按事懲治，但此意該鎮道惟當默存諸心，又不可使漳、泉人知覺，轉啟朋比為奸⁶⁷

清廷以消極的方式，藉民間族群對峙之力行分化之實，有效避免了地方勢力結合；地方紳商之首⁶⁸ 藉由祖籍分類之對立關係，以及護衛祖祠所信仰之神明等忠義事蹟，⁶⁹ 以使於有限空間中的經濟利益爭奪行為，找到合理動員的實質理由；而人民因利益共享與祖籍、宗族信仰之區辨——儘管有的時候，這種祖籍的分類，是受國家政治利用、被「封賞」，或是自我「認為我就是某某人」的歷史

⁶⁵ 陳其南，〈臺灣本土意識與民族國家主義之歷史研究〉，《傳統制度與社會意識的結構——歷史與人類學的探索》（臺北：允晨，1998），頁 169~203。

⁶⁶ 資料參考林偉盛，《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臺北：自立晚報，1993），頁 130~152。

⁶⁷ 此為乾隆轉諭臺鎮道楊廷理的文書記載，收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天地會（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

⁶⁸ 例如頂下郊拼之中，領導械鬥的兩方，主要是郊商之首。三邑人方面主要有黃三桂、黃龍安、林森等紳商，在同安人方面，主要有林佑藻及陳柳，他們都是當時泉郊、北郊及廈郊的富商。

⁶⁹ 三邑人渡海來臺時，即以「奉媽祖……，同安人則奉霞海城隍爺，而即使敗走，亦以保護金身為名，力抗敵匪……。相關資料可見該寺廟網站簡介。

情境建構中形成⁷⁰——產生了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 的社群型態，而這種社群的衝突，產生了空間分配的緊張與對立，故藉由對於非我族類的隔離與驅逐，以達到擁有空間與文化主導權的安全感。

此一現象，使臺灣島內形成各自分散割據、隔離自生的點狀聚落分佈形勢，這些地方社會，透過與其他地方社會的差異 (difference) 來建構起自我的認同 (identity)。這情勢如同之前所提，在清朝政府尚未正視臺灣之重要性之前，「臺北」不是一個令人想像得出來的「地方」。住民的地方感，僅侷限於自身所居之區域的認同，顯然對於臺灣北部人而言，他們從移民社會走向本土社會的改變是：從認為「我是泉州人」轉變成「我是艋舺人」或「我是大稻埕」人，但不會肯定而絕然地認為「我是北臺灣人」或「我是臺北人」。清代臺灣的「本土化」階段，尚在於建構現居地的認同，故在此之前，我們所討論的文化核心區，是封閉而單一的體系，它是區域型獨立發展之傳統文化傳播方式。

在清廷消極的放任態度下，臺灣島上人民 / 族群的組織及文化生產，非仰賴強而有力之國家權力，亦非以現代文化工業之途徑，進行大規模文化生產及傳播。北臺灣在清末既成了全島人口最密集之商業中心，但「臺北」的概念，以及以「臺北」作為一個核心場域、並以其文化勢力影響全島之能量，尙未成形。這有賴政治治理的力量，以行政力與宰制性的制度穿透地方，並影響地方日常生活與內在經驗，使文化在更有機制的傳播下，進行整合、交流與拓展。

抗拒文化他者的結果，使艋舺喪失了優勢，一方面知曉內情的清廷，實質看準了這些富豪與文士在地方如何地藉由空間的爭奪與勢力的膨脹，反自我削減能量，而坐享節省統治成本之利；二是艋舺因連年械鬥，民不聊生，經濟實力一蹶不振，加以瘟疫接踵而至，更使屍骨遍地，落魄淪為乞食者眾⁷¹。三則使文化主導權隨民生凋敝而逐漸喪失，械鬥之後，不乏有文人士族死傷者，亦有優秀人才因此舉家遷徙。⁷² 清末由於分類械鬥之波及，北臺灣經濟及文化核心區域開始有了轉變，到光緒年間，經濟及文化勢力向北轉移，各在大稻埕及大龍同地區形成聚落，而兩區之間在彼此互通與支援之下，直到日本統治時期，不論在經濟或文化實力，皆為北臺灣之核心地區，亦一躍成為全臺之首，而臺北因此成為全臺經濟及文化之核心首都。

五、經濟與人文共生：兩個文化圈的共構成形

在進行文化核心空間的研究之時，還需留意一個現象，即區域與區域之間經常存在資源整合、秩序編派的特性。城市核心除因區域機能的轉變而發生轉移現象之外，亦會因積累與生產的需求、資源的爭奪，以及社會的分質化等因素，促使舊有核心在不平衡的擴張中形成分化及內部排斥現象，致原本為邊陲的小區域

⁷⁰ 見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 103。

⁷¹ 參考王詩琅著，張良澤編，〈臺北乞丐考〉，《艋舺歲時記：臺灣風土民俗》(臺北：海峽學術，2003)。

⁷² 例如舉人陳維藻敗死於郊拚之中，後陳氏家族遷至大龍同，隨之而去的有附生陳柳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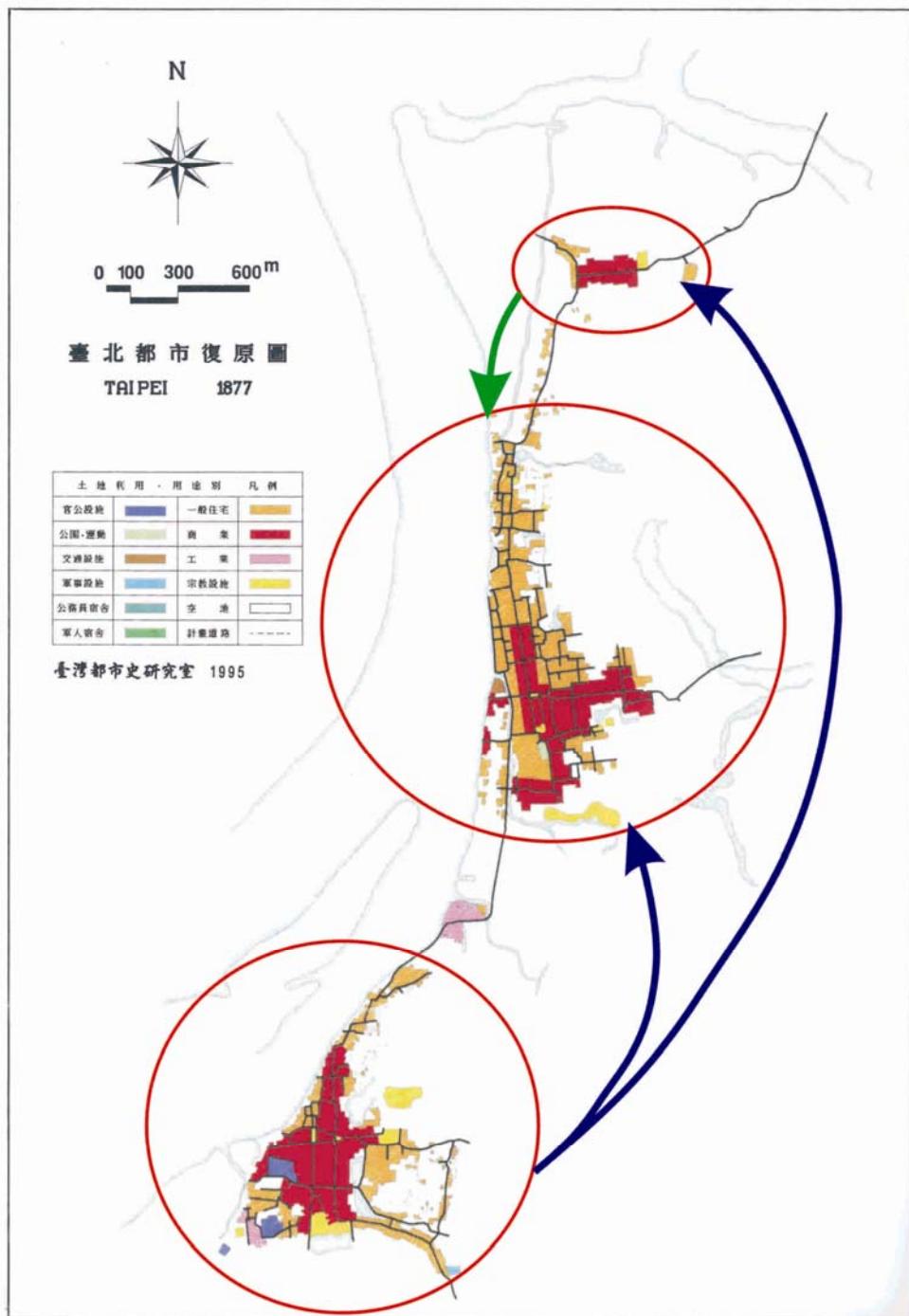
藉由彼此合作及經濟依附模式，以抵抗舊有之核心，最後成為雙核心整合，以經濟和文化核心共構成主導文化場域的現象。

從上述的基礎，我以大稻埕和大龍峒兩區域的文化勢力結盟作為說明。⁷³ 清代中葉以後，中國渡海來臺拓墾的人口倍增，傳統集居而成的聚落空間已不敷需求，加以經濟結構與社會網絡的複雜化，艋舺一方面市街急速向東擴展，一方面由族群認同增生的「地方感」，造成了強烈「排他」的意識，即原本居住於此地的頂郊人，在持續擴展其地方經濟、穩固其社會組織之後，對於外人的遷入與共享資源，即無法予以融攝。於是在激烈的械鬥之下，敗走的下郊人分別逃至邊陲地區：大稻埕以及大龍同兩地，而此兩區在一片荒涼水田之中各起爐灶，依其地理位置及經濟資源，彼此支援、共榮互生，故在有清一代，大龍同在與大稻埕區的合作之下，首先形成了一個新文化核心區。

大稻埕開發時間雖晚於大龍峒，卻因商業強度高於大龍峒，加以兩區之地理與人文相近，使大龍峒在產業上高度依賴大稻埕。當然大稻埕的商業榮景，亦帶動大龍同地區之產業發展，大龍同之花業即依附著大稻埕茶葉興起，種植配合飲茶之花茶、花卉產業，支持大稻埕成為經濟中心的地位。而大稻埕接續此一經濟基礎，在開放成為國際化的港口之後，又更進一步發展成為主導全臺灣文化的核心區。圖中以清代臺北聚落的復原圖作為底圖，標示了咸豐年間以後，臺北文化主導核心場域的變遷進程，並指出大稻埕與大龍同之間的相互輔成的雙核心文化空間概念：



⁷³ 在 Jonathan 的《文化認同與全球性過程》中，討論全球體系的地域結構，關於文化中心/邊陲結構、文化霸權和抵制性的認同，以及支配性和從屬性的文化現象，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發。然而歐美之文化核心理論強調全球化語境，對於研究臺灣清代地區文化現象的適用性固然有一定之局限，臺灣本土的狀況不同於歐美世界，以清代傳統社會來說，掌控文化核心之內部因素有廟會組織、信仰之神主對象、族群分野以及宗族勢力等；外部因素則有郊商合謀、經濟利益、水利爭奪、清廷施政態度等變因，這些才是影響大臺北地區文化核心變異之主要因素。故本文討論此概念，僅運用名詞意涵，以重新勾勒臺灣文化圈核心轉移之現象，而非於全球化下之語境中探討。參見 Friedman Jonathan 著，郭建如譯，《文化認同與全球性過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圖片說明：本圖以黃武達臺灣都市史研究室於1995年所繪之《1887年臺北市都市復原圖》為底圖，加以標示、繪製而成。

漢人在大隆同⁷⁴ 地區的拓墾，在臺北盆地僅次於艋舺，且開發的時間是要

⁷⁴大龍峒位於臺北市之西北隅，今名為「大龍峒」。此地原為平埔族凱達格蘭族之「巴琅泉社」（或作大浪泉，音 Paronpon），清初漢人入墾，尤以同安人為多，至乾隆中葉，正式成立大浪泉庄，旋改「大隆同」，有「興隆」「同安」之意。參見黃得時，《臺北市發展史：疆域與沿革》（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頁38。

比大稻埕為早。自嘉慶十年（1850），居住此地的同安人聚資捐建保安宮，居民信仰中心形成，街肆以此為核心出現，商業日趨發達，人口亦逐漸稠密。⁷⁵「頂下郊拚」發生後，艋舺同安人部份逃至大稻埕，另亦有部份即以大龍同保安宮為中心，漸定居於此。此地依山傍水，地靈人傑，有清一代之中，大龍同人才輩出，碩士如林，尤其是道咸以後，鴻儒競秀，不分軒輊。根據記載，至同治年間，先後中試舉人者六人，秀才不可勝數，極一時之盛，故有「十步一秀，百步一舉」之譽。⁷⁶繼艋舺學甲書院之後，咸豐3年（1853），在當地舉人陳維英的主導下，成立「樹人書院」於保安宮內，從此以後，春絃夏誦，蔚為文風。以北臺各聚落人口作相對比較，從1825到1890間，大龍同出現八位科名人士，相較於人口較多的艋舺，只出現九位，表示北臺科名密度較高的地方在大龍同。⁷⁷

清末臺北人文活動的核心區域，從經濟面來看，應以大稻埕為中心，但從文化面而言，大龍峒地區才是勝場，兩地之間長期存在著共生現象，事實上亦呈揭示著傳統社會空間模式逐漸在被賦予繁複機能之後，所自然形成的分工現象，意即兩區域分別承載了經濟資本與教育文化的空間機能，並在區域合作之下，逐漸掌握臺北地區的經濟與文化主導權勢。

第三節 「首都」的文化雛形

一、「城」：兩股文化勢力的緩衝地景

光緒元年（1875）臺北設府，乃源於沈葆楨為平衡臺灣南北地位失調之奏請，其〈臺北擬建一府三線疏〉中謂：「伏查艋舺當雞籠、龜崙兩大山之間，沃壤平原，兩溪環抱，村落衢市，蔚為大觀；西至海口三十里，直達八里坌、滬尾兩口，並有觀音山、大屯山以為屏障，且與省城五虎門遙對，非特淡蘭扼要之區，實全臺北門之管（鑰），擬於該處創建府治，名之曰臺北府。」⁷⁸儘管臺北在光緒帝首允之下設府，但在皇權時代的中國，大規模的公共建設經常會藉助大量的地方資源，尤其是府治的建設，不僅需要城牆、城門、城樓等基礎建設，另外尚需衙門、祭壇、廟宇等，不論在資金或是工匠，勢必需要民力支援，⁷⁹這種政府與地方勢力的合作，亦呈顯出地方勢力及族群角逐的現象。

令人玩味的是，在清代中葉中國大陸已陸續毀壞城門之時，臺灣卻興起了築城的潮流。尤其臺北府城的設置，為時甚晚，其設置之意甚至不在「防禦」，而在於凸顯地方的重要性，以及成為族群角逐的緩衝舞臺。

⁷⁵ 黃得時，《臺北市發展史：疆域與沿革》（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頁39。

⁷⁶ 黃得時，《臺北市發展史：疆域與沿革》（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1），頁40。

⁷⁷ 關於大龍同、艋舺、大稻埕三地中試統計，可參考王榮鋒，〈北市科第表〉，《臺北文物》9:1(1960)，頁24。

⁷⁸ 沈氏以北臺已闢，列國覬覦，乃奏請設府，即臺灣北部應設「一府三縣」，即「臺北府」及「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該疏係沈氏於光緒元（1875）6月18日之奏摺，收入沈葆楨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臺灣奏摺》（臺北：臺灣銀行，1959）。

⁷⁹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111。

從清帝國治理的觀點而言，臺灣其實不宜設城，其因由於臺灣位處邊區，民亂頻繁——即使此「亂」經常是清廷所暗許，築城反使亂賊有城牆可守，清廷反而不易調度各地鎮兵平亂，⁸⁰ 嘉慶年起，各縣城士紳紛紛主動要求築城，而築城之舉，多是國家消極、地方積極運作：士紳提議、監工、募款，並與官府交涉、出資動員，甚至為了拼「面子」，上書要求清廷將竹城改建成石城，以能和其他以石頭築城的城市互相抗衡，凸顯該城市的重要性。⁸¹ 地方社會藉由「築城」運動，一方面士紳們藉此發揮社會實力，以凝聚地方意識的方式，表現自我身分地位於地方之影響力；一方面亦以炫耀本地之經濟規模與教化水準，已達到一定之水平，以此自我肯定的方式，展現「屬於我們的」地方認同。

光緒元年（1875）臺北設府，使艋舺及大稻埕兩區之社會力量再度相遇。雙方士紳即使在郊拼之時械鬥慘烈，但參與築城工事之時，卻又很巧妙地在彼此之間形成均衡的勢力制衡，從蘇碩斌根據伊能嘉矩《臺灣文化誌》所載之十四名築城董事成員背景之資料統計可知，臺北的建城，參與咸豐年間械鬥的各個分類單位（如泉州、漳州二府、三邑、安溪、同安等現），都平均分配於名單之中，⁸² 此外，臺北城擇址於艋舺及大稻埕之兩區中間水田空地，在此居間築起高高的城垣，藉由實際的、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文化地景，分隔了艋舺與大稻埕兩地，並使清廷有效控制與平衡兩區域的族群矛盾與發展。「隔離」成了兩造互不相容的文化區域，最佳的對話方式：透過隔閡，得以在各自的文化／經濟領域裡獨立發展，凡有關於兩者利益之事或爭端，則城內相見，在官署之中一較分明，而城門關起之外，一個臺北，兩個世界，所有的不滿與仇恨各自歸回到自己的地盤裡宣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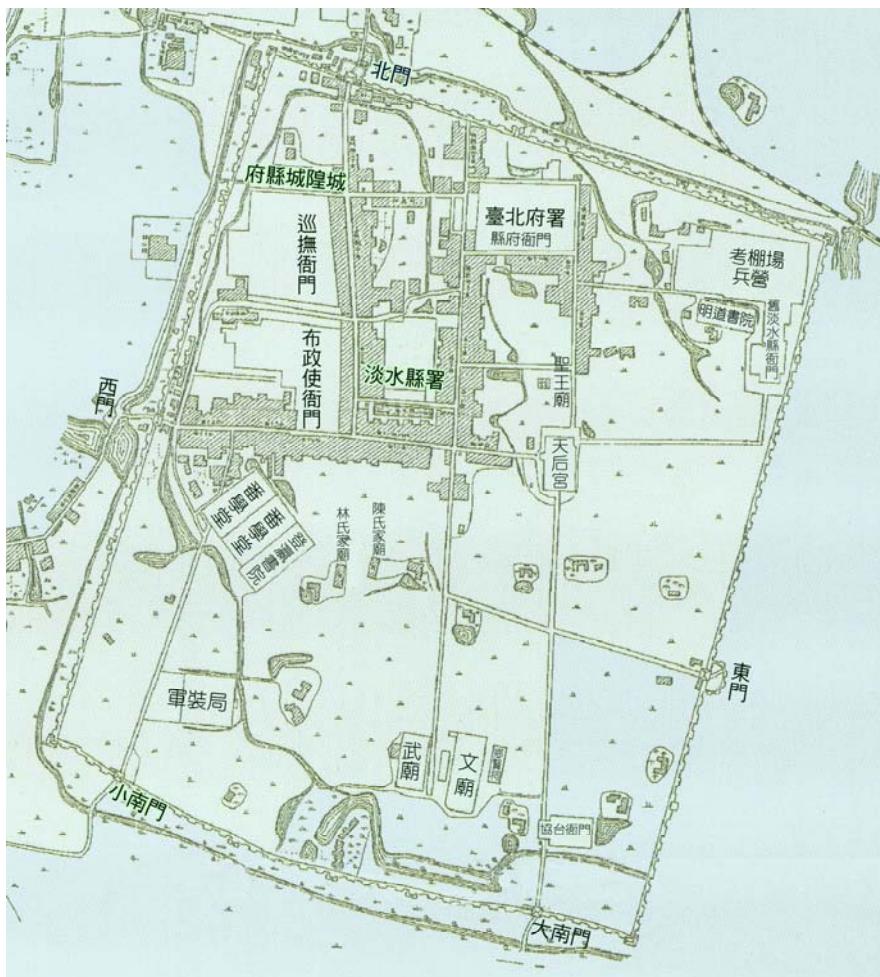
二、文教範式：中國傳統文化治理空間

再從清廷統治者的角度來看，「臺北府」設置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新市街，除有制衡大稻埕及艋舺兩地的意味之外，並有宣示清帝正統文教空間的意義。清廷在城內打造各種文教機構及經濟建設，試圖透過新府城的規劃，以在空間上發揮意識形態教化功能。下圖為根據 1895 年〈清代臺北古城圖〉重繪之臺北城，城內的各項建設呈顯出當局試圖將臺北打造成政治與文化中心的格局。

⁸⁰ 常鎮揚通道黃叔璥於《臺海使槎錄卷一》即言：「設嬰城自固，豈能尅期奏捷」，認為在朱一貴之變時，清兵易於攻據各點，乃因亂賊沒有城牆可守之故。文見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藝文，1966），頁 18。

⁸¹ Henry J. Lamley 在〈修築臺灣三城的發軔與動力〉中，提到民間熱絡興城，較之清廷冷處理的態度，有天壤之別。例如嘉慶 13 年（1809）彰化縣城的改建，是由當地漳、泉、客三族群士紳共同申名提案要求，經費則是由殷戶郊商集資；鳳山縣城居民代表也奏稱竹城毀壞，要求重建，費用也大部分由地方士紳所捐；1827 年新竹城籌建時改建的過程中，地區內上層人士有三分之二會上書要求改建石城，目的就是要與南部的行政城市抗衡，認為石頭圍城可以凸顯城市的重要性（1977）。參見 Henry J. Lamley，葉光廷譯，〈修築臺灣三城的發軔與動力〉，收入施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76-241。

⁸² 見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 113。



圖片說明：本圖以明治 28 年（1895）總督府所繪《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之臺北府城為底圖，參考同年〈清代臺北古城圖〉，兩圖經相互比對之後，重新合成繪製，並打字標示各機構地點而成。

清廷於城內設置書院、考棚、文武廟、天后宮及城隍廟，以發展文教；此外亦設西學堂、番學堂及城外機器局，電報學堂、官銀行，試圖透過從事北部資本主義基礎設施的建立，以抵抗當時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勢力，企圖擺脫外人的支配。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清朝對於臺北城內的文教建設，主要在於將臺灣社會導向內地化發展，因而城內重視文教建設，以建立一個以儒學為中心的文治型社會，並透過宗教力量聯繫社會之文化網絡，以進行行政治理。徐宗幹在〈祭告城隍文〉⁸³中，以向神明稟告該年度錄取生員名單的方式，宣示治理的正統性，並藉以向百姓昭示其執政權力乃由神權所許可、授與的合法性：

唯神聰明正直，赫濯威靈。海上蒼生，咸叨福庇。職服官茲土，並仰荷神庥，

⁸³ 大清道光二十有八年十二月辛丑朔，越二十八日己巳，按察使銜福建臺灣兵備道兼理學政徐宗幹，敢昭告於城隍尊神，收入〈重校「聖諭廣訓直解」恭敬〉，《臺灣文獻叢刊第 17 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

幸無隕越。……職罷勉率屬，矢慎矢勤；稍贖前愆，冀觀後效。

本年歲取生員，名次備列上陳。自念寒儒出身，不敢昧心，去取有不明、無不公，諒邀神鑑。又繕呈會同臺灣鎮覆勘審定、請令正法各犯，法無可寬，求其生而不得。惟懼有失入，即恐有失出，殺之者少、宥之者多；如逃顯戮，伏乞冥誅。至所屬各衙門，居海外重地，除莠安良，有不能不變而通之，俾得便宜行事者。但因公無私，神其諒之。

清廷當局善用民間社會以仰賴宗教做為社會秩序聯繫網絡的方式，因而在其建設臺北城之時，亦重視文武寺廟的興建，以藉由宗教的力量，引導百姓歸化崇文。在臺灣民間習俗中，宗教空間是聯繫社會文化網絡的重要場域，廖春生指出，人們相信對孔子及文昌帝君的祭祀，可搏取學識及功名的好運、對關帝及媽祖的崇奉，可帶來事業上的平安及財運、而城隍的職責可福善禍惡。⁸⁴ 清廷將這些祭祀化成為國家宗教的一部份，並藉公開祭祀過程，使官吏成為幽冥世界與黎民百姓的中介者，因而在神祕的、寧靜的祭典中，統治者得到神明的力量，藉神權鞏固統治的合法性，利用神明動員人民，並以宗教集會宣讀統治的規定。在臺北古城圖中，可以看見清廷在城內試圖進行的文教統治規畫，以做為一個文化治理的範式，當然這些空間與建設在清廷割臺之後，也成為日本在臺灣進行臺北城市規劃的概念基礎。臺北城的空間意義，於是持續在未來的政治治理中，更加地被執政者賦予多重的權力與文化意義。



⁸⁴ 廖春生，《臺北之都市轉化：以清代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頁 100。

第三章 建設？抑或隔離：壓抑的臺灣文化場域

臺北的建設整治，是日本殖民政府展現「現代國家治理能力」具體而微的實踐。⁸⁵ 總督府將大部份的建設精力投資於臺北，其經營臺北所付出的資本，為全臺之冠，許多重要的行政、商業機關都集中在此，且在臺日本人中，亦有三分之二集居在臺北。此建設資源集中的措施，使清末臺灣都市體系原本是臺北、臺南一樣大的雙峰模式，至日本統治之後，成為臺北獨大的單峰模式。⁸⁶ 在日本刻意的經營下，鞏固了臺北成為臺灣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的優勢地位，並且呈顯出日本政府殖民過程中，臺北被用以實踐一個「島都」的空間任務：對當時全世界重商主義的帝國而言，臺北的空間建構，象徵著日本可比擬歐美列強、躋身列強的里程碑；對日本國內而言，臺北是臺灣總督向帝國議會宣示其治理成果、並成為日本向南洋殖民擴張的楷模與指揮中心。

日本總督府試圖利用強勢的殖民政策與高壓統治技術，進行都市空間的改造與治理，以徹底施行其政經目的下的文化統治，然而殖民政府在臺北的統治知識，並非真實的呈現，而是真實的「再現」(representation)，亦即，日本宗主國對殖民地是透過「想像的地理」之形式建構而成。⁸⁷ 因此，殖民主義所做的，是依其主觀需要建構客觀知識，以客觀之名「正當的」掃除原有人民賦予土地的意義。⁸⁸ 然而對本地被支配者而言，臺北的近代化都市空間，是殖民帝國彰顯新興技術官僚，以及進步文明的空間文化宣示工具，殖民政府在空間計畫上，透過這些具有勞動力再生產功能的機構——醫院、學校、社教機構，形成一個有體系的空間網絡，且其都市計劃以城內為中心，滲透蔓延到具有強烈反支配意識的本地人生活領域。

從文化治理的觀點來檢視，我們可以發現日本統治下的臺北都市計劃空間政策的雙面性，即從殖民者的角度來看，是一個藉以形構臺北都市現代化生活空間的範式；但從被統治者的面向而言，此一政策反而強化了統治者／被統治者之間生活水平優劣相較的差異性。故此，在研究都市空間的文化形式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臺北城市空間與政治權力對於社會型態與文化模式多面向的介入與影響。因而本章延續本論文所要討論的要旨，將從城市空間與政治治理的角度，來分析日治時期文化主導場域生成與演變的脈絡，主要探討的問題有三：一，是日本殖民當局如何藉由城市空間資源的分配，來達成其統治的目的與國族的利益；

⁸⁵ 蘇碩斌認為，日本統治者對臺北的空間治理，透過「空間均質化」與「空間視覺化」兩種原則來進行，作者對於殖民政府之空間邏輯論述，參見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150~154。

⁸⁶ 章英華〈清末以來臺灣都市體系的變遷〉，收入瞿海源、章英華編，《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86)，頁253。

⁸⁷ 薩伊德認為，知識的目的影響了知識的內容，故殖民知識是建立在「想像」的異己地理學，例如對「東方」的知識，正是歐洲人在這種脈絡下的「發明」，也是歐洲人用來證明自身優越霸權的自我建構，文見薩伊德，《東方主義》，Edward W.Said著，王志弘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1999)。

⁸⁸ 見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148。

二，是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殖民者的空間支配政策與行政統治策略，如何激發出臺灣人的族群意識與地方／本土概念；三，則延續殖民者空間政策及此政策下所生成之臺灣本土文化意識，來探討臺灣的知識份子們，如何在臺灣人居處的都市空間裡，造就出一個主導全臺文化意識與政治思潮的核心場域。

第一節 打開城門：迎接日軍的經濟／文化意義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北城市面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全面性的轉變與挑戰，促使居住於臺北的本地人逐漸意識到外部強大異文化的入侵。事實上，原本在臺北內居住的居民們，並不具有太強烈的本土意識與國族概念，然而卻在日本刻意分化隔離的殖民統治之下，對於「島都」——這個被日本人認真定義的臺北城市，反而產生了強烈的在地認同。

我們先從臺北都市發展及殖民歷史的角度來看。清領時期，大稻埕、艋舺與臺北城內等三個區域，為當時臺北人口較為集居的熱鬧市街，三區鼎足而立，臺北設府之後，將此三個地區合成為臺北，稱為「臺北三市街」。⁸⁹ 在臺北尚未現代化之前，這三個地區並未相互連接，而是分別成為三個市街系統，彼此之間夾雜許多稻田、沼澤、荒草與墓地，往來不便，但各自發展出特有的市街風貌。據耆老所述，自大稻埕到艋舺，需經過城內。然若不入城門，則需沿淡水河、經過水田而至。⁹⁰ 此一自然分隔的空間形式，不僅影響了當時臺北的人文發展樣貌，也反映了居民的空間意識，即在一般住民而言，整體臺北的城市概念是模糊的，區域與區域之間存在族群的較勁與勢力的角逐，甚至大稻埕與艋舺地區的商賈富豪，長期存有經濟／文化爭鋒較勁的意味，而居民多依附這些掌控地方的民間力量，例如郊商與廟宇團體等組織勢力，來進行日常之庶民文化活動與經濟事業。

傳統社會中居民百姓，難以覺知自身成為城市公民的角色，因而對於國家、民族，乃至於現代化國家機制之下的城市治理空間等意義，亦無太多的理解，民間社群領域內的社會網絡權力之操作，即是凝聚該地住民地方感的主要力量，因而當日本接收臺灣、派兵入臺北城之際，儘管傳統社會對於日本軍國懷著排斥心理，但面臨如此具有組織的近代化國家之外力強勢進入之時，居民害怕失去現況的恐懼，其實遠勝於家國意義與民族意識，因而潰散不成軍。如此使我們可以理解為何日本統治初期，日軍可以不費一兵一彈，即輕易佔領臺北城的原因。

從歷史資料來看，1895年6月2日，日本與清廷在基隆外海的日鑑公義輪上，進行交割臺灣的換約手續，臺灣從此在國際法上成為日本的屬地。隨後日軍準備派兵進入臺北城，原為抵抗日軍而倉皇成立的「臺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聞風連夜潛逃離臺，官兵亦自亂陣腳，潰散浮躁，⁹¹ 臺北的士紳富商眼見時局大

⁸⁹ 黃富三，《臺北建城百年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95)。

⁹⁰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臺北市耆老會談專輯》(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0)，頁151。

⁹¹ 當時有「臺灣民主國」在各地發動反抗行動，但不久這些倉卒成立的反抗軍隨即自行浮亂潰散，大批軍官逃離臺北，民主國總統唐景崧亦潛逃離臺，臺北頓時成為無政府狀態，亂民趁火打劫、兵工廠被打開，商店各自設法取得槍械自衛，當時美國領事館記者禮密臣報導：「兵工廠被打開了，附近的街上都擁擠著搶劫者」，原文為Davidson, James W.著、蔡啓恆譯，《臺灣之過去

亂，派代表面告日軍現況，邀請日軍進城平亂，以驅暴徒，因而日軍進入臺北城時，不僅未遇任何反抗，城內還四處豎起投降白旗，有的白旗甚至畫上紅圈表示臣服，艋舺更出現歡迎日軍的標語。⁹² 日軍不費吹灰之力，即佔領了整個臺北，這和本島其他地區義勇軍武裝抵抗的情形大相逕庭，⁹³ 我們不應僅從降日臺民的國族意識來進行愛國忠誠度的批判，若從清代紳商與紳商之間的勢力角逐、以及族群文化區域之間的對峙之文化脈絡來分析，反而能進一步理解為何當時臺北有如此殊異的投降舉動。臺北市街分立發展，以及各區族群角逐對峙的情形來看，可知在清代，地方對於居民的意義，遠大於對臺北空間的認同，對平凡百姓而言，國家權力體系下的地理、國族知識反而令人難以理解，只有地方，才是人群與社區之間長期共同經驗的支柱，空間「歷久」之後，轉變為地方，而這些空間的過去與未來，實質地連結了空間內的人群。在清代，臺北原本就是各成一獨立體系之「三市街」，藉由清廷統治權力及經濟考量，構和、湊組而成的**拼貼城市**，不是一個「完整的臺北」。

清代臺北市街分立的人文活動空間，即揭示清代人們對於「臺北」，此一「城市」不甚緊密的共識與文化認同，如上一章所述，在臺北設府築城以前（在此要特別留意的是，臺北築城竣工，到日軍占領臺北城，前後歷時不到 11 年），人們對於「臺北」這一都市的概念，遠不如住民對於所居之「艋舺」、「大稻埕」等區的地方感來得實際而強烈，亦即，居民對於「自身所處之區域」的防備，遠大於對「都市」的守衛。清代的臺北人其實缺乏對於臺北內在熟悉的知識——一種實境環境中的關懷領域（fields of care），⁹⁴ 人們意識可以察覺到的環境認同和空間界限，以及居民與居民之間相互關懷的網絡，僅止於他們平日所接觸得到的狹小市街，以及市街內彼此相識的同一社群團體。

再進一步來分析，此一現象更顯示，在清廷統治之下的臺北，人們對於空間與文化認同的力量，遠不如經濟利益來得重要，因而艋舺及大稻埕地區富豪紳商們在日軍入關時，對於穩定社會秩序與鞏固經濟利益的需求，踰越國族意識之上——何況這些富商們，基於貿易的往來，原本即經常周旋於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甚至富商們在中國大陸亦擁有其廣大家業。捍衛「臺北」，甚至於堅守「祖國」的意義，對他們而言其實並不是那麼重要。因而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多重因素之默許與促成之下，使得大部分的臺北在地人士，對於殖民政府一手駕馭的空間治理霸權之行使，並沒有太大的反抗與異議，反而以「現代化」的近代都市化角度視之，而總督府就在這樣的治理基礎下，持續對臺北進行大規模都市整頓與改造計畫。

與現在（一）》（臺北：臺灣銀行，1972），頁 205~215，另〈臺海思慟錄〉亦載：「諸軍士劫庫藏、燒衙署，火光燭天，呼聲震耳」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十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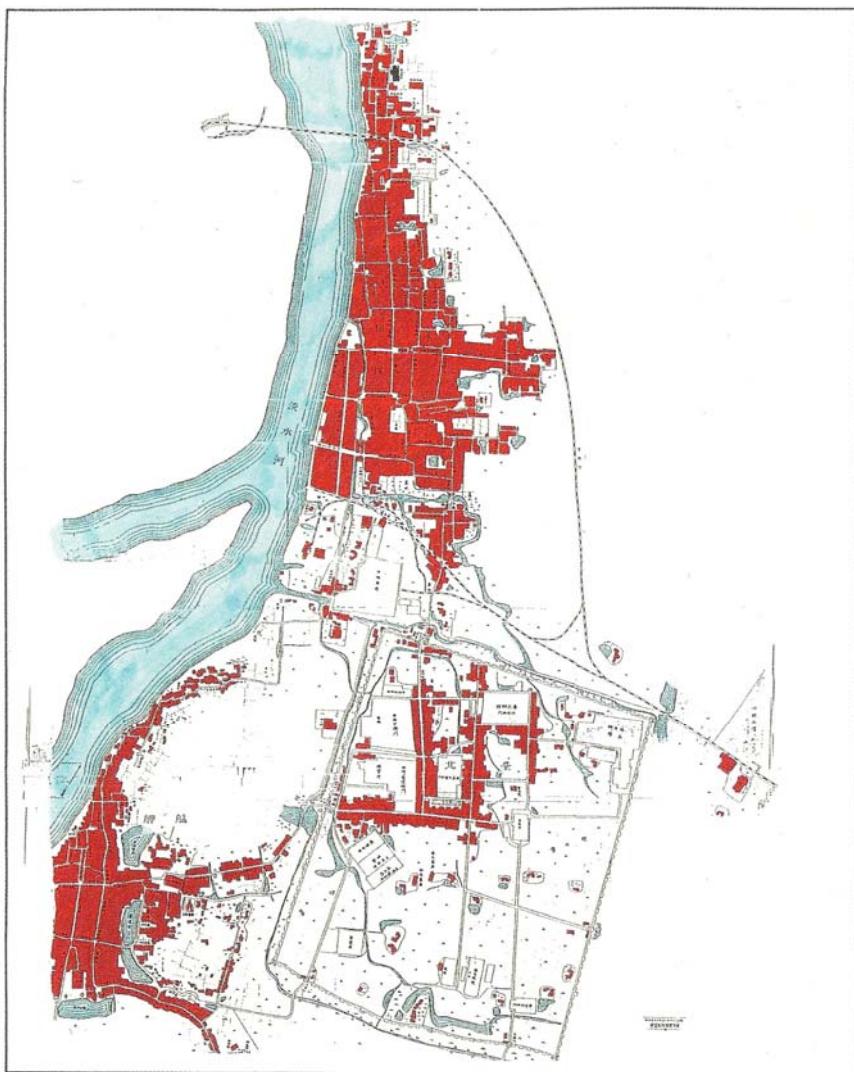
⁹² Davidson, James W.著、蔡啓恆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一）》頁 217。

⁹³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臺北市耆老會談專輯》（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0），頁 162。

⁹⁴ Allen Pred (1983)，〈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1993），頁 87。

一、剷除族群對峙的文化地景

在日本統治初期，臺北市計有人口 46,710 人，而這些人口集中區域，仍延續清領時期的人口分布狀況，分別以大稻埕和艋舺市街為中心，各自形成獨立的市街系統，從《臺北艋舺及大稻埕圖》中，顯示當時人口集中地為：一在臺北火車站以北、淡水河岸以東、中山北路以西的區域，大致為昔日大稻埕一帶；另一則是以龍山寺為中心的區域，大致亦與艋舺地區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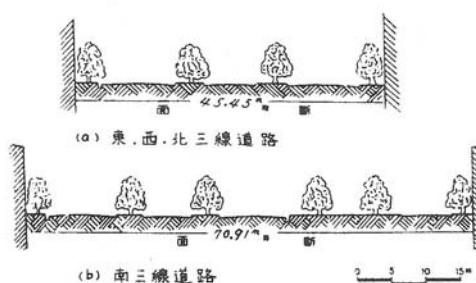
圖片說明：本圖根據明治 28 年（1895）《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加以著色而成，紅色著色區塊為住宅分布地。

艋舺、大稻埕兩區人口在日治初期佔了全市 90% 以上，即大稻埕佔全市人口之 49.6%，艋舺佔全市人口之 42.2%。此兩區在日治初期是臺灣人集居的商業和經濟主導中心。然而，此一以臺灣人聚居地為主導空間的情勢，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殖民政府計畫性地進行空間改造，因而使空間的文化形式形成了巨大的變化。一，是臺北的經濟與文化地位，逐漸取代臺南，成為全島首屈一指的核心城

市；二，則是臺北市原本以臨淡水河的大稻埕、艋舺等地為經濟核心地位的臺灣人居住區，因殖民當局刻意打造的現代化都市空間規劃而逐漸沒落，由日本人密集居住的都心區所取代。日本統治時期所興建之鐵路，使基隆港取代淡水的貿易地位，大臺北盆地的貿易方式亦因此而改變，商貨可不再仰賴水路貿易，亦可循鐵路從基隆陸運直達至臺北市，這不僅使臺北市在大臺北區域的主導地位更顯重要，更因貿易往來數量倍增，而促成經濟與人文活動更加頻繁，加以日本人有計畫地建造臺北市，因而在日本統治之後，臺北市逐漸取代臺南作為全臺核心城市的地位，成為全臺首屈一指的島都；並且，經由殖民政府的規劃，臺北市內部生活空間，亦形成日本人區／臺灣人區的明顯分野，而城市中的經濟和商業主導勢力，也逐漸由臺灣人區轉移至日本人規劃的經貿場域之中。

先從都市空間規劃成效及其所揭示的權力意向來看，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為使城市空間更具有殖民帝國之恢弘形象，並有效行使國家權力，因而進行殖民地城市空間之治理。在 1904 年前後，總督府規劃全面性地拆除臺北城垣，將城牆毀壞之後，臺北城也隨之被輾平、打通。這原本艋舺與大稻埕紳商豪族為相互較量、意圖在兩地之間築城分隔彼此的城牆，在進入現代化國家之際，被一個比清廷官署更強大的統治帝國所崩解，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系統生產與再生產之機制，以及營造環境與地景之隱喻。拆城的行動，使殖民當局打通了臺北的任督二脈，⁹⁵ 並計畫在殖民地以大規模的都市建造工程，以有效控管市政，裨益殖民經濟之發展，而殖民政府在臺北以其「想像的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ies) 建構之下，臺北成為具指標性空間宣示意義、象徵著崇高而偉大的帝國殖民城市。

拆完城牆之後，隨即殖民政府利用城垣所佔之空間，計畫為具有都市景觀意象的「三線道路」，(下圖左) 連結城垣周邊，並以此作為都市網路節點，以連結三市街。



史料源：臺北市土木課(1939)，《臺北市土木要覽》

，9 頁所收。

註：比例尺係本文繪註。



三線道路
背景說明：「由臺中或臺灣各地遷移來此地，成為不易的首都。人口二十五萬餘的文化之都。」右邊的三線道路是今之中山南路。臺灣是台北城東門所在，舊港的左上角是臺灣總督官邸，位於圖片的中心位置。總督官邸的北方是今台北大醫院舊院，當時為赤十字醫院及醫學專門學校。當時為台北醫院所在；三線道路的右方為今台大醫院新院區及醫學院所在。臺時為赤十字醫院及醫學專門學校。 資料來源：002416598

圖片來源：左圖翻印自黃武達，《日治時代臺北市之近代都市計劃》臺灣都市史研究室，(1997) 頁 84。右圖翻印自國家圖書館藏照片集，收錄於《日治時期的臺北》(2007)，頁 23。

從上圖三縣道完工後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規劃者以寬闊的路幅及林蔭道路鋪

⁹⁵ 此說法乃引用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

面，展現空間宰制的大器與魄力，隱含強烈的政治性宣示意義。1905年「臺北市區計畫」，將臺北傳統的「三核式」市街，以整體性之計劃路網予以連結，使分散型之都市空間，轉化為整體發展模式。⁹⁶ 此次的市區計畫，使的臺北終於有了清楚的街象與輪廓，不再是點狀分布的分散式聚落。

在打通都市空間之外，日本殖民政府同時亦計劃性地進行島內經濟之全面性掌控，而臺北作為一個實踐殖民經濟任務的島都，使殖民政府更加積極地介入此一都市空間的規劃與改造，並試圖轉移清領時期以臺灣人為主的大稻埕商業中心，使經濟與政治核心轉移至日本人居住地的城內。城內是指昔日臺北城以內的地區，殖民政府對臺北的建設，大多集中於城內區域，重要的行政與金融機關多設置於此，而該區在日治時期因日本人的規劃而逐漸發展，各項建設與住屋品質皆為最現代化的區域。在殖民政策積極介入空間改造工程之下，使得臺北城內快速地發展，日本人紛紛遷入至此區，而政府亦有計畫性地擴張城內日本人活動空間，將活動範疇拓展至城南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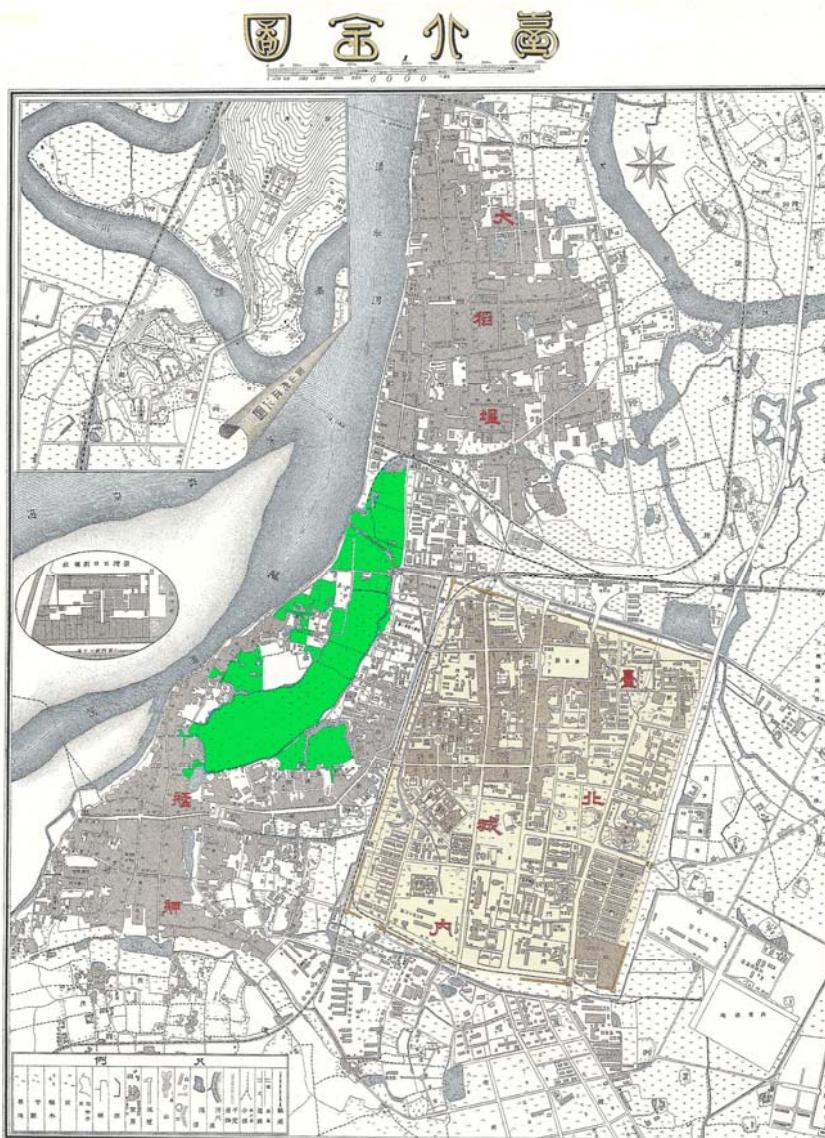
殖民政府積極賦予臺北作為「殖民首都」的空間任務，故以龐大的公共投資，企圖建構一個歐風文明進步的都市生活空間，但是由於其有意的透過國家空間政策，將臺北既成的政經及文化中心空間結構解組、移轉及重構，因之形成公共設施明顯的集中及區隔現象，這個空間政策的差別待遇乃是支配殖民政府與被支配之本地社會形成緊張關係的重要原因。⁹⁷ 在區域差別建設、空間區隔與種族分立之治理政策下，受到優渥待遇的在臺日本人，在殖民者所規劃的城市空間裡享受著政治、經濟、文化優位所帶來的各項豪奢娛樂與高層育樂禮遇；而同時在臺北另一個生活型態截然不同的地區裡，臺灣人卻處於無公共建設、空間擁擠雜亂且受警察系統監視的壓抑空間，且受到被殖民者的次等待遇。帝國在臺北城所進行的殖民政策與空間差別待遇，亦是促使此一原本對於國族認同概念模糊的人們，反而激發出被殖民者想像共同體的認同，因而形成內部反抗帝國殖民與強烈的地方意識。

二、築立殖民者的文化腹地

殖民者在臺北大興土木，一方面試圖將臺北整頓成一個有秩序的現代化的城市；另一方面則利用大規模空間規劃與公共建設，來凸顯統治者的主宰權，並有效於殖民地進行行政控制與經濟獲得。如上述所言，臺北在邁入現代化以前，是由零散的三市街聚落所組成，然仔細檢視此一零碎的都市空間形式，其實有礙於帝國對於人民的監視與行政控制，下圖為1898年日本政府進行臺北市街調查時所繪，圖中窪地部分以綠色表示，可知當時在艋舺、大稻埕兩區之間的大片連結區域，為荒涼人煙稀少之窪地，不適人居。

⁹⁶ 黃武達，《日治時代(1895-1945)臺北市之近代都市計劃(一)》(臺北：臺灣都市史研究室出版)，1997)，頁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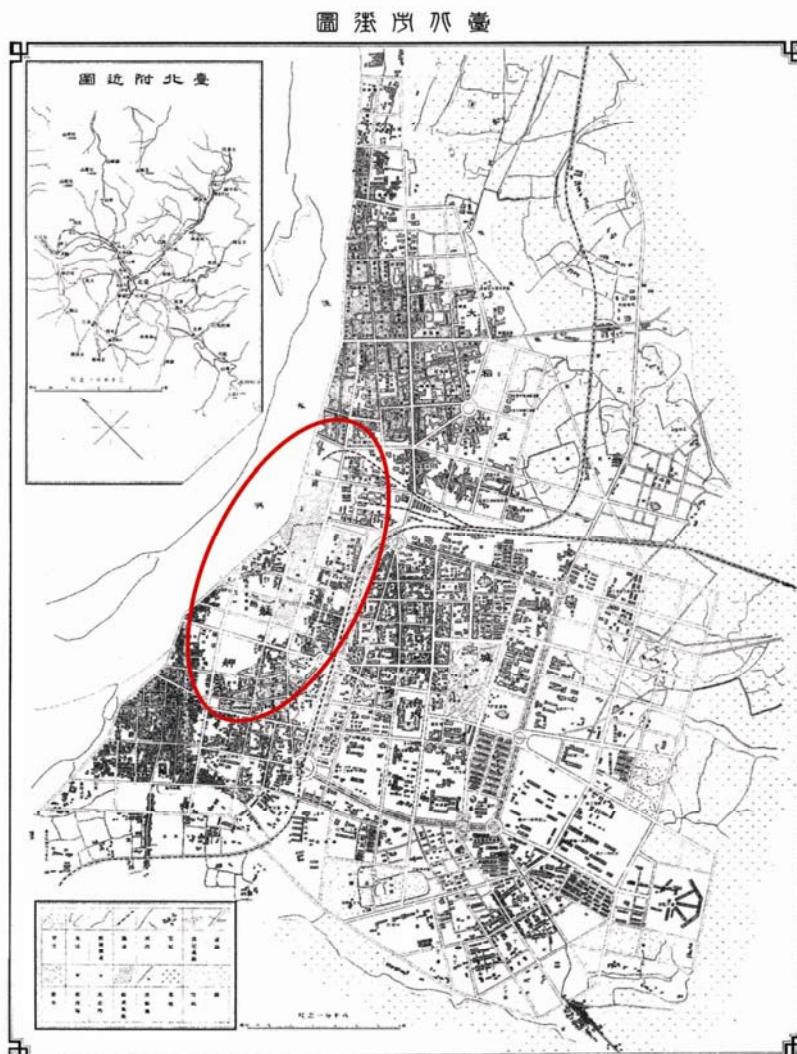
⁹⁷ 徐裕健，《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臺北為個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頁188。



圖片說明：筆者以 1898 年《最新實測臺北全圖附圓山附近》圖為底圖，加以著色、標示而成。

由於該區地處低窪，常年積水，污水無法排出，且住宅外圍多為水田與傳統農舍，到處可見魚塭及墳墓，且每逢夏秋之交，因颱風豪雨所帶來的淡水河河水氾濫，積水情形嚴重，故日本殖民政府為擴大空間使用機能，並藉以介入地方社會的空間支配權力，於是在 1914 年以填土整地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的「艋舺窪地填土工程」，⁹⁸ 將艋舺市街北部，沿淡水河與大稻埕間等區（即今日的所謂的西門町一帶）的 40 餘公頃土地，以人工加以填埋後，進行新都區的市街規劃，因而各街廓亦於這段填土工程間，增設細部道路與公共設施，使得艋舺、大稻埕、臺北城得以正式連結。下圖即為艋舺窪地填土聯結後的臺北市街圖，我們可以看到，窪地經過整平並且劃設連結道路之後，臺北城為一個街廓清楚、平坦而完整的城市。

⁹⁸ 關於艋舺窪地填土工事及土地重劃事業之工程細部研究，可參考黃武達，《日治時代(1895-1945)臺北市之近代都市計劃（一）》（臺北：臺灣都市史研究室出版），1997），頁 5-24。



圖片說明：筆者以 1914 年《臺北市街圖》為底圖，加以圈畫標示。

此一全臺第一次大規模的填地事業，將臺北「三市街」整合成爲「臺北市」，使經濟活動與人文發展超越市街的範圍，讓臺北成爲一個具有整體都市規模的現代化城市。蘇碩斌認爲，殖民當局以道路連結區域，並進行拆除城牆與填平窪地之工程，是在打造一個空間均質化與空間視覺化的都市，即在使當局能在地圖上完整呈現臺北市的每一塊土地與每一個居民，試圖打破空間的異質性，而且能夠被看見。⁹⁹ 殖民政府將臺北自清代以來長期對峙、零散且依賴地方人脈網絡所組成的地方社會，整頓成一外觀周全且平整、理性而秩序的地理空間，並試圖消彌本省人內部之間的差異性與歷史意義，建造一個整體的現代化都市。

然而需留意的是，當殖民政府在打造臺灣內部族群間均質化空間的同時，其實亦拉鋸出另一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彼此分隔的種族差異空間。艋舺窪地的填土築地工程，除了使當局方便於掌控都市空間之外，主要仍以擴大在臺日本人休

⁹⁹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2005)。

閒、飲食、娛樂機能之商圈為目的，而非以解決臺灣本地居民生活環境不佳的問題為要務，當局所築建之區域，即今西門町地區，¹⁰⁰ 日本人意在仿效東京淺草區，在此規劃以日本人為主的娛樂商業區，並於此空間上建造現代化娛樂建設，以提供作為殖民者地位的在臺日本人，在島都裡有一個完善而高級的休閒娛樂生活圈。築地後的西門町，因殖民當局計劃性的經營與建設而逐漸繁榮，區內商店櫛次鱗比，形成十足的內地人街，該區以西門市場的八角堂為中心，附近有日本人經營的商店、料理店、酒店、咖啡店、旅館、戲院、常設電影院等，黃昏以後，此區散步、逛街的人潮聚集，市街繁榮，為日治時期臺北熱鬧的商圈之一。¹⁰¹ 然而同時在臺北另一個以本省人商業活動範疇為主的大稻埕地區，則是「街道太壞……人聲車影、粉塵遍飛……路旁的樹木，一株不見，街燈卻寥寥無幾。」¹⁰²，當意識到當局刻意分化殖民與被殖民者的生活空間，以及凸顯殖民者優勢區位的不平等都市建設政策之時，本土人士開始意識到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臺灣新民報》的社論即指出當時臺北市的日本人——臺灣人生活空間之差異：

臺北市的總人口有二十三萬三千三百四十四人，內地人有六萬四千八百九十九人，臺灣人有十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內地人和臺灣人的住居區域，顯然的分開地域，內地人多居住城內和艋舺，臺灣人則居住於大稻埕和艋舺，因彼此分開，在市政的設施上就大大的不同。¹⁰³

日本總督府在臺北城市空間實施「地域制」之分隔策略，是試圖藉由對空間功能的強制分派，以達實質控制政治與文化權力之效。日人入臺北城後，清代舊有的官署與官地為其所接收，殖民政府帶來大批日籍官吏、軍人及商人，日本人以城內為中心據點，活動區域向城外四周擴散，進而掌控都市的政治與經濟主導權。從都市空間發展的歷時性脈絡而言，城內及其周邊皆為廣大的平原空地，確實提供殖民政府有效控制臺北都心的空間條件，城內土地多為官廳所有，其中大半部的土地為天然條件良好的水田，使日本殖民政府得以順利地在此進行現代都市規劃，而此一優勢之空間資源，亦直接提供日本人在此構建在臺日人活動區域的空間基礎。

日本政府引進街廓（block）與棋盤式街道作交通與都市分區建設，並逐漸拓展活動範圍，直至 1930 年前後，日本人生活範圍已擴張至中庄仔、朱厝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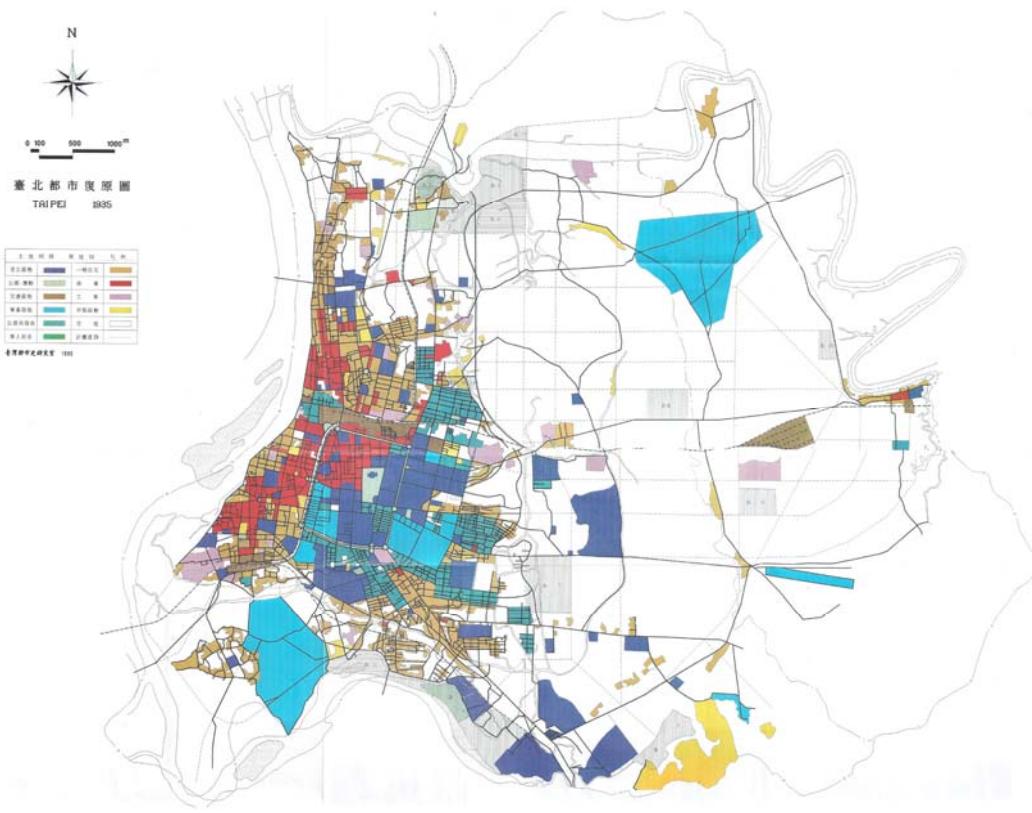
¹⁰⁰ 日治時期西門町約為今成都路、西寧南路、昆明街、康定路之一部，但今日之西門町更為廣大，尚包括有昔日之新起町、若竹町等。

¹⁰¹ 在殖民政府的規劃下，使原本為淤泥溼地的西門町發展迅速，成為以日本人活動為主的繁華商業區，1933 年時，境內已有 218 家商店，町內的住戶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從事商業買賣，商家密度為 36.31%，僅次於臺北城內的本町 40.7%、京町 41.3%、榮町 42.1%，為全市中的第四位。相關資料見臺北市勸業課編纂，《臺北市商工人名錄》（臺北：臺北市役所，1934），及大塗四郎著《大臺北鳥瞰圖》，此原為 1935 年臺灣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在臺北舉行的臺灣博覽會導遊手冊所附地圖「大臺北鳥瞰」，後收錄於大塗四郎著《大臺北鳥瞰圖》（臺北：南天，1994）。

¹⁰² 〈臺北市三大問題〉，《臺灣新民報》324 號（昭和 5 年 8 月 2 日）。

¹⁰³ 〈臺北市三大問題〉，《臺灣新民報》324 號（昭和 5 年 8 月 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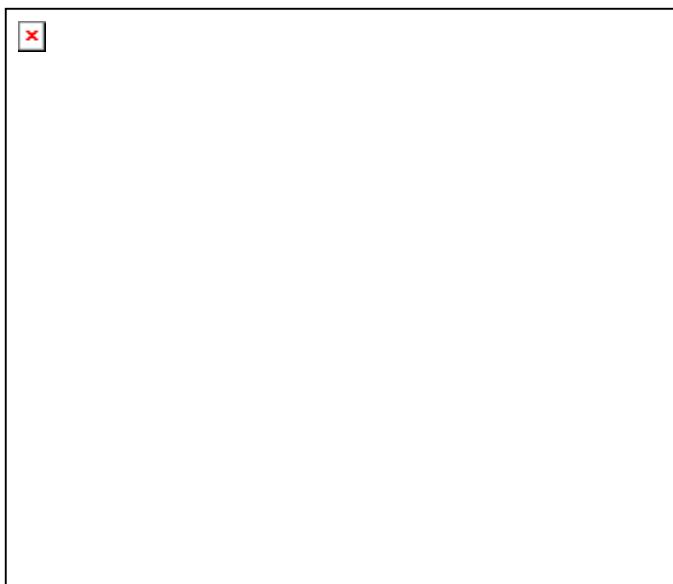
大安、水道町、馬場町等地。¹⁰⁴ 從〈1935年臺北都市計劃複原圖〉可知，殖民政府以城內作為日本人活動核心區，將日人生活圈向西擴展至西門町築地地區、向南則延伸至古亭、公館一帶，並試圖將城內及其以東規劃為政治、經濟與軍事中心，而西門町一帶經營成為商業娛樂圈、城南區段則為一般住宅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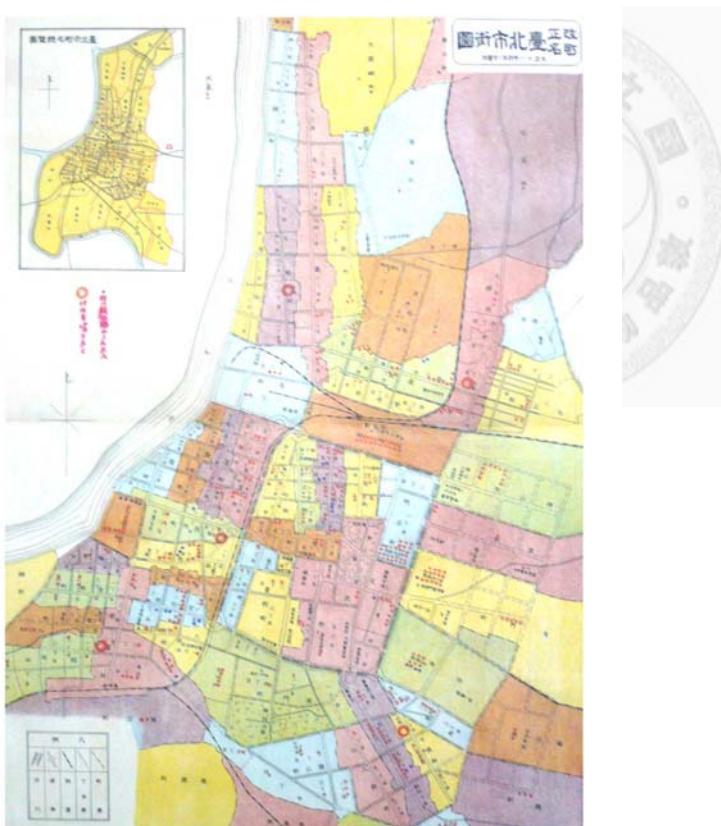
圖片來源：黃武達，臺灣都市史研究室《1935年臺北市都市復原圖》，1995年。

首先，我們將日治時代市政改正後的各區町名標示如下，以利進一步進行日治時期都市空間規劃的討論。上圖為各町及街庄在臺北市的相對位置簡圖；下圖為1922所繪製的細部臺北町名圖，標示各町及各丁目位置，而每一顏色區塊，代表每一個町。1922年，日本政府將臺北市原有155街莊，分為64町及郊外十部落，各町及各部落設區會事務所。¹⁰⁵

¹⁰⁴ 王月鏡主修，《臺北市誌 卷一沿革志 封域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51。
¹⁰⁵



圖片來源：依據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3 圖面重新繪製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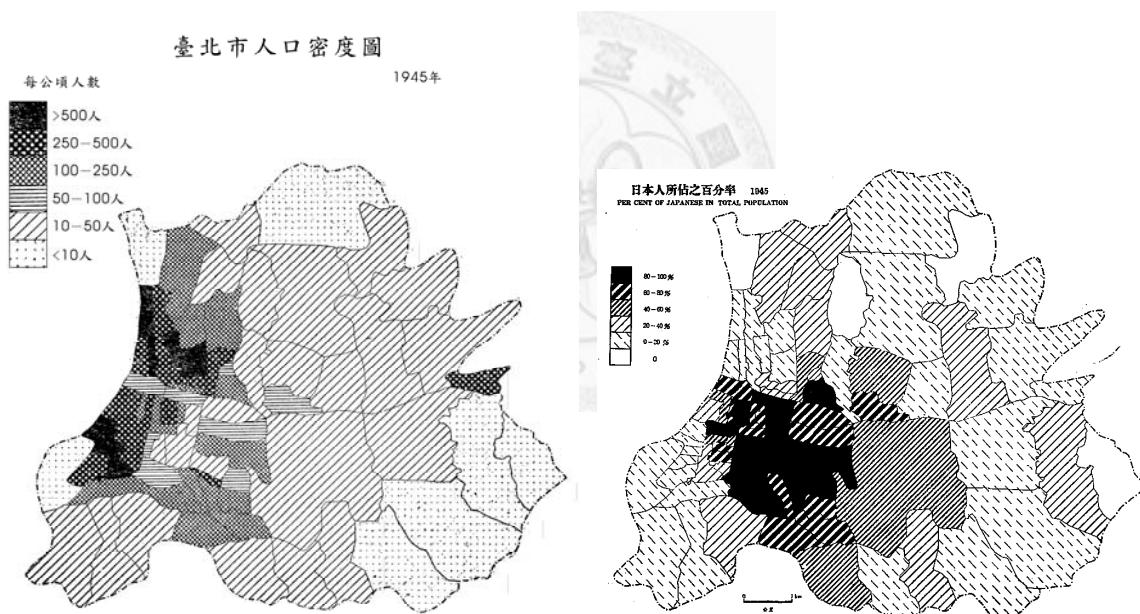


圖片來源：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大正 13 年（1922）所繪《改正町名臺北市街圖》。

在當局政策性的空間規劃之下，日本人的分布範疇集中於城內區以及該區以東和以南的地區。此區有大正町、明石町（今中山南路、青島西路一帶）、文武町（今公園路、懷寧街一帶）、書院町（今博愛路、桃源街一帶）、乃木町（今延平南路、中華路一帶，臺北憲兵隊附近）、旭町、福佳町、新榮町、佐久間町等，這些區

域日本皆佔當地總人口數 90%以上¹⁰⁶；此外北門町、表町（今許昌街、信陽街）、大和町、東門町（今徐州路、臨沂街一帶）、千歲町、龍口町、西門町、末廣町，亦超過 80%以上。這些區域成為為日本人打造的新興的住宅區，屋舍幾為日本式，且居住品質亦較臺北其它老地區高。

相對臺灣人的分佈地區，則以太平町、永樂町、大橋町、港町、日新町、下奎府町（今萬全街、赤峰街一帶）、蓬萊町（以上各町與舊大稻埕相符）、入船町、有明町、龍山寺町、綠町（以上各町皆在舊萬華區），本省人在當地總人口數佔 80%以上，其中大橋町、太平町（今延平北路一帶）、日新町、蓬萊町、龍山寺町與綠町皆超過 90%。¹⁰⁷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北市成為臺、日人分隔的二元都市，我們先看 1945 年臺北市分區人口密度圖（下圖左），可以對照出各町的人口密度，圖中顯示當時臺北的人口密集地，主要仍以大橋町、太平町、日新町、蓬萊町、龍山寺町與綠町等臺灣人居住地為主。再比較另一張 1945 年臺北市日本人所佔百分比率圖（下圖右），則明顯指出日本人的分佈甚為集中，且和臺灣人分佈的區域相互鼎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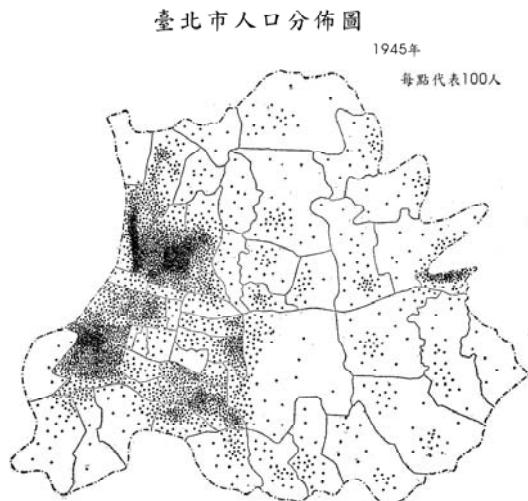


圖片說明：依據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1993，重新整理繪製而成。

再比較當時的臺北市人口分佈（下圖），亦明顯呈現臺北市人口集中的地區，和日本人聚居地相互對立，意即，佔當時臺北市大部分人口的臺灣人，其實住在相對密集侷促的艋舺、大稻埕等老舊市街空間裡。

¹⁰⁶ 1945 年，東門町（今仁愛路一二段與信義路一二段之間）日本人佔全町人口 84%，新榮町（愛國東路與金華街之間），日本人佔 98%。龍口町（今泉州街一帶），日本人佔全町人口 88%，川端町（今廈門街一帶），日本人佔 79%，大正町（今長安東路一段），日本人佔 92%。相關數據參照陳正祥，《臺灣地誌 上冊》（臺北：南天，1993），頁 310。

¹⁰⁷ 入船町本省人佔全町人口之 83%，有明町本省人口則佔 89%。



圖片說明：依據陳正祥，《臺灣的人口》。臺北：南天，1995，重新整理繪製而成。

日本殖民政府的都市規劃，使日人和臺人在空間上逐漸形成隔離之現象，此政策連帶影響了臺、日人居住區街町發展之顯著差異。殖民時期，臺北市的都市計劃主要以日人區域優先考量設計，如排水設施、衛生改善、新式醫院設立、電燈裝置、文教機構之設立等，大都設於城中及城南區域。故此，亦曾引發臺人抗議，指出城內的道路有如上海的租界，城外（大稻埕、萬華）好比上海的中國街道：

到過上海的人便知道，租借內的道路和租借外（即中國界）的道路實在有天淵之別，不幸這種現象，我們也能夠在臺灣的首都臺北市發現。城內的道路，正如上海的租界內，城外（稻江、萬華）正好比上海的中國街道。

108

此外，社論中亦批判城內不斷建設現代化大型公共設施，例如 1931 年日本總督府決定在城內添建臺北公會堂時，臺人諷刺：「佔全市三分之二人口的大稻埕竟然不能發現什麼公共建築，有之，僅有一北警察署而已」。¹⁰⁹ 此外，臺灣人居住區休閒設施明顯不足，即使人口擁有十二萬餘人的大稻埕，卻仍無一處公園，而且坐落其間的永樂市場，衛生條件極差，被比喻成「島都市唯一的糞掃堆」¹¹⁰：

公園的設施，在現在文明的國家，都看做極重要的事情……偌大的臺北市，僅有城內一個新公園，住著十幾萬人的大稻埕，連半個公園也沒有……大稻埕僅有一個永樂市場，裡面的設備是非常不衛生，夏天一到，臭不可

¹⁰⁸ 〈稻江路政的新紀元〉，《臺灣民報》3:18 (大正 14 年 6 月 21 日)。

¹⁰⁹ 王月鏡主修，《臺北市誌 卷一 沿革志城市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 97~99。

¹¹⁰ 〈永樂町市場已成糞掃堆〉，《臺灣民報》239 號 (昭和 6 年)。

聞。¹¹¹

由於種族在空間上明顯的分化，形成空間性質的差異，從公共設施分布的檢視，亦容易引發成社會公平的議題，而這些設施的分配不均，形成了空間意象的對比：

城內的房屋……櫛比鱗接，街道上面蓋著一層光亮的松柏油，塵土不揚、兩旁種著青翠的樹木，冬溫夏涼，街道旁的街燈，光輝奪目……一出城門，到大稻埕來看看，真有天堂地獄的感慨。¹¹²

李騰嶽¹¹³ 在〈臺北竹枝詞〉中，亦對於臺北市街發展之興衰感到慨歎，在現代化之後的臺北城市，日本人經營商號的規模不但超越了大稻埕的茶業貿易，加以日本投資的百貨商行如菊元、松井百貨的開張，城內經濟益加繁榮富庶，相形之下臺人所在地的萬華、稻江等地之經濟榮景卻逐年消退，豪門不再，商號易主，人們不勝嘆唏：

建昌街廢南街微，代謝何曾有是非；今日太平最殷盛，霓虹明滅耀珠璣。
柏油大道換新裝，車水馬龍達四方；雨不泥濘晴更好，可知善政在康莊。
兒女紛紛向菊元，後來松井並名喧，日臺經濟形優劣，似此前途不可言。
摩天樓閣七層雄，肆面宏開百貨充；卻笑儂家非顧客，也隨人去做流籠。
萬華稍遜稻江優，城內居然占上頭；長有人情疎隔憾，三分誰使畫鴻溝。
茶葉年來幾廢興，豪家相繼半頽傾；君看建泰珍春號，門面裝成換別名。

114

殖民當局在城市所進行之空間分化政策，不僅造成臺灣人／日本人居住區域之差異，且空間差異所致之臺、日人日常生活分立，更拉鋸彼此生活慣習、飲食文化、經濟活動、文教育樂事業之殊異。此情形在日本計畫性鼓勵日本內地人民遷臺之後更加顯著，日本統治期間，初期入臺人士多為統治、公務、教育與技術官僚人員；在當局穩固島內的統治體系之後，開始招攬工商業者入臺，發展殖民經濟政策，並由日本人掌理殖民地的經濟事業；待工商業人口逐漸增加後，直至稍晚方有農民在臺設籍，計畫性地開墾農地，以發展殖民地墾殖事業。因而日治期間的在臺之日本籍人士年有增加，1905 計 59,618 人，尚不及總人口 2%，1943 年增至 397,090 人，約佔總人口 6%。¹¹⁵ 尤需關注的現象是，這些殖民者帶來的日本移民，不同於清代臺灣民間社會的農業移民，即使在臺日本人的職業結構分佈於各行業中，但殖民者所帶來的，多是政治與計畫性殖民經濟上的統治階

¹¹¹ 〈臺北市三大問題〉，《臺灣新民報》324 號，昭和 5 年 8 月 2 日。

¹¹² 〈臺北市三大問題〉，《臺灣新民報》324 號，昭和 5 年 8 月 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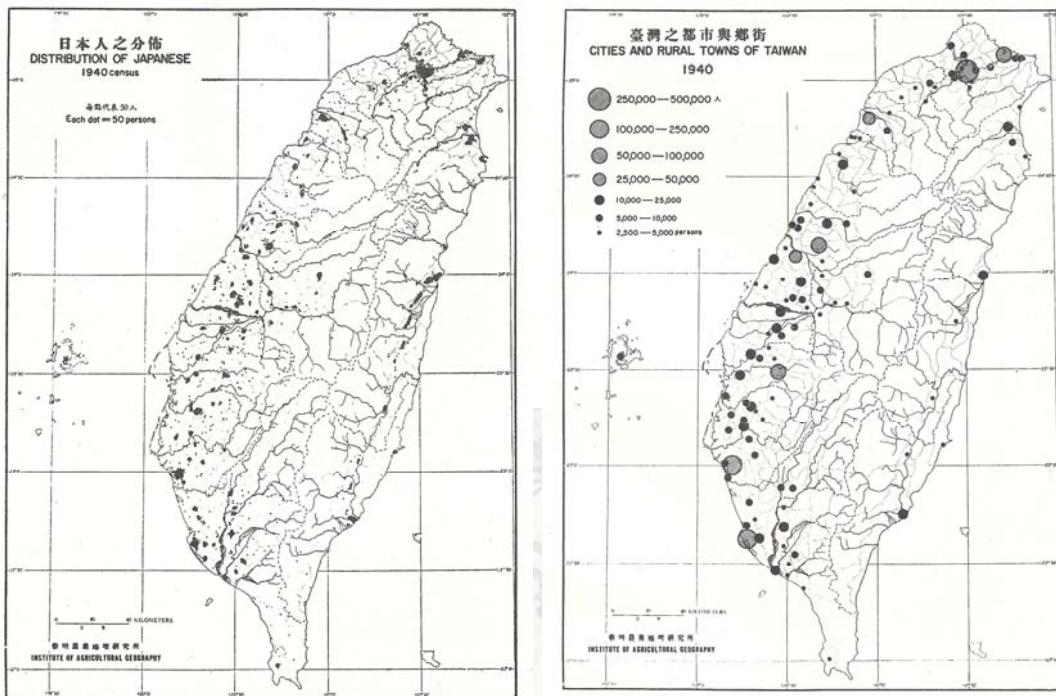
¹¹³ 字鷺村，號夢星，臺北星社社員。醫學博士，設宏仁醫院於大稻埕，為兒科名醫。

¹¹⁴ 黃啓端、張祥傳修，《臺北市志稿 文徵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頁 53。

¹¹⁵ 陳正祥，《臺灣的人口》，(臺北：南天，1997) 頁 239~310。

層，而不是從事基層生產的底層民眾。¹¹⁶

基於各行業經營與統治上的需求，這些日本內地移民人口多集中於都市與重要市街，¹¹⁷ 下圖左為 1940 年日本人分布於全臺的情形，比較當時的臺灣都市與鄉街人口分佈（下圖右），可知日本人亦多居住於各地主要市街之中。臺灣在 1943 年底以前，臺灣全島共有 9 個市街，¹¹⁸ 而日本人即多居住在這些市街的核心地帶，尤其是作為殖民地島都的臺北市，集中著龐大的官僚組織，當時臺北的日本



圖片說明：依據陳正祥，《臺灣的人口》（臺北：南天，1997）附圖重新繪製處理。

人就佔了全島的三分之一，¹¹⁹ 而這些在臺北的日本人，又大多是城內的居民。|

從日本人在臺灣的分佈現象來整體觀察，可以發現，只要指出日本人集居地在何處，即可推測該地的核心區域所在。意即，臺灣從日本統治時代帶入了現代化國家的統制秩序以來，總是難以避免地存在著政治權力高度支配了地方資源的現象。亦即統治者關注的焦點在哪裡，權力也跟隨著在哪裡，而有權力的地方，自然公共建設就多、文教休閒及經建設設施就相較完善。當然在此一權力與資源爭

¹¹⁶ 章英華，〈臺灣的都市體系——從清到日治〉，《臺灣的都市社會》（臺北：巨流，1997 年），頁 53。

¹¹⁷ 考察《臺灣地誌》內所繪製之〈1940 年，日本人之分佈〉人口密度圖，日本人密集處幾乎完全與都市和市街之分佈符合，以臺北市、花蓮市與基隆市為最高，此外，則集中分佈於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等地。山區則因為林業經營與高山族管理所需，故在山區管制要衝之日本人口數呈稀鬆的點狀分佈。參見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1993），頁 235，圖 151。

¹¹⁸ 這九個市街是：基隆市、臺北市、新竹市、臺中市、彰化市、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市。

¹¹⁹ 以 1935 年為例，臺北市人口 304,900 人中，日本人有 82,500 人，佔當時全臺日本人口三分之一。

奪的角逐場中，臺北總是居高不下地佔了勝場，不論歷代政治權勢如何轉換，北部的各項建設總是較其他地區完備。

我們再聚焦從日本人在臺北市分佈的情形，觀察日本人在臺灣慣習生活的空間經驗。事實上日本人的生活範疇，除了集中居住於各地較為熱鬧便利、居住環境較佳之處之外，且大多數的日本人即使與臺灣人共同生活在一個市街之內，也少與本地臺民混居，且多居住於日人在當地所興建的日式建築之中。這種建築形式與生活空間，對於習慣居住於傳統中國式建築的臺灣本地人而言，是一種陌生的空間經驗，然而這樣的空間形式，本地人不見得欣羨，並且也無法深刻認同日本人生活於其間的雅緻。當時即有文人作〈臺北竹枝詞〉透露著對殖民者帶來之異化空間形式的批判：

日式住房不見佳，每間胥是蓆鋪排；進門第一麻煩事，男女都須先脫鞋。
大小家庭院落中，儘多樹木鬱葱葱；豈為雅興人人有，綠蔭窗櫺醉晚風。

120

矮圍籬環繞的日式庭園，以及需先脫鞋才能入內的塌塌米設計，在溽熱的臺灣島內，於各地市街核心地帶建造出來的日式建築群，區分出統治階層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空間差異。日式建築代表了一種高層的雅致、統治階級的威望，相形之下臺灣民間依風水而座、見錢潮而興的住商雜居形式，顯得隨性許多。臺灣人與日本人的生活空間，即使同居處在一個城市當中，但不論在外部於市街中的區位，以及內部建築本身的形式樣貌，皆呈現差異顯著的差異。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差異，不僅表現在日常生活經驗之中，事實上最主要的，仍是殖民當局在公共建設上對於臺人與日人居住區有顯著的差別治理心態，因而衍生許多資源分配不均的批判。事實上大部分居住於島內的日本人，他們對於臺人長期居住的老舊地區，多少帶有鄙視的嫌惡感，甚至對於臺人的生活環境問題不聞不問，即使同居處在一個城市裡，日本人對臺人的生活其實不甚關心，甚至許多日本人在臺北停留的期間，一次也沒有從城內走入大稻埕，就撤回「內地」，沒有接觸臺灣文化的機會。¹²¹

在臺北的日本人稱大稻埕為「臺灣人街」，與城內的「日本人街」區別而極少去大稻埕，日本人的行動範圍，最多不過是城內和新起町（今漢中街、內江街一帶）西門市場附近的鬧區，本來就看不起臺灣人的日本人，當然不可能對臺灣人的生活和文化表示關心。¹²²

在殖民當局的空間政策下，日本人不僅在文化意識上對臺人居住空間產生歧視與

¹²⁰ 陶蓬仙〈臺北竹枝詞〉，收錄自王月鏡主修，《臺北市志 卷八 文化志文學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

¹²¹ 同上註，頁 299。

¹²²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臺灣今昔之旅（臺北篇）》（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頁 283。

鄙夷感，在經濟上，亦因當局刻意將經濟建設集中於城內，僅為殖民者經營的經濟事業提供優良的硬體資源，使城內的日本人商業中心——榮町更具商業競爭力，相形之下，即使經濟繁榮的本地人商圈大稻埕，卻因公共建設的缺乏，顯得困窘而克難。從日治時期臺北市的電力設施和服務水準，我們即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當時臺北市的電力設施和服務水準分為三區：第一區：城內、第二區：艋舺、第三區：大稻埕，三區以空間區隔，分成不同等級的服務品質。第一區絕無停電故障，若有故障，即刻有「火電氣」代用，停電未曾超過一分鐘以上；第二區一旦停電，即刻有火電氣代點；第三區設備不全，無火電線救急，停電常達五分鐘以上。¹²³ 臺灣人居處地面臨電力服務水平不佳的差別待遇，使仰賴商業經營的大稻埕店家，以及集居於此的本地區民感到極為困擾，相形於居住於城內的日本人高級官署，以及在艋舺「萬華遊廓地」（即前述「艋舺窪地」在填土造地工程後，所築立地區之新名）的娛樂區，本地人在公共建設的資源上，顯得特別貧乏，故在商場之競爭，亦因此而受影響：

臺北市大稻埕，人口稠密、商業繁盛，實為全臺各都市之首區，夜間照明設備還未普及，論其光亮程度，比諸城內，輸得很多，因之在雙方的商戰上，稻江的商界，比之城內，外觀上商況蕭條。¹²⁴

而臺灣人為與城內商況競爭，避免因經常停電而影響生意，僅能仰賴自立救濟解決面臨經濟競爭劣勢的困境，於是本地人自行組成「點燈組合」，由民間出資架設燈柱、連接電線。日本當局的種族隔離政策，明顯分化日本人與臺灣人的生活範疇，並刻意塑造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種族、文化、經濟與地域優劣之差異。因而本地知識菁英在對現代文明意識形態的普遍認同的情勢下，對於有「文化向上」功能的都市空間社會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質產生強烈質疑。

第二節 差異的文化空間

綜前文所述，日治中期以後，在殖民政策的主導下進行市區改正計劃，隱含著以服務日本人為主的殖民經濟與空間政治權力。從文化的角度來檢視，我將持續從殖民時期的都市空間政策中，討論以下幾點問題：一、臺、日人文化圈的對峙：日本人／臺灣人生活空間的隔離與分化，使行政、經濟中心集中於殖民者生活圈。二、殖民者高層休閒文化圈的形成：殖民者的娛樂休閒文化，在城內及新闢的市街生成，三、文化主導場域因空間權力衍生之不平等政策而興起：由臺籍精英主導之在地臺灣／抵殖民文化意識之生成。

我們先從日本人接管之初，臺北地區臺灣人與日本人口結構來討論。參照表格中所示，日本人接管之初，1896年臺灣人街的艋舺人口為19,700人，大稻

¹²³ 〈大稻埕常停電〉，《臺灣民報》207號，昭和3年5月6日。

¹²⁴ 〈稻江的照明設備〉，《臺灣新民報》昭和6年11月28號。

堀為 23,100 人，城內的日本人街只有 3,800 人。¹²⁵

地 區	本 省 人			日 本 人			合 計		
	共計	男	女	共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城 內	1,036	729	307	2,779	2,277	502	3,815	3,006	809
船 舷	18,745	10,840	7,905	966	517	449	19,711	11,357	8,354
大 稻 堀	22,673	12,376	10,297	511	435	76	23,184	12,811	10,373
共 計	42,454	23,945	18,509	4,256	3,229	1,027	46,710	27,174	19,536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臺北市統計要覽》1955 年。

殖民政府陸續推動以城內為中心的都市開發，使日籍人口開始集中在城內，到了明治 27 年（1904），城內人口增加為 8,100 人，大正五年（1915）為 11200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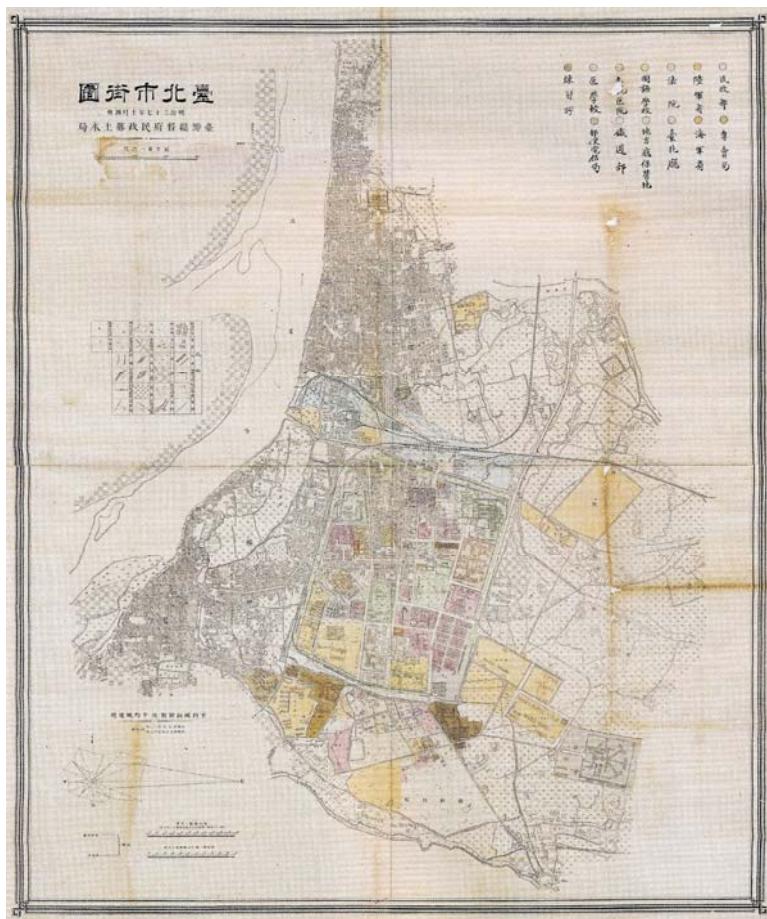
¹²⁶ 然而儘管如此，日本人在臺北市總人口的比例仍懸殊。儘管日本人在臺灣仍是少數的族群，但透過執政當局的權力運作，而使這些少數的人民在同時擁有高層治理實權之下，亦享有各項公共建設及福利性設施。

我們先從空間來看日本當局如何使臺北各區位機能造成分區殊異的現象。下圖為 1904 年總督府民政部所繪製的〈臺北市街圖〉，依原圖示說明，彩色部分代表各公共建設及公官機構，圖中指出，大量的公共建設集中在城內附近及其延伸的城南地區，而臺灣人居住地區則僅有零星的警察單位部署。



¹²⁵ 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7），頁 11。

¹²⁶ 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7），頁 6、12、13、17。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藏，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土木局於明治 37 年（1904）所繪《臺北市街圖》。

當局尤其重視城內地區的建設，將城中作為掌控全島經濟、政治、教育、軍事的權力核心，因而城內設有許多大型公共建設，如總督府、臺灣銀行、高等法院、軍司令部、測候所、郵便局、臺北醫院等等，周邊則有軍事機要地戍首，如旭町（位於今中正紀念堂）中的山砲隊、一聯隊及步兵隊，以及警察練習所、臺北刑務所等；此外，亦設有高等學校，以培養日式教育菁英人才，如師範學校、高等女校、商業學校、高等商業學校、商公學校；在促進經貿事業方面，則有許多日本人經營的儲蓄銀行、勸業社以及公司行號，尤其是「榮町」（今衡陽路一帶），為日本人街中最繁華的地方，其間商行林立、交易興隆，臺灣第一個百貨公司「菊元百貨店」，以及「三商百貨公司」即座落於此；此外，此區亦為書店和出版經銷商聚集之地，位在今重慶南路一段和衡陽路交叉口的新高堂書店（今東方出版社）是臺灣第一個書店，¹²⁷ 重慶南路一帶成為「書街」的榮景，即源於日本統治時代的空間規劃成果。

在臺灣人街的大稻埕地區，清代以降島內以大稻埕茶葉貿易經濟為出口大宗

¹²⁷ 以上各建設及商業行號資料，為參考 1928 年〈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臺北市〉所整理，該圖原為東京交通社印製發行，後收入黃武達編著，《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南天，2006）。

的景象，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本地民間商行的經濟實力漸形蕭條，取而代之的是帝國殖民政策下的資本經濟型態。¹²⁸ 而臺灣本地的民間茶商，其規模及資本不如殖民體系雄厚，因而大稻埕的經濟地位逐漸衰退，由日本人為主的區域所取代，此一情況亦延續到戰後，從下圖可以發現，貿易行仍以城內為主，而艋舺一帶從清代以來即逐漸衰退，經過日治時期至戰後，則僅存零星的小規模商號。貿易行分布圖。



圖片說明：依臺北市政府，《臺北市工商統計彙編》，及《臺北市志》底圖繪製而成。

殖民當局將政經主導權力鞏固於城中日本人區域之外，對於日本人的休閒娛樂生活亦多所重視，因而除了在都市周邊規劃公園及休閒用地之外，並善加利用前文所述由窪地填埋所築立之「萬華遊廓地」，將此區打造為成為日本人新興的高級休閒樂土，而此區即為今日我們習稱的西門町地區。

在殖民當局的規劃下，西門町成為在臺日本人的娛樂區，日本人可以盡情地在此進行娛樂消費、購買精品、享用高級餐飲、觀賞表演、看電影等高檔休閒活動。從下圖可以發現，規模較大的電影院，多集中於此區，而大稻埕臺灣人區雖亦有一較具規模的電影院（永樂座），但密集程度仍不如西門町地區。

¹²⁸ 矢內原忠雄原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2004)。



圖片說明：依據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3，圖面重新整理、著色繪製而成。

另外，對照乒乓球場的分布地（下圖），同樣在萬華遊廓地區的球場亦較其他地區集中，且規模較大，殖民當局技術性地規劃一個相對於臺灣人生活圈的休閒娛樂中心，使臺人與日人的休閒活動空間自然地隔離，此一全面性的空間的分化政策，不但維持殖民者生活圈的高層品質，不容一般臺人隨意滲入；另一方面亦可藉由殖民母國高資本額的投資與經營，塑造一個現代化殖民帝國的華麗娛樂天堂，向人民展示殖民者從容高雅的生活秩序與優異光榮的現代生活作息。



圖片說明：依據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3，圖面重新整理、著色繪製而成。

現代化的高雅生活，使得原生於臺人生活圈裡的臺籍菁英，開始崇尚日本文明，或學習日本所帶來的歐美現代化生活方式及藝術教育。而日本人的上流休閒活動，例如文學、藝術、電影、音樂、攝影，甚至於西式的體育活動，都受上流階層的喜愛與參予，¹²⁹ 文人們經常逡巡於西門町，享受娛樂生活：

一般娛樂集西門，藝術宣傳我獨尊；劇院歌場皆滿座，更誰聲色不銷魂。¹³⁰

透過帝國的經濟殖民，為臺灣本土帶來前所未有的現代化經驗與西方理性、高雅而時尚的消費品味；而西門町的築成，更使本地人民開始經驗「市民生活」的新式生活方式，從傳統農業社會養成之日出而作、日落而習的思維，轉而為休閒之際從事藝術欣賞、參加體育活動、文化集會、園藝造林，甚至溜狗散步的新生活型態。然而我所要關注的是，此一空間形式所帶來隱藏於權力表層之下的常民文化面向。萬華遊廓地之築成，一方面表徵作為殖民統治者的高級休閒娛樂區，另一方面卻也隱藏著從事娛樂服務的臺灣底層人民閹啞而深層的悲哀。殖民者透過強勢的政治權力，在臺北進行空間機能之劃分，藉以明示日本人所在地的核心地位，並彰顯在臺日人多方位的政治、經濟、文教主導權勢之外，更計畫性地在都市隔離出風紀區，以提供統治階層一個合法進行休閒娛樂、發洩情慾的場所。

¹²⁹ 關於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可參照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標準》（臺北：稻鄉，2007年）。

¹³⁰ 王月鏡主修，《臺北市志 卷八 文化志文學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

在 1937 年舉行的臺灣都市計劃另講習會上，當局揭示「商業地域」的設定，目的為：促使都市生活便利及發展、增進商業繁榮。¹³¹ 然而需注意的是，當局其實是特意將商業地域「活潑，有生氣」的活動型態，與住宅所需安寧、恬靜的住居品質加以區分，以提供作為統治階層的日本人，一個更好的生活空間。是故，殖民政府將臺北市區分出商業地域和居住區，並且在居住地又分為「日本人」的居住區域，以及對帝國資本統治具有生產作用之本地勞工居住區，藉以透過都市空間機能與品質優劣的差異性，達成社會控制與種族區異的目標。

殖民當局認定在臺北市的商業活動區分為三類：一、都心（都市中心）；二、一般商店街及繁華街；三、歡樂地區及風紀地區。¹³² 所謂的都心區，即指由城內的榮町、本町、大和町等商業區，除去書院町及文武町的一部份空間（衛戍監獄、學校等）而成，這區間主要是由殖民政府所設置的公共機所構築而成，是商業地域的最核心區。此區間有官公署（總督府、官衙公署、中央官廳、州市廳、警察署）、公共建築物（公會堂、博物館、圖書館、醫院）、商業建築物（商工會議所、商品陳列館）等；其次是一般商店及繁華街區，即指城內以外，涵蓋本地人區的大稻埕及艋舺街區，以及後車站下奎府町、建成町一帶；第三類歡樂地區及風紀地區，為與「市街地」隔離之特別區域，如位於艋舺的「妓館指定區域」等地，其劃設目的乃為執行隔離性的監控並防制其不良影響。¹³³

此一空間分類結果顯示日本政府藉由臺北城周邊／老舊街區之差異，來區隔殖民／被殖民的空間，並進行種族空間隔離行動，背後隱含著意義是：確保「都心區」殖民中心的進步、神聖意象，藉原本已繁榮發展之本地人商業街區持續推動國民經濟，並隔離風化區域，名義上以「防止……風紀上不受歡迎之建築物分散在市內各處，影響市民生活」，實際上則藉由隔離分化，一方面能隨時提供殖民官僚體制系在的娛樂時需求，但另一方面又不會影響其神聖而威權的殖民統治空間與生活作息。

如同我們至今所知，延續日治時代的風紀娛樂區，在臺灣人密集居住區的暗巷隱翳之處，藏著當年風紀隔離政策下的風化產業，尋芳客無人不知這些巷底風光：

臺北大稻埕茶坊櫛比，富豪相峙。茶時，庸夥多婦女精選之，婦女不獨臺人，且有遠來於漳、泉諸州者，一日貸銀自四、五錢至十五、六錢不等，每朝三三五五追逐，蓮步入茶館，坐小榻選之，多則五、六十人，少則二、

¹³¹ 塚本一郎等，《臺灣都市計畫令講義》(1937)，收錄於黃世孟譯，《臺灣都市計劃講習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1987)，頁 46。

¹³² 早川透，1937《都市計劃理論與實務》，收錄於黃世孟譯，《臺灣都市計劃講習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1987)，頁 147。

¹³³ 《臺灣都市計劃令施行規則》第 39 條明文規定：「有酒女、歌妓寄寓之酒家及其他知事或廳長認為有礙風紀，而已命令指定之營業用建築物，非在風紀地區內，不得建築」，這種風紀制度在日本本土之都市計劃法內雖也有法令明定，但未實際施行，而臺北地區則早於明治 29 年

(1896)，日治初期即由臺北縣以保發第 701 號指定「妓館指定區域」，於艋舺的「艋舺市街」、「內舊街」、「歡慈市街」、「大溪口街」、「凹斗仔街」等區內。原法令見《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第 23 卷第 11 門，明治 29 年 7 月 2 日。相關都市計畫法規，轉引自徐裕健，《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臺北為個案》(臺北：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頁 115。

三十人，有少艾，有老女，皆花裝柳態，紅綠相伴，實為奇觀。¹³⁴

延平北路鬧忙忙，春色無邊暗裡藏；祇要識途有老馬，矮簷僻巷任尋芳。¹³⁵

除了大稻埕以外，臺人聚居的艋舺舊社區亦是，過往繁華至此儘剩酒家林立，而沒落的本地民戲，亦多以色情包裝，博取觀眾：

閃爍燈光夜萬華，雜陳百戲最喧嘩；更堪觸目新花樣，特種名題各酒家。¹³⁶

日治時期臺、日人活動空間的分化政策，使得有一部分在臺灣的日本人從來沒有機會跨過日本人活動範疇，亦無機會走進臺灣人居住地、接觸本地的文化；然而卻在此同時，亦有一大部分的男性統治階層，為了生理上的需求，而經常游移於臺、日人休閒歡樂區的交界之域，並且跨足至臺灣人密集活動的風紀區裡尋芳飲樂。此一現象，使得在臺日人無論是否有機會接觸臺灣人民或文化，都在執政者計畫性地打造異質分化空間政策之下，促成日本人／臺灣人之間，存在著上層／下層的潛在文化諭示，在殖民統治下的文學作品中，許多殖民／被殖民者的隱喻，於是亦被引伸出日本男子漢／臺娘悲女的形象。¹³⁷ 臺灣人居住地因為旗亭¹³⁸ 文化性和性娛樂產業之供給，吸引日本人走進被殖民者所居處的生活空間，而在此一原本受日本人所歧視的本地人空間裡，統治階層並得以延續公領域中的主導權勢，持續在私領域的聲色享樂中滿足殖民者據有身心優位的快感。

第三節 在隔離／監控統治下迅速發展的文化核心區

日治時期臺北都市空間計劃的本質，基本上是一種權力關係的空間戰略，殖民政府透過權力的操作，來達成空間政策的文化支配意圖。日本當局在行使支配權的每一個戰略中，理性且合理化的區別出其「自我空間」，並且在環境中展現出自我族群的意志空間。然而儘管執政者意圖透過政治上的權力關係，以達成文化支配的主導權勢，但事實上，「文化」是一個多元交涉的系統，而非一個固成的型態，尤其在面臨異國政權施行種族分化政策之時，臺灣本地文化一方面受到殖民政策的影響而改變其內在風貌，並產生文化之間彼此吸納／排除之現象；但另一方面，亦因文化的強勢衝擊，而引起對於文化他者的認知，以及相對於他者的自體文化之認識。

以下我所要進行的是，將臺北在日治時期的政治權力，放置於空間政策角度

¹³⁴ 佐倉孫三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風雜記》(臺北，臺灣銀行，1961)。

¹³⁵ 王月鏡主修《臺北市志 卷八 文化志文學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 218~221。

¹³⁶ 黃啓端、張祥傳修，《臺北市志稿 文徵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頁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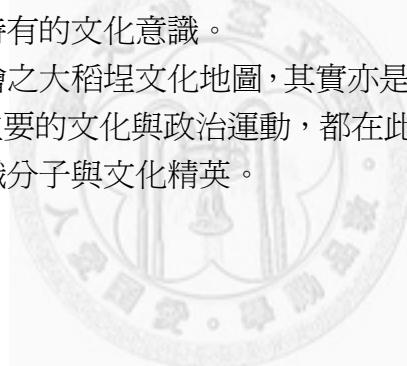
¹³⁷ 例如施文杞的寓言小說〈臺娘悲史〉，作者描寫橫暴的日猛看上了美麗的臺娘，非要將臺娘納妾，就威逼臺娘的父親大華就範。故事中的男女主角暗喻了日本和臺灣的處境。

¹³⁸ 日治時期稱酒樓、藝妲間為旗亭。

來探討。透過此一途徑，將使我們更容易理解為何大稻埕此一地方空間，在日治時期以來會被視為臺灣政治運動的起源地，以及本土文化的搖籃。臺灣政治史說明了日治時期在臺灣進行的反殖民運動，是以文化協會及其主導的各項文化運動為主軸，而在北臺灣並且由蔣渭水所帶領的民眾黨為領導中心。¹³⁹ 從空間的角度來看，殖民者進行的空間權力運作及其連帶之資源分配不均所帶來的政治衝擊，在日治中期以來在臺灣人地區所發起的各項文化運動中被凸顯出來，空間差異治理之政策，反而成為臺灣人的居住地成為掌權當局施行全面性殖民政策下的施政縫隙，它不但延續了臺人常民生活模式與文化形貌，並且容納、促進了臺灣本土意識的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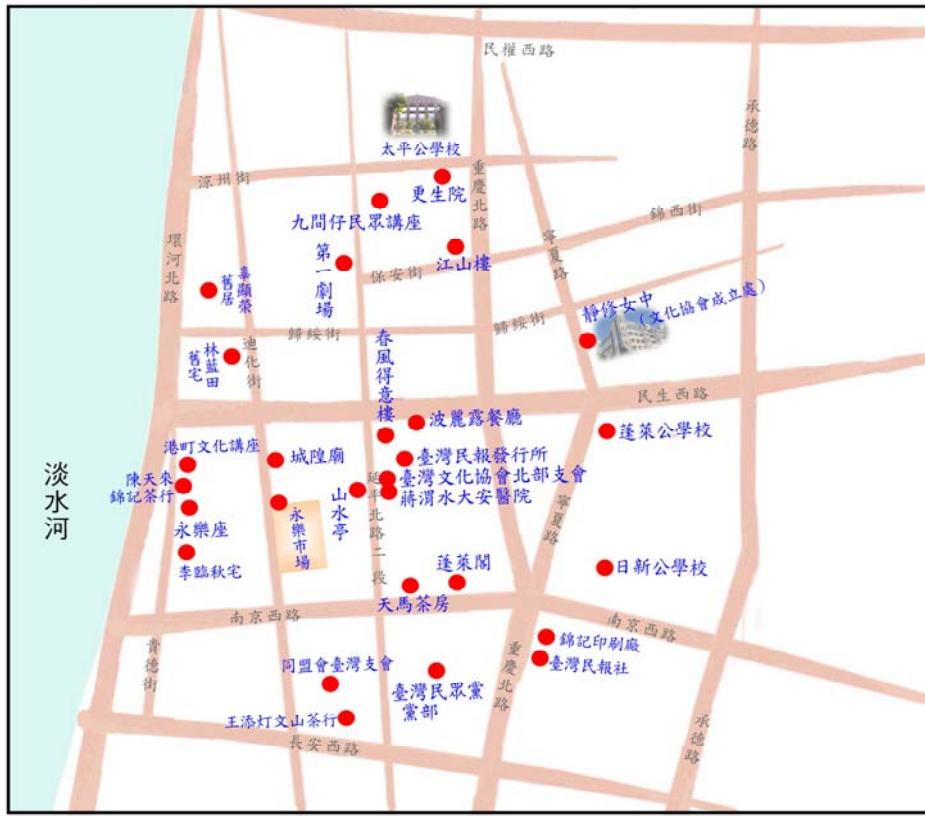
殖民當局的空間差異政策，使原本缺乏民族意識與地方概念的臺灣本地人，在面臨殖民政府一連串的空間權力運作之操作之時，開始意識到自身文化處於劣勢、落後的境地，因而有志之士們試圖透過文化的推廣與再教育，來提升臺灣人民的文化水平。殖民者對空間的隔離與分配不平等的環境資源，反使本地的菁英份子得以在此地醞釀文化反動的力量，這些知識分子們，開始嚴肅地正視臺灣主體性、關注臺灣文化的前途，並以他們經常活動居處的大稻埕做為文化改造主導中心，透過文學、藝術以及戲劇等文文化傳播的形式，滲透進臺灣人的日常生活中，企圖再結構本地人特有的文化意識。

試看下圖為筆者所繪之大稻埕文化地圖，其實亦是在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地圖的核心區域，許多重要的文化與政治運動，都在此發跡，而此區亦融聚了當時臺灣文藝界的重要知識分子與文化精英。



¹³⁹ 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2003)。

大稻埕文化地圖



圖片說明：筆者依據實際調查結果所繪製。

作為當時現代性／殖民性指標都市的臺北，歷經日本統治先後數十年的時間，從原本國族觀念薄弱、文化意識模糊而消極的城市，轉變成一個帶領全島民眾進行的反殖民文化運動的核心場域。就歷史層面來看，原本重商主義濃厚的大稻埕地區，在此一轉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大稻埕百姓在茶葉經商貿易所奠定的經濟基礎中，使子女有較多的資本接受日本所帶來的西式教育和文明進步的思想，而這些接受高等知識教育的菁英分子們，以自身所蒙受之西式現代化教育作為思辯反殖民文化的知識基礎，開始對於帝國的統治與不平等待遇產生深刻的省思與批判，並集結本地菁英集結交遊，彼此激發砥礪，使大稻埕漸成為文化與政治聯盟主導之臺灣本土文化核心區。因而，臺灣本地新興菁英階層以提升國民的素質、提倡新文化運動為訴求，教導民眾吸收新知及世界資訊，他們所標舉的許多文化活動，都在被殖民政府隔離的本地人區中，如火如荼地展開。

從文化場域生成的層面而言，有一現象值得注意，即大稻埕在日治中期以後所展現之文化核心形貌，與大龍峒地區傳統教育出身之士紳文化圈，可視為當時臺灣本土文化傳統與現代共生相繫的兩個文化系統。然而由於兩地區在歷史、文化、族群及經濟上長期以來的相互依附，因而在它們同時面臨更強勢的日本殖民文化之際，兩股文化勢力容易集結而形成較具有影響力的文化共識體系，進而帶動其他地區的臺灣人民，打破地域與地域之間的族群藩籬與隔閡，形成整體共識。

的臺灣文化認同。

此外，大稻埕地區和艋舺地區從清代以來累積的族群仇怨，亦在共同面臨強勢殖民文化的機遇下，逐漸蘊釀出消解的途徑。原本存在競爭與對峙意識的兩地居民，在共同面臨殖民者進行空間分化與種族區隔之統治政策之下，使兩地居民重新界定文化上的「他者」概念，並逐漸淡化漢人族群內部的差異，轉而將日本人族群視為實質異化的對象。

以「文化協會」的活動為例，本地新興菁英推動的「新文化」知性的活動，如定期講座、文化演劇、巡迴電影放映、讀書會、讀報社等活動，在大稻埕首創集會演講的活動開始之後，接續於大正至昭和年間頻繁地舉行，除了設於大稻埕港町的「文化講座」及太平町五丁目的「臺北民眾講座」附讀報社外，艋舺龍山寺及艋舺俱樂部亦開設免費的講習會。文化活動不僅在大稻埕地區展演，同時影響延伸至大龍峒、艋舺乃至於全省臺灣人居住的區域，各地菁英彼此同盟結識，共同推展文化活動，合力提升臺灣人的文化素養與知識水平，此一聚集各地菁英推動民間文化的結盟形式，形成殖民都市另一種常民文化生活，而殖民者對這種活動引發的社會效果深以為憂：

在都市，每逢星期六、星期天，定期舉辦演講會，且常常舉辦地方巡迴演講……動員無智的民眾，名為歡迎，鳴放鞭炮，逕行一種變相的示威運動。

140

儘管在封閉的臺灣人居處空間裡，殖民者的監控與政治權力易於滲透期間，然而在此政治包圍與壓抑之下，權力的後果亦同時在被殖民者的常民生活中生成。因而我們可以看到從執政者由上而下施行於被殖民者的權力意志，其實激發了從民間由下集結而上的反抗意識及本土文化認同。

大稻埕不僅在臺灣政治運動史上佔有關鍵的位置，它同時是戰前臺灣文化的主導核心區域，重要的本土文化運動皆在此發跡，例如靜修女中大禮堂即為「臺灣文化協會」創立大會地點、臺灣民眾黨本部舊址位於天水路上、大安醫院（現為義美公司）位於延平路上、大安醫院右側有《臺灣民報》發行所，左側有「文化書局」、以及在甘谷街的同盟會臺灣支部、南京西路的蓬萊閣、貴德街的港町文化講座、永樂座、春風得意樓（現為勞委會職訓局）、九間仔民眾講座，和位於重慶北路的臺北更生院。

當日本人在城內的榮町享受散步的快樂時，在大稻埕有對日本殖民地統治不滿的知識份子們，同時在大稻埕展開反殖民的組織運作，從事各項政治與文化運動。例如以羅福星（1868~1914）為首的「同盟會臺灣支部」，即設址於稻新街（今甘谷街），臺灣同盟會黨羽並以大稻埕做為地下抗日組織運作的中心據點；蔣渭水（1891~1931）在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也投資「春風得意樓」、文化公司、冰店與東瀛商會，1920年之後，蔣渭水參加「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年與林

¹⁴⁰ 臺灣總督府編，蔡伯塙譯《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臺南：臺灣史博物館，2008）頁 205。

獻堂創立「文化協會」，籌組「新臺灣聯盟」、開辦「臺灣雜誌社」、發行《臺灣民報》等政治社會運動¹⁴¹，許多組織的總部或辦事處，都直接設在大安醫院內，或常在附近的劇院以及自家經營的場地召開會議。這些公眾空間，為政治社會運動提供了極佳的掩護和聚會場所，各路政治菁英、知識分子以及文藝人士經常在此出入，使當時的大稻埕，儼然成為臺灣文化運動以及政治社會運動的中心所在。¹⁴²

北臺灣的文化協會在蔣渭水等人的號召下發揮影響力，協會以大稻埕為據點，透過社會教育來提高人民文化及知識水平，並藉由非武裝手段對抗日本的同化政策積極促成各項文化活動。所舉辦之文化活動，主要有：(一) 會報的發行；(二) 讀報社的設立；(三) 通俗講習會；(四) 夏季學校；(五) 文化講演會；(六) 文化劇運動；(七) 創立文化協會電影對—美臺團。文化活動於全省各地展開，尤其以臺北為多，知識份子們以「謀求臺灣文化水準之提昇，彼此以道德真髓相互切磋，並振興教育，獎勵體育……培養藝術興趣」¹⁴³ 作為號召，試圖以軟性的訴求探測殖民當局的政治隙縫，並透過人文藝術所潛藏的文化力量，作為渲染與號召民族意識的途徑，以求索民族自決與人權自由的可能。

除了熱衷政治的知識份子在此進行政治運動之外，大稻埕地區亦聚集許多文藝界人士，他們舉辦各種文藝活動、並經常在此區交遊切磋。例如由瀛社主導的全島詩人大會，即於 1921 年在蔣渭水投資的「春風得意樓」舉行、1922 年在顏雲年位於大稻埕的稻江別邸召開創立十五周年紀念會，許多古典詩聯吟會經常在大稻埕的江山樓與蓬萊閣等旗亭舉行。¹⁴⁴ 文人們透過交遊、聯吟以及各種社交活動，在大稻埕聯繫起穩固的文化社群網絡，黃美娥指出，此一社交資源對詩社社員所帶來的影響，並不只是文藝的切磋而已，甚至是文化界從事其他社會活動時，所能動員的最佳人脈。¹⁴⁵ 透過文化社群的集結，本地知識分子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在大稻埕累積了可觀的群眾實力。

除了古典詩文的結社之外，文藝知青們在現代文藝上的聚合組織，亦不勝枚舉。例如黃得時與廖漢臣、郭秋生共同在大稻埕松江樓組織「臺灣文藝協會」，以「謀臺灣文藝的健全發達為目的」，並發行《先鋒部隊》雜誌，推出《臺灣新文學出路的探究》專輯、注意到民間文學的發展和保存，協會以大稻埕為中心，於各地舉辦綜合藝術座談會，作家們推廣文藝應從大眾生活中尋找素材，將藝術落實於民間，並透過各種方式推廣藝術，提升整體社會文化的藝術水準。¹⁴⁶ 此外，又於 1934 年組成「臺灣文藝聯盟」，在日本東京及臺灣三處成立支部，發行

¹⁴¹ 連溫卿，《臺灣政治運動史》(臺北：稻鄉，2003)。

¹⁴² 黃煌雄，《蔣渭水傳》(臺北：時報 2006 年)、《自覺的年代—臺灣民眾黨紀念特展》(臺北：臺北市文化局)及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頁 701~702。

¹⁴³ 喜安幸夫，《日本統治臺灣祕史：霧社事件至抗日全貌》(臺北：武陵，1995)，頁 135~136。

¹⁴⁴ 王月鏡主修，〈臺灣詩社大會記〉，收入《臺北市志 卷八 文化志文學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 152。

¹⁴⁵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7:3(1997.09)，頁 47~88。

¹⁴⁶ 〈文聯主催綜合藝術を語るの會〉，《臺灣文藝》3:3(1936.06)，頁 45~53。

《臺灣文藝》雜誌，臺灣北部支部亦設於大稻埕；1934年留學日本的臺籍畫家們，從日本帶回來了西方新思潮，也帶來對於日本殖民體制的質疑與批判，他們成立「臺陽美術協會」、舉辦「臺陽展」。¹⁴⁷

依藉著茶葉及南北貨的國際貿易，帶動大稻埕一帶的經濟發展，而使當地人土擁有豐厚經濟基礎，並在文化藝術之消費能力及知識教育的投資具有一定之水平，促使本區人文活動益加興盛，¹⁴⁸ 加以大稻埕地區不少富商之子或赴日留學、或赴海外經商，這些年輕的知識份子，從世界各處帶來了民主社會的新思想與人文理念，對於受日本帝國殖民的臺灣本土現狀，具有一定程度之批判與反思能力，他們不論左傾或偏右，或即使在民族認同的道路上仍游移未決，在現實上勇於表達滿腔的理想與熱情，或有加入臺籍菁英人士所主導之社會運動，或獻身文化藝術領域中，抒發對斯土斯民的關懷。

當然任何的文化藝術活動之運作，皆仰賴豐厚資本的藝術贊助者之資助，因而我們不能忽略日治時期在大稻埕地區之文化資助人在推動臺灣本土藝術文化，以及支持政治運動中的關鍵性角色。在大稻埕興盛的文藝活動之背後，多因擁有資本的茶商或餐飲店老闆之資助及支持，例如「錦記茶行」的創辦人陳天來（1872~1939）亦支持臺籍知識份子所舉辦的文化活動，他所投資的娛樂事業，如「永樂座戲院」、「第一劇場」、「蓬萊閣酒樓」等，提供臺籍知識份子和文化人士彼此交流的場所。¹⁴⁹ 此外，積極從事社會運動、經營「文山茶行」的王添燈，而與他往來頻繁的左翼人士如連溫卿、王萬得、蘇新、林日高等人，亦經常是茶行的常客；¹⁵⁰ 知名作詞家李臨秋（1909~1979）在詹天馬的提攜之下，開始撰寫電影劇本介紹、及為電影歌曲填詞，並且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臺語歌謡，如〈補破網〉、〈四季紅〉、〈對花〉〈望春風〉等，其中《望春風》並改寫成電影。此外，在大稻埕日新公學校擔任教職的鄧雨賢（1906~1944），1932年受文聲唱片之託，創作〈大稻埕進行曲〉，隔年於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擔任專職作曲，其中〈望春風〉、〈四季紅〉、〈雨夜花〉等流行歌曲均出於其手；¹⁵¹ 此外，在大稻埕地區活動的

¹⁴⁷ 「臺陽美術協會」的成立，以及同年四月舉行的「臺陽展」，被視為與日本臺灣教育會主導的「臺灣美術展覽會」，具有互別苗頭的抗議性質存在，受到新思想洗滌的臺灣青年們，積極在政治、文學、藝術各領域中，試圖向統治者表達擁有多個主權力的訴求，並藉以象徵臺灣人對於文化藝術品味具有相當程度的鑑賞能力，不容為當局政治力量予以干涉。謝里法：「臺灣美術協會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團體組織，一方面可以在藝術上發揮中華民族的特質，另一方面可以用團結的力量，抵抗日人的歧視和壓迫……」為抵抗日人主辦之官展對於臺灣本土藝術家的歧視與壓迫，於是在1934年11月10日，由臺籍畫家陳澄波、廖繼春、陳清汾、顏水龍、李梅樹、楊三郎、李石樵及日人立石鐵臣等八人，得社會人士蔡培火及楊肇嘉等之聲援，在臺北鐵路飯店另組成一「臺陽美術協會」，簡稱「臺陽展」，又稱「民展」，每年舉辦美展一次。

¹⁴⁸ 可參照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標準〉（臺北：稻鄉，2007年）。

¹⁴⁹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臺灣：臺北新民報社，1934），頁134。

¹⁵⁰ 陳君凱，〈穿透歷史的迷霧—王添燈的思想、立場及其評價問題〉，《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1063~1106。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年），頁40。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初稿)》（臺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頁60~61。

¹⁵¹ 呂興忠，〈走過殖民時代的詠歎與希望——臺灣新民謡的奠基者鄧雨賢〉，《二十世紀臺灣歷史

藝術家，尚有臺灣第一位近代雕塑家黃土水（1895~1930）¹⁵²、膠彩畫家郭雪湖（1908~）¹⁵³、臺語流行歌曲推手陳君玉（1905~1963）¹⁵⁴、臺灣電影辯士第一人王雲峰（1896~1969）¹⁵⁵、李金土（1901~1972）¹⁵⁶ 等人。許多文藝青年們，在大稻埕喜好文藝活動的餐飲業老闆的經濟資助下，促使各式各樣的藝術活動在此開展。

從空間的角度觀察大稻埕的文化與政治運動，除了前揭所述，臺灣人居住地為本土文化共識凝聚，提供了一個相對隱密、不為當局所覺察的城市空間，使知識份子們容易在此區進行各項抵抗活動。然而我們要問的是，為何殖民當局無法全面性地運用其嚴密的警察機制與行政監控，來全盤壓制本地反抗份子的行

與人物》（臺北：國史館，2002年），頁184~185。

¹⁵² 黃土水畢業於大稻程公學校及國語學校，就學時因「圖畫」和「手工」成績優異，獲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推薦，赴日本東京美術學校雕塑科學習雕刻，是臺灣第一位近代雕塑家，他不僅有紮實的西方寫實技巧，也擁有嚴謹的創作態度，善於尋找創作「臺灣特有的東西」，參見《臺灣美術全集第十九卷—黃土水》（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6）。日治時期臺北美術界受黃土水成就之影響與鼓勵，紛紛起而努力於雕刻者不乏後起之秀，如陳夏雨、蒲添生、黃清亭、鮫島臺器等人，這些人即使非為臺北人，然其活動均以臺北為中心，參見王月鏡主修，《臺北市志 卷八 文化志藝術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22。

¹⁵³ 被譽為「臺展三少年」之一的郭雪湖，年輕時靠自學繪畫連獲臺展獎賞，曾加入東洋畫會「栴檀社」、「麗光會」，對於推展臺灣美術運動之貢獻為結合畫友成立東、西洋繪畫兼容的「六硯會」。「臺陽美展」成立後，曾擔任多年東洋畫部評委。戰後初期，受聘為長官公署諮詢，與楊三郎等人籌組「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立志終身為專業畫家、獻身藝術，持續創作細膩繽紛的膠彩作品，作品「圓山附近」、以及以家鄉大稻埕迪化街景為主題的「南街殷賑」尤富盛名。

¹⁵⁴ 陳君玉於1933年加入「臺灣文藝協會」，曾活躍於當時文壇，除發表新詩外，並於《臺灣新民報》發表連載小說、編輯《先發部隊》雜誌。此外，他對於臺語流行歌的推動更不遺餘力，1933年臺灣發行的第一首臺語流行歌曲〈跳舞時代〉即為其作詞，此外他創作的〈夜半的大稻埕〉，傳為暗戀臺灣第一代女歌手純純的作品，1935年他與廖漢臣發起籌組「臺灣歌人協會」，結合唱片從業人員，提升臺灣流行歌曲的製作水準，同時也注意樂器的改革，1936年聯合陳秋霖等人發起組織「臺灣新東陽樂研究會」，是為臺灣第一次漢樂改良運動。同時，陳君玉也是臺灣推行國語運動的先驅人物之一，曾於大稻埕日新町成立「燕京語同好會北京語講習所」，並與王詩琅主持兒童雜誌《學友》、《新學友》，並編纂《臺北市誌》、《臺北文物》等刊物。關於陳君玉相關文字資料，可參考莊永明，《臺灣百人傳2》，（臺北：時報，2000）；另2003年由李坤城編劇、簡偉斯導演之公視紀錄片《Viva Tonal 跳舞時代》，即記錄了1930年代陳君玉如何在文學創作與臺灣文化運動之中默默耕耘，並將藝文人士帶入流行歌曲的創作領域的故事。

¹⁵⁵ 王雲峰學生時代曾於日本學習音樂，返臺後定居大稻埕，組織「永樂管絃樂團」、擔任民間樂團「共樂軒西樂隊」指揮，並先後於臺北芳乃館（戰後改稱美都麗戲院，後拆建今國賓戲院）擔任小提琴手、第三世界館（今臺北延平北路大光明戲院）擔任辯士。其受邀為大中華影片出版之《桃花泣血記》電影創作之同名主題曲，在當時大受歡迎，不久被古倫美亞唱片公司聘為專業作曲，並為電影《望春風》配樂，成名作品有〈補破網〉、〈城市之夜〉、〈歸來〉、〈深閨怨〉等。相關資料參見王雲峰，〈電影、唱片、民間音樂〉，《臺北文物》4.2 (1955.08)，頁77~79。

¹⁵⁶ 李金土是臺灣音樂界具有卓越貢獻的前輩，曾於東京上野音樂學校留學，主修小提琴與音樂教育。1925年學成返臺，居於大稻埕太平町，並應母校臺北第二師範學校之邀，任教於音樂科，此外他積極推動地方音樂活動，1926年在臺北組織絃樂四重奏，經常舉行獨奏會與室內樂演奏。1927年舉行小提琴獨奏會，並作環島公演，轟動一時。1931年策劃萬華青年團體「艋舺共勵會」舉辦「臺島洋樂競演大會」音樂比賽，同年他亦根據賴和的詞做了一首《農民謡》，可說是知識份子的「社會運動歌曲」之一，1942年李金土組織明星混聲合唱團，團員由40多位青年男女組成，並曾於1944在臺北中山堂演出。戰後在他與蔡繼琨教授多方奔走之下，於1946年元月正式籌組「臺灣警備總部交響樂團」（臺灣省立交響樂團、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前身），為臺灣音樂教育及人才培育奠定基礎，參見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東京：湘南堂，昭和61年，1986年復刻），頁404。

動？事實上總督府在臺灣所設置的各項警備檢查機制，以及行政監控系統，皆經由謹慎而嚴密的國家佈署來實行。¹⁵⁷ 尤其是臺灣人密集居處的地區，隨時有一套嚴格的文化警治系統，針對人們在公眾場所進行的結社聚集行動，進行滴水不漏的政治檢查與監控。然而儘管日本當局的統治權力無所不在，但即使當局透過空間支配、政治禁閉與嚴密的警察制度來執行統治，尤其弔詭的是，我們反而更容易在被日本人區隔、監控的空間裡，發現權力所無法全面遏抑的文化集結與反抗現象。Michel Foucault 指出權力的雙向性，認為權力事實上也是和反抗聯繫在一起的，即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¹⁵⁸ 而臺灣人在差異性的弱勢空間裡，所能進行的抵抗方式，是當局無法藉由國家機器全面性壓制，且隨時隨地滲透、播散於常民生活中的各種日常文化型態，以及與以文學藝術為目的文化揭示與展演。

因而談及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文化主導核心，就不能不聚焦於大稻埕，而在關注大稻埕文化空間的同時，應留意知識分子習於活動的餐飲場域，如何扮演關鍵性的空間角色。以當時臺灣文藝界的三個重要場所來說，「波麗露」、「山水亭」、「天馬茶房」三個飲食空間，提供了當時臺灣文藝界青年們聚首交遊、激發文藝心靈，以及進行文化與政治論辯的場所。許多藝術家如李天祿、詹天馬、周添旺、楊三郎、陳澄波、郭柏川、藍蔭鼎、李澤藩、李石樵、郭雪湖、張萬得、鄧雨賢、洪瑞麟，以及作家張文環、呂赫若等文藝界人士都是店裡的常客，經常在這些場所裡談文學、繪畫及音樂。

「波麗路」在 1936（昭和 11 年）以欣賞古典音樂的第一家正式喫茶店之名在大稻埕開幕，餐廳老闆廖水來先生對於藝術界的長期贊助，使得此處文人們往來活動頻繁，亦開啟了臺灣美術評論與藝術作品的仲介大門，¹⁵⁹ 廖水來先生除了提供「波麗路」場地給予藝術家作品展覽的畫廊場所之外，¹⁶⁰ 他亦愛好文藝

¹⁵⁷ 日治時期警察相關部署及職務內容，可參見臺灣總督府編，蔡伯璽譯《警察沿革誌 第二編》（臺南：臺灣史博物館，2008）。

¹⁵⁸ 參見 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1992）。

¹⁵⁹ 美術評論家謝里法與史學家莊永明，皆肯定波麗路在臺灣美術史上的地位，謝里法更將波麗路視同如對巴黎印象畫派影響甚大的蒙巴爾斯納的 Demo 和 Rotonde 等咖啡館：「廖水來自從開了這家咖啡廳以後，有許多文藝界朋友前來捧場，除了生意興隆，自己也在文藝界成了知名人物，義不容辭地充當起畫家的贊助人來。經常拿錢出來收購畫家的作品，有時又將這些作品向自己朋友圈子推售出去，把所得的錢又向畫家購畫，接濟畫家的生活。所以當大家談起巴黎畫派而聯想到蒙巴爾斯納的 Demo 和 Rotonde 等咖啡廳的同時，論及我們的臺灣美術運動，也就無法不提到「波麗路」西餐廳和廖老闆。」關於日治時期崛起的文藝公共領域論述，在沈孟穎的論著《咖啡時代：臺灣咖啡館百年風騷》（臺北：遠足文化，2005 年）一書中，有精采的論述，作者從臺灣咖啡館的發展及轉化之歷史脈絡，探討咖啡館在文藝公眾領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對於本論文撰寫有重要之啟發。另外美術評論家前輩謝里法之著作《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藝術家，1998 年）提供許多珍貴的評述觀點與史料，使本文在勾勒日治時期大稻埕一帶人文藝術活動時，有更加豐厚的論證背景，特此致謝。

¹⁶⁰ 在首屆「臺陽展」的目錄上，即出現波麗路的贊助廣告，此後由於老闆對於藝術活動的喜好，臺陽展於是在廖老闆的支持下，易地至「波麗路」餐廳舉行：「早期每年都到這兒舉行年展，直到歷史博物館舉辦展覽，這個活動才轉移了陣地」，相關報導可參見丘彥明，〈從「波麗露」到「明星」三十年來文人與咖啡館探索〉，收入《報導文學》（1985），頁 174-189。

與古典音樂、支持文藝活動。¹⁶¹ 在那個崇尚西方文明、上流士紳標榜時尚雅興的年代，文人雅士喜歡到「波麗路」聽優雅的古典樂、欣賞藝術畫展，戀人們在此相親、約會和談情說愛，無論是跟得上潮流的浪漫情事，或是引領時尚的文化藝術展演，都經常在此處活絡生產。當然，波麗路咖啡廳裡的藝術家們和他們的支持者，向來以文化階級而自命。謝里法也指出，日治時期在西方文化經日本而輸入臺灣之際，他們正是第一批接受到西方文化的新文化人，不管這些藝術家們以怎樣地眼光來面對這個社會，他們無疑的已拋開舊文人的孤立王國，去參與實際的社會建設工作。¹⁶² 咖啡館在文藝界一向被視為實踐理念與討論公共議題的場所，當然它亦伴隨著資本主義時尚流行的聲色想像，讓具有一定資本基礎的精英人士，透過「品味」的選擇表現自己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態度。¹⁶³ 大稻埕新興的知識份子飲食空間，提供藝術家們在這裡風流地搔首弄姿、也在這裡熱烈地高談政治理想的最佳文化場域。日治時期在大稻埕新興的飲食場所，兼具了文化階級的區辨功能，提供本地知識份子一個較為私密隱蔽、但同時又可以聚眾討論的公共空間。

當然除了西式餐館之外，位於大安醫院斜對面、東洲大飯店附近的臺菜館「山水亭」，亦是文人喜於聚集活動之處，店家老闆為熱衷於文化藝術的王井泉（1905~1965），他曾與張維賢、王萬得等人創立「臺灣藝術研究會」，也在大稻埕永樂座等劇院演出宣導自由戀愛的《終身大事》、以及揭露鴉片毒害的《黑籍怨魂》，1941年並且與張文環共同籌辦《臺灣文學》雜誌。¹⁶⁴ 在山水亭中，經常有作家張文環、呂泉生、黃得時等人在此出入，並且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金關丈夫，和民俗學家池田敏雄也經常來此拜訪，由於王井泉熱心於文化藝術，使的山水亭成為文學家喜愛光顧的餐飲場所，充滿濃厚文學氣息。

在戲劇方面，第一辯士詹天馬所開的「天馬茶房」，也經常聚集了熱衷戲劇表演的青年們。尤其在1941年日本政府實行「皇民化運動」，臺灣文學和本土戲劇表演受到限制，臺灣人禁止演、唱以臺語發音的新劇、歌仔戲及布袋戲，僅能演出官方日語的「日劇」。於是當時許多熱衷新劇的提倡者們聚集到天馬茶房，商討日後大計，並抒發鬱悶心事。詹天馬之女詹天慧回憶說：「像以前很流行的臺語歌〈望春風〉、〈雨夜花〉，就是在天馬茶房裡寫出來的」，詹天馬不但是大稻埕有名的電影辯士，更投入當時名盛一時的組織「星光演劇研究社」，成為其中的重要分子，而「山水亭」的王井泉也是該團成員之一。¹⁶⁵ 我們從電影《天馬茶房》中，可以窺見當時大稻程思想先進的藝文人士，如何聚集在茶房內互訴心

¹⁶¹ 波麗路是依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的作品 Bolero 取名，由於老闆非常歡迎喜好「新文化」的同好能在此聚集，使得「當代畫壇的美術家以及文人雅士，都是波麗路的常客；廖老闆的藝術鑑賞眼光也不錯，常充當畫家的贊助人與經紀人，收藏、推銷他們的畫作，並給予經濟上的奧援……」莊永明，〈大稻埕食的文化〉，《中國時報》，1992年8月15日。

¹⁶² 謝里法，《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市：藝術家，1998）頁77。

¹⁶³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Boston,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¹⁶⁴ 謝里法，《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市：藝術家，1998）

¹⁶⁵ 莊永明，〈二十世紀臺灣代表人物（上）〉，《臺灣：望春風文化》，2001)。

曲，以及這些熱血青年如何在茶房密室內自由創作、書寫、閱聽著臺灣民歌：〈望春風〉、〈雨夜花〉、〈丟丟銅〉、〈六月田水〉，以及標榜演出「新劇、新戲、新希望」的「新劇團」，如何熱烈排演著《高砂館》、《閨雞》、《地熱》等新劇。¹⁶⁶

當然，文藝家彼此之間也經常支援與繫聯，例如「天馬茶房」和「波麗露」除了分別為戲劇界和美術界的聚集場所外，也贊助文學界的活動，「天馬茶房」內「臺陽展」五人小組舉辦洋畫展覽，即為《臺灣文學》雜誌籌措經費而組成，¹⁶⁷ 而臺陽展的成員—陳澄波、楊三郎、郭雪湖、許聲基和洪瑞麟同樣也是波麗露的常客。

除了上述地點之外，「淡水戲館」、「第一劇場」、「港町文化講座」、「永樂座」等，均是當時盛極一時的文化活動地點，尤其「永樂座」是大稻埕最負盛名的戲院，除了傳統的戲曲以外，也是現代化話劇上演的舞臺，當然除了新文化之外，大稻埕各處總是有著京劇、話劇、布袋戲、歌仔戲等在上演，位於永樂國校南面的涼州街，是以臺灣傳統技藝出名的「布袋戲」街，當時王炎一的劇團「哈哈笑」和李天祿的劇團「亦宛然」活動的場地亦在此處。

殖民權力強勢治理的結果，使臺灣人居處空間呈顯出資源分配不均、文化地位弱勢的事實，知識分子對於國家前途的擔憂，以及急切改變現狀的滿腹理想，然而脫離殖民或獨立，只是遙不可及的政治理想，¹⁶⁸ 因而知識份子們意識到只有透過文化傳播與建構的途徑，培養自己的文化、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質之後，才有可能改變族群弱勢的命運。因而知識分子透過廣義文化教育、文化傳播與知識塑成的途徑，將政治意識滲透於人民生活之中，試圖以文化的形式來取代政治圖謀，是以新興菁英所推行之文化運動、政治運動、社會運動，逐漸滲入傳統日常生活中。當然，在這股文化運動的潮流之中，大稻埕在空間環境、經濟基礎、政治情勢及人文條件等因素交相輔成之下，無庸置疑成為領導全臺的文化主導核心區，並且大稻埕的空間意義，也成為臺灣本土社會對抗、鬆動殖民支配結構的一個反支配中心。

殖民時期的本地居民在總督府所精心擘畫的都市空間裡，因面臨相對於「殖民者生活圈」的「臺灣人生活圈」之空間隔離統治途徑，反而使其內部獲得更多文化發聲的機會，因而促成本地文化主導場域的鞏固與深化，並激發居民去意識到清領時期所未有的在地城市認同，而此亦強化了本省內部族群的自我文化定位。都市的空間過程，與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都市過程所指涉的空間轉化與歷史轉化，是歷史中的城市轉化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ty in history)，亦即，

¹⁶⁶ 葉金剛原著，林正盛導演，《天馬茶房》(臺北：勇士股份有限公司，2003)。

¹⁶⁷ 沈孟穎，《咖啡時代：臺灣咖啡館百年風騷》(臺北：遠足文化，2005年)，頁36。

¹⁶⁸ 日本思想家賀川平彥曾向臺灣留日學生表示：「你們現在還不配談獨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必有獨自的文化。譬如文藝、美術、音樂、演劇、歌謡等等。不能夠養成自己的文化，縱使表面上具有獨立的形式，文化上也是他人的殖民地，現培養自己的文化才是你們當務之急。丁瑞魚口述，引自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2000)，頁332。

它包含了整個都市的變遷（urban change）與歷史的變遷（historical change）。¹⁶⁹因而我們在探討日治時期臺北城市的空間形式，以及其對於戰後整個臺北社會以及文化場域的影響時，若從連續互動的歷史演化觀點來脈絡中來理解，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解釋城市如何變遷，以及為何變遷的多重成因。因而我們可以指出的是，臺北城市從日治時期到戰後的空間演變轉化過程，不僅是都市化的常識性呈現，亦涵括社會、族群以及文化等多重面向的都市過程，而對於此議題的關注，將有助於我們從歷史脈絡中理解當代臺北所顯之多元交混的城市意象。



¹⁶⁹ 參見 Manuel Castells 著，陳志梧譯，〈一個跨文化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1993），頁 223-300。

第四章 戰後初期（1945~1949）的臺北：一個文化尚待

重組的城市

日本投降後，在臺日本人除了留用的技術人員外，其餘陸續遣返回國，而中國內地人士紛紛遷移入臺，直至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大量外省籍軍民湧入，臺北人口逐年遽增，前後計有一百二十餘萬人撤退到臺灣；此外，由於戰後社會秩序紊亂，物價飆漲，民不聊生，百姓在故鄉求生不易，故島內亦有大量移民從中南部北上，到臺北討生活的本省人。廣大的移民人潮，直接影響臺北的，除了人口族群結構的改變之外，尚有城市空間嚴重不敷使用的問題，是以這些移民們，有的開始佔據土地及日本人留下來的空屋，有的在都市邊緣搭起臨時違建，在狹小、潮濕而擁擠的空間裡闢地而居。

戰後初期的臺北，臺北又經歷一次城市空間經驗上的巨大轉變，而此次面臨的城市變遷，不是國家大興土木的實質建設，而是社會人口結構的遽變促成城市空間重新支配的改造運動。事實上戰後初期在國民政府軍事威權體制的控制下，多以考量臺海對峙下的防空疏散工程，以及中華民族宗主國統治之正統性象徵為施政方向，因而對於臺北的實質建設並不多，¹⁷⁰ 臺灣居民面臨的城市變遷問題，是如何在擺脫日本殖民、歡喜迎接國民政府之際，認真面對政權轉移、人口流動，以及政治意識壓抑等多重文化考驗；另一方面，經過大時代動盪戰亂的外省軍民，在中國內陸一面往南遷徙，一面向北相思，最後來到一個陌生而侷促的小小島嶼上，他們對茫然國家前途及動亂的政局，充滿了憂懼與不安，他們又是如何在臺北每一個暫時編派而安身的空間角落裡，安頓因流離失所而創傷的心靈，並且重拾生活的秩序？

本章將透過戰後初期的幾點文化面向，探討戰後初期的臺北如何在動盪的時代中，歷經空間分配、文化重組的過程，並且爬梳臺北如何在一個國家意識高漲、族群結構多元的年代，逐漸形構出城市的秩序。當然，本章目的不在於將如此一個大時代的大議題壓縮於一個小幅篇章之中，而是試圖透過文化研究的關照，接續探討臺北在脫離殖民統治之後所面臨的一些文化現象，尤其關注此歷史背後所隱藏的權力及文化結構問題。當然，隨著國民政府在臺灣長達半世紀以上的統治，許多歷史的爭議點也逐漸被化解、抑止或平息。同樣本文的目的不在重新複述歷史上的事件，而是藉由文化角度的揭示，來理解人民如何在這克難的年代，在眾生喧嘩、千頭萬緒的文化課題中，透過城市空間與文化場域的編派與支配，尋求族群與族群、社會與社會、空間與空間之間，一些彼此溝通對話的可能。

在展開討論之前，我首先要問的是，為什麼是「外省」？必須先釐清「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區別與意涵。如同我們一般所知，外省人含括來自各省的人士，根據1956年全國戶口普查資料，在臺外省籍人口的原籍，來自中國各個

¹⁷⁰ 曾旭正，《戰後臺北的都市過程與都市意識形構之研究》，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

省份，其中以中國東南沿海各省為多數，原籍為福建、浙江、江蘇、廣東四省的人士，即將近半數。¹⁷¹ 「外省人」是一個單純相對於「本省人」的名詞概念，原本並不是一個用以區異族群的方式，在中國，只要是來自外省的客旅，都會被當地人稱為外省人。林桶法指出，日本投降之後在臺灣所謂外省人，不只是單純相對於本省籍人的概念，而是「有一口外省腔，愛講當年打日本、打共匪英雄事蹟的一群人」¹⁷²，當然也有人認為外省人因為初來時有一種優越感，於是本省與外省鴻溝就因此劃出來。¹⁷³ 我認為此一概念的產生，和文化生成與變遷的歷程一樣，是一個經由長期經驗與積累的認同過程，它包含各發言立場者的政治取向，以及族群之間的權力競逐與地方認同。然而，僅管對於本省人／外省人如何被命名與劃分的說法各異，但我在本文中所要採取的取徑，則是最原初「外省人」乃相對於「本省人」的概念，單純作為區別戰前戰後在臺人士出身背景的稱呼，而此概念將作為未來本文解讀史料與討論相關議題之取徑。

第一節 日本人走了以後？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歷經烽火之後的臺北正待復元，當時的臺北僅是一個人口有 33 萬人的小城，根據當時奉派來臺接收工礦事業的嚴演存，描述戰後初抵達臺北時的都市景況：

柏油馬路只有中山南北路、延平北路、重慶南路及衡陽街，餘均石子路。不但汽車絕少，公共汽車也無，只有少數高輪人力車，一般人均用腳踏車。……博愛路一帶商業區，炸得斷垣破瓦。新生路以東一片田野，間有二三所房屋。只有萬華大稻埕一帶，大約盟軍因中國居民多居於此而未炸，尚有些城市風光。¹⁷⁴

日治時期的臺北「都心」在盟軍猛力轟炸之下，市容盡毀，景況蕭條，不少公共建設毀於烽火之中，反而是臺灣人居住地艋舺及大稻埕，保住昔日市街風光，居民們幸未在二戰烽火中受到太劇烈的創傷，然而，緊接著他們所居處的臺北，將面臨戰後巨大的社會變遷，以及政治結構的轉變，而藉由這些改變，臺北將呈現多元而繁複的情景，且各區之間亦逐漸形構出特有的空間氛圍以及人文現象。在未來幾章將逐步展開探討戰後臺北所呈現之多元現象之前，我們先觀察戰

¹⁷¹ 1956 年在臺外省籍人口中，原籍為福建省有 142,520 人，佔 15.35%、浙江省有 114,830 人，佔 12.37%、江蘇省有 95,836 人，佔 10.32%、廣東省有 92,507 人，佔 9.97%、其餘依次為山東省、湖南省、安徽省、河南省、四川省、湖北省、河北省、江西省、上海市、南京市、廣西省、遼寧省、北平市，以及中國其他各省人士。這些數據未含約三十萬未設籍之軍事人口。參見臺灣省政府戶口普查處編，《中華民國四十五年戶口普查報告書》（臺中：臺灣省政府）1957。

¹⁷² 林桶法，《一九四九大撤退》（臺北：聯經）2009 年，頁 400。

¹⁷³ 此乃林桶法引楊雲開的說法，但林氏不認為完全如此，他較為同意柴雅珍在其碩士論文《戰後臺灣外省人的塑造與變遷》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1997）所認為，外省人概念乃是歷史長時間逐漸塑造所成。見林桶法，《一九四九大撤退》（臺北：聯經）2009 年，頁 400。

¹⁷⁴ 嚴演存，《早年之臺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頁 8。

後臺北市人口變遷與分布的情形。

人口數量的增減，不僅僅是社會變遷的現象，同時亦為社會變遷的主因，一地之人口的增加與減少，以及增加速度的快速或滯緩，經常作為衡量該地區發展程度的指標，亦可視為當地社會、經濟活動的綜合現象。戰後臺北市的人口結構，呈現明顯的改變，如上所述，戰敗的日本人陸續遷出，中國內地的外省籍人士先後遷入，遷徙潮在 1949 年大撤退之後達致高峰，因而使臺北在短短十年之間，人口數量遽增，而族群結構也迅速改變。

根據《臺北市誌》於 1959 年的調查，日治時代臺北市人口的族群結構，主要以臺籍人口居多，約佔三分之二，日本人約佔全市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外省人僅佔 3~6% 不等；到了 1945 年，日人比例達到最高，約有 32%，外省人僅 3%；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日人被遣返歸國，直至 1955 年底時，在臺之日本人僅剩 534 人。¹⁷⁵ 另一方面，戰後大陸地區來臺的人數則迅速增加，根據 1947 年底的統計，外省人佔臺北市總人口的 9.9%，1949 年大陸淪陷後，大批外省人遷入臺灣，到了 1957 年底，外省籍人士佔臺北市總人口數之比例增為 37.7%。¹⁷⁶

從下表可以更清楚了解臺北市在戰前與戰後人口變遷的情形。1945 年之後，日本人口數遽減，在往後的五年間，外省籍遷臺人士則以數十倍增加，短短十年間，外省籍人士已遠超過原居於臺灣之日本人數量。

臺北設市後歷年戶數及人口數一覽表

年份	戶數				人數			
	全市總計	本省人	外省人	日本人	全市總計	本省人	外省人	日本人
1920	42,390	25,983	2,649	13,721	164,329	109,141	9,513	45,675
1925	47,420	28,597	3,550	15,219	201,374	133,201	13,300	54,843
1930	57,191	33,136	4,431	19,549	240,435	154,694	15,372	70,369
1935	68,293	40,684	4,884	22,604	287,846	187,975	17,347	82,130
1940	74,739	46,202	3,532	24,932	253,744	239,468	13,341	100,554
1945	77,057	46,428	2,758	27,805	335,397	218,784	9,130	107,269
1950	106,707	—	—	69	503,450	336,228	166,858	104
1955	153,474	—	—	—	704,124	438,380	265,744	218

註：戶數與 1935 年以後人數未列其他少數外僑（外國人、朝鮮人），故後三者相加和全市總計略有出入。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編，《臺北市志》（1976）

戰後的臺北在移民潮中不斷擴張，在遷入的人口中，不僅僅有外省人大量移入，同時亦有大量外地本省人也遷居到都市，這些移入人口使臺北市從日本統治之初的 1986 年至戰後 1970 年間，人數增加近 38 倍。¹⁷⁷ 戰後大量的人潮在不同

¹⁷⁵ 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3）。

¹⁷⁶ 陳正祥，《臺灣的人口》（臺北：南天，1997）。

¹⁷⁷ 日本統治臺灣之次年（1896 年），臺北的人口共計為 46,710 人，其中大稻埕人口數最多，計

時空背景及原因之下，全都湧入了臺北，這些移民當中，有的來自中國大江南北，也有來自臺灣各地，他們原本各自擁有著自己所習知的故鄉、血緣與地方認同，卻在大時代國家政權爭戰的遽變之中，有的為了理想，有些為了求生存，當然又有大部分是迫於故國山河變色的無奈，都先後來到了這個陌生的城市裡尋找並等待著可能。

接著我想要問的是，從戰後 1945 年到 1949 年前後，臺北如何在短暫的時間內，騰出足夠的空間資源，來容納這麼龐大的移民人潮？延續從上一章討論的日治時代都市空間規畫來看，由於日本殖民當局原本即刻意將臺灣人與日本人的活動範圍區隔開來，因而當日本人戰敗被迫遷離之後，自然殖民時期以居住日本人為主的城內、城南地區，以及提供日本人從事高級休閒娛樂的西門町一帶，皆留下了空缺，戰敗的日本人毫無選擇，除了少數專技人員之外，其餘百姓皆必須在短暫時間內，變賣在臺灣經營的所有財產與土地，接受遣返回國。因而在戰後日本人產權尚未妥善處置之前，臺北「佔房子」、「剝狗皮」的情景四處可見，鍾肇政即在其回憶錄中，談到戰後初期日本人急於脫產、「剝狗皮」的情形，¹⁷⁸ 丘秀芷也書寫了當年情景：

那些房子，「先住先贏」……城中區的房子原都是日本人住的，一光復日本人多數走了，誰先住進去，誰就有居住權！空房子到處都是。¹⁷⁹

「佔房子」，後來我瞭解，光復初，很多日本人要回日本，尤其臺北城中區絕大多數是日本官員住的。有的本來就是宿舍，日人一走，一時產權「真空」。有的有房契，日本人急於脫售，據說以一棟房子房契換一隻鵝、一隻雞都行。他們要走，搬不了那麼多東西走，於是在路邊典賣東西，換一點點錢或一點食物也好。戰後物資，尤其糧食奇缺。房子，這時變成沒用了。

日本人較矮，臺人稱他們為「四腳狗」，日據時剝削臺人的不在少數，這一下子局勢轉換，他們不得不變賣東西，臺人笑是「剝下狗皮」。¹⁸⁰

23,184 人，佔 49.6%，艋舺次之，計 19,711 人，佔 42.2%；城內區僅佔 8.2%。（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 年。）1904 年，臺北的人口增至 85,890 人，成為全臺最大都市。當年度臺南倉安平外港的人口為 52,222 人。（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 年）1916 年底，《臺北廳志》記載，臺北的人口已超過十萬，為 102,249 人。1944 年為日治時期臺北市人口最多的一年，401,497 人。其後因美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軍轟炸，使人口遞減。日本戰敗後，大批日僑被遣送回國，故 1946 年時，臺北市人口減至 271,754 人。1948 年以後，因國民政府在中國失去政權，眾多外省人士渡海橫空到臺灣避難，使全臺人口頓時遽增，1950 年底臺北市人口已逾 50 萬人，1955 年則超過 70 萬人，至 1970 年則有 170 多萬人口。見《臺北市志 卷四 人口篇》。

¹⁷⁸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臺北：前衛），1998。

¹⁷⁹ 丘秀芷，〈三線路〉，收入《回到中山堂》（臺北：文化局，2002 年，頁 129）

¹⁸⁰ 丘秀芷，〈二二八事件前前後後〉，收入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主編，《我們的八十年》1991，時報出版社，頁 197。

終戰之初，日本人留下的大片空間，成為戰後首批遷入人士足可利用的最佳選擇，因而在 1949 年國民黨淪陷大陸之前，不論是奉命接收臺灣的公務專技人員，或是自行遷臺謀生的外省人士，皆能擁有較佳的居住空間，例如青田街一帶的臺大教員宿舍，多配給當時接收臺大的第一批教職員所使用。¹⁸¹ 之後，隨著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局勢逐漸危急，外省人陸續遷臺者增加，這些從日產接收來的公家宿舍逐漸不敷需求，加以日產的接收、清點以及分配，對於在內戰之中奉命接收臺灣的陳儀政府而言是一大考驗，許多公、私有財產接收過程之中，爭議不斷，¹⁸² 而同時民間又存在著迫切的空間需求，不少由大學延攬赴臺的公教菁英人士，初到臺灣卻無落腳之處，因而暫時居住於其他友人家中，例如錢思亮曾住在臺大傅斯年校長宿舍、趙元任先生也會借住錢思亮先生家中、後來胡適之先生和梅月涵先生也曾同住於此；齊邦媛來臺大任教之初，也借住在馬廷英教授家中。¹⁸³ 即使是被聘來臺的教授，學校有時也未能安排住處，如何安排這些外省精英們的居住，成為一大問題。

當時的臺北百廢待興，儘管同時臺灣內部對於陳儀政府的軍政統治開始異議不斷，且臺灣文化界亦對於政府貪敗施政展開嚴厲撻伐，¹⁸⁴ 但在多數自願來臺服務的外省人士，大多對臺灣存著較佳的印象，本省人亦對這些外省人士誠懇尊敬且溫和有禮。¹⁸⁵ 1949 年國民黨在大陸淪陷，隨政府撤退臺灣的大量軍民湧入臺灣後，作為臨時首都的臺北，開始面臨真正嚴峻的文化衝擊與空間考驗。

國民政府在中國內陸的流離戰敗，幾經烽火摧殘，使民生凋敝，軍紀不振，避難潮湧入臺北之後，人心不安所致之社會震盪，使物價飆漲、通貨膨脹加劇，許多人被迫在短期內攜家帶眷、變賣家產而匆促離開家園，隨逃難的洪流一路由華北竄向南方，最後在驚惶與恐慌之中來到了臺灣。在兵馬倥偬、青黃不接的局勢之中，眾多攜家帶眷的百姓等不著落腳之處，索性就地佔用個空房子，若沒有空屋就找個空地，隨意搭起簡陋的房子克難地居住：

大陸淪陷，許多難民來臺，沒有地方住，住在中華路鐵道旁、淡水河堤岸旁，隨便找木板、油紙搭個棲息之所。¹⁸⁶

在這批移民潮中，從外地移入臺北的本省人也不例外，移民們因陋就簡地佔了一

¹⁸¹ 左祥駒，《古蹟保存作為一種空間的社會生產：臺北市青田街的日式宿舍保存運動》臺大城鄉所碩士論文，2006。

¹⁸² 例如有利可圖的事業或財產，往往未經呈准即擅行接收、變賣或挪用等等。參見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土地的接收與處理 1945-1952》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頁 98-104。

¹⁸³ 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文化），2009 年，頁 290-293。

¹⁸⁴ 臺灣文化界對於陳儀政府對於本省人的政治歧視、指控臺人奴化，並擅用軍權審判臺灣人等作為極為不滿，加以政府在接收日產的過程中，貪腐霸道且積弊無能，因而展開各項文化行動，並對於現政加以撻伐。相關論述及史料研究，可參考陳翠蓮，〈戰後初期臺灣人的祖國體驗與認同轉變〉，收入《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臺北：遠流），2008，頁 333-386。

¹⁸⁵ 林桶法，《一九四九大撤退》（臺北：聯經）2009 年，頁 363-373。

¹⁸⁶ 畢璞，〈危樓歲月〉（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主編，《我們的八十年》，時報，1991，頁 206）。

方空地，做起生意：

鐵道旁的人家越來越多，有人開始做生意買賣東西……他們初到臺北，離開車站順著鐵路「紮營」就對了！離西門町又最近，離大稻埕區也不遠，可以就近做些小生意……¹⁸⁷

當然這樣的環境當然不盡理想，不論是於異地謀生的本省人，抑或避難赴臺的外省人，要在這狹小而潮濕的都市邊緣縫隙中過日子，實在煎熬不好受，因而經常發生意外：

鐵道旁的鐵皮木棚竹棚越來越擁擠，日子不好過，有人熬不下去就乾脆臥軌自殺，1950 年代前後，中華路鐵道上經常夜間有人臥軌尋短。

到臺北的越來越多，沒地方住只好沿鐵道旁搭建竹棚而居，人越擠越多，一路延伸，有時一不小心則造成嚴重火災。¹⁸⁸

許多個別來臺的民眾透過個人的關係尋找住屋，不少機關也為其員工注的問題大傷腦筋，各機關之間也展開彼此借空間、搶宿舍的情形，例如中研院史語所、故宮博物院向臺大借宿舍、1949 年的《民族報》上，也刊載〈婦女工作會自顧不暇，沒有空宿舍容納別人〉的報導，以婉拒其他單位覬覦其原本擁有的三十間宿舍。¹⁸⁹ 不論民間或公家單位，民眾住的問題總是不斷滋生，因而「先搶先贏」、「先佔先有」的情形，在臺北侷促的城市空間裡不斷上演，然即使是分配到宿舍的公教人員，有時環境也不盡理想：

我永遠忘不了三十八年的初夏六月，我和我的丈夫帶著一個二歲半、一個不滿周歲的幼兒，從廣州渡海來到臺灣。我們的第一個立足點是丈夫所服務一家民營報社位於臺北市成都底的公共宿舍，那是一棟年代久遠的破舊日式二層木樓，我們分配到的是二樓靠近東北向的一間六疊房間。

那棟公共宿舍不但樓齡老舊，腐朽的樓板千瘡百孔，牆壁剝落，天花板上鼠輩橫行；而且煤氣公司就在馬路對面，整天飄送惡臭，薰人欲嘔。¹⁹⁰

戰後臺北人口遽增，並且以一個令人無法預料的速度不斷擴張，空間不足的問題、糧食不足的問題，以及通貨膨脹的問題，又連帶著地價、房價與房租的飆漲，接連地發生。羅蘭也回憶當時的情形：

¹⁸⁷ 邱秀芷，〈三線路〉，收入《回到中山堂》（臺北：文化局，2002 年，頁 129~130）。

¹⁸⁸ 同上註。

¹⁸⁹ 文見《民族報》，1949 年 5 月 27 日第二版。

¹⁹⁰ 畢璞，〈危樓歲月〉（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主編，《我們的八十年》，時報，1991，頁 222~223）。

旁觀逃亡潮，也旁觀那光復後第一波的房價飆漲，日式房屋以每疊「他他米」一兩黃金算。¹⁹¹

由於人口密集、許多百姓居住空間及衛生品質不佳，加以物價及房價飆漲所衍生之貧富差距、資源分配不均等狀況，致使經常有各類社會案件在臺北發生，這和臺北在日治時代民風純樸、夜不閉戶治安良好的情況差異極大，但日久之後，人們也於是漸漸習慣臺北小偷猖獗的治安。

臺北小偷之猖獗，臺北人雖然自己未被偷，一定也聽過親友被偷，遭偷在今日可說是家常事。¹⁹²

那年頭很多人丟小東西，衣服鞋襪都有人偷，連木屐都有小偷偷。更大膽的「大偷」是偷電線桿上的電線、地裡的自來水管，因為電線中有銅線，水管鉛做的，在那物資奇缺的時代，值錢得很。……¹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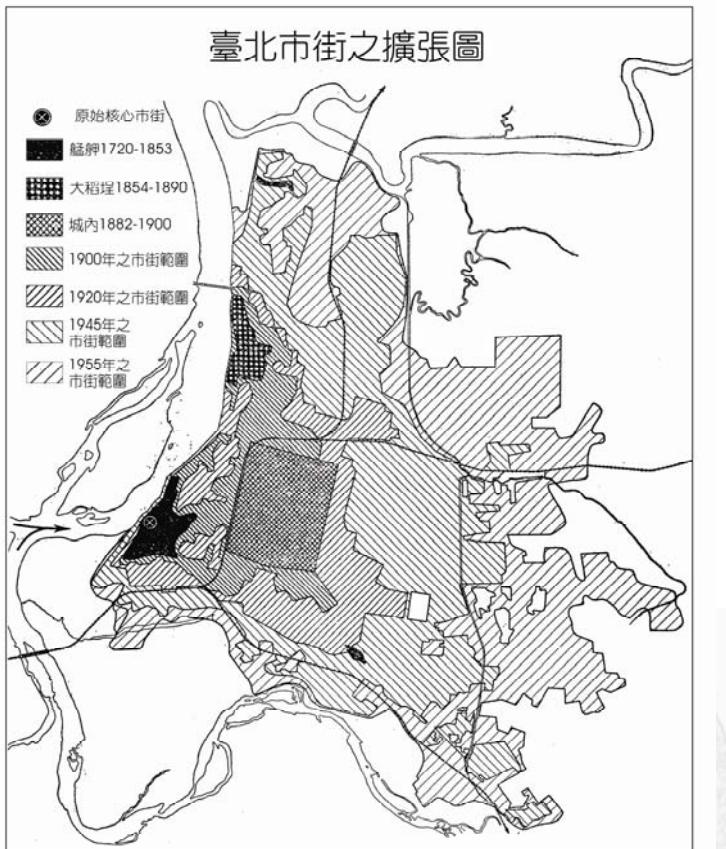
住屋供給不足、活動空間狹小，以及房舍隱蔽性和防盜性不佳，幾乎成為戰後臺北都會生活的居家樣貌，而為擴大使用空間所加蓋的違建，以及各式各樣林立的招牌，也逐漸成為臺北市普遍的都會建築景觀。隨著人口的遷入及都市的擴張，臺北迅速地開發出大量分布的密集住宅，戰後除了人口活動較為密集的市街以外，尚有廣大的市地未被利用，此因亦致使往後都市之發展，漸向臺北城之東南方向持續擴張。從下圖中，可以看到臺北是如何在歷經多次政權的交替，以及各族群密切接觸、理解以及彼此融合之後，從原本小小的分散型市街，逐漸擴大成為兼具政治、經濟以及族群文化發展核心的現代化都會城市。

¹⁹¹ 羅蘭，〈幾頁民族滄桑史——是誰奮鬥誰犧牲〉，《歷史月刊》24期，1990年1月，頁16。

¹⁹² 陳克環《書癮，書緣》（九歌，1980年），頁99。

¹⁹³ 畢璞，〈危樓歲月〉（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主編，《我們的八十年》，時報，1991，頁200）。

臺北都市歷史擴張圖



資料來源：根據陳正祥，《臺灣地誌 上冊》。臺北：南天，1993 二版，p.285 重繪。

觀察臺北市內部的人口結構狀況，有一現象值得關注，即外省人之分布，和本省人地區呈現對比的現象，即外省遷入臺北市的人口中，主要分布在大安區、古亭區、城中區、中山區、松山區。¹⁹⁴ 尤其是日治時代日本人分佈密集度較高、屬於城內、城南區域的城中、大安與古亭三個區特別顯著，外省人在當地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皆超過 50%。¹⁹⁵ (表) 為 1956 年臺北市各區人口結構，從表中可知，外省人在大安、古亭及城中區，人口數較本省人多。

¹⁹⁴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臺北市誌 卷一 沿革志城市篇》，1988 年 6 月，頁 102。

¹⁹⁵ 相較於本省籍人口佔多數的建成區、延平區與大同區，同年度本省籍人口數，皆佔 80% 以上。

地區	省籍	本省籍	外省籍	合計
臺北市		116,564	67,480	184,044
松山區		9,162	4,695	13,857
大安區		9,108	17,621	26,729
古亭區		11,268	13,518	24,786
雙園區		11,111	2,500	13,611
龍山區		12,635	3,149	15,784
城中區		8,379	9,445	17,824
建成區		11,743	1,383	13,126
延平區		12,055	1,979	14,034
大同區		15,191	2,684	17,875
中山區		15,904	10,506	26,410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臺北市文獻會編，《臺北市志 人口篇》各項人口統計數據整理製作而成。

此現象乃因延續日本殖民時期的都市規畫，以及臺／日人活動空間隔離政策之結果，外省人來臺之後，不論是國家給予政策性的安置，或是自行尋屋遷入，都自然而然地填補了日本人留下來的空間區位。相對於臺北其他本省人集居的地區，原屬日本人地活動區人口較為稀疏，面積廣大，適合大量外來者遷徙移入。因而像是城內、城南和西門町周邊公共設施相形較臺灣人地區完善的區位，多直接由國民政府的各公家機關及其眾多員工和眷屬們所進駐及接收。

外省人彼此生活在一起，除了有共同的抗日與反共經驗，銘刻在彼此流離的生命故事之中之外，其「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相知相惜，使得他們自然而然地生成一個生活圈，地方感形成的過程，乃是個體活動參與時空之流的結構歷程之產品，意即，在該地所有和地方相關聯的活動，透過「佔用地方」(taking place) 或是佔有和轉換空間與自然，而共同建構、維繫和塑造了地方。¹⁹⁶ 當然，由於日本殖民統治因素使然，外省人的活動範疇，亦不會與經過歷史長期積累成型的傳統臺灣人社會混居，或在日常生活與本省人共處共患難的機會。

在來臺的外省籍人士中，不乏飽學之士以及種專門技術人才、行政人員、學生等，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人才到了臺灣，不但豐富了臺灣內在文化，同時也為建設臺灣、繁榮臺灣提供各階層優秀的人才。由於大環境情勢的因素，這些外省籍人士在臺灣落腳，於是與臺灣人的接觸，不再是短暫相逢而是長期居處。尤其需留意的是，臺灣人對於外省人的觀感，以及外省人對臺灣人的印象，不應是一種全盤性的文化觀感定論，¹⁹⁷ 外省人並不完全是以統治者的優勢姿勢看待臺灣人，臺灣人也並不完全對於外省人懷有排斥，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彼

¹⁹⁶ 《地方》，頁 91。

¹⁹⁷ 有的歷史觀察家認為外省人還是有統治者的優勢心態，有些人則不認為完全如此。見黃秀政等，《臺灣史》（臺北：五南書局）2002，頁 251，以及游鑑明，〈當外省人遇到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 期，2005 年 3 月。

此印象，可能因個人教育程度、工作環境以及生命際遇等因素而不完全一致。¹⁹⁸當然也有人只是逃難者過客的心態，但也有多數的外省人最後選擇臺灣作為永久深根的土地。但不論如何，在戰後臺灣文化需面臨重整之際，這些人士帶著各自的文化經驗，提供臺灣再造與創新的多元性。

第二節 日本人帶不走的建設、臺灣文化的空間資產

日本殖民帝國在島都臺北用心打造的模範都市空間，以及投資鉅額所建造的各項大型公共建設，都在戰敗投降之後，全遺留在臺灣而無法帶回，這些帝國所留下來的遺憾，都成了國民政府在臺灣統治的龐大資產。當然最直接受惠的，是戰後初期接手管理的執政當局，以及經常在城中、城南及西門町附近活動的軍民們。像是最熱鬧的日本人市街榮町（衡陽路、博愛街一帶），戰後許多日本商行轉為外省人接收經營，像是翔泰、永裕綢緞莊，生生、新亞皮鞋、聞達鐘錶行，以及推銷國貨精良產品的中華國貨公司，這些響有商譽的商行皆在此地，加上原本由臺灣人經營的老字商號，如和興行、伍中行、掬水軒等，使此地商區在經過二戰的蕭條之後，又逐漸繁榮起來。遼耀東在作品中回憶戰後初期此趨繁華的景象：

當年的中山堂是臺北市的心臟，前對博愛街，右邊是衡陽街。當時的博愛路上大綢緞莊一間接一間，都是山東人的生意，店裡的夥計說話都帶青島味……還有過去北京做買賣和氣生財的遺風。衡陽街雖然不長，卻是臺北市最熱鬧的街道，銀樓、百貨商店集中在這裡……外地人來臺北必逛衡陽街，衡陽街上人來人往，夏天南市多戴大甲草帽，女士撐五顏六色的花陽傘，半高跟鞋，婀娜多姿。¹⁹⁹

在文化事業方面，1945 年前後，陳儀政府首要工作為從事臺灣島內之軍事、政治、經濟等之接收，因而官方無暇顧及文化事業的接收。故出版事業之接收並未受到關注，故初期多以民間出版事業為主。因而初期在重慶南路上的圖書文具書街，在日本商家離開後，只要由一些本地出版商所接手頂讓，至 1947 年開始有有東方、正氣兩出版社經營出版，皆著隨著大陸來臺的經銷商續進駐，書店種類更加齊全，如經銷圖書並代理出版之書局有五家：南方、東華、三民書局、臺灣書店（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所直營）、學友書店；出版部則有文化協進會、新新月報社、臺灣青年月報社三處。另有兩家印書館，為民權印書館、香華書館。這些出版機構所出版的種類，又多為中小學教科書及通俗性讀物。1949 年之後，有幾家原本在大陸地區經營的出版事業，積極籌劃以臺北市為基地，或開始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構、準備發展臺灣出版事業者，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

¹⁹⁸ 林桶法在近著《一九四九大撤退》（臺北：聯經）一書中，引用詳細史料說明了外省人的籍別結構以及抵臺之初的印象，可資為參考。見前揭書，2009 年，頁 363-364。

¹⁹⁹ 遼耀東，〈守著書店的日子〉，收入《回到中山堂》（臺北：文化局，2002 年，頁 64）。

正中書局、開明書局、文星書局等，接著陸續開張。

此外，日本時期作為人民發表言論與集會討論的場所之臺北公會堂，戰後改名中山堂，其周邊的軍事用地，經國民政府接收之後，原南警察署改為刑警大隊、日本憲兵隊成為國軍憲兵隊，而陸軍官舍則興建國軍藝文中心、國軍英雄館，成為提供軍官進行休閒娛樂、教育訓練的國軍育樂中心。這些設施多在城內，成了官方公署、軍務人員及，以及外省軍民經常出入的地區，加以此區位與西門町地區隔鐵道相鄰，從衡陽路到西門町一帶，構成一個兼具商品及圖書消費、逛街休閒、約會聊天或從事藝文展演的文化生活圈。年輕人經常逛完衡陽街到中華路吃飯，再跨越鐵路到西門町逛街，當年臺北的電影院和娛樂場所都聚集在這裡，成了臺北最繁華的所在。這些原本以服務日本人為主、提供殖民者玩樂享受高級娛樂區，在戰後成了軍民百姓以及作家文人們可以經常涉足的育樂天堂。例如創立藍星詩社創社前的聚會，就在中山堂附近的「朝風」餐廳裡討論：

……當時幾位志同道合的詩壇重鎮，覃子豪、鍾鼎文、鄧禹平、夏菁、余光中、辛魚等人約在那裡聚會，為他們要創辦的一個詩刊想一個響亮又有氣質的名字。眾人苦思不得，覃子豪對法國詩很有興趣，想起了法國有名的「七星詩社」，便建議說：就叫『藍星』如何？²⁰⁰

這些空間場域，對於戰後臺灣文學及藝術的發展，發揮關鍵性的功能。在往後長達三十多年的戒嚴時代，它提供了城市空間解嚴的可能，人民得以藉由各種盛事在此集會、看表演，並且彼此交流。例如雲門舞集和民歌手楊弦都在中山堂舉辦他們最初的公演、〈藍星周刊〉兩百期紀念，在中山堂光復廳舉行、²⁰¹ 臺北市第一屆的集團結婚，國中小畢業典禮，甚至還有宴客和放電影也都在此地進行。戰後許多外省文人們，因地利之便而經常有機會到此休閒，他們喜歡從城中及城南的住處，一路騎腳踏車或悠閒踱步地來到中山堂西門町附近，逛逛街、看書買書，或偶爾喝咖啡、寫作聊天，或者談一場浪漫的戀愛：

中山堂後面靠中華路和秀山街的拐角處原來是一處花木扶疏，設有假山流水的露天茶座，很多文人雅士，戀愛中的情侶都經常流連在那塊幽靜的角落，享受人生。

中山堂附近的「朝風喫茶店」，逐漸成為文人聚集的咖啡館，文學家之間的交誼在此頻繁地進行著：

「朝風」成為報館的編輯、記者、作家、詩人的約會地點，子敏說，報館

²⁰⁰ 向明，〈詩·音樂·黃豆湯〉收入《回到中山堂》（臺北：文化局，2002年，頁93）。

²⁰¹ 1958年7月1日在中山堂光復廳舉行的〈藍星周刊〉兩百期紀念，頒發「藍星詩獎」給痖弦、吳望堯、黃用、羅門等人，由新月派大將梁實秋教授頒發，特獎獎座由名雕塑家楊英風製作。

編輯和作家、詩人的交誼，經常約好在「朝風」見面，不論是「拉搞」或不得已的「退稿」，都在此低聲進行。²⁰²

文人作家經常聚集的西式餐廳及咖啡廳，除了上述中山堂附近的「朝風喫茶店」之外，還有重慶南路附近的「田園餐廳」，以及張愛玲和王禎和在美新處長邀請之下相約見面的「美而廉」咖啡廳（1949~1968，衡陽路），經常舉辦畫展及攝影展，攝影家張照堂、鄭雙禧，以及作家兼畫家的劉奇偉、藍蔭鼎、雷驥等人，皆在此辦過畫展；摩登的中國文化人經常聚集的「中國之友社」（1958-1965），為早期中外人士交換新聞與文化的中心；享譽盛名的明星咖啡館（1949-1989 武昌街），幾乎是臺灣現代文學的發源地，當代文壇重要的作家，如《現代文學》、《筆匯》、《文學季刊》的白先勇、陳若曦、王禎和、陳映真、尉天驥，還有黃春明等人，以及在咖啡館門口擺舊書攤的周夢蝶，都經常在此出入。²⁰³ 這些餐飲店，以一種文藝公共空間的文化姿態發聲，而戰後臺灣豐富的當代藝術文化，在這些空間裡悄悄地進行。

日本人除了在其活動範疇的城內、西門町地區留下不少公共建設及休閒空間之外，還有一個地方值得我們關注，即城南地區。如上一章所述，城南作為當局規劃在都市逐漸發展及擴張之後，提供給日本人高品質住屋的地點，因而日治時期在此區住的居民，其文化素質及經濟地位皆有一定之水準。然而在戰敗投降之後，依規定一人最多僅能攜帶兩包行李返國，因而日本人只好將家中所藏的各種圖書、古董及字紙書畫擺出來賤價販售，當時城南街巷中的日式住宅外，因日本人急於清理舊物，因而將不少值錢物品棄置堆放戶外的混亂現象，家家戶戶的大落庭院外，賤價販售書籍和古董的、收買值錢物品的，以及撿拾回收物品的，穿梭在這些高級住宅的街巷之中，最後在牯嶺街一帶聚結成雜物交易市集，到了1945年左右，賣舊衣、舊貨的小攤販慢慢往萬華方向集中，舊書攤則在原地陸續增加擴展，牯嶺街就在社會結構變遷、物質生活面臨重新解構的戰後臺北城南空間裡，成為當時全臺灣最大的舊書畫集散交易中心。

1949年以後，國民政府軍民大舉遷臺，牯嶺街又陸續聚集了擺地攤的人潮，販賣舊書、藝品、舊衣及日常用品的小販往來其間，當時牯嶺街一帶充斥著流動攤販，不論是拾荒的、撿便宜的，或是愛看書的作家及窮學生，以及四處尋寶的文史之士，都經常逡巡於此地，而擺攤者佔地為王，愈佔愈多，後來發展到58家舊書攤的規模，除了少數幾家擁有店面外，其餘多利用人行道擺露天攤，書本依牆堆疊而立，雜誌書報隨地鋪陳，卷軸書畫掛在樹枝頭，書攤連綿佔據大半條街。而這雜亂但卻充滿生命力的牯嶺街，在政府當局的容忍之下，²⁰⁴ 同時收納了許

²⁰² 子敏，〈約會在朝風〉，收入收入《回到中山堂》（臺北：文化局，2002年，頁113）

²⁰³ 關於咖啡館及文藝空間的相關研究，可參見沈孟穎，《咖啡時代：臺灣咖啡館百年風騷》，（臺北：遠足文化），2005年。此書乃依其碩士論文整理後所出版，論文題目為《臺北咖啡館：一個（文藝）公共領域之崛起、發展與轉化（1930~1970）》，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研究所。

²⁰⁴ 1950~1960年代，許多中南部人口北上謀生，這些缺乏技藝與資本的城鄉移民，多從事高勞力的攤販及小本生意工作，加以1949年以後，許多隨軍來臺的軍民多依賴街頭擺攤、撿破爛或

多文人作家的年少回憶：

依牆為攤位／靠路天為店鋪／天地是家／書籍是賴以維生的貨品／而
我……踩過雨後的泥濘，在書堆中／悄悄地探著奇蹟／窮學生來買用過的
教科書／窮學生來買破舊的絕版書／而生意眼的舊書商／卻打起算
盤……算著古老的年貨。²⁰⁵

舊書攤在城南空間的聚集，以及便宜的價位與銷售，正滿足了當時文人作家的經濟現實需求，他們可以藉由舊書交換與買賣，既減輕知識所承載的經濟負擔，又能獲得更多的新知；另外出版社與期刊編輯部在此地的聚集，讓不論是擔任編輯的文化工作者、或是負責撰稿的作家學者，都在此區進行作品交流與分享活動，使得文人在此出入頻繁，整體空間環境漸漸形成一種文化氣質。

第三節 交織而成的中國圖像：街道命名所隱含的文化意識

1947 年，臺北市政府組成「臺北市街道路牌編訂委員會」，積極更改日治時期所採用的日本式路段界定及日式定名方式，以符合傳統中國定名之習慣。最後委員會通過之方案，指出定名主要包括以下原則：一、既定街路名儘量予以保留；二、以省府圓環（今忠孝東路與中山北路交叉口）為中心，通過中心的兩大幹道，以中山路為經、中正路（今忠孝東路）為緯，將全市分為西北、東北、西南和東南四區；三、主要街道寬度在十五米以上者，概稱為路，分別以「國家」、「元勳」、「元首」、「主義」、「國訓」、「省分」、「大都市」、「名川大山」定名；四、次要街道寬度在六米至十五米間，概稱為街，分別以各省之「城市」或與史蹟有關之「地名」定名。²⁰⁶ 於是，臺北市在經緯兩軸（忠孝東路與中山路）的劃分之下，四區的道路依照上述的原則加以命名，並且同一區的街道又依其空間上的區位關係，來對應城市或山川名。使得臺北市的街道命名，在空間上與中國的地圖對應起來。

上圖藍色部分為大稻埕一帶之街路名，紅色則為艋舺地區街路名。可以發現，此次定名，是繼日本殖民政府在 1920 年進行「町名改正」之後，為臺北市的空

賣舊書、舊貨維生。政府當局惟恐因為全面禁止攤販而影響這些人的生計，甚至動搖他們對於國民政府的認同與正當性，故多採取寬容的態度。為了「反攻大陸」終極目標，所有一切「非正式經濟活動」均可被視為整建軍備的「臨時狀態」，只要不妨礙交通、不抵觸政治思想，管區警察對於街頭拾荒者與攤販多採取放任態度。關於臺北舊書攤相關論述及攤販訪談紀錄，在李志銘的《版世紀就書回味》（臺北：群學出版社，2005 年，本文所引述部份於該書第二章〈黃金歲月三十年：戰後牯嶺街的崛起與沒落（1945~1973）〉）一書中，做了詳盡的研究，作者針對當時舊書攤市集的調查及分析，對於本論文有極大的啟發，可資為臺北市文學生產場域論述時之強證背景。

²⁰⁵ 趙天儀，〈舊書攤〉，《牯嶺街》（臺北：三信出版社，1978 年）

²⁰⁶ 國民政府接收臺北後，認為原本日本政府的街道定名，未能達到「簡單」、「通俗易記」的功能，故著手重行編訂。街路定名工作於 1946 年 8 月由剛成立的長官公署民政處之營建局辦理，後轉由臺北市政府接辦，最後由市政府會同公共工程局、市參議會及區民代表，組成「臺北市街路牌編訂委員會」負責。朱萬里，《臺北市都市建設史稿》，1954 年，頁 399~401。

間稱謂與定義，進行再一次的全盤更易，前後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臺北再一次進行重新命名，統治者透過重新組織空間的途徑，進行國家意識的宣示與彰顯。統治者試圖以臺北市來象徵整個中國，於是在命名工程中，置入了中國地理、偉人名諱，以及及國族訓示，其作用在於「時刻警醒復國職志」，提醒人民不忘故國家園，使得「臺北，這個中華民國位於臺灣的臨時首都，以位於「重慶南路」的總統府為中心（重慶是抗日時的臨時首都），在生活指標上緊密地與中國大陸的地理知識相互接連著，使得生活在臺北的人們，一直與失去已久的領土有似遠而近的關係」²⁰⁷。藉由政治象徵的全盤壟罩，國民政府一方面要刮除臺北在日本統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空間意識，因此「日政時期具有殖民地性質的政制……予以改訂或重新分配，以剷除日本之遺毒。」²⁰⁸；一方面則試圖以大中國的、想像的地理，來重寫臺北的街道與空間記憶。因此臺北的街道之名，從初期的「接收改制」，之後被賦予「反攻復國」的政治象徵，以及對於中國神州故土的強烈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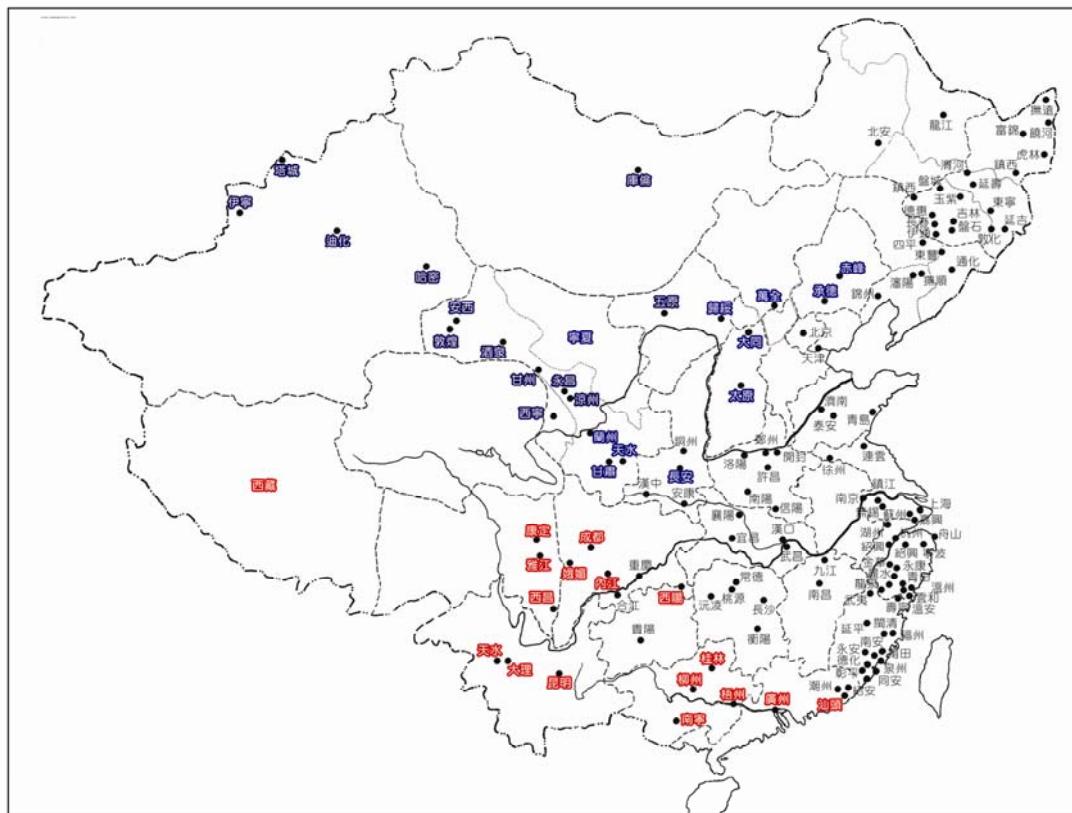
僅管統治者透過一套具有組織體系的制度化命名原則，宣告臺北街道新命名的誕生，但其實這些透過權力的操作達成的空間計畫，基本上上是一個空間戰略、一種權力關係的空間操縱，具有文化支配之意圖，都市是個空間和文化的範疇，包含且壓縮了國家權力的每一項表現。²⁰⁹ 統治者除了以融攝國家意識型態的街道命名，做為文化操縱的方式之外，這些被「寫定」的象徵系統，同時亦「書寫」了人們的空間。²¹⁰ 在命名、書寫街道之名的過程，其實亦隱含著統治者對本地臺灣人居住區的貶抑，戰後初期最繁華且居住人口最多的本省人活動區，如大稻埕及艋舺等地，在這套命名規則的運作下，位於臺北市西北區的大稻埕及大龍峒，被分配中國西北邊疆省分的城市命名，如「迪化」、「歸綏」、「伊寧」、「塔城」等地名；而城市西南的艋舺一帶，則以「西藏」、「大理」、「康定」等西南邊區省分命名，強化了這些區域的負面形象。此外，以本省人中低階層為主的貨品買賣區，以及本省人和外省人混居的勞力密集聚居處，亦透過命名規則的操作，予以不雅之名，如臺北後火車站的「華陰」街、以及雙園區的「克難」街，在這些命名的背後，隱含了支配者對底層人民的貶抑。

²⁰⁷ 曾旭正，《戰後臺北的都市過程與都市意識形構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

²⁰⁸ 見臺北市政府於 1948 頒訂之「臺北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

²⁰⁹ Simon Parker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遇見都市》(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 122。

²¹⁰ 曾旭正，《戰後臺北的都市過程與都市意識形構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頁 146 頁 133~137。



資料來源：筆者以舊版高中課本「中華民國地圖」為底圖，對照臺北市文獻會編《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2002），逐一標示、繪製而成。藍色代表今大稻埕一帶之街路名稱、紅色則為今艋舺一帶街路名。

戰後臺北都市的規畫與開發，在威權體制和私人開發部門運作下塑造起來的都市形式，滲透了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並伴隨著意識形態的建構和傳播，深入到都市日常生活中。尤其需留意的是，戰後外省人口最集中，且職業組成明顯偏重於社會高階層的專技人員、監佐和服務業的城中、大安和古亭三區，²¹¹ 如前文所討論，此三區原本即為日本殖民政府規劃為高級住宅的日本人居住區，在國民政府統治之後，以國家機制透過公職單位的安排，將官僚體制中的高階層外省移民，安排居住於這些地區中的日式宿舍區。根據調查，戰後初期在臺外省籍人口比例，以東南沿海之福建、浙江和江蘇籍人士偏多，²¹² 因此這些高級住宅區的街道，多以福建、浙江、江蘇三省的城市命名，如青田、泰順、麗水、潮州、瑞安、晉江、金門、廈門等街。

以南方為名的那些街道——晉江街、韶安街、金華街、雲和街、泉州街、潮州街、溫州街、青田街，當然，還有廈門街——全都有小巷縱橫，奇徑暗通，而門牌之紛亂，編號排次之無軌可循。使人逡巡其間，迷路時惶惑如智窮的白鼠，豁然時又自得如天才的偵探。幾乎家家都有圍牆，很少巷

²¹¹ 瞿海源、章英華編，《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86）。

²¹² 根據李棟明分析，1956年在臺外省籍人口比例，最高依序分別為福建（15.4%）、浙江（12.4%）和江蘇（10.3%）。見氏著，《歷來臺灣人口社會增加之研究》，1968。

子能一目瞭然，巷頭固然望不見巷腰，到了巷腰，也往往看不出巷底要通往何處。那一盤盤交纏錯綜的羊腸迷宮，當時陷身其中，固曾苦於尋尋覓覓，但風晨雨夜，或是奇幻的月光婆娑的樹影下走過，也賦給了我多少靈感。²¹³

臺北市的街道命名，勾起文人們對家國山川的懷念，作家王聿均也說道，這像是六朝時「僑置州郡」的辦法，用以安慰渡江臣民的懷鄉之思。²¹⁴ 儘管身在遙遠的異鄉，但內心對故土的盼望，在巷弄交錯的臺北城市裡，織起重重的懷念。



²¹³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頁192。

²¹⁴ 王聿均，《繁華猶記來時路》，頁17~18，1992。

第五章 戰後文化主導場域之形成（一）：國家文化政策與 軍中文藝

戰後，隨著人口的迅速成長，臺北市亦不斷擴張，延續上一章所述，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刻意分化的空間治理政策下，使得戰後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居住地，形成明顯的分野。從城市發展的歷史意義來看，這是一個平常且自然的現象，社會原本即存在於時間與空間中，社會的變遷與城市的變遷原本即有著密切的連結，即城市是被歷史的社會所決定，是為歷史的產物，因此都市意義之界定，原本即是一個關乎社會的結構的社會過程。²¹⁵ 在此情境之下，於是我們不難理解戰後本地區民與外省移民彼此之間的空間區別現象，以及外省住民基於生存空間的需求，而填補城市原本可利用的空間、以及政策性地開發都市邊區，以拓展居住的可能。當然除了以空間區別之現象加以探討戰後都市空間的社會變遷議題外，研究人們如何透過文化與權力對於空間的介入，促成區域之間經濟/文化價值的高低優劣，以及都市文化核心/邊陲的相應生成，亦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因此，我們需再進一步從都市的文化形式中，檢視都市意義的象徵表現，柯斯特的觀點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發，即「都市」是一個反應或主導社會變遷的一個空間結構體，它被賦予空間形式的結構性任務，乃根據歷史的社會衝突動力而成，亦即，都市意義的界定，應是歷史角色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與價值，重新結構社會的重要過程。基於上述的觀點，有助於我們分析在戰後被歷史界定的臺北都市，是如何透過都市之空間形式，來結構其社會與文化意義。²¹⁶ 本章將研究臺北如何在社會變遷之中，透過各區域空間彼此間的屬性差異，結構出城市的社會與文化意義，並指出臺北城市空間的形式，其實亦是促使某些區位具備文化優位形勢之成因，進而探討這些地區的住民，如何在此結構性環境中，重新再賦予臺北都市空間更新、更多元的文化與歷史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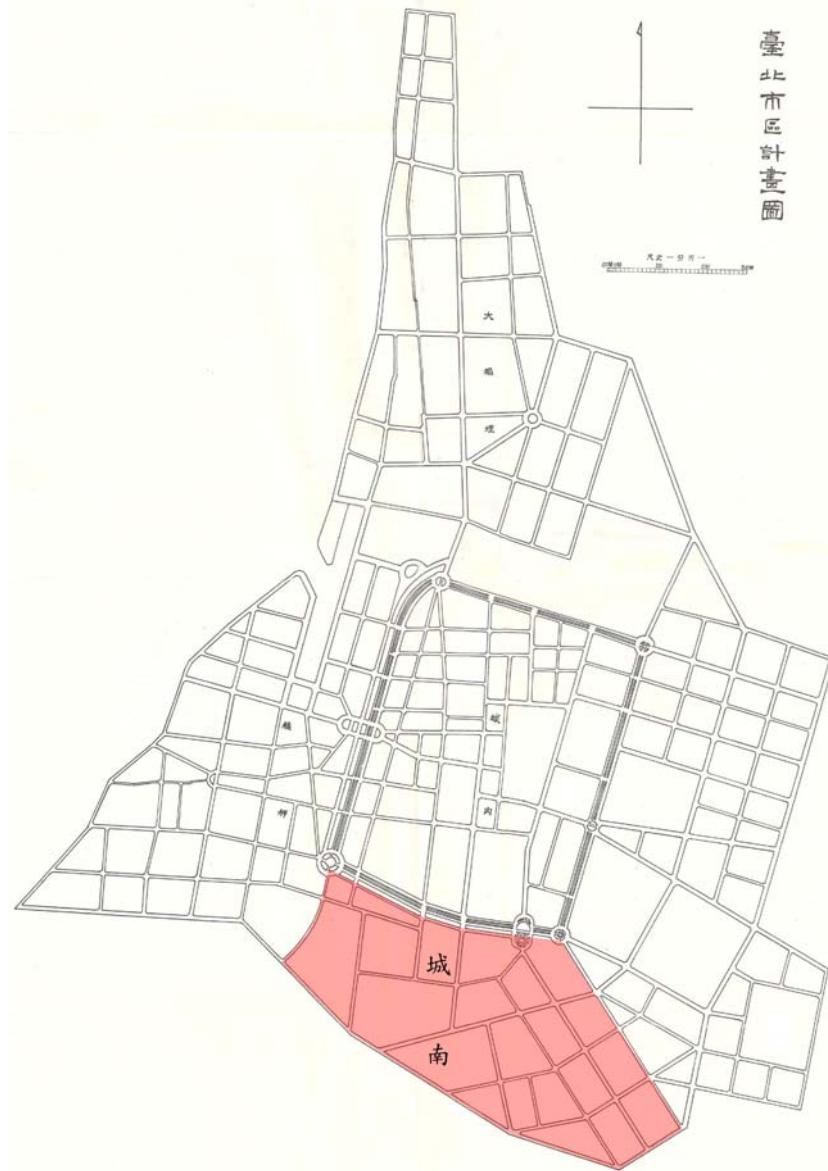
第一節 城南：以地方建構社會的範式

在研究二戰前後臺北市之政治、文化與空間權力的一連串關聯與影響之前，首先必須提到一個本文關注的區位，即在戰後經常被文人作家們所書寫到的臺北「城南」。城南之名，若以狹義的地理區位而言，應與舊臺北府城地理位置以南相應，然此「臺北城之南」，僅為今愛國西路以南的區域，無法明確指出臺北歷經現代化都市規劃以後，在府城以南廣大區域自日治時代迄今頻繁的人文活動。故本文引借之城南概念，為廣義的區位指涉，亦即依循臺北都市發展的格局，並相對於清代已發展的大稻埕、艋舺及城內等區，為城外以南、延伸至東南區的大片區域，包含今大安區，以及中正區吉寧一帶等現代都市發展之區位。以今日臺

²¹⁵ Manuel Castells(1977), “Urban Centrality”,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p.221~233。

²¹⁶ 同上註。

北市現況而言，城南即今愛國西路以南、和平西路與重慶南路以東，包含羅斯福路至復興南路以西之間的區域，區內包含臺灣大學、師範大學及臺北師範學院三所大學，此區與臺北各區相對位置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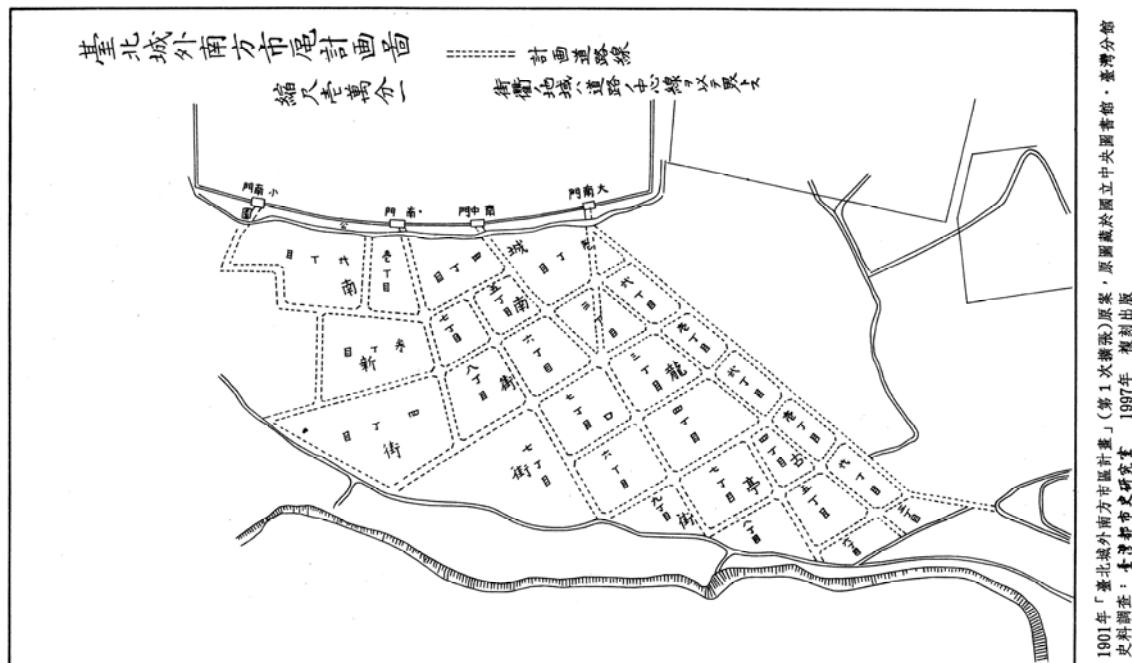


圖片說明：筆者依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之 1905 年臺北廳告示《臺北市計畫圖》為底圖，加以著色、標示處理。

再從都市規劃的角度來看城南地區，早在 1901 日本人統治期間，「城外以南」的空間概念已正式成形，1900 年總督府進行跨出清代城內範圍的都市擴張計畫，發佈「臺北城內市區計畫」，該計畫維持原先的道路系統，並予以拓寬，而在此規劃之下，隔年總督府接續發佈「新市街：臺北城外南方市區計畫」，該計畫在南門以外的城南方向，進行新街區的規劃。²¹⁷ 下圖為該次計畫的地圖資料，在

²¹⁷ 參見劉可強主持，《市定古蹟紀州庵修復調查研究委託技術服務案報告書》(臺北：臺灣大學

此之時，城南範圍不大，僅為包含樟腦專賣局（今公賣局）、城南小學校（今南門國小）、林業試驗場（今植物園）、衛戍醫院（今和平醫院）、臺北中學（今建國中學）等公署設施之區域。²¹⁸ 此後，在1900年至1932年之內，經過了三次規劃性的都市擴張，²¹⁹ 尤其1922年（大正11年）市町改正之時，規劃出臺北市新的行政分區，²²⁰ 自此，「城南」範圍內並有了新的區名，即首見「佐久間町」、「兒玉町」、「川端町」、「古亭町」以及「大安」等新劃設之區域，取代了清領時期統稱之「古亭村」。



圖片來源：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1901年《臺北城外南方市區計畫》

如上一章所述，日本殖民政府有計畫性地將本省人與日本人活動區隔離開來，而隨著日本人口遷臺數量漸增，因此在規劃城南的都市計劃中，繼規劃公署設施範疇之後，持續擴張都市界域，以容納更多的日籍人口，並進一步有計畫性地將城南規劃為日本人專屬之新興高級住宅區。在1935年都市現況復原圖中（下圖），即可清楚看見在城外以南延伸至東南區一帶，為純粹的住宅用地，期間兼有鐵道、川渠，以及公園設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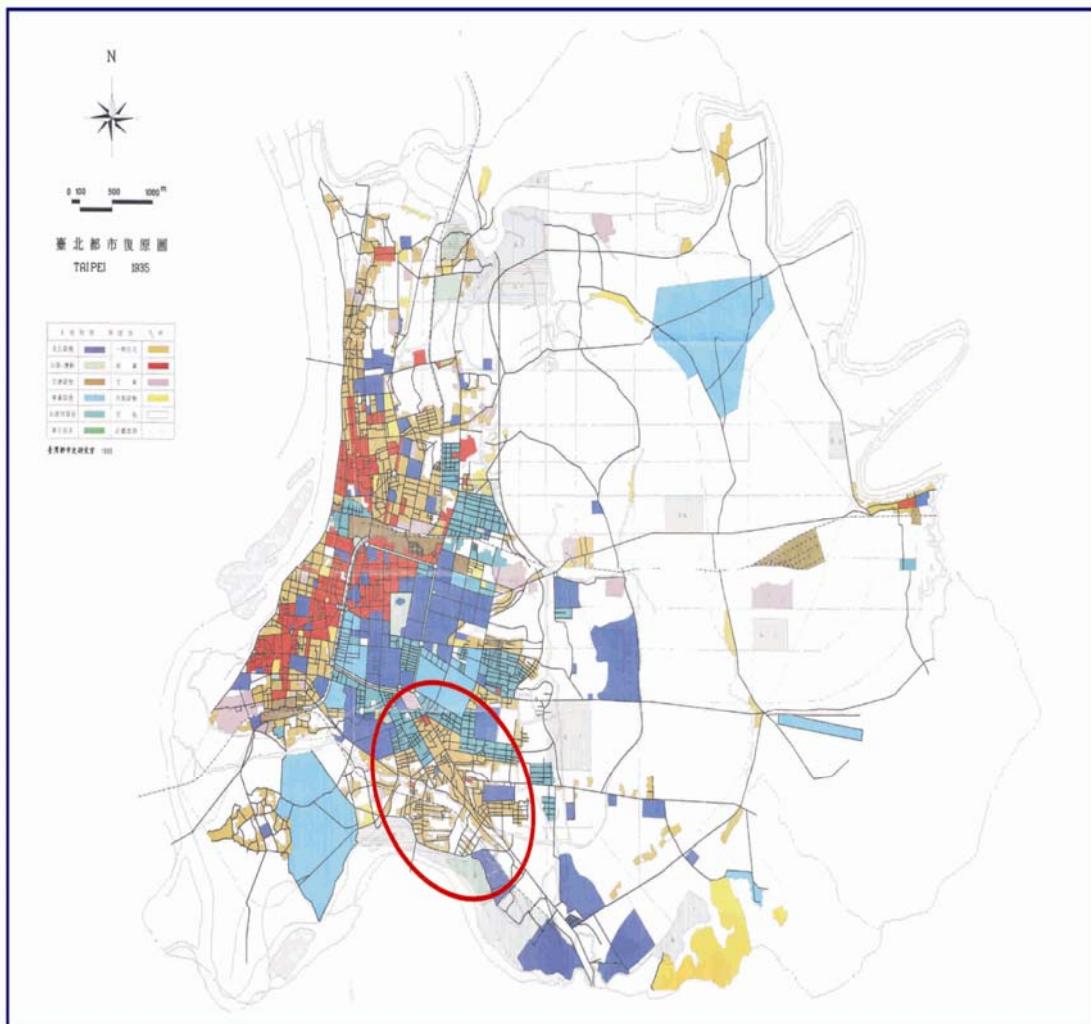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5)，未出版。本資料為臺大城鄉所受案於臺北市文化局，針對位於城南之市定古蹟紀州庵及其週邊環境進行調查研究之委託技術服務案之調查結果。

²¹⁸ 參見黃武達，《臺灣近代都市計劃之研究》論文集(3)（臺北：南天，1996）。

²¹⁹ 分別於1901年、1905年、1932年中，臺北市在日本人的規劃下，進行都市計畫區域範圍實際

擴張，且除了這三次擴張計畫外，另有計畫範圍內的徵收或是局部土地整理，相關資料見劉可強主持，《市定古蹟紀州庵修復調查研究委託技術服務案報告書》（臺北：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5年），未出版。

²²⁰ 相關行政分區資料，參見簡博秀，《日治時期臺北市：殖民主義下都市計畫與空間構造》（臺中：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圖片說明：根據臺灣都市史研究室繪製《1935 年臺北市都市復原圖》（1995）為底圖，加以標示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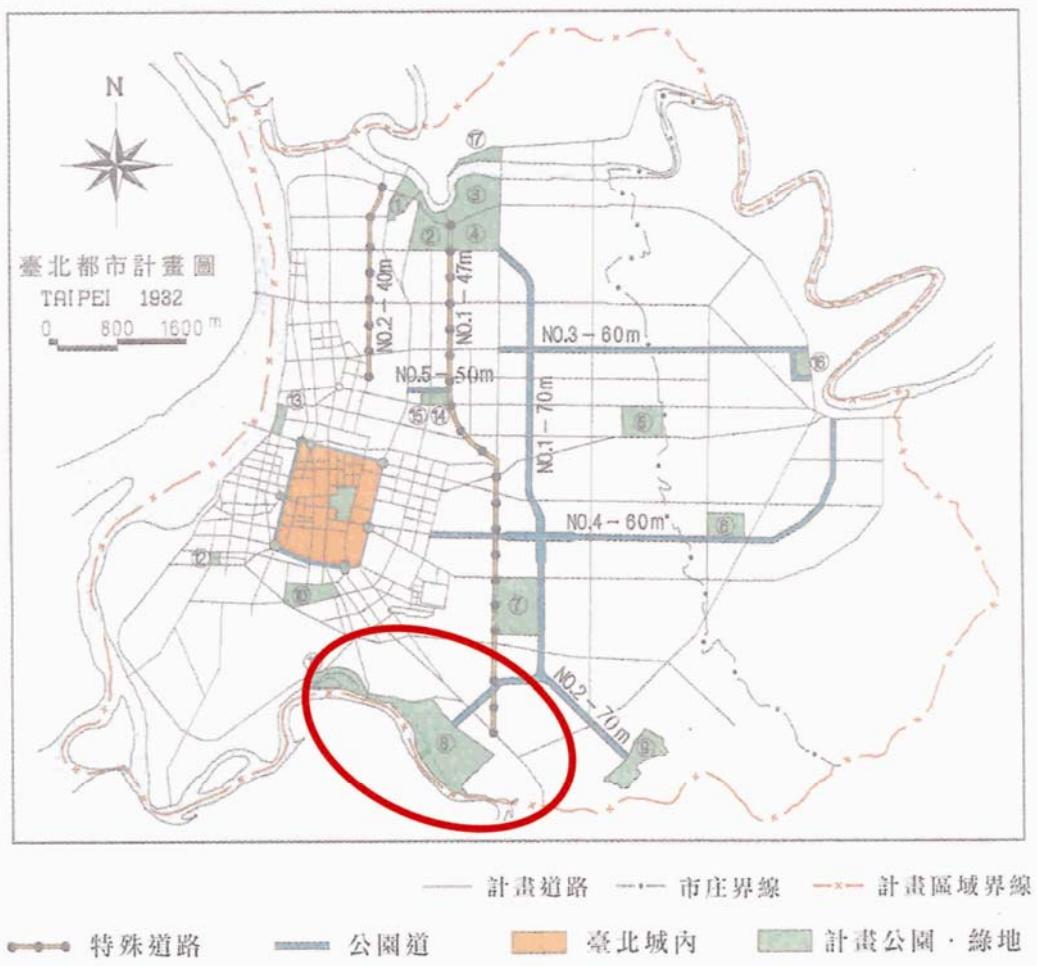
從文獻中可知，殖民政府其實有意於城南打造全日式高級水岸生活社區，以充分提供在臺日本人聚居與休憩的高水平生活空間，在 1932 年的都市計畫中，建設了兼顧交通、遊憩、都市景觀及防災避難等多功能之「公園道」²²¹，一路連接至當時臺北市第八號大型公園——川端公園，此公園佔地 59.9 公頃，西至川端橋，東至水道水源地，北以萬新鐵路為界，南至新店溪²²²，公園內有競馬場、農園設施、自動遊戲機器等設備，並設置了可容納一萬三千人觀眾的相撲場。²²³

²²¹ 日治時期相關公共設施資料，可參見黃武達：《臺北市之近代都市計畫》（臺北：臺灣都市史研究室，1997），頁 101。

²²² 八號公園規劃，參照「臺北市區計畫街路及公園圖」，《臺北州報》第 765 號，1932 年（昭和七年）3 月 7 日。

²²³ 參見臺北市役所，《臺北市概況》（臺北：臺北市役所，1939）。此段為譯文，原文為：「川端公園は昭和七年大臺北都市計画公第八号公園として公示せられたもので、広袤実に五九、九ヘクタールを有し内九、九ヘクタールは既に臺北競馬場、農園の施設があり、芝生、自動遊戯機具、縁棚等を設備し、更に其の隣接地一七、五〇ヘクタール観衆一万三千人を収容し得る相撲場の設けがある、其の他の部分は目下地均工事中であるが、此の公園は主として市民の運動体育に関する施設を行ふ予定で、全地域の完成には尙相当の年月を要する。」

下圖即為 1932 年都市計劃中的公園綠地規劃圖。綠色區塊即為公園用地，本區的第八號川端公園，為臺北市區內面積最大的公園休閒綠地。



圖片來源：依 1932 年「臺北都市計畫之公園道、公園、特殊道路」圖，加以繪製及著色處理。

殖民政府政策性地結合水岸資源、公園綠地以及交通設施，提供日人優質的生活環境，並在都市計劃中，於東南方保留住居擴張的空間，以容納城南持續發展之後增加的人口。日本人於此區用心進行的居住環境規劃，目的在為殖民期間所帶來的龐大官民體系，建造一個日本化的臺北生活空間，從文化的觀點來看，這情形不難理解，在日本統治之前的臺北市，沿淡水河岸具有經濟利用性的港埠腹地多為臺灣人開墾居住，如上一章所述，艋舺、大稻埕等臺灣人居住區，已在日本統治之前，各自發展出一個具有區域性格的臺灣人常民生活空間，殖民政府即使運用了龐大的警察監控系統，然亦無法完全掌控當地既已成形、幾乎屬於臺灣本地人的臺灣島內文化與社會活動圈。因此，日本政府在將臺北建設為一個現代化都市的同時，也正思量著如何能複製一個具有**日本內地性**的常民文化，並注入臺北城市空間裡。於是透過物質、制度性的城市構築，提供成為日本式社會的文化單元，並試圖以日本本位的觀點，賦予空間新的人文意義。

殖民政府對於城南日式高級文化區的打造，促使我們重新思索**地方**的意義。儘管 David Harvey 認為，地方和時間及空間一樣，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地方內

的物質建構，如建築物、公園、栽種的數木、實際興建的道路和餐廳，並非「自然天成」，而是居民基於社會、自然及文化的心靈與知性力量——當然其中包含營利的想法，而孜孜建造完成的。²²⁴ Harvey 認為是社會建構了地方；然而，Sack 並不同意這一點，認為地方在人類世界裡的角色，比 Harvey 所指的還要深遠的多，它不能只化約為僅以社會內在力量所構築出來的空間概念。反而，地方是將文化與社會匯聚在一起的現象，並且實際上局部生產了住民的文化與社會活動。²²⁵ 意即，社會不先於地方而存在，社會本身亦源於地方結構。²²⁶ 我們不能否定地方是社會和文化的產物，但必須理解的是，社會藉由地方結構，得到了部份的闡釋的意義，意即，沒有了地方，社會本身就無可想像，社會與文化應是在地理層次的基礎中建構的。從日治時代城南地方的打造，可以看到的是，城南的地方觀念，是包括了透過地方結構表現出來的社會活動，在這裡所指的地方結構，在殖民時期而言，是對於城市一連串的都市計劃、政策制令、以及社會秩序的劃設與改造，而日本殖民者則有效率地運用了這些地方結構，使之成為打造城南日本人社會的空間基礎。

第二節 城南：主導文化政策的空間實踐

接下來本文所要關注的是，日治時代日本人精心打造的城南家園，在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日產之後，此區的社會空間，有了什麼樣的轉變，而這轉變又為戰後臺灣文學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首先，試以一個位於城南的典型地區——川端町（今古亭崁頂一帶）來討論。此區在日治時代，日本人口比例遠高於臺灣人，根據（下表）的人口資料顯示，該區日本人口及人口比例，隨殖民時間漸長，皆有逐年增加的趨向。

臺北川端町歷年人口數及族群比例

年代	人口	各族群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
1930 年(昭和 5 年)	1799 人	臺灣人 578 人(32.1%) 日本人 1197 人(66.5%) 其它 24 人	昭和 5 年國勢調查結果中間報(臺北州臺北市)
1934 年 (昭和 9 年)	4006 人	臺灣人 842 人(21.0%) 日本人 3132 人(78.1%) 其它 32 人	臺灣常住戶口統計(第 17 頁)
1935 年	4207 人	臺灣人 820 人(19.5%) 日本人 3340 人(79.3%) 朝鮮人 14 人 其它 33 人	昭和十年 臺北市統計書(第 16 頁)

²²⁴ David Harvey, 1996:261。

²²⁵ Sack, 1997:2

²²⁶ J.E. Malpas, 1999:35~36。

1940 年	6121 人	臺灣人 1215(19.8%) 日本人 4865(79.5%) 朝鮮人 21 人 其它 20 人	昭和十五年 臺北市統計書(第 10 頁)
--------	--------	---	----------------------

到了戰後，國民政府接收日本殖民政府財產，本區之地籍及屋舍亦收歸國有，並將區內日人所蓋的民舍，做為公職人員宿舍，分配給隨政府播遷來臺的大批公職人員及教員。從 1964 年區公所籍貫別人口資料統計之結果，可發現上述日治時期屬川端町的河堤里，住民為外省籍者，佔 76.9%，²²⁷ 這數據與戰前日本人在本區的人口比例相當接近，在戰前與戰後人口資料的比對之下，我們於是能進一步理解到，本區在日治時代為日本人所建造的高級日式屋舍空間，到戰後幾乎為另一批從中國大陸來臺的外省籍人士所充分使用。

當然，外省籍人士並不是在戰後一兩年之間，即全部搬遷並進駐此區，如同我們所認知，戰後外省籍人士的遷徙，是一個漫長、輾轉而艱辛困頓的歷史過程。戰後日本人的房舍、事業及物品，原則上需依「臺灣省接收日人財產處理準則」接收，並由日產處理委員會統籌處理，進行轉撥各機關，或辦理標售、租用、接管等事宜。²²⁸ 因而城南地區的高級日式房舍，亦隨著日產分配各項作業的進行，被分配到公教眷舍的公務員及教員，才著手紛紛自其他地區遷居至本地，進而落腳於此。在這些外省籍人士中，根據 1963~64 年的抽樣調查統計，從大陸直接遷入本區者，佔 21.2%，由臺北市其他地區遷入本區者，佔 50.4%，由臺灣北部遷入者，佔 15.6%，其他地方亦佔 12.8%。²²⁹

從戰後遷居至此地的作家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公職人員攜眷初入此地的回憶，擔任國語日報社編輯的何凡、林海音夫婦倆，就在一間小小的日式房子裡，開啟了大半生的文化事業。林海音寫一家三口在榻榻米上生活的日子：

三十八年初，我們就搬到重慶南路三段的宿舍來住，十八坪不大，祇有一頂日本「皇軍」色的大蚊帳，一張矮桌，也就勉強可以應付我們一家人二十四小時的生活所需了。三個孩子——八歲的，四歲的，兩歲的——就每天在這十八席上翻來滾去。榻榻米的房子，日子倒也好混！²³⁰

和林海音一樣，何凡亦樂天知命，在小房子裡過著平凡人的生活：白天工作，晚上一邊照顧家庭，一邊在書房兼臥室的「三疊室」²³¹ 裡，伏首「玻璃墊上」²³² 勤

²²⁷ 龍冠海主編，《臺北市古亭區社會調查報告》(臺北：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1967)，頁 46。

²²⁸ 詳細日產接收資料，可參見薛月順，《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臺北：國史館，1996)。

²²⁹ 龍冠海主編，《臺北市古亭區社會調查報告》(臺北：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1967)。

²³⁰ 林海音，《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4)，頁 4。

²³¹ 夏祖麗，〈從三疊室寫起——我的父親專欄作家何凡〉，收入《人間的感情：感人的真實故事》(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5)，頁 117。

²³² 「玻璃墊上」取自何凡從 1953 年到 1970 年，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的專欄名稱。參見夏祖麗，〈從

奮寫作，一字一字，爬了大半生的格子：

那時我們住在臺北重慶南路三段的宿舍裡，我有一間三疊室書房，海音則在長廊的窗戶邊上擺上一張書桌，我們全家六口住在十四疊半的榻榻米上。我和海音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寫稿，兩人同心協力照顧家，家庭生活愉快，寫作力旺盛。²³³

林海音跟隨在國語日報社工作的夫婿何凡，在戰後搬遷至重慶南路三段的國語日報員工宿舍，然而從他們的作品中，可發現當時的屋內空間，已不似日治時期日本人規劃城南高級住宅區的理想樣貌，反而是狹小、侷促、混雜、拼貼的違建式日本建築：

我們住在臺北城南一間不到三十坪的日本式榻榻米房子裡……日本房子玄關入口改成臥室，小院子裡貼近街門的牆邊又搭建了一間像傳達室般的臥房。²³⁴

日本時代留下來的日式屋舍，經過二戰戰火的摧毀，以及戰後混亂膠著的大規模人口遷徙與都市變遷，加上戰後國民政府對於日宅的分配，有時是以一屋多戶的方式，依照公職位階予以配給，因而每戶家庭實際的生活空間仍顯侷促。舉例來說，戰後位於廈門街、同安街一帶的日式建築，主要為省政府合作事業管理處和社會處的員工眷屬宿舍，其中位於同安街巷底的第一宿舍區，原為日治時期的紀州庵料理亭，庭內的三幢日式建築，一間餐廳在戰後被分配成二十八戶人家，職級較高的，如科長、主任、主任秘書等，分配到較多的空間，其餘則分屬該單位各員工眷屬所有。²³⁵ 由於眾多家庭侷處於窄小的日式房舍裡，空間不足，而日式建築多為木製建材，隔音效果不佳，難免互受干擾，因而住民們開始在格局上加以改建、隔間，或經常在原建築之外增設違建，以及改闢出自家獨立的出入口。²³⁶ 然而並非每戶人家都被分配到如此狹小的日式宿舍裡，住在廈門街 113

三疊室寫起——我的父親專欄作家何凡》，收入《人間的感情：感人的真實故事》（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6），頁 117~119。

²³³ 何凡，《何其平凡：何凡散文》（臺北：三民，2002），頁 109。

²³⁴ 夏祖焯，〈虹橋機場〉，收入《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2000），頁 198。夏祖焯，筆名夏烈，林海音的長子。

²³⁵ 根據調查結果，紀州庵料理亭的三棟建築中，位處庭園區的高級別館，分配給職級較高的李科長、吳會計主任與龍家；現存的離屋，則由黃主任秘書、林家、盧家、周家與曾家居住，而料理亭本館，除一部份當做倉庫外，其餘分給給王家（即作家王文興的父親）、龔家、劉家、周家、焦家……等二十戶公職人員家庭及眷屬使用。參見劉可強主持，《市定古蹟紀州庵修復調查研究委託技術服務案報告書》（臺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5），未出版，頁 3-17~3-19。本資料為臺大城鄉所受案於臺北市文化局，針對位於城南之市定古蹟紀州庵及其週邊環境進行調查研究之委託技術服務案之調查結果。

²³⁶ 參見劉可強主持，《市定古蹟紀州庵修復調查研究委託技術服務案報告書》（臺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5），未出版，頁 3-17~3-19。本資料為臺大城鄉所受案於臺北市文化局，針

巷 8 號的余光中家，因父親余超英曾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教育及僑務要職的緣故，而配有一棟佔地一百多坪的日式房子，²³⁷ 正在臺大外文系求學的余光中，於是和母親倆，從 1952 年住進這棟偌大的房子。此後，他「近半輩子在其中消磨，母親在其中謝世，四個女兒和十七本書在其中誕生」，²³⁸ 並且，余光中書寫他在廈門街的這間日式房子裡，與妻子（亦是余光中遠房表妹）范我存一同在此度過婚後安恬而穩定的生活，以及夫妻相互眷戀的濃厚情感：「三十五年前有一對紅燭/ 曾經照耀年輕的洞房/——且用這麼古典的名字/追念廈門街那間斗室/ 迄今仍然並排地燒著/ 仍然相互眷顧地照著」。²³⁹

戰後國民政府有計畫性地將龐大的公職體系人員，以及知識份子們的家庭眷屬們，適地適所地安頓於接管日產而來的各式屋舍中，這樣安定民心的做法，是政府實踐空間支配與安置的成功經驗。必須瞭解到的是，這些外省籍人士們，在歷經中國戰亂與流離，並被迫離開原鄉親密社群之後，在島內孤立而斷裂的生命，已不容再支離破碎。人們一般對於「家屋/家」（house/home）的空間經驗特別強烈，家的安置，讓人們感到安穩與切實；而家的經營，使人們開起對於外在各種空間的認識，以及串連出有個人的記憶、想像和夢想的地方。²⁴⁰ 因而，「想要有個家」，是他們在顛沛流亡後，來到這陌生城市急切的需求與渴望。

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統治者陸續將精英與公職人士，安置於一個彼此熟悉的社群網絡之中，具有特殊之統治意義，如同葛蘭西「市民文化霸權」（civil hegemony）所指，在奪取和保持文化霸權的過程中，知識份子的作用是絕對重要的，知識份子擁有教育及文化生產、傳播與再製的智識，隨時影響著人們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選擇，因此在戰後收攏並安頓知識分子，是穩定其文化霸權治理的重要途徑。統治階級奪取文化霸權的過程中，存在著兩個階段：一是逐漸確立了某一社會集團的文化及意識形態的文化霸權，二是攏絡其他社會集團，做到在某種程度上尊重這些集團的利益。²⁴¹ 國民政府一方面藉由權力、經濟與文化支配的全面控制，一方面說服人民接受自己的道德、政治以及文化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則考量被行使對象的傾向，因而尊重與之同時播遷來臺之眾多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的利益。

國民政府理解到知識份子思想與傾向的複雜性與影響力，因而有效率地以其具有政治宰控權的空間支配法則，給予知識分子安家樂業的穩定力量。從葛蘭西的脈絡看來，這途徑確實是成功的，亦即一個成功的統治階級，以最少訴諸武力的方式，在實際上取得政權之前，就已經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領導地位的階級。我的陽臺向北。當然，也僅多北望的黃昏。奈何公無渡河，從對河來客的口中，

對位於城南之市定古蹟紀州庵及其週邊環境進行調查研究之委託技術服務案之調查結果。

²³⁷ 傅孟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臺北：天下遠見，1999），頁 50。

²³⁸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頁 131。

²³⁹ 余光中，〈三生石〉，《五行無阻》（臺北：九歌，1998），頁 47。

²⁴⁰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2006），頁 43。

²⁴¹ 相關理論參見葛蘭西，《獄中書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聽到的種種切切，陌生的，嚴厲的，迷惑的，傷感的，幾已難認后土的慈顏。²⁴²

這種文化霸權的建立是所有統治階層的基礎，而當時的政府即是要建立這樣的領導權，因此即使外省籍菁英和公職體系人員數量逐年增加，但透過國家機制的空間支配與家眷安置，在這經常只關注於大歷史、大時代之國族意識的環境中，這些具有智識能量的精英人士與科層官僚，獲得了一處暫時歇腳的庇蔭所；並且，時間隨著人們的鄉愁記憶緩緩流逝，於是乎人們開始環視、凝望自己多常年來於城南被安置的住所，而發現自己竟也對它產生濃濃的感情依附，於是，這個當年被政府政策性支配與安置地方，成了住民的意義中心和生命關照的場域：

這家，是住出來的，也是寫出來的。八千多個日子，二十幾番夏至和秋分，即連是一片沙漠，也既已住成家了。多少篇詩和散文，多少部書，都是在臨巷的那個窗口，披一身重重疊疊深深淺淺的綠蔭，吟哦而成。我的作品既在那一帶的巷間孕化而成，那條小街，那些曲巷也不時浮現在我的字裡行間，成為現代文學裡的一個地理名詞。螢塘里、網溪里，久已育我以靈感，希望掌管那一代的地靈土仙能知曉，我的靈感也榮耀過他們。²⁴³

第三節 在空間支配中成形的文化核心區

國民黨政府在戰後的文化統治政策，及其政策性的空間支配行動，彼此之間具有密切的關聯。我們從「霸權」的概念可以觀察到這一點，文化統治霸權，並非優勢、權威、聯盟和構連等辭彙所成就的目標，而是帶有支配意味，而且通常也以支配的方式運作。國民政府意識到必須透過一連串民族/國家的論述，以全民總體作戰的方式，激發人民的戰鬥士氣，以達成反攻大陸、建立自由統一中國的勝利目標。在文化政策上，政府一方面以高壓權威的統治，使島內反抗的異議份子在國家機器施行的各項規訓與懲罰中逐漸噤聲；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對知識分子進行收攏與安置，試圖在島內建構一個全面反共抗俄、復興中華文化的生命共同體。

如上一章所述，戰後島內文化紛雜而混亂，百姓語言南腔北調，並且對於文化認同與歸屬亦各有主張，形成意識型態眾聲喧嘩的現象。這對一個在國共內戰中，已幾近喪失民心而敗北遷臺的統治者而言，是嚴重威脅到其治理正統地位的一大挑戰，國民黨政府需要大批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們為之效力，以在文化上進行整體性的「戰鬥」，一方面宣揚反共救國的意識形態，一方面進行語言文化的推廣與教育，以扭轉、教化曾受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民紛雜的文化意識。

然而傳播霸權信念，需極度仰賴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活動，所謂的有機，從馬克思的觀點來說，是深具意義與關聯性的一個社群，由一群具

²⁴²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收入何寄澎、劉龍勳編，《人生、家國、鄉愁》（臺北：長安出版社，1981），頁189。

²⁴³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收入何寄澎、劉龍勳編，《人生、家國、鄉愁》（臺北：長安出版社，1981），頁190。

有密切關聯性的菁英份子及科層體制，來進行文化領導的模範。例如像城南的學者、文人和文藝協會的作家們，他們能以日常言語表達複雜的思想哲理和文化議題，因此能指引群眾應當如何行動，即使如我們所知，這些外省精英份子，大部分並不見得與黨國組織系統有密切的關涉，甚至在政治傾向與文化意識抉擇上，與執政者並非全然同調。然而，執政者除了運用空間統治術，將文化精英們安放至首都最優位的空間區位裡外，亦以組織性的的文化動員、獎勵與制度，有效使此一由上而下的文化意識型態系統成功地運作，因而在國家力量的鼓勵與推動之下，知識份子在城南形成了一個文化霸權集團（hegemonic bloc），具有支配社會與文化的力量。

即使知識分子與官公體系有不同目標的各種異質意志，也因而在國族/家國偉大而單一的目標裡結合在一起，亦即，這個霸權意識型態綜合了國族主義思想與常識的層次，以內部而言，它掩蓋群體內的異質與差異；²⁴⁴ 而就外部而言，這個菁英集團被政策性地結構、安置與集合，並且，他們所居住的環境，在政府的禮遇與社會資源分配的明顯差異中，形成了同時與臺灣本土文化實景，以及臺北市其他地區社會形式殊異甚遠，卻充滿高尚氣質、具有高度熱誠及理想性格的特殊文化場域。

也因此，城南地區成為全臺北市環境最為優質、住戶品質最高的住宅區，而其間在戰後被認為是文教區熱門之地段，主要有：基隆路3段155巷前段、水源市場一帶、羅斯福路4段24巷12弄及78巷、永春街兩旁及新店線鐵路（今汀洲路）兩旁、南海路29巷、和平西路2段8巷、和平西路1段28巷17弄、晉江街兩旁，和平西路、牯嶺街及廈門街一帶，廈門街113巷及199巷前段、重慶南路3段3巷16弄、金門街34巷底及龍泉街94巷等。²⁴⁵ 戰後初期，在此區之建築物多是低矮、黑瓦木牆的日式建築，庭院多綠樹，各院以磚牆或樹籬界定，彼此坐落在小巷之間，比鄰而居，一條一條蜿蜒小巷，又彼此相互串聯，通向幹道旁的熱鬧街市。這些地區的住民，普遍文化素質偏高，交遊出入單純，民風較為樸質，且經常有臺大、師大和臺北師院三所大學教授與大學生來往頻繁，文化風氣濃厚，加以居住此區者，多為同僚或同鄉，他們任職的文教機構亦設於此處，惠於地利之便，更有助於住民們從事各項文化事業及文化活動。

以古亭區為例，因此區住商較為分離，²⁴⁶ 加以教育與文化機構密集分佈於此區，文化區位特質顯著，根據1967年《臺北市古亭區社會調查報告》顯示，此區教育機構有46所²⁴⁷、文化機構30所，其中公立（含臺北市美國新聞處）

²⁴⁴ 林宗德譯，Philip Smith 原著，《文化理論面貌導論》（臺北：韋伯文化，2008），頁56~57。

²⁴⁵ 此處乃依據龍冠海主編，《臺北市古亭區社會調查報告》（臺北：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1967）。及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7）調查報告整理之總結。

²⁴⁶ 戰後的古亭區，大部分為住宅區，主要商業活動按多寡依次分布於羅斯福路、南昌街一帶，另有小規模商店和小工廠分布於克難街（今萬青街）、和平西路、廈門街、漳州街。

²⁴⁷ 其中包括：大學一所、有學生9671人、中學三所，學生7039人、小學六所，學生19,849人，以及函授學校二所、軍事學校二所、幼稚園及幼兒所十三所、補習學校二所、短期職業補習班十七所等。

有 10 所，中英文報社 2 家、雜誌社 18 家²⁴⁸，文教機構之密度為全臺之首，而其實在 1959 年，此區之人口密度，每公頃尚不足 500 人²⁴⁹，是以住民平均擁有的文化資源更遠高於臺北市其他區域。

再從住民閱讀報刊情況觀察，此區訂閱報紙的戶數，佔 44.2%，值得注意的是，報紙訂閱率最高在大學附近的幾個區域（國校、文盛、農場、大學等四里），訂閱率高達 66.7%，為臺北市之冠。此外，此區訂閱雜誌的戶數，亦佔 8.8%，雜誌訂閱率最高亦在上述大學區的四個里，訂閱率為 17.8%。雜誌銷售最多的為：《今日世界》、《自由談》、《讀者文摘》、《拾穗》、《電影雜誌》及《現代知識》²⁵⁰。從一區之閱報率及雜誌訂閱率之探討，可知住民對於文化傳播的接受程度，亦能呈顯該區之文化素質，臺北文教區的高閱報率以及雜誌訂購率，顯示住民對於戰後文化傳播系統的高接受率，而此一接受度，乃受當地教育系統與家庭結構之影響，形成一種具文化支配地位的「文化無意識」之生產結構，並持續在此場域中，進行文化生產、接受與再造。

城南一帶的居民族群與人文結構的改變，使此區漸漸形成孕育臺灣文學的溫床，1950 以降，許多文學性報刊在此發行，例如《純文學》、《自由中國》、《創作月刊》、《藍星》、《公論報》、《文學雜誌》、《仙人掌》、《大學雜誌》、《文學雙月刊》、《中外文學》、《文訊》、《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國文天地》、《新生報》、《現代文學》、《國語日報》、《現代詩》、《創世紀》、《文星》等，另外「中國文藝協會」、「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中國作家藝術家聯盟」、「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中華民國筆會」、「中華民國新詩學會」、「中華民國歷史文學學會」、「耕莘青年寫作協會」亦設址於此地；還有許多重要的文學家與學者，如夏濟安、吳魯芹、洪炎秋、臺靜農、鄭騫、齊邦媛、何凡、林海音、林文月、余光中、王文興、楊牧、子敏、亮軒、紀弦、隱地、侯吉諒等人，亦居住於此；知名的文學出版社，如純文學、爾雅、洪範、星光、林白、吳氏、人間、文史哲出版社，皆設址於此區，區內的舊書街牯嶺街，亦是昔日書刊與文化交流的中心，另外金石堂、遠流等文化機構，也在城南創始發跡。試以地圖點示 1945 年以後的二十年間，位於臺北市之主要文學期刊、文學社群與作家居住地之分布狀況²⁵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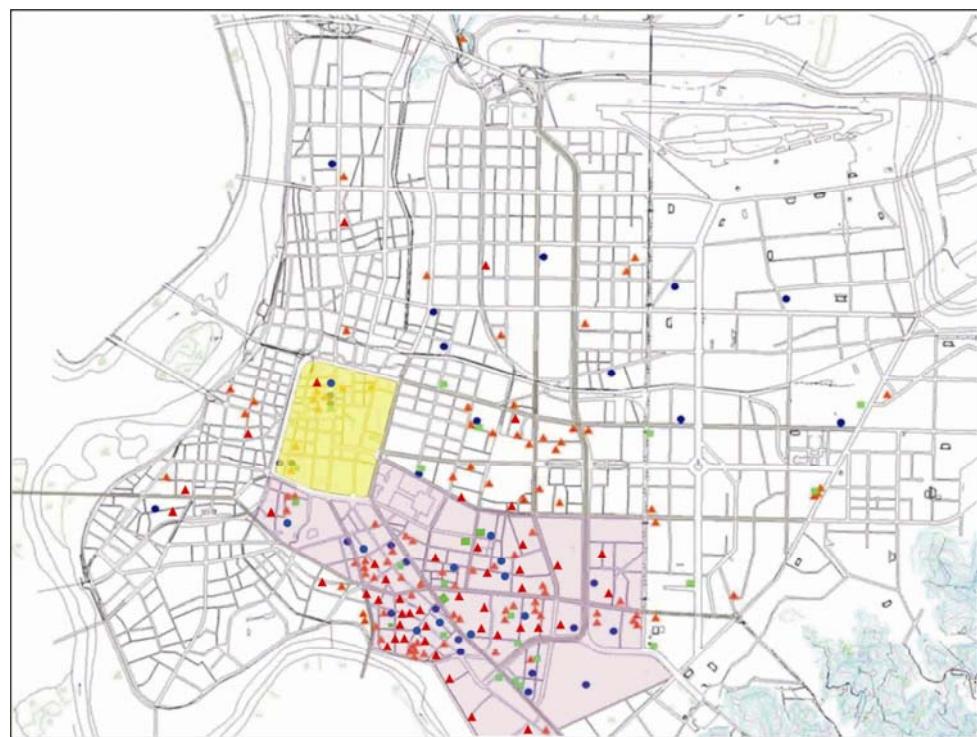
²⁴⁸ 相關數據資料參考龍冠海主編，《臺北市古亭區社會調查報告》（臺北：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1967），頁 57、58、148。

²⁴⁹ 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7）。

²⁵⁰ 此數據參考寇龍華，〈臺北市民家庭文化設備調查報告〉，收入《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第一期（1963），頁 57、107。1962 年臺北市雜誌閱覽率為：平均每戶約 0.198 份，若以全市 21 萬戶計算，約有 39,690 份雜誌散佈於臺北市各家庭。在各種雜誌中，《今日世界》所佔的百分比最多，為 14.3%，《自由談》佔 6.4%、《讀者文摘》佔 4.4%、《拾穗》佔 3.3%、《電影雜誌》佔 3.0%、《皇冠雜誌》佔 2.4%、《現代知識》佔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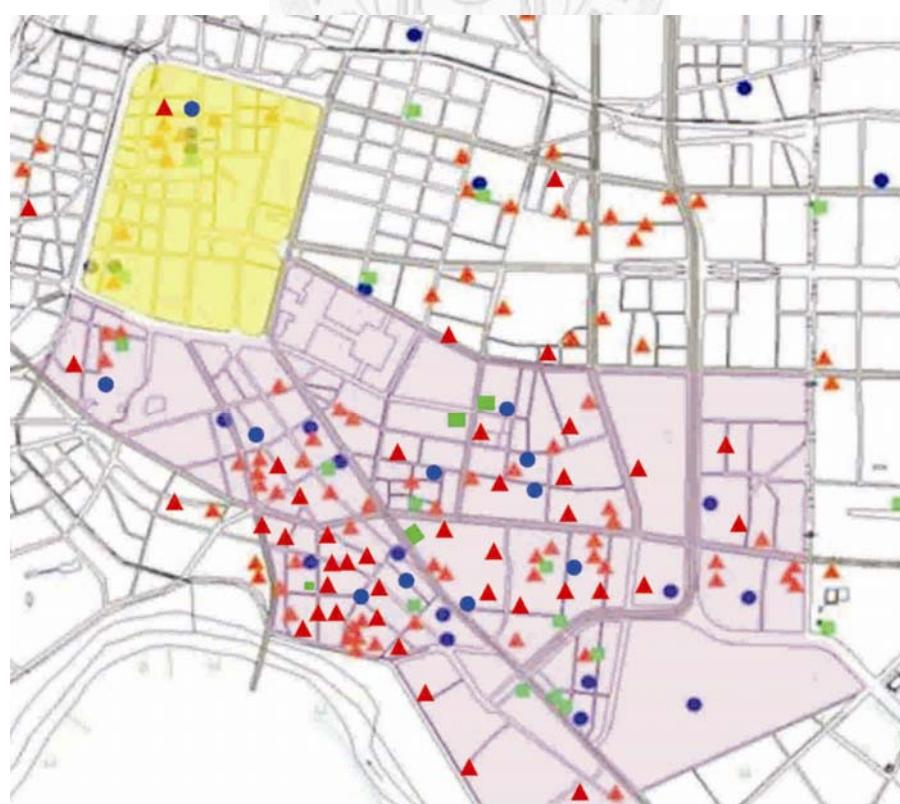
²⁵¹ 本圖根據我所蒐集之居住於臺北地區之作家、文學出版單位與社團地址，逐一點示於臺北市地圖上製成。相關地址資料除本案之調查結果外，亦感謝中國文藝協會王吉隆（綠蒂）理事長、賴和文教基金會、文訊雜誌社提供。

主要文學期刊、文學社群與作家居住地之分布狀況



※標記說明：三角橘色為作家住所、綠色方塊為出版社、藍色圓點為文學社團。

城南一帶文學位址分佈狀況



※標記說明：三角橘色為作家住所、綠色方塊為出版社、藍色圓點為文學社團

Rebert Escarpit 在《文學社會學》談到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時，認為「文學活動」是「以作家、書籍及讀者三方面的參與為前提」，亦即「作者、作品與大眾藉著一套有藝術、商業、工技等各項特質而又極其繁複的傳播運作，將一些身分明確的個人，和一些通常無從得知身分的特定集群串聯起來，構成一個傳播系統」²⁵²，而這傳播系統，以 Raymond Williams 的話來說，目的即在「使（文化）普及於大眾」。臺北城南豐富的文學氛圍，及其所孕育出的文學作品，反映了 1950 至 1960 年代臺灣文學的概貌，除了產生大量懷鄉與反共作品，現代派文學也在此發跡，且新詩創作的成果亦豐富。居住於城南的文人在本地組織文學社群，使得城南形成特殊的文化氛圍，而此時多數文學作品的發表場域，也經常是設址於城南地區的期刊雜誌，此外，透過眾多書店與舊書街的媒介，讓文人在此區容易接收到各類文學創作，於是，作者、作品，以及閱讀者之間，構成一個相互循環的文化網絡，如同 Raymond Williams 所指，在頻繁的書寫與傳播之間，形成一個完整而有系統的文化「共享過程」（Community of process）。

第四節 以中國文藝協會為首的文化活動場域

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數十年之間，以強勢的文藝政策主導了一時代的文學走向。國民政府以文武雙管齊下的方式，在民間與軍中開展文藝運動，以團結全國藝文人士、實踐三民主義文化建設與反共建國為目標，²⁵³ 1950 年 4 月，蔣介石主席指示黨內幹部張道藩創辦「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以「能應用多方面技巧發揚國家民族意識及蓄有反共抗俄之意義」²⁵⁴ 為獎勵原則，用優渥的高額稿費獎助撰寫反共文學作品的作家，並將五月四日定為五四文藝節、辦理大型文藝活動，接著在國民黨中常委的指示之下，由張道藩出面主導，透過陳紀澄等外省籍來臺作家的號召，在當日二百人聯署發起之下，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²⁵⁵ 會址即設於城南之水源路上（今改為龍祥賓館）。據余光中回憶，當年「在水源路上，靠金門街、面臨新店溪之處，從同安街走上河堤之後，可以看到中國文藝協會」。²⁵⁶

中國文藝協會的主要委員，多都是當時重要的文藝政策主導者與知名作家，如張道藩、陳紀澄、王平陵、趙友培、王藍、李辰冬等人，他們倡導「軍中革命

²⁵² Rebert Escarpit 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臺北：遠流，1990），頁 10。

²⁵³ 中國文藝協會成立的宗旨中即闡明：「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宗旨，在以團結全國文藝界人士，研究文藝理論，從文藝創作，展開文藝活動，發展文藝事業，實踐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完成統一中國任務，促進世界和平。」本段文字為我親至中國文藝協會抄錄而得。

²⁵⁴ 參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舉辦文藝獎金辦法」，收入《文藝創作》第 9 期（1952 年 1 月）徵稿啓事欄。

²⁵⁵ 陳紀澄在《文藝運動二十五年》中回憶：「有一天，道藩先生談起中常會的決定，並且囑我與各報副刊編者先作初步聯繫。那時，……還有一兩位中央管宣傳的人也來參加。」參見陳紀澄，《文藝運動二十五年》（臺北：崇關文藝出版社，1977），頁 9。本文亦參考應鳳凰，《五〇年代臺灣文學論集》（高雄：春暉，2004）。

²⁵⁶ 本段為我所進行之口述採訪，由余光中先生本人口述中國文藝協會與新店溪堤岸的相對位置。

文藝」，並組成「文化清潔運動專門研究小組」，²⁵⁷ 主張創作需文以載道、富於「戰鬥性」，而在成立初始，協會在會章中揭示了文學的政治理念：「本會以團結全國文藝界人士，研究文藝理論，從事文藝創作，展開文藝運動，發展文藝事業，實踐三民主義文化建設，促進世界和平為宗旨」。²⁵⁸ 在文藝協會成立兩週年後，張道藩亦再次揭示了政治與文學密結合的書寫範式：「根據當前反共抗俄的戰鬥的生活方式，從事戰鬥形式的創造」。²⁵⁹ 協會一再宣示的文學理念與走向，隱含了高度的政治符碼，並積極主導、控制著文學作品的書寫傾向。

從中國文藝協會有效地進行政治文化傳播之成果來看，文學研究者經常討論的是，執政者透過國家機制的組織與動員，使 1950 年代的文學走向，納入黨國文化戰鬥的主流系統中，成為當局的政治宣傳工具，亦即，將議題聚焦於國家文化主導權力的行使成果，以及造成一整個時代文學為政治所用的文化結局與文學現象。然而，本文所想要關注的，是此一主流文化力量的行使過程，即其是如何在大敘述的國族論述底下，以政治、文學與空間權力交換的途徑，獲取文化主導的勢力，而進一步理解此一時代所呈現的文學風景。

在執政者進行文化宰制的權力進程中，為了有效組織、培養這些行使文化/政治宣傳的中堅份子，以使他們有效推行統治者所範定之主流文化，因而如何能透過一套具有高度信服力的制度組織系統，封賞這些中間份子，使其擁有**治理菁英**的名份，成為重要的途徑之一。

「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主委張道藩，1950 年的身份是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中華日報董事長，1952 年以後擔任立法院長；其他委員中，張其均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陳雪屏是臺灣省教育廳廳長，程天放為教育部長，而兼掌「中國文藝協會」的陳紀瑩是終身職立法委員。²⁶⁰ 這些以獎勵文藝為名的組織，以及文藝界人士名義所發起的「民間團體」，其實黨國高層勢力穿透期間，而他們所具有崇高的政治菁英地位，使得這套文化霸權傳播方式，在這些人士的推廣下，更顯得是當前全人類天經地義的發展正途，並且是正確的國家施政方向。

從文化治理的角度來看，在任何一個具有複雜組織之社會的政治中樞，都有一群治理菁英，和一套用以表現出「這群人在遂行治理」這件事實的象徵形式。不論挑選菁英集團成員的方式有多麼民主（通常不是很民主），或者精英之間可能分化到多麼深刻的程度，他們都會運用一系列得自傳承、或是一套組織制度、

²⁵⁷ 民國四十三年(1945)，美國為清潔每月銷達一千萬冊滑稽圖畫中的不良部分，曾經由美國各地牧師、教育家、家長等組織委員會，展開有計畫的抨擊，同時美國國會也成立調查小組，作專案研究。此外，英為遏止此類美國刊物進口，並掀起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在英、美兩國「反不良刊物運動」聲浪中，臺灣當局亦仿效歐美，積極推行「文化清潔運動」。指陳：「有少數不良雜誌，為迎合讀者低級趣味，已達到非法營利目的」，而予以強制停刊處分。參見陳光輝，《臺北市社會變遷因素之研究》(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67)，頁 136。

²⁵⁸ 參見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宗旨。本段文字為我親至中國文藝協會抄錄而得。

²⁵⁹ 張道藩，〈論當前文藝創作三個問題〉，《聯合報》副刊（1952 年 5 月 4 日），後收入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編，《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評論卷之五》(臺北：聯合報社，1998)，頁 512。

²⁶⁰ 趙友培，《文壇先進張道藩》(臺北：重光文藝，1975)。

獎勵過程，來合理化他們行動。²⁶¹ 意即，在國民黨政府以一套合理的政治/民主產生過程，給予了特定菁英崇高名份與權力，並讓這些文化精英來治理整個文藝界，於是在他們的領導與推動之下，容易成功地促使當時多數的文藝創作者們始終堅信，國家所施行各項文化政策，用意即全為促進藝文界的文藝復興，以及進行一項偉大的民族文化使命，而忽略其間的高度政治符碼。

再來看《文藝創作》的發刊詞，張道藩指出了當前因文藝不興，而使作家作品被埋沒，因此，我們肩負著使命，必須為整個文藝發展復興而努力：「深感文藝作品不能大量發展，不僅埋沒了作家的心血，減少思想戰精神戰的力量，且將低抑了作家們的寫作情緒，阻滯了整個文藝運動的發展。……決定……發行本刊」²⁶² 文化菁英們不斷以「我們」來稱呼自身的位置，²⁶³ 表示這些菁英們和廣大的群眾同處一條船上，並且一起面對這個大風大浪的時代。當這些擁有高階地位文化的化領導者，以**生命共同體**的精神召喚時，果然成功地激發了創作者們的文學使命，是以在「道公」（文化界對張道藩的敬稱）等文化領導中堅份子的登高一呼之下，由大陸匆促來臺的作家群們，無不採戰鬥之姿，以反共為標的，凝聚力量，集體創造了昂揚奮進的政治文學時代。²⁶⁴

然而弔詭的是，從當時國內的出版及新聞管制政策來看，事實上使戰後初期臺灣文藝不興的，亦是推行文藝復興的執政當局。1945年二戰一結束後，許多新聞、雜誌及圖書出即積極地登記申請出版許可，出版事業迅速地從戰爭時期舒展開來，根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統計，短短一年間，全臺就有99家出版社申請經營，其中前後申請於臺北發行之新聞、雜誌社，即有74家。²⁶⁵ 政府對出版業採取「創刊不需許可，言論不受檢查」的寬待制度，創辦報紙及出版雜誌書刊也沒有強硬的限制，因而作家言論自由受到充分保障，²⁶⁶ 尤其是1946年前後，文化事業言論完全自由，創作亦不受干涉及約束，而報社「沒有申請登記的限制，最簡單只要借一個門掛起報社招牌，隨便租賃或佔據一兩間房子作為編經兩部，接洽一家小印刷廠承印便可」²⁶⁷，戰後初期臺北的文學及文化活動，其實正呈現蓬勃發展、多音交響的局面，當然，由於作家擁有言論的自由，不論本省或外省作家，皆能在書寫的場域中暢所欲言，因而多有評論時政、批判社會現實的報導及作品。然而，正當此一島內文化正積極進行復興之際，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此後，執政者積極運用各種文化監控及管制途徑，以壓抑島內自由發展的文化復興現象。

²⁶¹ Clifford Geertz 原著、楊德睿譯，〈中樞・帝王與領袖魅力——對於權力象徵的反思〉，收入《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臺北：麥田，2002），頁171~204。

²⁶² 張道藩，〈《文藝創作》發刊詞〉，收入《文藝創作》創刊號（1951年5月4日）。

²⁶³ 例如張道藩〈我們為什麼提倡文藝〉、〈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等，見趙文，〈道藩先聲與文藝政策〉，收入《中國語文》27:1。

²⁶⁴ 李瑞騰，〈張道藩的文藝歷程〉，收入《文學的出路》（臺北：九歌，1994），頁189。

²⁶⁵ 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臺灣一年來之宣傳》（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

²⁶⁶ 陳國祥、祝麗萍，《臺灣報業演進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年），頁27。

²⁶⁷ 此乃引用老報人金生麗的說法，轉引自陳國祥、祝麗萍，《臺灣報業演進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年），頁27。

1949 年，國民政府因總動員和戒嚴而施行的「國家總動員法」與「戒嚴法」，連帶將戰後臺灣的出版管制帶入戰時體制，透過政府所頒訂之「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管制辦法」，以及「出版法」，使得戰後臺灣出版文化，受到執政者強勢的監控與管制，在中國文藝協會等團體發起「文化清潔運動」之後，1954 年內政部公佈「九項禁例」²⁶⁸，對於出版品加以限制登載，新聞報紙在「限證」、「限張」、「限印」的出版控制之下，²⁶⁹ 政府「得對報館及通訊設之成立，報紙通訊稿及其他印刷物之記載，加以限制、停止」²⁷⁰ 因而文學傳播的表現受到極大的影響，尤其是副刊，這個足以呈顯當代作家心靈面貌與文華才智的文化媒介，卻在報紙限張的規定之下，被裁減或縮小版面，大規模限制了作家們在副刊發表作品及闡述思想的管道。

政府在限制文化傳播及文學創作的途徑之外，亦對於文化從業人員進行管制與監控。1954 年推動的「文化清潔運動」，以掃除文化界裡隱藏的「赤色的毒」、「黃色的害」與「黑色的罪」，並舉行民意調查，接受各界檢舉三害書刊的信函。²⁷¹ 接著，一連串進行雜誌停刊處分、查扣書刊，以及逮捕、恐嚇文化人的事件，光是《公論報》從總主筆、總編輯、副編輯，到編輯、記者、營業部人員等等，都先後或以莫須有之罪名判刑，或以甲級流氓罪名逮捕，有的嚴加管訓，有的送往小琉球拘禁，²⁷² 而社長李萬居則一年內收到五封各附有一顆子彈的恐嚇信，一時之間，文化界風聲鶴唳，於是人人自危，²⁷³ 從編輯到作者，對文字的處理，無不謹慎恐懼，曾擔任《中華日報》副刊編輯的作家、亦是寫作協會一員的蔡文甫，回憶當年文壇編輯們如何在政治高壓的氛圍下，戒慎恐懼地從事文化工作：

接副刊的新手，經常請教的是主編副刊老手更是名專欄作家王鼎鈞兄。他說：「利用的每篇稿件，一定從頭到尾看完，這樣，才知道自己如何負責，才知道自己如何死的！」在「白色恐怖」時代，編者常因發稿不當肇禍，例如五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聯副」刊出一首詩〈故事〉，涉嫌影射當局，編者即自動請辭。²⁷⁴

然而即使如此，仍有不少編輯、作家、譯者乃至於排版的工人們，因出版當局所

²⁶⁸ 所謂「九項禁例」，內容牽涉極廣，涵蓋整個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之限制，其中與文學傳播運作相關者，有〔二〕誇大描述盜匪流氓等非法行為而有誨盜作用者，〔三〕描述自殺行為而有助長自殺風氣之虞者，〔四〕描述賭博或吸食煙毒之情景足以誘人墮落者，〔六〕描述猥褻行為而有誨淫作用足以影響社會治安者，〔七〕傳布荒謬怪誕邪說淆亂社會視聽者……等。參見林淇瀅，〈明月下的熄燈號：《自立晚報》報業文化的反省與批判〉，收入張炎憲等編，《20 世紀臺灣新文化運動與國家建構》論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3)，頁 195-212。

²⁶⁹ 見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2005)，頁 65~142。

²⁷⁰ 此為 1949 年 5 月 19 日宣佈戒嚴自 20 日凌晨起實施時，公布之「國家總動員法」第十九條規定之條文。

²⁷¹ 相關活動報告，見中國文藝協會出版之《十四年來的中國文藝協會》，頁 18~19。

²⁷² 見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2005)，頁 65~142。

²⁷³ 王建邦，〈請政府確實保障人權！〉，《自由中國》第 19 卷第 11 期 (1958.11)，頁 26。

²⁷⁴ 蔡文甫，〈天生的凡夫俗子：蔡文甫自傳〉(臺北：九歌，2001)，頁 341。

不悅之作品或文字而致禍，乃至於作家在創作之時，下筆用字總是往復斟酌，而編者在採稿時，無不處心積慮地嚼索文字，以免無心觸犯當局禁忌而致罪。文人不得充分抒發智識，連排版工人都有可能牽連入獄，就更遑論創作自由了：

此外，新生報副刊主編童尚京即因匪諜嫌疑被處死，而新生報記者多人亦受牽連。柏楊因在中華日報家庭版之漫畫翻譯，被送往火燒島，致專欄作家人人自危。中華日報新聞版編輯俞棘（于吉），亦聽說被關。中央副刊主編孫如陵將詩題〈中正橋落日〉改為〈川端橋落日〉，以免賈禍。而且常聽說報紙將中央誤排成中『共』，蔣總統誤為『蔡』總統……等排字工人及編輯部都因而坐牢。²⁷⁵

然而，儘管作家已如此謹慎小心，以文化界遭遇之各種劫難為戒，並處處提醒自己戒慎節制，但蔡文甫還是遭遇了〈豬狗同盟〉案件的牽連。²⁷⁶

從觀察戰後文人們創作及言論不斷被監控、限制的社會情境，再回到當時文藝協會試圖進行「文藝復興」的脈絡來看，有助我們較能去理解這之間所存在的文化力量操作過程。文藝政策的主導者，認為當今「文藝作品不能大量發展」、「埋沒了作家的心血」及「低抑了作家們的寫作情緒」，因而需要「團結全國文藝界」、「從事文藝創作」，並且「發展文藝事業」。這和執政當局同時正在進行的文化掃蕩、清潔運動，似是相互矛盾，然而它應被理解是一連串相互關聯的文化反應，並且是文化和文化之間，在彼此交鋒之時，具有支配地位的一方對於異質文化進行排除／吸納之行動。

從「文化清潔運動」的組織動員來看，政府於 1954 年 8 月 20 日公告，開始接受各界檢舉密告的民意調查，並於七日後（8 月 27 日）公佈結果，而結果公佈的當天，內政部即以「誨淫誨盜妨害治安」的罪名，對臺北市共十家雜誌處以停刊的行政處分，無獨有偶的是，此十家雜誌亦皆出現在民調公佈的名單中。²⁷⁷ 這一整套看似合理的接受密告、查核、揭發與執行清除任務的公權力行使程序，卻因執行動作來得如此迅速且湊巧而令人恐懼，並懷疑是政府預謀。²⁷⁸ 然而，文化為何需要被清潔？換個說法來問，那麼污穢又是什麼？Mary Douglas 從人類社會行為的分析中，認為人們對於污穢概念的產生，不在於事件本身的絕對不潔，而是它擾亂或抵觸社會中人們遵行認知的體系，因而認定它破壞了秩序，具有危險的力量，而觸發人們對於它的厭惡、恐懼與焦慮感。²⁷⁹ 執政者在戰後宣示對於文化進行清潔的各項行動，其實是對於眾多異議文化人士們的高度恐

²⁷⁵ 蔡文甫，《天生的凡夫俗子：蔡文甫自傳》（臺北：九歌，2001），頁 341。

²⁷⁶ 蔡文甫，《天生的凡夫俗子：蔡文甫自傳》（臺北：九歌，2001），頁 304-312。

²⁷⁷ 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2005），頁 135。

²⁷⁸ 李玉階，〈文化清潔歟？摧殘文化歟？——從十家雜誌停刊到內政部制定九項禁例經過——〉，《天聲人語：涵靜文存》（臺北：驚聲文物，1980），頁 179。

²⁷⁹ 譬如將鞋子放在餐桌上，人們就會覺得噁心污穢，但如果置於泥巴地上，鞋子卻又不令人感到噁心。……（補充原文）。擾亂或抵觸社會中人們遵行認知的體系。Mary Douglas，1966，《Purity and Danger.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懼。我們暫且不論國共對抗期間複雜的文化問題，然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失敗是個客觀的歷史事實，在棄守大陸遷徙來臺之後，執政者必須面對的，是整個黨國的敗退、失勢與流亡的真相，即使內心無法承受失去中國政權的事實，但做為一個領導廣大人民的政府，必須要盡力地遮掩戰鬥失敗的事實，並且光明、正統地宣告領導的威信，讓人民相信統治者的正面性。然而，當面臨臺灣文化界以各種複雜傾向、眾聲喧騰的輿論批評時，執政者擔憂失去合理統治的恐懼隨之而生，魅影幢幢，於是對於破壞執政秩序、造成黨國危險力量的——「污穢行爲」，以及各種顏色的「罪、害、毒」，都必須加以清潔、掃除。

政府以接受匿名檢舉的方式，假一個無形卻擁有大眾輿論力量的民意之名，一方面減低獨裁行動的焦慮感，一方面意圖使人們相信並肯定這是政府「順應民意」、「為大眾而為」的正當執法行動。如同 Durkheim 分析人類社會模式行為的所指，即任何的人們，尤其是施害者，在對於受害者進行施害行為之後，都存在有一定的焦慮，因而會用各種合理化的方式，透過儀式、組織制度等群體性的社會行為，以彌補、分散或降低內心的焦慮感。²⁸⁰ 於是，在壓抑「他們」的文化與言論之後，再以「我們」來與聚合群眾，積極推展並鼓勵各種復興文藝的組織活動，並且試圖將失去政權的悲傷、對於輿論的恐懼，以及面對受害者的焦慮，一一予以「除魅」(disenchantment)，轉變成了領導人民為中華民族進行激昂奮鬥的正當理由與力量，而「生聚教訓」、「復國雪恥」這些將失敗轉化為正面光明的口號，亦在精英們的宣揚之下，成功地帶領群眾化悲憤為力量，讓廣大的我們一起肩負保衛中華民族文化、為中華文藝復興而奮鬥的偉大使命。

於是，持續在官方主導之下，接連幾個以主流國家意識形態所號召的「民間」文藝團體相繼成立：1953 年的「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呼籲全國與海外文藝青年「和我們站在一起，同心同德，為反共抗俄而寫作，為復國建國而磨礪」²⁸¹、1955 年成立的「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旨在結合自由中國的婦女們，從事自由和文化保衛戰鬥：「我們要發揚文化，我們要保護自由，所以我們結合在一起，努力以赴，不但要使自由燈塔下的婦女廣泛普遍的享受到自由與文化，並且要肩負衝破沒有自由與文化的鐵幕，拯救在黑暗中掙扎的姊妹們」²⁸² 另外，同樣具有官方文藝主導性質的「中華民國新詩協會」也設址於城南，會員約兩百一十多位，這幾個官方主導的文藝團體，從文學到藝術、從軍人到百姓，乃至於各階層志士、青年到婦女，都備有組織緊密、系統周嚴的文化宣傳體制，因而幾乎囊納了全臺灣當時中文書寫作家群。²⁸³

國家行使強勢意識形態統治之時，除了依賴政體及警備制度對於思想的控制之外，透過文化利潤與獎賞的途徑，更能讓支配階級有效率地進行統治，並且減少維持社會秩序原先所需的武力需求。文化動員與各項獎助政策的重要性在此顯

²⁸⁰ Emile Durkheim，汲喆等譯，《亂倫禁忌及其起源》(上海：上海人民，2003)。

²⁸¹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聯合文學》17:7 (2001.05)，頁 148-160。

²⁸² 陳芳明，〈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聯合文學》17:7 (2001.05)，頁 148-160。

²⁸³ 相關資料，見中國文藝協會出版之《文協十年》活動手冊。本段為研究者採訪當年中國文藝協會作家王牌（王志濂）之口述紀錄，王先在回憶當年協會的盛況與會員眾多的情形。

現出來，戰後國民黨政府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即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編列一年高達數十萬臺幣的經費之下，系統化地推行這一套具有高度政治符碼運作其間的文化獎勵機制。²⁸⁴ 並且以優渥的稿費與獎金攏絡作家，²⁸⁵ 連文藝宣傳小折頁中的一篇小文章，即可和軍官一個月的薪資相當。²⁸⁶ 本身也是戰鬥文藝詩人出身的紀弦也認為，這些作家之所以要參與甚至熱衷於這種方式的寫作，並非完全出自於個人文學意願，以及文學使命之類的理由，實際上有不少非文學因素，例如優渥的稿費、獎金等利益，促使這些作家奮力地從事創作。²⁸⁷

文學評論者在評價臺灣 1950 年代反共懷鄉文學的價值之時，無可避免地會批判這時期作品因依附於政治的宣傳工具，而予以較低的評價，例如葉石濤、陳芳明所著之臺灣文學史，乃至於中國大陸的文學史著中，亦多以批判的角度，來檢視此一時期為黨服務之政治文學的價值。²⁸⁸ 然而，我們從文學場域的視角來思考期間的文化脈絡，無可否認它是一個作家必須而為的過程，尤其身處於國族大敘事的時代之中，無論本省或外省作家，都需要衝破這個政治突圍，才能在文學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再回到臺北城南的空間意義來思考，戰後整個時代的文化主流，都壓縮在一個具有高度族群區別性、以及國族立場鮮明的空間裡運行，不論是政治的、民間的、軍中的、學院的、出版界的；或是從指揮的到聽命行事的、從掌權的到受監控的，最重要的，還有從知識分子到平民大眾，都生活在同一個有機的文化空間裡。城南這個地區，足以成為文化宰制階層（或可以說是國民政府統治高層），運用來組織知識分子的文化場域。

從此一脈絡來思考戰後城南地區的空間文化角色，中國文藝協會、中華民國新詩協會等眾多人民參與的文藝團體設址於城南，即高度具有進行文化收編的企圖，執政者希冀收編這些頻繁活動於此區的中高階層人士，透過他們形成文化知識分子的角色，以在全臺灣獲得更全面的文化控制。在城南，透過各個文藝組織而頻繁舉行的各項文藝活動、文藝創作班，人們經常容易感染濃濃的文藝氛圍，加以住處居住的人士，三不五時鄰居就可能是個教授、作家、編輯、記者，或是藝術家等文化人界人士，這樣的文化氛圍，具有一定程度的渲染效果，當時常於城南居住及活動，且較為知名的反共文藝系統出身之文藝協會作家有：潘人木、

²⁸⁴ 應鳳凰，《五〇年代臺灣文學論集——戰後第一個十年的臺灣文學生態》(高雄：春暉，2004)，頁 51。

²⁸⁵ 《文藝創作》徵稿辦法中記載，當時短、中、長篇小說第一獎的獎金分別為三千元、八千元、一萬二千元，以當時物質環境而言，是極為可觀的獎勵。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得獎作品與 1950 年代小說相關研究，請參見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2005)，頁 63-126。

²⁸⁶ 本人採訪王志濂(王牌)先生時，作家口述，他的第一篇作品〈別〉，發表在中國文藝協會的《文藝創作》小折頁中，稿費五十元，當年一個少尉一個月薪水也不過五十四元。

²⁸⁷ 原文出自林亨泰，《找尋現代詩的原點》(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轉引自應鳳凰，《五〇年代臺灣文學論集——戰後第一個十年的臺灣文學生態》(高雄：春暉，2004)，頁 51。

²⁸⁸ 整理自應鳳凰《五〇年代臺灣文學論集——戰後第一個十年的臺灣文學生態》(高雄：春暉，2004)，頁 54、55。

王藍、王荅芷、尹雪曼、王在軍、王書川、程大城、上官予、伍鳴皋、何志浩、鍾雷、紀弦、鮑曉暉、師範、隱地、丹扉、鐘鼎文、魏子雲、羅青、鄒化民、郭嗣汾、黃美序、小民、王琰如、魯艾、羅雲、王令嫻、高準、王志濂、金戈等人。

²⁸⁹ 這種空間的文化氣質，促使生活在此之間的個體，容易形成一種感覺結構，一個人的感覺結構，部份由於他所擁有的知識來源途徑，如暴露在印刷文字或現代媒體所形成的政治—歷史事件的新聞之中；而另一部分則由於他每天和生活週遭所遇及之「時間」與「空間」的遇合，例如人與人、世代與世代、以及生活知識、失活空間配置等等。這些生活週遭作用於意義的觸媒，透過某一象徵引出整個象徵系統，使人們感受到感覺結構的存在。意即，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是個體和群體在特殊歷史情境，參與時空與結構歷程的產物。因而，在此空間氛圍中，頻繁活動於城南的人，愈容易相信自己就是傳播文化的中堅份子。

因而，我們想問的是，在如此具有特殊氛圍的地區中，知識份子究竟為數眾多，或只是一群及少數的精英？這是 Said 在《知識分子論》裡開頭的第一句話，²⁹⁰ 也是我們在探討城南這個有機的文化空間時，所要提出的問題。延續 Said 的思考脈絡，我們可以從 Gramsci 《獄中札記》裡獲得了一些啓示：戰後的臺北城南地區，可能所有的人都是知識份子，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文藝協會在城南的運作，有兩個菁英文化操作方向值得我們探討，其一，透過指導民間文化組織運作的名義，進行軍中模式的文化位置支配與利益給予。其二，運用文化與空間的操作，使人們成為（國家的）知識份子群。探討這兩者之間在城南此一空間裡的文化作用，則有助於我們在進行文學研究時，較能理解為何 1950 年代官方主導的軍中文藝，以及從民間文化事業與學院間興起的文學思潮，都能在同一空間裡共存，並相輔相成的原因。

國民黨政府即使試圖透過軍警系統，在民間行使文化監控、清潔等極權宰制行為，但外顯行為上，若過度動員軍警系統進行恐怖逮捕行動，則反而容易使人民產生反感，且勢必將遭受文化界更嚴厲而激烈的批判。文化的弔詭性即在於此，即文化在遭受強行壓抑之時，愈容易引起民間反抗的勢力，因而，即使統治者目的在於進行極權的政治行使，但絕不能總是動用軍警的系統，來對於民間強行實施文化的控制。儘管國民黨已經有一系列完整體制的軍中、黨國新聞及文化事業編制，但這些系統過度的黨國色彩，容易淪為口號、八股的教條宣傳，不足以感染廣大的民眾，因而在體制之外，以「指導」的方式，透過民間發起文化動員與文化教育體系，是最節省統治成本、且最能號召民心的方式。然而，若這些文藝團體，只是精英式的宣導國族與文藝戰鬥之間的重要性，以及過度高舉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與國族性格，最後仍會淪為一群菁英份子關起門來從事文藝戰鬥的窘境，亦即，精英最終仍舊只是精英，由於沒有激情、沒有知識分子與民族大眾的感情聯繫，就不會產生歷史和政治，缺少這種聯繫，知識份子和民族大眾的

²⁸⁹ 參見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執行，《臺北市文學資源調查蒐集計畫成果暨報告書》（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未出版）。

²⁹⁰ Edward W.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頁 1。

關係就降低為純粹官僚式的、形式性的關係。

出身於黨國系統的文化菁英們意識到這一點，於是他們透過民間文化組織來組成民眾，加強利益（稿費）的贊助與給予，並且透過各種競賽、獎勵與輔導機制，以類似軍中支配黨政軍階地位的方式，提供這些文藝創作者擁有在官方及半官方文教機構的文藝主管工作，並優先給予出版、獎勵、甚至改編成電影的曝光機會；²⁹¹ 本身即是從戰鬥文藝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作家郭楓，即回憶當時黨政軍對於文壇的掌控情形：

……他們培訓出大批文藝戰士，組織起以軍政黨工為骨幹的龐大作家系統，這個系統中，長幼有序，自是一種人事倫理與工作準則。他們盡力在軍中輔導的文藝新秀，結訓後大量分派到政府機構及社會各部門，擔起文藝教育和運動的任務。自五十年代以後迄至目前，官方各部門的文藝主管以及半官方的報刊與出版機構負責人，大多從戰鬥系統出來，他們對臺灣文學生態的影響，不言可喻。²⁹²

在此風氣推波助瀾之下，文藝家除了須以迎合公辦文藝獎的標準而創作，以取得發表出版和文壇位置的機會外，各類文藝雜誌及團體，亦皆需在辦刊及成立理念上配合官方的論述，才能攫取文學的位置和出版各方資源的支持。²⁹³ 因而不只官方文藝機構推行戰鬥文藝，一般文學報刊媒體也在國家全面性的文化宰制之下，充斥著激昂的反共論述。例如 1949 年由一群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大陸來臺作家創辦、設址於城南的《自由中國》（和平東路 2 段 18 巷 1 號），其創刊四條宗旨（由胡適手筆親自書寫）中的第二條，為「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而發刊詞亦聲明：「《自由中國》這個刊物，正是要闡明蘇俄對於世界——尤其是對於中國——的禍害，和中共對於對於國家和人民的罪惡。」²⁹⁴；1950 年由作家程大城一個人籌辦發行、設址於城南（青田街 2 巷 4 號）的《半月文藝》，在發刊詞即宣示了與當時官方相應的主流的文學信念，以及消滅赤色文藝的口號：

我們為挽救祖國的危亡和人類的厄運，非消滅赤色文藝，重新培育新的文藝思想不可，所以今天的戡亂戰爭。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卻遠超過了對日抗戰……特創立《半月文藝》，願絞盡腦汁以報祖國，在人類文藝路向辨識不清的今天，我們大膽的舉起前進的火把，擔起文藝運動的責任，消滅

²⁹¹ 例如由國民黨直接經營的出版社，規模較大的像「正中書局」、「復興書局」、「中央文物供應社」都出版相當比例的文學書，這些黨營單位常常與不同的「作家協會」合作，出版他們的選集。

²⁹² 郭楓，〈四十年來臺灣文學的環境與生態〉，《新地文學》第 2 期，1990 年 5 月，增訂後收入郭楓，《美麗島文學評論集》（臺北：臺北縣文化局，2001），頁 13。

²⁹³ 應鳳凰，《五〇年代臺灣文學論集——戰後第一個十年的臺灣文學生態》（高雄：春暉，2004），頁 23。

²⁹⁴ 《自由中國》創刊號（1949 年 11 月）。

赤色思潮。²⁹⁵

紀弦在 1953 年於城南（羅斯福路 3 段 76 號）創辦的《現代詩》季刊的創刊宣言中，亦將充滿軍政意涵的信念提升於文學理想之前，揭示了戰鬥文藝的政治意旨：

我們是自由中國寫新詩的一群。我們來了！站在反共抗俄的大旗下，我們團結一致，強有力地舉起了我們的鋼筆，向一切醜類，一切歹徒，瞄準，並且射擊。²⁹⁶

接著在 1956 年紀弦宣告現代派的六大信條中，第六條亦為「愛國。反共。擁護自由與民主。」。

無論是自由主義文人、抑或是單打獨鬥開創文藝天地的作家，以及以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而發奮創作的軍旅詩人們，即使思想各異，文藝理念更是多有殊異之處，但相同的是，這些雜誌在發刊詞及刊行文告中，皆宣示與官方同調性的政治思想，以透過獲得政治正確的合理性的途徑，為文藝的茁壯與刊物的生存，各自找尋到持續發展的出路。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為戰後執政者企圖在運用文化與空間的操作，使城南一區的人們，儘可能地成為（國家的）知識份子群，並促使他們形成一股主導臺灣文化的強大力量。回到前一段所問的，在戰後的城南，何為知識分子？首先，我們先看西方學者們如何辯證知識分子的意涵。

Said 試圖在為知識分子進行定義時，即指出有兩類知識份子的典型，一是 Julien Banda 所謂傳統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活動本質不是追求實用的目的，而是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尋求樂趣；而班達更進一步認為，真正的知識份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熱情、正義，以及超然無私的法則之感召時，會斥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²⁹⁷ 另一種則為葛蘭西所認為，在知識生產或分配相關的任何領域工作的每個人，都是知識份子； Said 甚至亦認為，知識分子應向公眾以及為公眾成為代表，並表明歷史、價值、寫作、立場、觀點、態度或哲學意見的人，不為政治所收編。²⁹⁸

由上可知，認知「何為知識份子」的取徑，即因認知者及詮釋者的角度不同，原本就具有多樣性，從班達的觀點來說，城南的知識份子，應包含學院裡的專業人士、文化工作者、政策專家及顧問、媒體工作者等；但從葛蘭西的角度來說，城南所有的人都為知識份子，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而進一步在他們的論述之下，Said 延伸出更具共性的觀點，即知識份子應為一個超然、不依附於有權勢的官僚機構與雇主，並以獨立的道德判斷獻身於理性

²⁹⁵ 《半月文藝》創刊號（1950 年 3 月）。

²⁹⁶ 紀弦，《新詩論集》（高雄：大業書店，1956）。

²⁹⁷ Julien Banda，孫傳釗譯，《知識份子的背叛》（長春：吉林人民，2004）。

²⁹⁸ Edward W.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頁 16-17。

探究，不斷向社會宣揚理念之人。²⁹⁹ 儘管 Said 的觀點已趨近於現今我們所理解的知識份子的角色，然而戰後國民黨政府在城南空間裡對於知識分子的塑成，卻不是這一套普遍被認同的概念。

總的來說，戰後執政者選擇性地賦予知識份子新的定義，以有效進行政策性的文化操作；而城南地區在中國文藝協會等當局文化政策主導之下，所呈顯此一文化形勢尤其顯著，即知識份子被普遍地框架出一種具殊異性、受支配者操控而成的特殊樣貌：一、是具有形而上的熱情、正義，以及在受到超然無私的法則的感召之時，會斥責腐敗，保衛弱者；二、則具有學院/文化/媒體/專技/公教人士的專業高層形象；三、則是所有的人都具備了成為菁英的潛能，並且足以在各領域發揮文化介入的作用。這種情況，和一般學者所認為的普遍的知識份子 (universal intellectual)³⁰⁰ 是不同的，這些知識份子即使聲稱不屈服於社會上的腐敗，並樂於伸張正義，但其實仍是在政治意識的操作下，來進行知識分子肩負之文化宣示與傳播重任，意即，他們在執政者宣示反共抗俄的框架下，斥責腐敗（例如共產黨）、保衛弱者（例如失敗的國民黨），並且，藉由國家所賦予他們的各種文化位置與優渥的文化利潤，讓他們隨時有機會介入文藝界，進而加強使任何人都能堅信「我可以成為知識份子」的真確性。

第五節 「寫作班」帶動的軍中文藝風潮

執政者在城南，壓抑並且收編了知識份子的公共角色，轉而給予普遍的、廣大的平民更多的文化地位、榮耀，乃至於給予知識份子的崇高名分。讓人人都有機會成為文人作家，並且也都可以成為「知識分子」，即使是軍人、基層人員或平民百姓，只要願意拿起筆來做文章，就是文人作家，並且可以是文化菁英。因而，光是在城南的一個中國文藝協會，總計即有一千多位會員，並且僅僅 1950 年到 1951 年這一年間，在協會鼓勵之下進行反共抗俄文藝創作者，就有三千餘人之多，並且創作了四百萬字的文章：

本會自去年四月成立以來，一方面竭力獎勵文藝創作——一年來在本會激勵鼓舞之下從事反共抗俄文藝創作者三千餘人之多，已得本會獎金及稿費作家共計四百餘人——一方面將得獎及採用之作品向有關出版機構及報章雜誌介紹發表……一年來……全部文字稿四百萬字……³⁰¹

在一年內出現的三千多位作家群，還不包括眾多非戰鬥性（如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小品文、散文等）作家的數量，這種高度量化的情形，在城南造就臺灣文壇前所未有的文化榮景，而這些作品，除了有優渥的獎金贊助之外，發表機會

²⁹⁹ Edward W. Said 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頁 11~27。

³⁰⁰ Michel Foucault, "Truth & Power" i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1980. p.125-133。

³⁰¹ 此為張道藩為 1951 年 3 月發行之《文藝創作》雜誌所寫之〈發刊詞〉。

亦多，協會運用各種出版管道與官方推介機制，將這些作品廣為印刷出版，如推薦刊載於官方色彩濃厚的《新生報》、《中華日報》副刊，或於《火炬》等刊物發表，並且「寄往南洋、印度、加拿大、美國等各地華僑報紙發表」，或「直接印行「反共抗俄」歌詞選」。³⁰²

城南之所以成為全臺文化主導場域，即在執政者知道如何善用知識份子的名份，擴大但限制知識分子的角色，讓廣大群眾成為國家的知識份子，並鼓勵他們以語言/文化介入社會的方式，從城南地區開始，逐步拓開擴及全島的文藝復興運動。中國文藝協會等民間文藝團體，除了在城南開授各種寫作班及文藝研習活動外，並定期在各地舉辦各種文藝活動，培養許多小說、攝影、美術人才，亦提供作家與讀者對話交流的機會，尤其協會積極鼓勵人們進行創作，培育了許多創作者，這些作家群，在往後亦深刻影響整個臺灣文學的發展。高雄左營海軍出身的軍中詩人，如洛夫、張默、大荒、痙弦，等人，都積極在城南參與文藝協會及新詩協會舉辦的文藝活動。據採訪口述，當年他們都是熱血沸騰的文藝青年，經常豪放地跳到桌上表演詩歌朗誦。³⁰³ 九歌文教基金會的創辦人蔡文甫，曾為中國文藝協會第二期小說寫作班（1953年4~7月）學員，他肯定小說班對他的影響至深。當時主辦單位是文協第四屆理事會，實際負責人是李辰冬、趙友培兩位師大教授，兩位教授專注投入課程，除了自己授課，其他講座上課亦坐在第一排聽講，從頭到尾參與。³⁰⁴ 對於這些因戰亂而失學的年輕學子而言，文藝協會的課程引導當時青年們走入文藝的殿堂，並提倡文藝與深耕文學，在那個知識匱乏的年代，顯得彌足珍貴。寫作班對於文藝教育的深化，使人們相信自己擁有知識分子對於社會帶頭領導的作用，於是文藝文藝地說著，不論是愛國熱血沸騰的軍人，或是懵懂尚未涉世的年輕人們，在寫作班的鼓舞與激勵之下，都成了「文藝青年」。

軍中文藝的提倡，間接轉化了軍中作家的熱烈情懷，他們將革命愛國的戎旅激情，一路伴隨著戰亂的遷徙流離，輾轉帶到了臺灣之島。多少國仇家恨與兒女情仇，生命亦歷經屢次生離死別，即使現實環境無奈成了兩岸隔閡與政治閼啞噤語，但軍中文人們卻能積極地將心中的澎湃熱血轉化為對文學的熱情，並相互交流切磋，在那歷史錯綜曲折的年代裡，透過文學的慰藉彼此取暖相持。楚戈在〈八千里路雲和月〉中，述及當年軍中文藝青年藉由文學為澎湃熱血找尋心靈出口的心情：

六十年代的初期……那時正值詩的狂熱年代，寫詩好像是草莽英雄吶喊的武器，到處都可以觸及那熱烈的呼聲，充滿著狂飆的熱情。這些熱，首先瀰漫在軍中。中國在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那一股愛國的熱潮，最後都被軍隊收容、集中，而帶到了臺灣。這些渴望捐軀給苦難祖國的年輕人，那獻身的意欲，無疑都被暫時抑制住了，但至於那些抑制不住的澎湃活力

³⁰² 同上註。

³⁰³ 當年詩人朗誦詩歌的場景，為筆者採訪王志濂先生之口述回憶。

³⁰⁴ 參見蔡文甫，《天生的凡夫俗子：蔡文甫自傳》（臺北：九歌，2001），頁170-171。

呢？如是這些英雄們就用各式各樣的方式，把自己的熱情傾吐在詩中，不管是情詩也好，咒罵的詩也好，頹廢的詩也好，可憐又誰知道那後面隱藏了多少悲痛呢？壯士們是不會直接說出自己心中之苦況的，那苦況隱藏掩飾在他們異常的行為中。這股熱也感染了臺灣多年輕人，當時，一些十七八歲就寫詩的少年，他們真是作夢也沒有想到，他們寫詩的動力，是被那一股潛流激盪出來的。³⁰⁵

然而對於這些軍中詩人而言，他們口口聲聲所自稱的詩人，事實上是抒發現實生活中戰士無用之鬱悶心情的一種出口與慰藉：

說穿了當年軍中的那一群所謂詩人，根本就不是什麼真正的詩人，他們只是一群死士，因為死不了才無可奈何的去寫一些所謂的「詩」的。³⁰⁶

1950 年代軍中詩作品發展蓬勃，除了《新生報的》的〈軍中文藝週刊〉之外，許多軍中文藝作家亦積極於紀弦所創辦的《現代詩》和覃子豪主編的《藍星詩刊》上發表，這兩個刊物編輯部皆設於臺北城南，此處亦成了各路人馬碰頭的中心。當年的臺北，頗有北宋時代梁山泊的吸引力：

而臺北漳州街有一個小泊，這個小泊是國防部軍官宿舍，主人叫葉泥，他不僅是國防部的上尉軍官，又是現代詩刊的一員大將。……每個星期天或週末，這個小泊就熱鬧起來了，常常跑到這裡來喝茶、吃飯、聊天的有將軍的兒子鄭愁予，歪嘴商禽（當時都叫他羅子馬），冷澀的辛鬱，北一女的林冷，成功中學的學生羅行，以及無所謂的我。……除文藝青年林冷、羅行、愁予外，這些傢伙清一色都是小兵，從上等兵到中士，統由上尉負責擔開支。³⁰⁷ (153)

講求義氣豪邁的軍人身分，加上溫潤多情的文藝理想，使得軍中文人聚首尤其交心相惜，而文友圈也隨日月增長而擴大，並與當時在學的文藝青年相互提攜交流，以澎湃的熱血共劃文學版圖，致使每次的例行聚會人數愈來愈多，「文友圈」儼然成形：

每週末想泡在一起的人數愈來愈多，洛夫、羊令野、一夫、張拓蕪、秦松、管管、張默，加上臺大的陳若曦、鄭秀陶、劉大任，中興大學的王渝、洛冰，師大的張淑芳，政大的劉廷湘，大夥兒就只有以臺北公園為中心了，而公園附近的「田園咖啡室」是聯絡中心兼集散地。大部份時間是在公園或野外廝混，但節目仍舊，一直維持漳州街清談、朗誦詩、喝酒、和罵不

³⁰⁵ 參見楚戈，〈八千里路雲和月〉，《再生的火鳥》(臺北：爾雅，1995)，頁 151-154。

³⁰⁶ 楚戈，〈八千里路雲和月〉，《再生的火鳥》(臺北：爾雅，1995)，頁 152。

³⁰⁷ 楚戈，〈八千里路雲和月〉，《再生的火鳥》(臺北：爾雅，1995)，頁 153。

在的人為樂事之傳統。清談的內容，無非都是文學和詩。忍不住時就唱歌，但歌手都是辛鬱、商禽、高麗梆子（老許）擔任，老朋友紀弦有時也唱一點祖母時代的舊歌，其裝模作樣的戲劇效果很叫座。

戰後初期的臺北文壇，一方面因現代化的腳步尚未深刻地影響都市中的生活型態，另一方面因城南地區多為外省籍人士聚集，意識形態與生活模式較為相近，人情味較為濃厚，尤其文人之間彼此惺惺相惜，溫馨互動：

回想那些年輕熱情樸實的面孔，令人懷念不已。文友們除了研究寫作之外，就是爭相向報章雜誌送稿。文章發表了，稿費拿到手，便邀三五知己，上小館，喝咖啡，聽音樂。彼此都沒有家室的負累，一派積極飄逸的文風，迴盪在文壇上。回想起來，那時的況味，真是令人夢寐難尋。³⁰⁸

在官方主導的軍中文藝勃興時代，軍人作家一方面肩負著文藝革命與發揚民族文化的重大責任，但另一方面，因戰亂的流徙與離鄉背景的思愁，回歸故鄉與重拾年少時期的戰鬥狂熱已成了遙遠的理想。於是轉化為豪情萬千的文字，透過協會舉辦的活動，與文友切磋交流，致使官方主導的文藝思潮，在城南成為軍人文友爭相仿效的人文風尚。



³⁰⁸ 王書川，〈交情淡如古琴音——移居臺北有感〉，《王書川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1978)，頁247。作者在作品中亦述及：「二十六年前，臺北市是一個多麼純樸的都市，人口少，地區大，人與人多數都是從大陸撤退來臺，所謂「萬劫歸來」的劫後餘生。名利淡，慾望低，彼此友情真摯，人際關係單純，所謂「人情味」極為濃厚。」對於作者而言，戰後的城南因住處之住戶人口密集度不高，且生活背景單純，多為大陸撤臺人士，故生活緊密，人情味濃厚。。

第六章 戰後文化主導場域之形成（二）：民間文化界與文友圈

第一節 空間生產與奧援下的「有機」文化圈

戰後的臺灣文化場域，除了因政策性的主導，使得臺北城南，在廣大而普遍的軍民系統知識份子持續進行主導文化論述與文學介入之下，呈顯出似是文藝復興的大量化作品，但藝術價值上卻良莠不齊，談不上豐富文學佳作的格局。在大時代的政治環境中，儘管創作的自由度受到了限制，然而文學的永恆藝術價值，在戰後卻尤其能在城南持續發揮影響力，並且以另一種民間、純文學的形式，同樣主導臺灣文壇。我們需留意的是，戰後並非所有的作家們，從此都進入黨政軍的收攏系統之中，在城南尚有一大群具有人文關懷以及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們，他們以低調、溫文而沉穩的人生態度從事文化事業，一方面較不為政治意識形態所過度煽動與收攏；另一方面這些人們進行文學創作所關注的焦點，亦少以激動、情緒化的國族與歷史教條去概括。

本章將從文化生產與傳播的角度，來探討這些較無政治色彩，或較具有文人素養與風骨的知識分子們，如何在城南突破政治的框架，形成另一股不完全謀於當局、但又不與當局交鋒衝突的文化主導勢力。其中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城南的文學空間生產模式。民間的文化推廣，短期間內不似官方主導來得具有成效及渲染力，然而在城南，我們看到的文學成果卻並非如此，反而民間的文壇勢力較佔勝場——即使每個文友圈的成員雖量少但卻質精。透過文友圈的相互溝通與交流，加以空間機能的發揮，以及文化資本的奧援，因而造就另一股引領全臺文壇的文化主導勢力，甚而從長期歷史價值來看，這股文化主導勢力遠勝於官方主導的文化體系。是以，本文將以城南文化生產模式為核心意識，一方面釐析為何這股從民間興起的文化主導勢力，仍是在城南這個空間裡；一方面從這些文人的書寫與創作中，來看他們如何在城南以「文友圈」的交遊，無意識地擴大、連結了文化影響範疇，因而主導了大半個臺灣文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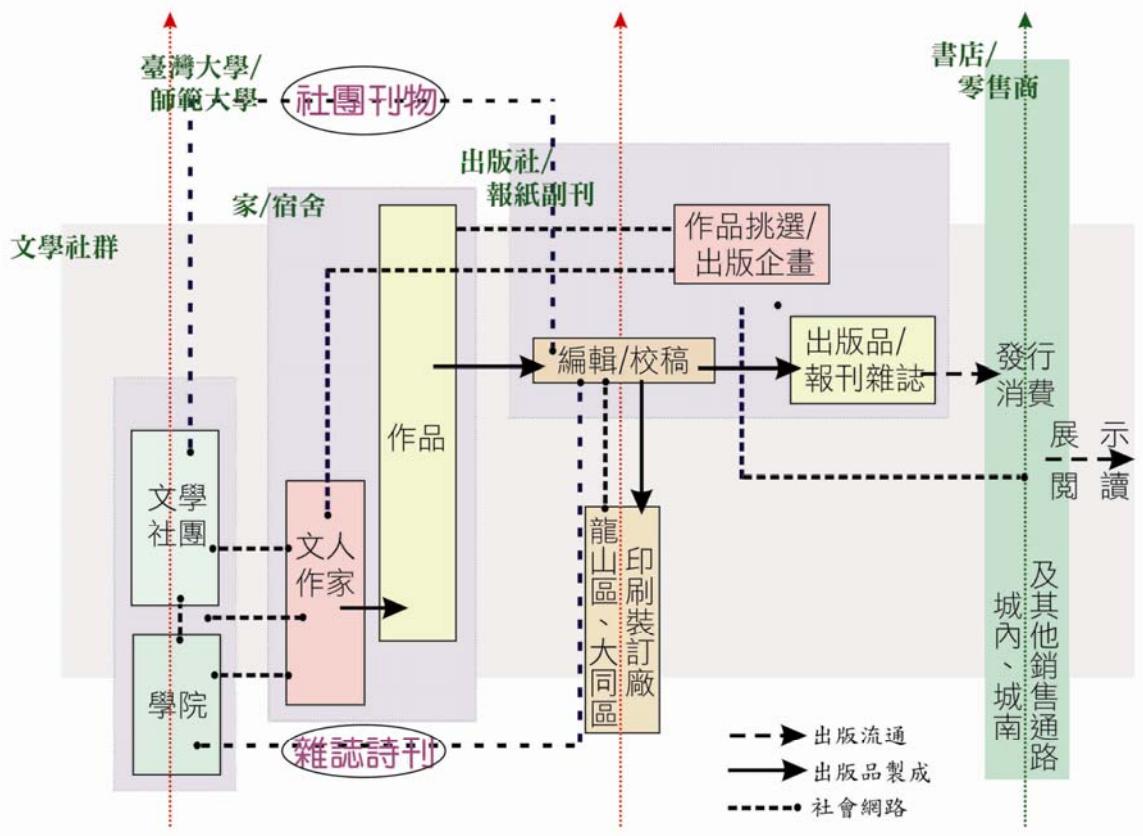
一、促使文化事業興起的臺北空間經濟模式

從戰後二十年間臺北產業分布情形，有助於觀察臺北文化生產的網絡，Diana Crane 在《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中提到，文化是一連串被生產、傳遞和接收的訊息，在這三者之中的每一階段，都蘊含著文化性、技術性、以及社會性的因子，³⁰⁹ 亦即將文化視為出版社、傳播網、以及國家科層體制的產物，則有助於觀察文化生產的過程，並可提供發掘這些因素的作用、指出它是如何地產生影響。

文化產物必然與社會緊密連結，一個創新的文化產物，需要有社會資源與環境條件的支持，才能持續被生產、被選擇，以及最後得以制度化並且因而穩定和

³⁰⁹ 參見 Diana Crane 著，趙國新譯，《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持續地發生 (Robert Wuthnow, 1989)³¹⁰ 戰後城南的作家文人們，其作品乃透過一套制度化之文化的社會空間過程，進行文化生產與傳播，其過程圖示如下：



圖片說明：筆者繪製。

從圖中可知，文化生產是一個系統性的社會過程，創作僅僅是生產的第一道手續，其接續的過程，尚仰賴空間、社會資源的多方支援，意即，文化生產者必須透過社會與空間，取得必要資源，將文化訊息傳播至閱聽大眾。城南之所以可以成為文化核心主導區，除了精英與文人聚集以外，更有賴與之聯繫的社會與城市空間，傾注全力地緊密支援。試看下圖為國民政府遷臺初期（1956）臺北市書店及印刷業的分布狀況。

³¹⁰ Robert Wuthnow,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Reformati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European socialism* ,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圖片說明：依據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3，圖面重新整理、著色繪製而成。

從圖中可以看到，統治者正積極營造的文教區城南，主要以居住環境的品質為優先考量，城南除了幾家中外文書店之外，僅有舊書攤集中於牯嶺街一帶，不同於新書店之重商經營模式，舊書攤之出現，已於第四章討論，為戰後城南在社會變遷下的文化交易途徑。

反之，具有商業性質的中外文書店，以及屬於工業生產的印刷廠，多位於城南以外的地區。圖中各書店之分布，大致延續日治時代的規劃，位於城內及西門一帶日本人商業密集區域，尤其重慶南路附近，為各中外文書店群集之處；此外應留意的是，需大量勞力與工業銷耗，但卻擔任文化生產過程重要角色的印刷廠，則密集分布於本省人居住之萬華（艋舺）及大同區（大稻埕）地區。從圖中可以判讀的是，促成城南進行文本創作——印刷——消費的文化生產網絡，其實是臺北都市空間一連串在社會資源及行銷通路上的支援，換言之，從經濟層面來說，城南文化核心區的塑成，是在萬華及大同區的印刷工業基礎，以及城內書商販售經營通路的奧援之下成形的。這種此文化生產的空間模式，在戰後持續進行，以勞力密集的工業生產區，來支援城南地區成為文化主導核心的現象更加顯著。根據 1966 年《臺北市誌》的調查，以本省住民為主的萬華龍山區，印刷裝訂業特別發達，在 1966 年臺北 250 家登記的工廠中，計有 111 家位於此區，佔 44.4%，居臺北市各區之冠；³¹¹ 而大同區亦工廠甚多，1968 年有 387 家，其中印刷及裝訂業 35 家，並且印刷業有增加之趨勢，直到 1981 共有 57 家。³¹²

我們需了解的是，任何人類社會中，**上層結構**之文化塑成，乃基於**下層結構**

³¹¹ 王月鏡主修，《臺北市志 卷一沿革志城市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 126。

³¹² 王月鏡主修，《臺北市志 卷一沿革志城市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 198。

的生產力量，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描述之上層——下層結構的模式，可以理解這種透過社會階層力量的應用，及其得以運行的文化生產過程。馬克思分析社會的特定結構，以及其所構連的制度與行為關係，指出「下層結構」為經濟與生產的「力量」，包含工具、科技、工人的技術；而「上層結構」意指制度以及這些制度所表達或生產的「意識」形式，包含文化的、教育的、政策的制度等。而恩格斯接續馬克思的觀點，認為下層結構與上層結構之間的關係，在某種程度而言，是相互作用而成的。³¹³ 城南地區的文化生產，除了仰賴下層基礎的印刷工業之外，還需透過腳踏車、三輪車等工具做為生產過程往來之媒介，這些在當時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亦是文化生產的基礎力量之一。戰後二十年間，臺北市的主要交通工具，仍以腳踏車及人力三輪車為大宗，如下表所示，臺北市區每日平均交通流量中，腳踏車數量遠高於其他車輛。

改制前臺北市主要道路每日交通量(市區)

年別民國	載貨汽車	乘人小汽車	乘人大汽車	機器腳踏車	腳踏車	人力三輪車	載貨人力車	乘人人力車	牛馬車	行人
37	1211	2243	967	341	40,737	6,068	2,234	625	345	47,830
38	3352	5,564	2,388	855	10,9510	13,444	6,996	1,320	679	112,286
39	2911	9,794	3,949	1,015	7,780	19,606	6,591	308	387	80,103
40	2835	9,655	6,170	888	12,836	22,330	6,629	95	477	111,115
41	1,709	11,371	6,277	983	12,0276	30,709	6,012	—	1,040	91,319
42	4,128	12,496	8,554	1,147	11,9616	29,878	6,343	—	577	79,029
43	4,509	15,115	7,448	1,631	14,4506	40,352	6,461	—	654	115,049
44	3,623	14,888	8,614	2,960	10,9809	40,783	5,378	—	362	212,942
45	8,811	24,529	15,648	5,957	12,7621	56,866	4,979	—	485	92,208
46	4,408	18,277	7,271	6,897	11,2947	50,918	5,846	—	248	75,752
47	3,454	15,861	9,988	6,418	9,4350	51,390	4,717	—	233	71,185
48	3,857	14,717	11,147	6,010	8,9693	51,380	5,710	—	76	86,019
49	3,508	13,951	12,883	9,157	13,1,589	48,799	6,380	—	122	91,806
50	2,555	23,630	12,253	8,450	12,5,779	42,640	5,295	—	235	102,807
51	2,706	31,117	12,959	11,053	12,7,968	37,973	4,578	—	63	102,703
52	3,291	39,122	11,459	12,869	15,0,597	27,449	9,486	—	100	111,655
53	1,817	40,900	11,145	20,354	12,5,462	36,868	6,917	—	83	106,083
54	1,922	47,581	14,849	26,564	10,5,108	32,348	5,199	—	69	69,812
55	3,544	51,705	16,871	44,873	12,7,926	30,517	3,604	—	34	94,588
56	4,906	89,961	15,340	52,778	91,663	22,432	9,381	—	14	111,540

資料說明：依據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臺北市志 交通篇》統計數字整理。

透過交通工具在各區之間的往來收送，因而在作家與編者、編者與印刷廠、以及印刷廠與書商之間，得以進行文化生產的聯繫，並成功支撐起基礎經濟支援與上層文化生產之間的網絡模式。文人作家們即使不出門，仍有許多收送稿件的人們，騎著腳踏車穿梭在各區之間，以協助文化生產的進行，據曾擔任社長的林良先生口述，早期專欄寫作都靠人工收發稿件與樣版，撰稿者多為居住於城南一帶的作家與大學教授，報社總是定期請工友騎著腳踏車，到編者與作者家中收稿，最遠及於溫州街一帶，³¹⁴ 夏祖麗女士也提及父親與母親收送稿件的情形：「有時

³¹³ Eagles, F. (1994),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New York : Haverster Wheatsheaf. p.194.

³¹⁴ 本段為研究者所進行之口述採訪，由林良先生本人口述早期國語日報如何在儉樸的環境中，用人工走訪於城南一帶，在編輯與作家之間進行收稿、審稿與送印出版的繫聯工作。

先交一半稿子給報社去排版，等另外一半完成後再請工友來收」。除了腳踏車以外，三輪車兼具運人和運貨的功能，在城南亦是重要的基礎運輸工具，何凡曾描述三輪車的多元功用：「公務員傍晚下班如擠不上公車，坐三輪車兜風，是很愉快的一件事。尤其是看見太太小姐坐漂亮的三輪車在大街上馳行，更有「油壁香車」的美感……三輪車有到處可行，價錢便宜和運人運貨兩相宜種種方便。尤其是坐三輪車買東西，一路上上下下，極為便利。此外送孩子上學，接「搭子」打牌，送客送信，無往不宜，「車頭」車夫並可代為看家。」³¹⁵透過這些便利的交通工具，文人作家可以愜意地在家裡寫稿、率性地在都市空間裡優遊自得，而報社與編輯、作家與讀者的文學繫聯，在城南蜿蜒的街巷中規律而沉靜地展開，文學的種子於是發芽茁壯，城南的文學風華，在戰後帶動了整個臺灣文學的發展。

促成文化生產基礎結構的印刷工業、交通運輸等技術能量，提供了文化上層結構的決定性之經濟基礎，使城南擁有足夠資源，參與並主導臺灣社會/政治/文化的過程。進一步從恩格斯的觀點來看，上層結構（制度、象徵化過程、文化）不僅是反映經濟所潛藏的決定性，更主動地參與社會與政治關係的形塑，因此，在研究城南成為文化核心區域時，應留意城南在從事文化表徵的過程中，與下層結構之間的溝通與交往，而透過交往的過程，經常亦是提供城南精英們進行文化思辨及建構自由思潮的能量。

二、城南知識分子的文化角色

另外，從知識分子的在城南空間的發言角色，我們可以發現，相較於其他地區，城南擁有較多的自由言論空間。一方面由於此區多為隨國民政府遷臺的外省籍公教菁英，族群的歷史認同較不會產生太多的歧異，對於統治者執行的各項國家任務不會有太多意識型態的交鋒，而造成黨國統治上的滯礙；另一方面，則是此區的高層文化現象，當上層階級擁有一定之禮遇與資產時，他們較不會選擇艱難危險與政府針峰對抗的方式，讓自己原本擁有的各項經濟、文化及社會資本，處於隨時可能被威脅的不安全感中。如同 Giddens 和 Faucult 所強調，在多數情況下，霸權概念與行為體和利益意念相關，執政者對於權力的操演，並不是在社會的各領域及各空間，皆以同樣的成本行使出同樣的制約程度，³¹⁶ 城南空間的住民階層的特殊性，使得執政者容易將更多的權力縫隙與利益回饋至人們身上，因而促使人們選擇較輕省、容易的社會競爭方式，即利用此一資本階級派系的霸權，來追求自身的美好生活。

然而，難道所有的知識菁英們，在戰後就因此全被當局所吸收或壓抑，而沒有真正的知識份子了嗎？當然絕非如此，戰後在島內的知識分子們，絕對有理解當前國家形勢的智識，並且他們亦非全然都向政權及利益靠攏。然而即使真正的知識份子仍然存在，從戰後從國民黨政府一連串的文化情治事件中，知識份子應

³¹⁵ 何凡，〈結束三輪時代〉，收入洪炎秋、何凡、子敏合著，《茶話》（臺北：國語日報社，1969），頁 39-51。

³¹⁶ Chris Barker 原著，吳沛嶸譯《文化研究核心議題與關鍵爭辯》（臺北：韋伯文化國際，2009），頁 84。

肩負的社會批判功能幾乎無力可施，即或是在城南居住了如此密集的高層文化人士，依然是無法擺脫當局對於文字書寫與思想言論的全面監控。

當然我們要留意的是，這裡所謂的真正的知識份子，不同於上一章所述，被執政當局所定義、普遍而廣大的一群。知識份子是非全屬個人、亦非全屬政治的，如同 Said 所述，個人的知識分子（a 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在的，因為一旦形諸文字並且發表，就已經進入了公共領域；然而，僅僅是公共的知識份子（a public intellectual），意即個人只是作為某個理念、運動或立場的傀儡、發言人或象徵，也是不存在的。³¹⁷ 真正的知識份子，除了具有自由思想與性靈，並願意將屬於私領域的文字書寫揭示於大眾，但他們具有的理念與思想，可以透過在公領域的組織體系來闡發，但卻不屬於任何一個公領域的政治團體所御用。1950 年代最著名、同樣也是在城南發行，當然且作者及編者群亦多於城南活動的《自由中國》文人群們，正是以這樣的社會角色，在 1950 年代的政治氛圍中肩負了知識份子的核心重任。

創辦雜誌的自由派菁英人士，如胡適、雷震、殷海光、杭立武、張佛泉、許孝炎等人，這些作家及思想家們，無論在當時的社會地位或文化階層，皆具有崇高的位置，加以胡適與雷震尤其與蔣介石總統親近，黨政關係良好，刊物籌辦之初，其「擁蔣主戰」之鮮明立場，受到總統的大力支持。《自由中國》的菁英們，從堅守自由民主思想的立場，而支持一個宣稱自由中國的政權，在彼此相和之下亦英雄相惜，除了胡適對於總統「知遇之恩」的回報之外，³¹⁸ 重要的是，他們期待著蔣介石統治下的中華民國能成為自由中國。³¹⁹

在《自由中國》初期，雷震曾將殷海光批評總統的稿子退回，認為「今日不能毀他，反共全靠他」。³²⁰ 但隨著執政者愈加極權，逐漸悖離自由中國之路，自由派知識份子於是在 1956 年 10 月的《自由中國》的蔣總統祝壽專號中，提出一系列的國是意見。當然這些言論不容於國民黨當局，因而遭到黨工文化系統的嚴厲圍剿，並扣以「散播共產毒素思想」的指控、接著當局接連以公權力禁止售賣、陳列該刊物，且對承印雜誌的印刷廠展開調查與施壓，即使在這樣的壓制與情治監控的環境下（按：根據本人採訪口述，當時積極查緝《自由中國》的情治單位首腦彭孟緝，其官舍亦在城南的同安街一帶），雷震等人依然積極而堅定地肩起了知識份子不畏政治勢力所屈服的社會責任，持續批評時勢，闡發民主自由論述。但至 1960 年底，雜誌仍是遭到雜誌停刊、雷震等人被判入獄的下場。³²¹

即使在城南的少數知識分子們意識到自己已身為社會金字塔的上層，應除了

³¹⁷ Edward W. Said 原著，單德興譯，《知識份子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頁 17。

³¹⁸ 陳儀深，〈胡適與蔣介石〉，收入周策縱等著，《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1991），頁 103。

³¹⁹ 胡適親自撰寫的〈自由中國的宗旨〉中，認為在反中共的鬥爭中，我們一定要戰勝民主自由的一邊，而言論自由的實行，可以讓我們站在民主自由世界毫無愧色。收入張忠棟，《胡適五論》（臺北：允晨，1987），頁 271。

³²⁰ 雷震，《雷集》第 32 冊，1950 年 6 月 21 日日記，頁 130。

³²¹ 軍事法庭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判處雷震十年徒刑。

要在私領域的專業裡堅持個人的感性、延續創作思想的文藝性靈之外，其實尚應堅守文人在社會中的清醒度，尤其不能忘記對於公共事務的批判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由於執政者透過城南地區，成功地施行文化霸權政治，使得大部分的知識精英們，無法全然發揮知識份子介入社會實踐的功效。

第二節 一間客廳，等於半個臺灣文壇

戒嚴時期的臺灣，是各報副刊主編得以掌握文化霸權、型塑社會價值的年代，林海音深知這一點，因而即使身處於政治意識型態遠高於文藝價值的戰後臺灣文壇，但其實自由思想與人文關懷才是她從事文學志業的信念，在其《純文學》發刊詞，即揭示了她擇稿的理念：「文學以外，不予考慮」³²²，並也曾說：「我寫東西從不『政治掛帥』，也不高喊『革命』」，³²³故即使在戰後臺灣的濃厚政治環境裡，她並未認真去馴服執政當局指導的文藝方向，而是將文學回歸於純然本體、獨立的場域裡經營，以開闊心胸和寬廣格局，鼓勵文壇創作人才。然而，在報禁、限張的年代，強勢副刊的主編雖然必須抵擋來自黨國體制的干預、壓力，但主控副刊的位置卻也使副刊主編在文學社群裡享有一定的影響力，因而在文學價值與官方壓力之間，林海音還是經常會擔憂自己對於文學開放自由的態度，會引起官方的關注，因而在拿捏尺度上的往復斟酌，亦使她經常感到焦慮：

在《聯副》的日子……時時感到職業的疲倦。好文章越來越多，我雖然謹慎小心，卻常常夜半驚醒，想起白天發的稿子，有何不妥嗎？錯字改了嗎？敏感感染了我，時常感到煩躁。³²⁴

文藝政策將文學引導為政治服務或實踐某種政治目的而創作，使許多文藝家對藝術價值認識不清，難以創作出好作品，甚至逐漸在官方論述之下，對文藝觀念產生了偏差，林海音當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盡力在她可以操控的副刊場域裡，以文學回歸文學本身價值的信念，默默地進行文學位置的微調，以平衡文化的主流勢力。這樣的策略究竟是成功的，從文學場域的概念來說，林海音以城南她的住處作為文化發跡的起點，一方面在城南網絡各文學社群及文藝家們，另一方面將戰後以文學社群為中心的各個文學場域一圈圈地聯繫、整合起來，不斷向外拓展，使臺灣文學自然而然地跨越地域、政治與族群的侷限，凸顯文學的內在價值。

應鳳凰者認為，林海音是臺灣文學歷史的一部分，是文學史的重要「文本」，我們不只閱讀她的作品，亦「閱讀林海音」。林海音的人際脈絡所串聯的文友交誼，可說是戰後 1950~1960 年代的臺灣文學作家概貌；而以其居所處之城南為地理中心所拓展出的人文活動，在戰後亦主導著臺灣文學的動態。³²⁵

³²² 〈做自己的事，出一臂之力——代發刊詞〉，《純文學》第 1 卷第 1 期（1967 年 1 月），頁 1。

³²³ 林海音，《生活者》（臺北：純文學，1994），頁 103。

³²⁴ 林海音，〈流水十年間〉，《芸窗夜讀》（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4），頁 308。

³²⁵ 本概念援用學者應鳳凰之論述，相關論文參照應鳳凰，〈林海音與臺灣文壇〉收入李瑞騰、夏

聯合副刊在戰後的文壇，起初並不是讀者最多的，當時的報紙，多由黨政系統所主攬，而副刊的主編，亦多黨政出身之文工人士，如《中央日報》副刊主編耿修業、孫如陵、《新生報》副刊主編馮放民、姚朋、《公論報》副刊主編王聿均、《民族晚報》副刊主編孫陵、《中華日報》副刊主編林適存等，這些報紙副刊的發行量和讀者人數，高於當時的《聯合報》副刊。³²⁶ 然而《聯副》在她的經營之下，改變了文壇生態，用 Bourdieu 的話來說，即是她成功地以一個社會施為者代表的角色，支配並且領導了文學場域。³²⁷ 從空間的角度來看，林海音和推行國語運動的夫婿何凡，與當時眾多居住於城南的純文學作家與國語運動人士們，也同樣頻繁活動於城南這個社會資本充裕的文化空間裡，因而更容易藉由文人交流、作品刊登及出版等社會關係的連結，聚合更多的文化資本，³²⁸ 林海音和何凡的好客和熱誠眾所皆知，他們熱情將位於城南重慶南路三段的自家，闢為開放性的藝文空間，讓文人經常有機會聚首交流。他們「溫暖的客廳永遠是開啟給朋友的」，像是「臺灣的半個文壇」³²⁹：

許多人說她家的客廳就是一半的臺灣文壇。我們都忘不了在夏家客廳高談闊論時，承楹先生（何凡）親自為我們泡茶的情景。……海音憑自己的頭腦和勤勞建立了那個時代女子少有的自己的華廈（不只是吳爾芙所說的「自己的屋子」）。寫必然傳世的小說，主編《聯合報》副刊，辦《純文學》雜誌，創立純文學出版社。³³⁰

林海音以自家的客廳、餐廳聯繫文壇族群，召國內外文壇菁英，投入純文學創作的陣營，並且在各文學集團的整合中，促使城南眾多具有影響力的作家們，彼此凝聚出文學的共識和文化選擇的認同，使純文學的意義與價值得以受到重視，而突破政治的氛圍，在城南另形成一股較為自由、包容的文壇主流勢力，而這股文壇勢力，更是超越了族群和地域，只要作家們願意，總是有辦法將他們聚合在一起：

林先生為人熱情俠義，樂於助人，喜愛朋友，若有文友從國外回來（也許是夏志清，也許是於梨華，也許是余光中，也許是楊牧，也許是鄭清

祖麗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2），頁 145-153。

³²⁶ 應鳳凰，《五〇年代臺灣文學論集——戰後第一個十年的臺灣文學生態》（高雄：春暉，2004），頁 151。

³²⁷ Patrice Bonnewitz 原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北：麥田，2002），頁 110。

³²⁸ 邱天助，〈再製理論的結構〉，《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臺北：桂冠，2004），頁 131。

³²⁹ 「當年的林先生家的客廳，就是臺灣文壇的一半」此句原出於作家隱地之口，之後成為文壇盛傳的佳言。隱地自小即在城南長大，且曾與林海音之子夏祖焯同窗，受教於夏家極深。本人在採訪隱地時，隱地特別述及他年輕時即常到林家作客的情形。隱地先生的成長故事，以及他在臺北城南生活與接觸文學的回憶，可參見隱地，《漲潮日》（臺北：爾雅，2002）。

³³⁰ 齊邦媛，〈失散——送海音〉，收入李瑞騰、夏祖麗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2），頁 6~7。

茂……），她總會為這些遠道回國的老友邀一些作家朋友聚聚，而相聚的朋友，總是由主客點名，主客想見誰，只要把名單開出來，林先生總有辦法將主客想見的朋友一一約到。³³¹

同樣住在城南，並於往後創辦「爾雅出版社」的作家及出版家隱地，也是林海音家中的常客，他回憶林海音家中那一個容納臺灣大半文壇的空間，「最初是靠近寧波西街的重慶南路三段的日式小屋裡，那小屋後來拆除改建成大樓，變成純文學出版社的辦公室」³³²，文學交流空間逐漸擴大，從日式小屋改建成了大樓，使得更多的文人得以在這裡出入往來，例如經常來訪的有：林文月、王文興、楊牧、殷允芃、黃春明、林懷民、高信疆、何懷碩、痖弦、林太乙、江玲、鍾玲、季季、羅門、蓉子、羅青、蔡文甫、鄭清文、喬志高、白先勇、張系國、琦君、子敏、游復熙、季光容、簡靜惠、齊邦媛。³³³ 不論是學者或創作者，也不論文學派別與年齡世代，總是有一群一群的作家，擁有豐厚文化資本的文藝界的大老們在這裡聚頭，偶爾也彼此相約在臺北各餐廳、咖啡館等空間裡聚會：

海音姐極熱心好客，她和夏承楹先生的家，常藉海內外文人的來往，便有大小的宴聚，儼然成為臺北藝文界的一處沙龍，我所尊敬的前輩作家如喬志高、殷張蘭熙、琦君和潘人木諸位，都是在那種場合中認得。其後，海音姐、Nancy（蘭熙的朋友都如此稱呼）、外文系齊邦媛教授與我四人，更經常相約，輪流作東，於臺北的各餐館、咖啡廳，忙中偷閒聚敘。³³⁴

其實，這個文壇所謂「沒有組織的組織」，是從 1953 年 12 月開始，一開始是每個月聚餐舉辦「慶生會」，輪到誰當壽星就不用出餐費，於是慶生會持續 30 年多年，之間從沒有休月過，成了臺灣文友圈維繫最久、最沒有組織的組織，有時候慶生會在作家家裡舉行（經常在城南同安街的劉彷家）、有時候在餐廳、有時候甚至在碧潭划船，聚會的人從不到十人，一直擴增到五十多人。³³⁵ 當然，這些作家們有目的的聚會也不侷限於慶生，偶爾他們也會主動將一些平日少出門、但總是創作相近主題的作家們聚合在一起吃飯、分享創作，譬如經常寫北平的幾個作家，如唐魯孫、白中錚、莊嚴、夏元瑜、包緝庭、郭立誠，在林海音和陳紀瑩的邀約下，在會賓樓也組織起來吃飯「聊大天兒」³³⁶，而熱情的林海音，總不忘在每次的聚會，為大家共同合影留念，她所累積的可觀人脈，幾乎像是典藏了當代文壇的影像資料庫：「我手邊的數十冊照片中，泰半以上是和文壇、文友有

³³¹ 隱地，〈到林先生家作客〉收入《漲潮日》（臺北：爾雅，2000 年），頁 207。

³³² 同上註，頁 209

³³³ 同上註，頁 208。

³³⁴ 林文月，〈兩代友情〉，收入夏祖麗編，《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序文（臺北：天下遠見，2000）。

³³⁵ 林海音，〈有組織的組織〉，《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 66。

³³⁶ 林海音，〈「聊大天兒」〉，《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 74。

關的」³³⁷，連作家們也懷念她總是不忘為大家留影紀念的時光：

到林先生家作客，除了談得快樂，吃得快樂，還有更令人難忘的是林先生的「無皺紋照片」，她會為朋友們三人一組、四人一組地拍照留念，拍過來拍過去，在笑聲中圓滿地留下全體合影。大概是作客後的第三四天，所有林先生的客人，都會一一收到照片——快樂地作客照片，背後還會註明時間、地點，讓人永遠懷念。³³⁸

這些文人圈的聚會模式，儘管組織起來的結構是鬆散的，但內在文化精神的理念與規範是一致的，他們願意進入此團體文化形式的認同程序，具共同理想但又自由表述，群體本身是寬泛的，有大致路向，但無具體目標，各自以其創作主體的生命型態輝映著文學群體的活力。這種溫馨而頻繁的文壇交流模式，對隱地的影響甚深，在1975年成立「爾雅出版社」後，也同時在廈門街編輯部旁的門市部，開放一處「文學沙龍」，「爾雅辦公室，有席慕蓉的畫，楚戈的字，和蔣勳的小品……廈門街一一三巷是一條美雅之巷，巷內還有雅趣之屋、雅趣之門以及雅趣之牆」³³⁹ 出版社經常舉辦小型文藝活動，同樣經常有文人門來此地泡咖啡、聊文學，因而作者、編者和出版者、閱讀者之間，透過文化空間的攏聚，形成一圈又一圈的文友圈，彼此維繫著深厚的交誼，並藉著友誼，擴大文化資本的交流。從城南地區的文人交往模式，更顯示了文學場域是作家、編者、出版者、論述者、閱讀者共同參與運作的成果，因而文學和文化生產網絡的彼此繫聯，也是促進臺灣文學和文化的重要一環。

應鳳凰引 Bourdieu 的場域（field）概念，來說明林海音從與文友交好，到突破禁忌、培植新人，她所勾勒出來的文壇風貌，一步步把政治性、商業性（對照於純文學）摒棄於文壇之外的社會過程，³⁴⁰ 意即「文化生產領域」即是由無數作家、作品、出版機構、各文學社團、協會等等不同「個體」或「位置」組織所成。這些「位置」彼此消長牽連，待此一領域逐漸成熟成形，就會逐漸產生出一套屬於自己領域的運作規則。換句話說，這一「領域」隨著時間成長，會愈來愈有主體性或自主性，領域外的因素與條件便愈來愈喪失影響力。³⁴¹ 從文學場域生成的脈絡來切入，有助我們延伸來探討城南的文化場域與社會資本之間的相互奧援，而臺北城南之所以能聚合出如此雄厚的純文學文化場域，其原因與當時臺灣整個文化界在此空間裡，所構合成一個龐大而強勢的社會資本網絡息息相關。

所謂社會資本，是人們藉著自身所佔據且持續的社會網路關係，所擁有的資源與財富，且特定行動者佔有的社會資本數量，是依據行動者可以有效地加以運

³³⁷ 林海音，〈從何說起〉，《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1。

³³⁸ 隱地，〈到林先生家作客〉收入《漲潮日》（臺北：爾雅，2000），頁208。

³³⁹ 隱地，《爾雅 30·30 爾雅紀念冊》（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頁137。

³⁴⁰ 應鳳凰，《五〇年代臺灣文學論集——戰後第一個十年的臺灣文學生態》（高雄：春暉，2004），頁153。

³⁴¹ 應鳳凰，《五〇年代臺灣文學論集——戰後第一個十年的臺灣文學生態》（高雄：春暉，2004），頁147。

用關係網絡規模的大小，依據與行動者有聯繫的個人其所佔有資本數量的多少而定。³⁴² 意即，社會資本是由社會關係所構成，為個人或群體在一個相對穩定且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化關係網絡中，所逐漸而形成的資源總和。³⁴³ 從場域的概念探討戰後臺灣文壇形成「文人圈」現象之研究途徑，有助於啓發本文繼續進一步深入指出，戰後文人圈形成所隱含的兩種面向：一是文人「圈」頻繁活動的空間位置，由於多發生於城南，在優渥空間資源的輔成之下，更強化了戰後文人們在社會資本上的累聚；二是文人們在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交互積累之下，更容易教育出優秀的下一代，而他們的下一代，不僅持續擁有主導臺灣文化資本的核心權力，同時這些成績優秀的子女們，更能順利地將志業擴展到各領域（藝術、教育政治、經濟、科學……），成為當代臺灣各學科領域的主導菁英。

城南地區的第一代文人，因文化區位及政策面擁有優勢的地位，因而在文化資本累積之後，構成一圈一圈的文人圈現象，而這種現象，就是一般所說文學人脈的累積，此一人際關係在制度化的網絡關係上逐步建立，不是靠親戚或血緣關係，而是存在特定的工作關係、群體關係和組織關係中，因而也是社會資本的累積。在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彼此增長之下，第一代文人將這些資本轉移、繼承或交由下一代持續累積，因而更增益了城南的文化主導權力，以及在各領域中的主導性。政策構築了城南空間，而城南空間醞釀了文化勢力，而此文化勢力又影響了整個臺灣社會，從城南的例子，我們持續證明了文化的力量，或者說，亦是文學的力量，對於整個人類社會文明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Robert Escarpit 認為，「文人圈」的概念和「大眾圈」相對立，文人圈聚集了絕大多數的作家們，而且吸收了從作家到大學文史研究員，從出版商到文學批評家等文學活動所有的參與人士，這些在文學界裡的人物全部都是文人，因而其文學活動又是在一個內部封閉的交流圈裡流轉運作；³⁴⁴ 而另一群佔大多數、廣大的「大眾圈」的讀者，他們所受的教育並不足以掌握理性判斷與詮釋能力，僅能粗具一些文學的鑑賞能力，他們的工作環境與生活條件並不利於進行閱讀或養成閱讀習慣，這些讀者有的是小資產階級人士，卻有更多是上班族、勞動者和農民，而他們所閱讀的，經常是銷售量佳的通俗文學作品與生活、消費雜誌³⁴⁵，而非文人圈裡被文人與文學批評家流傳的作品。從 Robert Escarpit 和 Bourdieu 的研究，我們知道在歐洲文學界的「文人圈」，形成一個內部封閉、品味較為高層的一個文化社群；而在戰後的臺灣社會，又因為政策、空間與族群的因素，「文人圈」不僅僅是一個不佔實體空間、只以想像社群的文化概念散佈在各主流文學媒介中，它是一個具有實際都市空間、被區分地域而圈劃出來的一個城南場域，因此，臺灣戰後的「文人圈」，其實亦可概括來說，是「在城南的文人圈」，它比歐洲社會中的文人圈，更具有框界性、階級性的精英化形象。

³⁴² 周新富，〈布爾迪厄再製理論的基本概念〉，《布爾迪厄論學校教育與文化再製》（臺北：心理出版，2005），頁 46。

³⁴³ 邱天助，〈再製理論的結構〉，《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臺北：桂冠，2004），頁 131。

³⁴⁴ Robert Escarpit 原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臺北：遠流，1990），頁 92。

³⁴⁵ Robert Escarpit 原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臺北：遠流，1990），頁 101-107。

也就是在此一空間特殊性之下，城南的眾多文人們，更容易分享及交換他們各自擁有的社會資本，以進一步累積出更多的資源。這些社會資本，包含彼此在文化位置上的晉升提拔、學業甫成、啓蒙指引，還有策略指導、有利消息預知，甚至於生活關照等等。我們可以從文本中，來分享文人們的生活記事，並發現他們是如何在彼此的照應之下，在日常交誼中連結起了一連串的社會網絡：

何凡因為和洪炎秋教授的關係，踏入了「國語日報」，³⁴⁶ 在「國語日報」任職時，和林良、劉玉琛、柯劍星熟識，因而常到彼此家裡玩：³⁴⁷

海音個性開朗隨和，與報社同事相處融洽，週末總有同事來家裡吃飯聊天。逢年過節，我們也會約一些離鄉背井的單身同事來家過節。當時國語推行委員會也設在植物園內，會裡的成員都是讀書人。³⁴⁸

此外，夏元瑜是何凡的中學、大學同學，初到臺灣時，原本住在新竹，在何凡的勸說之下，沒幾年也搬到了臺北，住入了城南；³⁴⁹ 林海音和文友們經常到城南安東街梁實秋家裡作客，³⁵⁰ 蘇雪林、張秀亞、琦君、郭良蕙、王琰如、艾雯、孟瑤、張漱菡、劉彷、鍾梅音，經常到中央日報副刊主編武月卿日式宿舍的家裡作客，林海音也是因為到武主編家裡作客，而在巷口第一次遇見作家琦君；³⁵¹ 中副主編孫如陵是武月卿政治作戰校的同學，並且住在同宿舍區，因而彼此經常往來，甚至生病時相互照料；³⁵² 中國文藝協會的張道藩、王藍等作家與大家熟識，³⁵³ 前輩作家徐訏只要依回臺灣，就會和文友通電話報到，大家分批和他約聚；³⁵⁴ 周夢蝶經常會到林海音的「純文學」出版社買書、而林海音也偶爾到武昌街的明星咖啡屋買蛋糕，順便見見在咖啡屋前擺書攤的周夢蝶。³⁵⁵ 琦君住在金華街，隱地也經常拜訪她的書房；³⁵⁶ 孟瑤的兒子要向師大楊希賢教授的女兒求婚時，也透過林海音充當媒人送訂婚禮。³⁵⁷ 余光中和何凡家也是離得很近：

夏家住在重慶南路三段十四巷一號，余家住在廈門街一一三巷八號，都在城南，甚至同屬古亭區。從我家步行去她家，越過汀洲街的小火車鐵軌，

³⁴⁶ 林海音，〈從一張書桌說起〉，《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4。

³⁴⁷ 林海音，〈漫寫林良老弟〉，《生活者》(臺北：純文學，1994)，頁83。

³⁴⁸ 李瑞騰、夏祖麗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2)，頁28。

³⁴⁹ 林海音，〈兩隻翠鳥〉，《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56。

³⁵⁰ 林海音，〈「雅舍」的主人〉，收入《生活者》(臺北：純文學，1994)，頁52。

³⁵¹ 林海音，〈一生兒愛好是天然〉，《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50。

³⁵² 林海音，〈當年一「抗議」〉，《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17。

³⁵³ 林海音，〈文藝鬥士張道藩〉，《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11。

³⁵⁴ 林海音，〈徐訏「筆端」下〉，《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38。

³⁵⁵ 林海音，〈默默的，燃燒著的灰燼〉，《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53。

³⁵⁶ 隱地編，〈琦君記憶裡有許多書房〉，《琦君的世界》(臺北：爾雅，1980)，頁65

³⁵⁷ 林海音，〈婆娑一嫋扮四郎〉，《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37。

沿街穿巷，不用十五分鐘就到了。³⁵⁸

余光中在聯副刊登了長篇的譯文和短篇的詩文，經常在晚間把續稿送到林海音家。夏天的晚上，林海音常會打電話邀余光中全家去夏府喝綠豆湯，夏家的大姐姐們也喜歡余光中的女兒們，有時還會帶她們到街邊「撈金魚」；³⁵⁹ 張道藩在城南的大宅院外的街燈下有一個大木水槽，晚飯後何凡一家和余光中一家大小經常會到這兒散步聚會，大人喝茶吃零食聊天，天南地北地聊了一個晚上，小孩則向大人要了小額錢幣，拿紙網子玩起撈魚的遊戲，偶爾街燈不亮了，只要張道藩夫人一通電話打到市府，馬上就有工人趕來修好。³⁶⁰ 夏家也和《自由中國》、《文星》、《文學雜誌》及藍星詩社等自由主義系統的知識份子精英們多有往來，³⁶¹ 當然也協助藍星詩社的文藝青年們出版「藍星叢書」；吳濁流先生在 1960 年代創辦《臺灣文藝》時期，從公家機關退休的他，也經常拜訪林海音和青年的文學界朋友們。³⁶²

余光中也不諱言地指出，當時臺北大半的文人都住在城南，他回憶光是在他家附近，就經常和作家們碰頭：

那時候臺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單說我們廈門街這條小巷子吧，曾經住過或是經常走過的作家，至少就幫包括潘壘、黃用、王文興與「藍星」眾多的詩人。巷腰曾經有新生報的宿舍，所以彭歌也常見出沒。巷底通到同安街，所以《文學雜誌》的劉守宜、吳魯芹、夏濟安也屢印交疊。所以海音也不時會走過這條巷子，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門口，來按電鈴。³⁶³

有趣的是，同樣住在城南的郭良蕙，她的《心鎖》1961 年出版的時候遭禁，就在她住家鄰近的中國文藝協會，煞有其事地開除她的會籍，然後隔了二十多年後，又煞有其事地恢復了她的會籍，無論是被禁或解禁，開除或恢復，郭良蕙從頭到尾都沒發聲過。³⁶⁴ 長年旅居海外的徐鐘珮，在 1950 年代其實也住在城南，並曾住在水源路川端橋附近日式房子裡，為川端橋的美景寫了一篇懷舊散文。
365

³⁵⁸ 李瑞騰、夏祖麗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2），頁 9。

³⁵⁹ 余光中，〈另一段城南舊事〉，收入李瑞騰、夏祖麗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2），頁 10-11。

³⁶⁰ 林海音，〈撈魚的日子〉，《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 76。

³⁶¹ 呂正惠，〈論林海音在《文學雜誌》上的創作——特約討論〉，收入李瑞騰、夏祖麗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2），頁 79。

³⁶² 林海音，〈鐵和血和淚鑄成的吳濁流〉，《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 92。

³⁶³ 余光中，〈另一段城南舊事〉，收入李瑞騰、夏祖麗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2），頁 10-11。

³⁶⁴ 林海音，〈從新潮到古董〉，《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 86。

³⁶⁵ 徐鍾珮，〈發現了川端橋〉，《我在臺北》（臺北：重光文藝，1951），頁 14-18。

第三節 文化扭轉：本省作家的語言困境與突破

戰後國民政府厲行國語政策，在光復後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即規定公開發表的報章雜誌不得以日文書寫，使得日治時期慣用日語的本省籍知識分子，因無法銜接這突來的語言轉換瓶頸，加以各方面因政治性政策造成的劣勢，使他們逐漸在文化界裡失去了發言的位置，而同時執政者厲行國語教育，以試圖在短時間內全面性地扭轉島內的語言符號系統。用 Wittgenstein 的話來說，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本省籍知識分子還來不及操演這一套令其甚感陌生的文化表意系統，就已先喪失了自我用以建構社會的語言工具。戰後語言環境的改變，使他們無法運用穩定而適切的詞彙，去描述他們認知經驗中的內在會話，因而他們只能從頭進行新文化的操演與學習，重新摸索並自我穩定這一套新的表意系統，以符合社會的過程。³⁶⁶ 在這樣的窘境之下，遑論文字書寫，連閱讀對於大部分的本省籍人士來說，都形成了極大的障礙。

政府當局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它被視為一種權力形式，並隨著運作於表意和文本層次的文化政治起舞，³⁶⁷ 因而透過一連串強制的國語政策，將日治時期本省人們慣用的日語和民間習用的方言，全面性地加以禁制及壓抑，並且藉由文化動員與教育傳播的途徑，將國語表意系統推向高層化，促使百姓們不論本省或外省人，無不以學習或教育出能操演一口流暢、捲舌的國語腔為模範。

在國民黨的強制語言政策下，國語成了知識分子們進入主流社會與文化系統中的初步入門工具，因而從日治時期歷經跨語一代的作家們，面臨如此一個歷史與語言錯位的大環境，大多被迫中輟創作而淡出文壇；而臺灣文學生產與消費的主流，於是漸漸由熟稔中文書寫系統的外省籍作家與中文讀者群所取代。在此情況之下，我們於是不能忽略林海音主持聯合報副刊（1953~1963）與「純文學」出版社（1968~1995）的時代，以及她提拔本省籍作家的貢獻。林海音的終身職業，與五十年來臺灣文壇的重要作家作品、文學生產與消費發生了密切關係，尤其注意的是，她提攜了許多本省籍創作者，³⁶⁸ 在那個報紙文化副刊掌握文學主流的時代裡，以身為一個主編的角色，堅守對創作者的真實性靈與文學內在價值的尊重。

林海音早年特殊生活經歷，加上臺籍籍貫，使其擁有開闊心胸與寬廣格局，超越省籍、地域的藩籬，並且更容易理解本省人所面臨的語言困境，因而在進行文學作品的鑑定時，較具有寬容、開闊的文學胸襟，來設身處地去理解本省作家的處境，而她也善用了文壇的位置，成功地在城南推動了純文學的力量，並影響

³⁶⁶ Wittgenstein,L. (1957)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p.117.

³⁶⁷ Chris Barker 著，吳沛嶸譯，《文化研究核心議題與關鍵爭辯》（臺北：韋伯國際文化，2009），頁 32。

³⁶⁸ 由於戰後初期，能以流利中文創作的本省作家不多，〈聯副〉最初無論是投稿、約稿，都是以外省籍文友居多，林海音主持聯副時，破例連載刊登了本省作家作品，引起文壇矚目，鼓舞了許多本土作家拾筆創作。如施翠峰、廖清秀、鍾肇政、文心、陳火泉、鄭清文、林鍾隆、鍾理和、張良澤、黃春明、七等生、林懷民等人，皆受林海音提攜。相關資料可參見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2000），頁 161-166

了戰後整個臺灣文壇，將臺灣文學拉至一個超越政治和族群議題的層級之上。戰後數十年間在國民黨政府的治理下，臺灣社會經常呈顯出「由宰制階層決定什麼是合法化的」³⁶⁹ 的情景，文化界尤其是如此，從報禁到書寫語言的強行限制，致使文壇不少有志之士受到壓抑。同樣從小受日本教育，也身為跨語一代作家的葉石濤在《臺灣文學史綱》中，即強烈地表達：

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的十年間，臺灣文學完全由來臺大陸作家所控制，臺灣作家的作品既少又水準不高……。這固然是省籍作家，面對了語文轉換的艱辛不容易運用中文寫作有關，但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政治彈壓，也造成了省籍作家的畏縮和退避……。(大陸)來臺的第一代作家包辦了作家、讀者及評論，在出版界樹立了清一色的需給體制，不容外人插進。³⁷⁰

在戰後初期，其實許多本省籍知識份子，對於祖國文化是抱持著熱烈興奮的態度，努力想去親近而學習的，林海音深知這一點，在她於「中國文藝協會」舉辦的研習營當中的演講，即認為戰後的臺灣文學，不應該被認為是「啓蒙」，而是「再出發」，她呼籲文壇應注意到日治時期這段歷史中臺灣亦有不少文學人才的實情，並且現身見證光復初期本省知識份子對於祖國文化的熱中與支持：

臺灣一光復，日據時期到祖國大陸去的臺灣同胞，尤其是文化界人士，也就急於要把祖國的文化恢復起來，帶回來」³⁷¹……

戰後初期，臺籍文化人士對祖國文化是以興奮的心情去熱烈迎接的……謝東閔先生、李萬居先生等日據時代返回祖國的前輩，返臺前夕，他們在一起，很興奮的談起各人返回故鄉的抱負。李萬居先生曾留法，也喜愛文學，他說他很想返臺辦報。³⁷²

本省文化人士李萬接辦了日治時代的《臺灣新報》，改名為《新生報》，成為戰後臺灣第一份報紙，起初報紙的內容為了提升臺灣人的閱讀能力，故中日文各半，但副刊卻是全中文版面，因而當時不闡中文書寫的臺籍作家，多只能在南部創辦、由龍瑛宗主編的《中華日報》副刊發表作品，可惜好景不常，1947年的光復節前夕，因國民政府嚴格執行全面中文書寫規定，臺灣報紙的日文版全面停止，使得眾多本省籍作家無法面臨突如而來的語言書寫轉換，因而停筆。

鍾肇政曾提及，他曾考上並就讀臺大中文系，但因為不闡全中文的學習環

³⁶⁹ 高宣揚，〈場域的象徵性〉，《布爾迪厄》(臺北：生智文化，2000)，頁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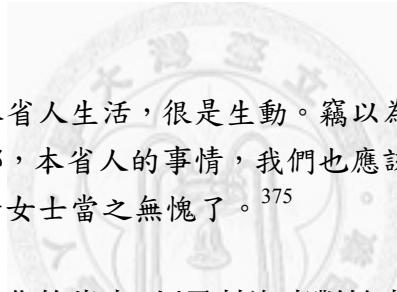
³⁷⁰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頁 86。

³⁷¹ 林海音，〈回顧臺灣文學的啓蒙與成長〉，《寫在風中》(臺北：純文學，1993)，頁 105。

³⁷² 林海音，〈回顧臺灣文學的啓蒙與成長〉，《寫在風中》(臺北：純文學，1993)，頁 105。

境，加上幾乎聽不懂教師上課的國語口音，因而中輟修業。³⁷³ 戰後跨語一代且多非為臺北圈的本省作家們常自嘲為「退稿專家」，經常面臨稿件到處被退的厄運，以及必須等待發掘、等待提供發表園地的困境。³⁷⁴ 身為主編的林海音，衷心地理解並同情本省作家在與境轉換上的困頓，一方面她尊敬以日文書寫作品的前輩作家，另一方面亦盡心提攜由日文轉換到中文一代作家，發掘了鍾理和、鍾肇政、鄭清文、陳若曦、七等生、黃春明、林懷民等省籍作家，並且亦鼓勵日治時代以後停筆的老作家再重新出發，例如鼓勵楊逵、鍾肇政、廖清秀、文心、陳火泉、施翠峰等前輩復出創作。同時，她也對同樣居住在城南的本省籍作家吳濁流，以及他所創辦的《臺灣文藝》雜誌，也竭盡其力地支持，1964 年吳濁流創辦此刊物時，幾乎每一期都看得見她的文章、1969 年「吳濁流文學獎」創辦時，林海音亦呼籲大家拿出行動支持基金會。

從城南的文化空間角度來看，不僅僅是林海音一人，許多學院裡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們，對於本省人及臺灣鄉土的議題，亦是竭盡支持與鼓勵的，例如在 1950 年代滿是外省人懷鄉論述的時代裡，夏濟安看到林海音發表一篇以本省人生活為題的短篇小說《要喝冰水嗎？》，因而寫信給林海音，鼓勵並且肯定外省作家從事關懷本省人的創作：


.....這篇小說寫本省人生活，很是生動。竊以為這條路大可走得。我們外省人雖然懷念故鄉，本省人的事情，我們也應該寫。小說家應該有廣大的同情，這一點海音女士當之無愧了。³⁷⁵

從學院派對於本省文化的肯定，以及林海音對於本省籍作家方面的提拔與支持中，我們可以理解的是，城南的文化空間，一方面隱含著高度政治支配勢力；另一方面也蘊藏著思想自由的文化因子，亦即在城南的場域裡，即使各文化群體之間保持良好的互動與密切關聯，但其實內在隱藏著宰制者及被宰制者、保守或顛覆的鬥爭及再生產機制。換句話說，城南文化空間是一個自主性的有機文化體系，在這個文化主導系統裡，不存在恆久而固定的最高文化指導方向，而文人們的主體性和文化認同，也非永恆不變；反之，它是一種依社會和環境而有所變異，一個以人文價值為核心概念，且可塑、可變化之文化的「決定」(all the way down)。³⁷⁶ 身為一個文化人，不論是學院裡的學者，或是民間出版界的專家，對於作者的禮遇、對文學的尊重與文化的重視，皆是應有的胸襟與風範。跨語一代的作家們，即使有中文書寫表達上的瑕疪，但一個文化主導者對於這些作品背景的理解與包容，以及堅持回歸文學純然本體、獨立特性，不願文學受政治糾葛

³⁷³ 鍾肇政，〈殘兵乎 敗卒乎——我的青春夢碎記〉，收入柯慶明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頁 10-14。

³⁷⁴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2000)，頁 150。

³⁷⁵ 林海音，〈小說家應有廣大的同情〉，《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頁 88。

³⁷⁶ Hell,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Community,Culture,Difference.* London:Lawrence&Wishart.

纏繞的立場，確實豐富了戰後臺灣文學的面向。在城南為文學默默耕耘的林海音「不曾與作家鬧過不愉快的事」³⁷⁷，本省作家的作品「常常寄來雋永的散文……文字也是從日文跳過來的，尚不能達到流暢的地步」，但是林海音總是能欣賞他們：「我很喜歡，總是細心的把文字整理好給他發表。」³⁷⁸ 許多作家們懷念那一個編者、作家與知識分子之間都保有真純至情的時光，尤其是城南空間所孕育的文友圈，在戰後文化界單純而無利欲紛爭的時代裡，不論本省或外省作家，文友們彼此都能誠摯以對：

所謂來者不拒，那個年代，尚未爆發鄉土文學之爭，作家和作家之間，識與不識，都親得不得了，老作家和年輕作家，男作家和女作家，本省作家和外省作家……全部都像一家人，見了面有說不完的話，就算不愛說話的，只要到了林先生家作客，也會變得話多起來，有時候大家還搶著說話，笑聲穿插其間。³⁷⁹

城南的有機文化空間，是文人與知識菁英們嚮往的地方，而文友圈之間的殷勤往來與密切的文學交流，使本省作家精英們，也紛紛選擇定居於城南，例如鄭清文、吳濁流先生，他們在居住於城南後，也經常和林海音及文友們往來。文人對於城南空間的文化共識，透過身體的經驗、居住的體驗與日常生活的交流，逐漸產生了彼此共享的地方認同感。

在城南，把作家多元、豐富而自由的思想，和作家的潛在群眾僅僅聯繫起來的，便是文化素養、認知以及語言上的共性。擔任國語日報主編的林良重視語言對於文學的重要性，並認為作家仰賴語言而存在：

文學作品是某一個時代某一個人「活在語言文字上」所留下來的東西。要緊的是那個「活」字。活著，就是存在。一個作家，就是仗著語言文字使自己存在的人。作家仰賴語言文字，就像靈魂仰賴軀殼，他沒有它，就「不存在」了。³⁸⁰

從文化治理的視角來看，執政者政策上的語言厲行措施，應理解是一個行使文化霸權的必然過程，確實一個集群內部若缺少共同的語言，等於缺少共同的表達方式來充分陳述內在的認知，因而對於文化的決定、選擇與理解容易產生溝通滯礙，使作家在語彙系統的反覆鬥爭、顛覆、以及相互宰制與被宰制之中，更加造成文化體系內紊亂的語言錯位，而喪失對於文學本身的藝術與人文核心價值的判斷標準。戰後在城南的文化空間裡，一方面以「國語日報」及師範大學國語文教

³⁷⁷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2000)。

³⁷⁸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2000)，頁 96。

³⁷⁹ 隱地，《漲潮日》(臺北：爾雅，2002)，頁 208。

³⁸⁰ 子敏，〈我的作家論〉，收入洪炎秋、何凡、子敏合著，《茶話》(臺北：國語日報社，1969)，頁 227-228。

育作為國語教學體系的中心；另一方面以報紙副刊作為國語教育的傳播媒介，值得關注的是，城南文化空間在國語教育與中文書寫文化場域的影響，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當然城南的文化人，尤其是何凡與林海音夫妻在文化圈的影響與領導地位，更是功不可沒。

第四節 以文化資本所涵養之城南菁英世代

在臺灣，教育除了本身被認為是有價值的文化資本財之外，尚被視為是個人取得職業地位最重要的機制，換句話說，不僅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提升個人的社會地位，同時不論出身背景如何，憑藉著自己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每個人都可以在執業階層的結構裡爭取一席之地，並且力爭上游。³⁸¹ 這表示了現代社會重視普同化價值，同時也顯示出教育價值的普同性，此現象在一般現代社會國家這亦是普遍的情形，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³⁸² Bourdieu 以法國的文化菁英世代作為研究對象，所提出之「社會空間」的論述，可提供我們理解社會位置之間的關係面向，即每個人或社群，都被局限在一個空間的特定位置與階級裡，而這社會位置的分配，則依其擁有的資本總量，以及資本結構來決定。³⁸³ 當然所謂的資本，包含經濟、文化、社會與象徵資本，這些資本的累積，需要透過投資的過程，並亦可繼承和移轉。臺北城南的社會空間，由於人口結構與政策因素，使它成為一個累聚高度資本，並且成為資本宰制階層的地區。

從 Bourdieu 的觀點來看，社會空間分為三個階層，首先是宰制階層，其成員擁有相當多的資本，並且常能同時累積不同的資本；其中此階層中的主流派，掌握經濟資本的優勢，而非主流派則是掌握文化資本。這些階層，戰後的臺灣文化現況來說，就是主導文化政策的官員、工商及文教大企業老闆、大學教授、出身名校的各部門高級主管；第二個階層則為小資產階級，其成員在社會中佔有一個中間的位置，但都想往社會上層爬，他們文化上欠缺資產階級的自主性，但卻十分由衷地遵守既有的社會秩序，並且在文化上試著不落人後，積極模仿宰制階層的文化，這些階層的人們，在戰後城南尤其眾多，包括基層及中階公務人員、中小學教師、文藝工作者、文化界人士、新聞工作者、年輕的知識份子和技術人員等；第三個階層則為普羅無產階級，他們不管以什麼方式存在，其共同點就是沒有任何資本，並且在文化上需要接受宰制，戰後二十幾年的臺灣，這些人就是我們習慣稱的廣大臺灣百姓們，還有（大部分居住在城南以外，以及臺北市區以外）勞工及農民們。³⁸⁴

³⁸¹ 蔡淑鈴，〈職業地位結構——臺灣地區的變遷研究〉，收入瞿海源、張英華編，《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臺北：中研院民族所，1986），頁 299-351。

³⁸² Wang, Charlotte Shiang-Yun, (1980)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Papers in Social Sciences* 80:3, The Institute of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cademia Sinica.

³⁸³ Patrice Bonnewina 原著，孫智綺譯，〈對社會的空間概念：空間及場域〉，《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北：麥田，2002），頁 70~96。

³⁸⁴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by Nice, 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趙蕙鈴，〈布狄厄論「文化資本」的再生結構—文化區辨與社會區辨的社會結構過程〉，收入《思與言》1995，22：1，頁 161-184。

城南空間在各方奧援之中，除了透過文人圈內彼此之間良性的人際關係，構築出一個除了文化場域以外，同樣在各精英領域皆擁有優勢主導地位的主流場域。因而研究戰後臺灣文學場域中文人圈的形成，以及圈內彼此之間的人際關係，有助於使我們更清楚了解，城南的文化場域，不是僅僅主導了一時代的文學主流，它更擴大影響了下一代的精英，並且，這些文人所教育出的下一代，又在當代臺灣各領域中佔有重要的主導位置。

城南空間在各方面的文化優勢，使區內的人們得以彼此累積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源，而使這些人的文化教育與文藝素養，經常處於全民文化金字塔的上層，他們重視教育、並且有足夠的經濟餘裕持續這種文化與社會資本，並傳襲給下一代，尤其在城南，具有高度的空間資本，於是越來越多各領域的菁英，以及他們的下一代群聚於此，並且掌握了整個社會與國家的重要資源。此外，不只文學領域，甚至在各領域中的上層菁英，經常與城南的人事物有著深厚的關聯，並且許多社會的高階份子及文學家，其父母多為基層或高級公務員、藝文及文化界人士，甚至大學教授，因而城南此一空間，在戰後數十年間，呈顯出一個幾乎涵括各個工商文教領域的菁英份子之情形。例如和林海音交遊甚篤的臺大中文系林文月教授，如眾人所熟知的，是連戰的表姐，而連戰之妻方瑀也學歷傲人，亦曾身兼作家，當然他們都出身書香名門世家；此外，同樣住在城南、與林海音為莫逆之交的沈櫻，則與中國當代名詩人梁宗岱結婚，其兒女學業成就亦高，大學畢業後皆赴美留學，其長女梁思薇留美期間認識了齊錫生（後來成為政治學家）並互結連理，而齊錫生又是連戰的大學同學；³⁸⁵ 余光中的四個女兒亦學業有成，出國留學後在世界各地任職，因而有「日不落家」之譽；同樣住在城南、曾任中央日報社社長的作家彭歌，他的兩個兒子，老大從清大物理畢業後留美深造、老二畢業於臺大中文系；³⁸⁶ 擔任基層公務員、亦居於城南的作家鮑曉輝，兒女們也都受了高等教育、留美深造³⁸⁷……這樣的情況不勝枚舉，城南第一代作家們，在文學作品中透露出對下一代子女教育有成，而感到滿足與欣慰的文本亦俯拾即是。我們從這裡可以明顯看到了文化資本造就更多總體資本的現象。

值得留意的是，外省人對於文化和教育的重視，尤其從城南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菁英階層們如何從社會資本，進而累積文藝和國語教育的文化資本，而這些資本使他們在教育下一代時，擁有更多的知識經濟資本，唸優秀的學校、進大學、或出國留學，進而在各領域中更加傑出，形成主導臺灣的經濟資本的情況：

《國語日報》的宿舍圈子是在重慶南路三段及和平西路一帶，所以大家又都是街坊。孩子們漸漸長大了，各個進國語實小幼稚園、實小、建中、一女中、中山女中、市女中等校唸書。雖然孩子們的年齡有差別，可也分大小玩到一起。孩子們又都各個兒大學畢業出去留學，後出去的先找

³⁸⁵ 沈櫻，《春的聲音》（臺北：純文學，1986），頁131-191。

³⁸⁶ 夏祖麗編，〈愛書的人——彭歌訪問記〉，《握筆的人》（臺北：純文學，1977），頁101。

³⁸⁷ 鮑曉輝，〈公務員之家〉，《故鄉水》（臺北：道聲，1987），頁98。

哥哥姊姊，如林良的大女兒到美國找我的大女兒，而我的兒女們出國也和前《國語日報》副社長王康壽的兩兒正中和正方不斷來往（現在王正中是中研院的院士，正方也是大導演）。現在林良的老二也到澳洲去留學了。³⁸⁸

在城南第一代的文友圈，從社會網絡的一般基層到最高階層，都以其豐富的文化資本，成功都造就了下一代更豐厚的經濟/社會/象徵資本。他們的子女多學業有成，並多唸名校、求學之途亦多順利地從大學畢業、或留學深造，這些文人們優秀的下一代，不論在政治、文化、經濟或科學等領域中，在當代皆佔了高層的支配位置。因而當我們在說城南像一個臺灣文學大樹³⁸⁹ 的時候，也可以這麼說，城南亦是一個具有龐大規模的社會資本網絡樹。

臺灣社會學的研究亦指出父母的教育直接影響子女的教育成就的現象，以及教育成就對於職業地位取得的影響：包括最初進入勞動市場時所取得的第一個職業地位與目前的職業地位，以及進入勞動市場後，目前的職業地位直接受到第一個職業地位的影響。³⁹⁰ 而研究結果指出，差異性之教育成就，在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呈現明顯的差別³⁹¹。不論性別、年齡或社區類型，外省人的教育程度平均高於本省人；父母的教育程度愈高，子女的教育程度也愈高，並且平均教育程度的高低次序，大多是都市高於城鎮、城鎮高於鄉村，在都市與城鎮裡；不論男性或女性，外省人之平均教育程度皆高於其他人，其中男性外省人中，教育變異量較大，此乃不少外省人男性擔任基層士兵之故，但不論社區類型與年齡，皆以外省籍之平均教育程度為最高。³⁹² 從城南文化空間的優勢來說，即城南多數的公教人員及文人作家們，在此一文化及教育氛圍濃厚的都市空間中，競相選擇了對下一代盡其所能的文化及教育投資策略，這對於子女未來的生涯發展具有極為正面的意義。

文化資本的習得，與每個人的出生背景有著緊密的聯結，天生的文化資本的取得端賴社會階級的傳承，這種起跑點的先天條件的不平等，導致每個人後天擁有的文化資本不平等。意即，出身不同社會階級的子女，在文化資本的累積過程中，是處於一種後天性的社會建構過程，也就是子女所接受的文藝品味、人文素

³⁸⁸ 林海音，《生活者》（臺北：純文學，1994），頁 85。

³⁸⁹ 此乃引用隱地為爾雅成立二十周年所寫，他說文人之間所串起的文壇，就像一顆大樹一樣，為文學開花結果。參見隱地，《文學樹》（臺北：爾雅）1995 年。

³⁹⁰ Treiman, Donald 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蔡淑鈴，〈社會地位取得：山地、閩客及外省之比較〉，收入楊國樞、瞿海源主編，《變遷中的臺灣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1988），頁 1-44。

³⁹¹ 例如駱明慶即明確指出外省人在成為臺大學生上擁有優勢，城南所在之大安區也為全臺灣最易考上臺大之分區；研究結論指出，教育成就不僅受性別差異之影響，省籍差異亦是另一主要影響因素。參見駱明慶〈誰是臺大學生？—性別、省籍及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2002.03)，頁 113-147；駱明慶〈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29:2(2001.06)，頁 117-152。

³⁹² 蔡淑鈴，〈社會地位取得：山地、閩客及外省之比較〉，收入楊國樞、瞿海源主編，《變遷中的臺灣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1988），頁 1-44。

養等薰陶，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後天受到社會性建構過程的影響。³⁹³ 換言之，資本界定了人們生活的可能性和機遇，更重要的是，它被用來再生產階級分化。文化世界的運作與社會階級的階層結構有關，而且文化世界本身也是階層式的、同時也持續不斷地階層化。文化資本的獲得、累積與傳承有其特徵與過程，欲獲取文化資本需要經濟資本（如金錢），愈是有餘裕的家庭就愈有機會進行文化資本的積累，而文化資本愈多則愈能得到社會的認可與敬重等象徵性利益。

儘管如一般所認為，外省人平均教育程度較高，所從事的職業也有較高的聲望，當然我們不能將外省人當成一個同質的團體，其中有教育程度較高的公教人員，也有一群教育程度偏低的軍人，但整體來說，在來臺的第一代中，外省人所擁有之文化資本及社會地位有普遍較高的現象，而從此現象來思考城南文化空間，確實文化圈存在著 Robert Escarpit 所謂「世代同儕」與「班底」的世代群體，³⁹⁴ 在各個語言的文學領域中，作家們的出生年代往往叢聚在某一些時期，所謂的班底，就是指包含了所有年齡層的作家群，他們在一個時代把持了文學場域，並且，在他們老化之後，會造就另一批年輕的班底，而這種局勢每每與政治情勢的緩和相呼應。作家們多群聚於都市，並且多受大學院校的影響，常群聚於大學區域，或者都會中樞區域，而臺北城南，一個以文化場域聚集的龐大文學班底，於是在戰後深刻影響著臺灣文學的發展。



³⁹³ 趙蕙鈴，〈布狄厄論「文化資本」的再生結構－文化區辨與社會區辨的社會結構過程〉，收入《思與言》22:1 (1995)，頁 161-184。

³⁹⁴ Robert Escarpit 原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臺北：遠流，1990)，頁 52。

第七章 戰後文化主導場域之形成（三）：大學與教育

第一節 政治／經濟操作下的文化主導場域

儘管從各項研究顯示，戰後的臺北，呈顯出明顯的區域差異，其差異特徵經常沿著本省人／外省人、巨商／貧民、純粹住宅區／中心商業區／行政區等差異，在空間上對比並區隔開來。³⁹⁵ 例如愛國東路與金華路之間、南昌街、泉州街、廈門街附近等日式高級住宅區，以及經濟活動頻繁的仁愛路一段與信義路一二段之間、中山北路北段、新生北路以東至復興北路之間的新興住宅區，是臺北市住宅區中人口密度較低、且多富商巨閥以及高級公教職員的住宅區，出入有小汽車；反之臺北西南郊沿淡水河邊往北一帶，多為本省人密集居住之地，房屋簡陋，道路狹小而汙濁，為貧民之集中區。³⁹⁶ 固然我們可以透過二元對立的方式，從臺北城市的分區域差異的比較，來檢視空間資源分配的不平均，或者以此結果來進行政策與社會批判，當然我們因此得到了一個普世性的結論：誰掌握了城市政治，誰就擁有都市治理決策的權力，而這權力的執行，亦是使都市各區資源分配不平均的主因。

然而我們原本即須理解的是，在現代國家中，原本都市政治即和國家權力的接合密切相關，一個城市不可能被平面化地被純粹視為一個文本看待，當然亦不能鐵板一塊地將一個城市的總和資本，當作皆可平均分配在所有的區域之中。因此，研究城市空間的歷時性差異，除了有助於我們理解國家政治力量的行使之外，最重要的，若再深入透過人文活動的對照檢視，還能進一步發現其間易被忽視的文化力量的行使過程，以及都市經過資源分配之後，所產生的在地性文化差異感。從 Simon Parker 的「都市政治」概念我們可以理解的是，都市是個空間和文化的範疇，包含且壓縮了國家權力的每一項表現。³⁹⁷ 即使是有清楚界限、完整行政劃的人口密集城市，在政治和經濟上亦不見得整合一致，而造成都市核心—邊緣的區分，而這種區分所形成的人文差異，以及因文化差異所塑成的區域性格，即為本文較為關注的範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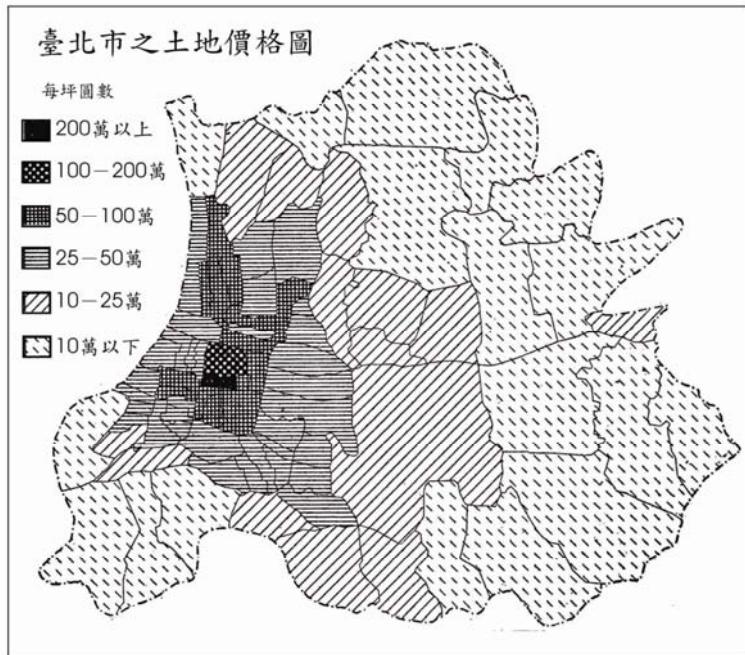
綜觀而論，戰後國民政府其實有效地透過都市政權，使臺北整體經濟價值提升，當然此一做法雖造成資源分配的極量化，但對於執政者而言，它最終仍達到經濟與資本擴張的都市發展目標。政府藉由**菁英主義的都市權力**，鼓勵官方與民間企業聯手進行都市更新，並大量吸引企業和地產資本的投入，使都市**有政策／目的性地**被開發、被市場重新定價，並因此成功促進城市整體地價之提升和經濟之繁榮。基本上，戰後國民政府透過各種官方及民間機構，以多種正式與非正式的途徑，確保了在空間決策上的權力，如同 Clarence Stone 對於都市政權的定義，

³⁹⁵ 曾旭正，《戰後臺北的都市過程與都市意識形構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 146。

³⁹⁶ 陳正祥，《臺灣地誌 上冊》（臺北：南天，1993），頁 310。

³⁹⁷ Simon Parker 著，王志弘、徐苔玲合譯，《遇見都市：理論與經驗》（臺北：群學，2007），頁 176。

認為它是「一個非正式但相對穩定的團體，能夠取用制度性資源，並藉此得以在政治決策上維持一定角色」。³⁹⁸ 全球經濟早已在資訊科技的支援下，更進一步地穿透各個社會，然而，區域不均等發展的趨勢也更為明顯。而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 則是全球經濟決策網路(network)的權力中心，是財富積累與資訊生產的基地。我們先從以下的地價分析，來判讀戰後臺北都市各區價值分別成長，以及都市如何在經濟資本增長中，逐步拓展的情形。下圖為臺北市戰後初期的臺北市地價分布圖：



圖片來源：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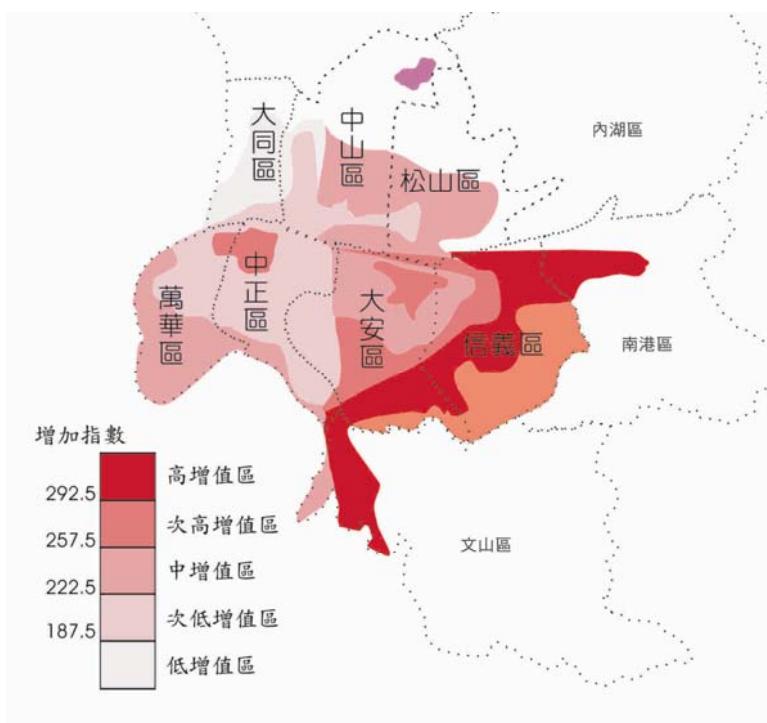
從圖中可知，戰後初期的臺北市地價，與日治時期的土地規劃結果相符，即地價最高為日本人規劃經營的商業區，如榮町（今衡陽路一帶）、京町（今博愛路北段）等地，其次為行政區所在的文武町（今公園路一帶）、書院町（今貴陽街一帶）。而本省人聚集的太平町、永樂町，在當時的地價，高於外省人居住的古亭町及大安一帶，甚至已漸進沒落的艋舺各區中的入船町、龍山寺町等區地價，亦與古亭町、千歲町等外省住民為主的文教區地價相當，且這些地區之地價，仍遠高於大安區。在戰後初期，臺北市的地價，主要仍以政經中樞區位及具商業經營價值為高價區位，顯示當時仍主要以政治導向與基礎經濟需求做為定價標的，而非是以高居住品質或文教生活環境做為首選。³⁹⁹

然而至 1970 年代，臺北市整體土地價格逐步攀升，尤其中正區古亭、大安

³⁹⁸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1993)。

³⁹⁹ 當然這期間所關連的因素極為複雜，包含執政者的都市規劃政策，以及族群差異問題，例如許多日式高居住品質區皆列為政府所收管，一般人民無法於此進行土地買賣與競價；以及本省人與外省人居住區之區隔，造成本省人不易進入外省人住宅區買售房地等因素，然此議題不為本論文之主要討論焦點，故僅略加說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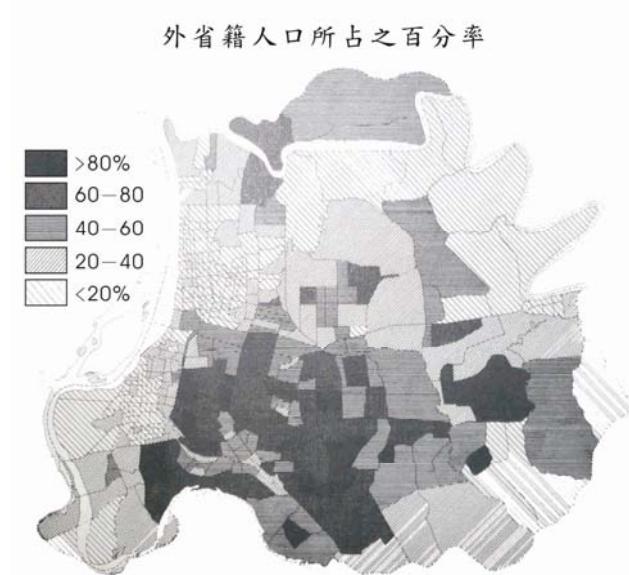
區、信義區一帶的地價漲昇情形特別顯著，從（圖）可見，⁴⁰⁰



圖片說明：依據周偉民，《臺北市房價的空間結構》（1985）p.29 圖面重繪並著色。

此現象顯示之成因有二，一為原本由日本人經營規劃的居住區，其經濟區位及生活品質較本省人活動區域為佳，故在長期區位競爭之下，以外省人為主的生活圈，較具競爭力而佔有地價優勢；二為在日本殖民政策，以及戰後國民政府市政施政與文化權力主導之下，將整個臺北都市的核心區，包含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區位優勢，移轉至外省人較為頻繁活動的區域。再比較兩幅戰後臺北市人口分佈圖，可以更清楚地呈顯上述所說，即族群區位與房地價值之間的關聯性：戰後本省人與外省人分布區，顯現出兩個分立的世界，而再將外省人分布區，與臺北市未來三十年內之房價漲昇情形彼此對照之下，呈顯出外省人地區房地價格較具潛在優勢的狀況：

⁴⁰⁰ 參見周偉民，《臺北市房價的空間結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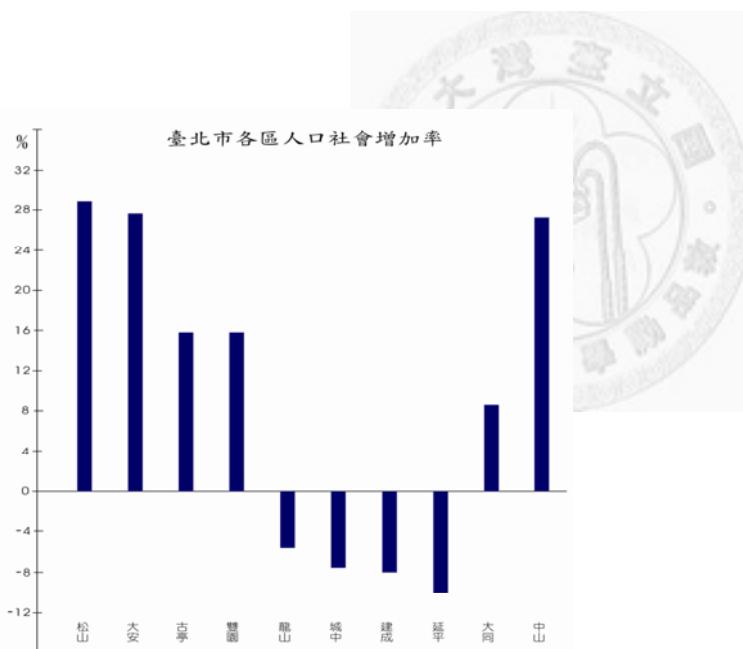


圖片來源：陳正祥，《臺灣的人口》。臺北：南天，1997。

觀察地價最為高漲的區段，約為今中正區古亭、大安區、信義區一帶，此為臺北市在戰後政策性發展而新形成的都市中心區，這些原本為臺北城區的邊區，尤其是城南公館一帶及東南大片區域，因政策性地分別成為文教區及經濟貿易區，因而在 1960 年代以後，快速地發展起來；同時原本在日治時代本省人居住密集的舊城區，發展相對遲緩，逐漸形成人口外移，某些區域如大同區、萬華區，甚至有逆城市化 (counter-urbanization) 的現象。⁴⁰¹ 從下頁圖表中可知，從戰後開始，除了城中區有大量外移人口之外，舊城區如艋舺的龍山區、大稻埕內的建成及延平區，即有人口逐漸外移的現象，城中區之外移人口主要為政治與軍事上的考量，為政策性遷出人口；至於舊城區的外移人口，則為自發性之社會遷出狀況，顯示舊市區人口已過度稠密，居住條件較不佳，而逐漸產生外移人潮；反之，較多外省人居住的大安、古亭、中山、松山等區，對外明顯有人口吸收作用，因而遷入人較多。

⁴⁰¹ 逆城市化危現象為人口從大都市居住區向外離心擴散之現象，此情況尤其是大都市區內較老舊的區域會發生，為人口向外流動的淨遷移情形。當然亦有此一說，即逆城市化不意味著國家城市化水準的下降，它只導致城市發展新的區域再分配，它是人們對居住環境偏好變化、交通通訊高度發達、生產地理格局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分區名稱	1954~1958 年五年平均遷出與遷入人口差數 ⁴⁰²	1951~1967 年十七年來人口佔全市總社會增加數 ⁴⁰³
原屬城內及城南地區	大安區	5,177	27.7%
	城中區	-1,662	-6.2%
	古亭區	2,031	15.5%
大部分區域原屬艋舺地區	龍山區	-921	-5.2%
	雙園區	22,44	16.0%
大部分區域原屬大稻埕地區	大同區	2,122	9.9%
	建成區	-1,354	-6.6%
	延平區	-1,261	-8.8%
新興區	中山區	4,029	28.4%
	松山區	2,234	29.3%



資料說明：以上皆根據臺北市文獻會編，《臺北市志 人口篇》提供之數據製作而成。

⁴⁰² 各區遷入人口-遷出人口的數據。在 1954~1958 五年之間，每年從市外遷入臺北市之人口，平均約為 7 萬人，其嵌入率為 101.6‰；同時從臺北市遷出者亦約達 6 萬人，遷出率為 86‰；遷入與遷出約達 1 萬人。資料來源：陳正祥、孫得雄、蔡曉耕著，《臺灣的人口》(臺北：南天，1997)，頁 36。

⁴⁰³ 據王月鏡主修《臺北市誌 卷四 人口志》製表，(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 165~163。

第二節 空間就是權力：臺北「文教區」的成形

日治時代，因殖民政策與社會的變遷，使得臺北各區呈顯出迥異的區域特質，各區由於歷史與文化的推進，而逐漸呈顯出特殊的「區域性格」，黃得時在戰後初期即指出，日治時期的艋舺具有政治性格，大龍峒具有學者性格，而大稻埕具有實業性格。⁴⁰⁴ 而戰後的臺北，持續在國家力量的支配與政策的控制之下，各區基本上仍維持日治時代以來的區域發展模式，各自形塑其地方特質。從 1966 年《臺北市誌》的各分區調查資料中，可發現以下三點現象值得探討：一、舊本省人居住區，住民教育水準偏低、外移人口偏高；二、城中及文教區的人口比例，以外省人居多，住民教育水準偏高、人口移入情形顯著；三、隨都市之擴張，都市邊緣區因政策性之人口移入，青年層人口比例大，且住民教育程度因之而提昇。

下圖為臺北各分區的人口教育程度比例，外省籍人口比率高的區域，如城內、城南、新興地區，居民教育水準偏高；反之本省人所在的舊城區，受教率普遍偏低。

	分區名稱	本籍人口比例	本省他縣市移入人口比例	本籍及本省籍人口比例合計	外省籍人口比例	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之人口比例	教育程度為高中學歷之人口比例	高中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合計
城內及城南地區	大安區	17.41	15.42	32.83	67.17	15.11	13.24	28.35
	城中區	21.70	27.99	49.69	50.31	8.75	14.13	22.88
	古亭區	20.20	25.27	45.67	54.53	8.28	9.73	18.01
原艋舺地區	龍山區	58.54	21.85	80.39	19.61	3.20	7.80	11.00
	雙園區	47.85	33.94	81.79	18.21	1.71	4.44	6.15
原大稻埕地區	大同區	62.21	21.40	83.61	16.39	2.08	5.80	7.88
	建成區	64.08	25.07	89.15	10.85	2.66	7.73	10.39
	延平區	60.44	23.79	84.23	15.76	2.98	8.33	11.31
新興區	中山區	35.68	25.57	61.25	38.74	7.19	9.80	16.99
	松山區	39.36	16.69	56.05	43.95	4.6	8.09	12.69

資料說明：根據 1962 年《臺北市誌》人口數據資料整理，頁 106~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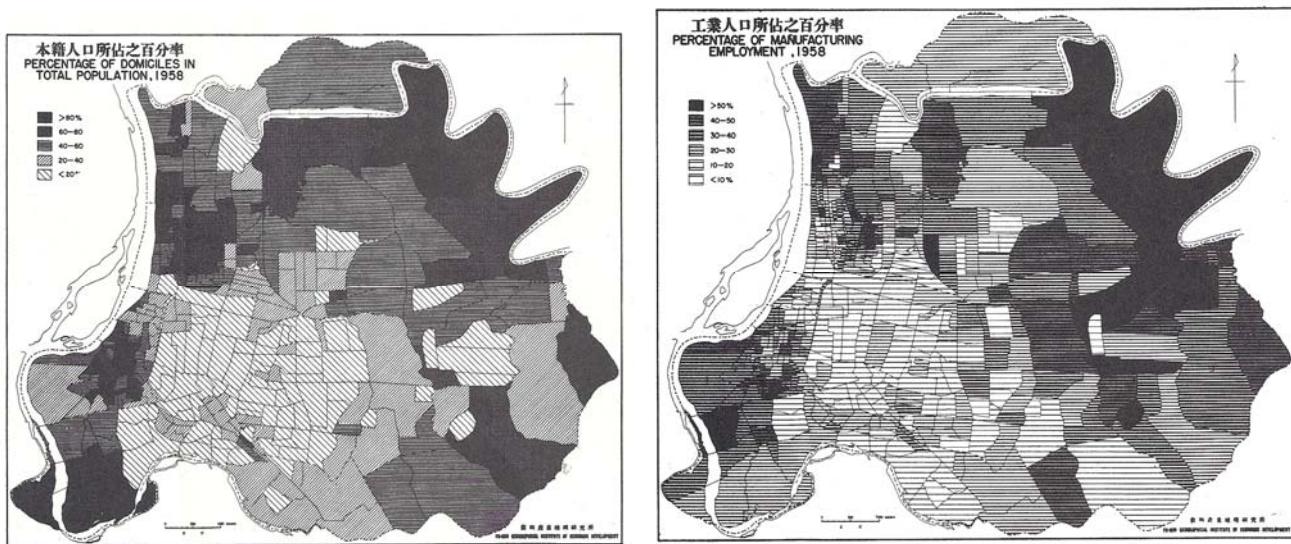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發現，戰後的臺北市，「教育素質」成了判定一區文化優劣之重要指標，然而區域文化水平之優劣，其實隱含著政治政策、族群結構，以及產業區位等複雜成因。教育程度偏低之區域，經常伴隨著本省人口居多、工廠數量偏高、人口外移明顯等現象併生，例如龍山區早在 1956 年時，遷出人口已多於遷入人口，而人口組成中，青年層比率甚低，區域產業以印刷裝訂業特別發達；⁴⁰⁵ 建成區、大同、延平等區人口外流現象明顯，遷入人口有限，住民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者，僅佔 1%~3%、區內工廠及製造業比例亦偏高；⁴⁰⁶ 教育程度

⁴⁰⁴ 參見《臺北文物》2:3 (1953)，頁 11。

⁴⁰⁵ 王月鏡主修，《臺北市誌 卷四 人口志》(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122~126。

⁴⁰⁶ 王月鏡主修，《臺北市誌 卷四 人口志》(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 132~145。

偏高之區域，如大安區、古亭區及城中區等地，住民外省籍人口比例較高、區內教育及經濟建設較多、青年層人口亦偏高；⁴⁰⁷ 至於新興之松山及中山區，由於政府政策性地移入人口，故外省籍人數比例偏高，加以地處機場、兵工廠等軍事要地，專技人員多，教育水準亦不低。⁴⁰⁸ 試看（圖），為戰後工業人口分布圖與本省籍人口分佈圖，兩圖疊合後之重疊率偏高，此現象顯示，本省人所在的地區，多為工業傾向區位，和外省人住居地多為公教及專技人員的情形，恰巧呈現對比。



圖片來源：陳正祥，《臺灣的人口》。臺北：南天，1995。

因而，從上述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戰後各區的性格，延續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規劃且更加凸顯：即艋舺地區具有勞力及製造業密集之區域屬性、大稻埕地區具有傳產工業及商業性格、城內與城南具有政治和文化性格，而新興地區具有商業貿易及精密產業發展的潛能。

城市的構成，原本就是一個歷史性的空間競逐，從 Castells 的觀點來說，城市是都市意義的戰鬥，其都市功能與形式的根源，為歷史抗爭所塑造。⁴⁰⁹ 在前幾章對於臺北空間一系列的探討與分析中，我們揭示並證明了歷史是如何孕育於城市之中的現象，當然我們也可以進一步以 Castells 的話來說：城市不只是在歷史之中，它們本身就是歷史。城南空間的人文活動，就像是閱讀戰後臺灣現代文學史般，我們看到這些活躍於文壇上的作家們，如何在一個大時代裡高喊著反共抗俄，而另一方面也真情自性地進行內省式的生活與性靈文學創作，而這些文學，又透過文人圈的交流，彼此反饋到城南空間豐富的文學體系之中，使得城南在城市內的一場場歷史性的空間競逐中，因空間與社會的相互作用，尤其凸顯其

⁴⁰⁷ 王月鏡主修，《臺北市誌 卷四 人口志》（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 111~118；頁 126~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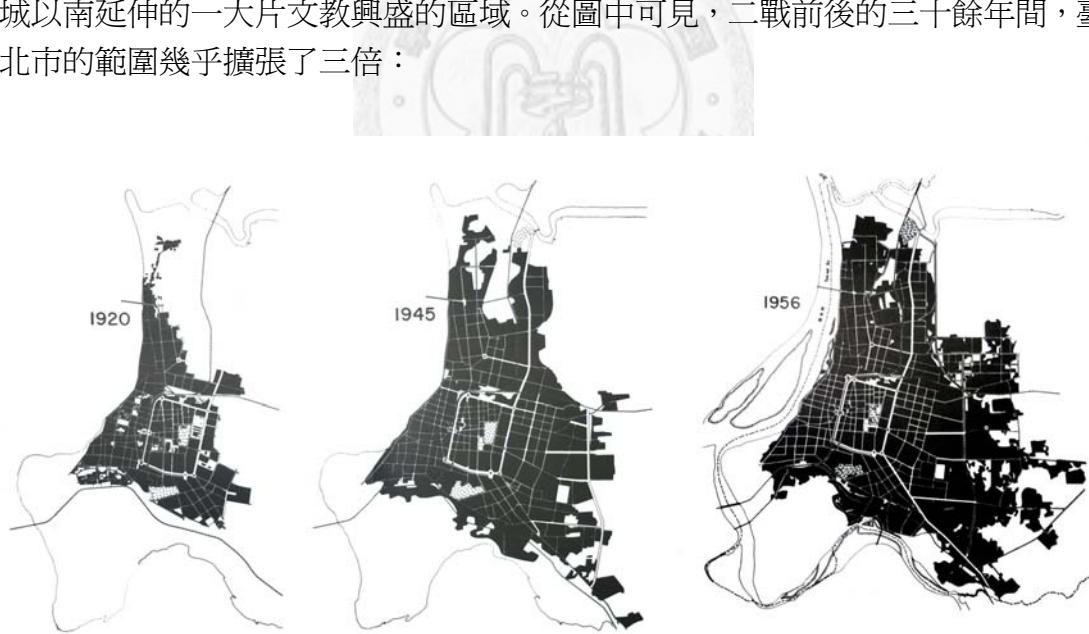
⁴⁰⁸ 王月鏡主修，《臺北市誌 卷四 人口志》（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 106~111；145~149。

⁴⁰⁹ Manuel Castells & Alejandro Portes 著，夏鑄九、王志弘譯，〈底層的世界：非正式經濟的起源、動力與影響〉，《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1993），頁 335。

出色的文化性格。

儘管傳統政治經濟學拒絕了反映論的化約，認為空間並非社會的反映，而只是社會的表現，然而人文地理學者不認為如此，他們更進一步指出，在討論空間對於社會之相互作用時，需用一個整合性與主動性的觀點來視之。⁴¹⁰ 換言之，我們不能單獨只從空間優勢建構了城南文教優位的角度來觀察此區在臺灣文學中的歷史角色，而更需要以社會建構的概念予以統整理解，必須理解的是，空間不只是社會的建構，社會也是空間的建構，這也就是說，空間不只是社會的反映，而是社會之所以為社會的一種建構元素。城南之所以成為文化優勢之地位，除外在資本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也在於城南社會有效運用其空間氛圍，連結區內文化社群、大學機構與各文化生產組織，使區域的文教特質特為凸顯，因而吸引更多精英自主性地加入此空間系統中，進行文化再製與生產。

再進一步來說，城南在經濟區位上具有高價值的原因，乃在於文化和教育的區位性格，使其無論在歷史或政治的變遷中，都仍保有維護人文核心價值的空間氛圍，而成為人們嚮往的優質居住核心地帶，是以區內推銷都市更新建案時，經常會以文學、藝術、大學城、水岸生活等語彙，置入行銷的宣傳當中，⁴¹¹ 特意凸顯在地的文化價值。城南地區，如第三章所述，它原本即是一個概念範疇，伴隨都市的拓展，其範疇亦隨之往南方及東南延伸。但總括而言，城南泛指從臺北城以南延伸的一大片文教興盛的區域。從圖中可見，二戰前後的三十餘年間，臺北市的範圍幾乎擴張了三倍：



圖片來源：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3。

圖中顯示臺北市區擴張的情形。而城南在都市擴張的範疇中，尤其尤其是戰後至1960年前後，當都市邊界主要向東及東南方擴展後，使得城南地區原本偏僻荒

⁴¹⁰ Peet and Thrift 等原著，1989:18，收入夏鑄九、王志弘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1993），頁 260。

⁴¹¹ 例如 2005 年在水源路上與同安街口交界附近的「捷年涵碧」開發案，即打出家在「臺北文學森林」旁，以及「與作家為鄰」的宣傳意象，使該建案銷售量及價格奇佳，且不到一年內即已銷售一空。

涼的師範大學及臺灣大學一帶，逐漸聚集了人口，都市邊界越過了瑠公圳（今新生南路）。臺北都市的擴張，使得城市在不斷向外擴張的同時，也納聚了新地域的文化風格。

在戰後初期時，城南從古亭到公館大學區一帶，人口並不密集，尤其相較於艋舺龍山區、大稻埕延平區等地，即使已在較多人居住的南昌街、廈門街等地，仍是人煙稀少：

一九四七年八月某日，波外翁喬大壯先生一到臺北，魏建功兄即遇之於南昌街。他是受臺大中文系教授聘來臺的。渡海由兒子護送，傳到基隆，學校有人將他們接到臺北廈門街招待所……時過中午，父子兩人，又乏又餓，便出門打算午餐……那知附近並沒有賣吃的，走出廈門街到了南昌街，也是如此。當時這兩條街，荒涼得很。⁴¹²

城南內的小巷弄間，亦是純樸中帶著簡陋，還有濃濃的鄉土氣息：

最耐人尋味的小巷，是同安街東北行，穿過南昌街後，通向羅斯福路的一段。長五、六十碼，狹處只容兩輛腳踏車蠕行相交。上面晾著未乾的衣裳，兩旁總排著一些腳踏車手推車，晒些家常醃味，最擠處還有些小孩在嬉遊。磚牆石壁半已剝蝕。頽敗的紋理伸手可觸。近羅斯福路出口還有個小小的土地祠，簡陋可笑的裝飾也無損其香火不絕，供菓長青。⁴¹³

當然就更不用說城南邊界的公館大學城區，人口更是稀疏，到處皆是荒涼的景象，臺靜農先生回憶當年初到公館的情景：

三十五年十月我來到臺灣，住進臺大宿舍，不特朋友極少，而臺大附近又是一片荒涼。⁴¹⁴

1950 年代余光中就讀臺大外文時，經常騎著他那輛價值不菲的「赫九力士」腳踏車在臺北市疾駛，從城南的同安街沿羅斯福路到學校上課，⁴¹⁵ 而當時騎腳踏車看到的公館四周風景是：

騎著腳踏車，在和平東路上向東放輪疾駛，翹起的拇指山巒有個性地一直在望，因為前面沒有高樓，而一過新生南路，便車少人稀，屋宇零落，開始荒了。⁴¹⁶

⁴¹² 臺靜農，《龍坡雜文》（臺北：洪範，1988），頁 91。

⁴¹³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頁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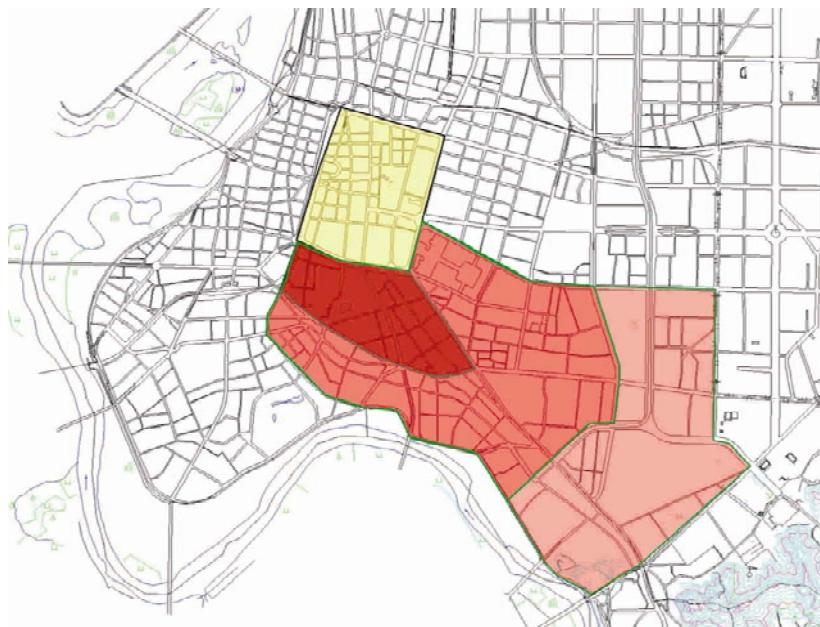
⁴¹⁴ 臺靜農，〈何子祥這個人〉，《龍坡雜文》（臺北：洪範，1988），頁 81。

⁴¹⁵ 余光中，〈傅鐘幽幽長在耳〉，收入柯慶明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28~37。

⁴¹⁶ 余光中，〈沒有鄰居的都市〉，收入余光中、陳芳明編，《余光中跨世紀散文》（臺北：九歌，2008 年），頁 199~206。

趙天儀在 1956 年就讀臺大哲學系時，羅斯福路正在拓寬馬路，當時臺大校門口「一邊是新生南路，有瑠公圳的溪水潺潺流過；一邊是羅斯福路，從校門口有些違章建築的小商店以外，一直到公館，只有一家小小的豆漿店，其他一片荒蕪」，從臺中北上求學的趙天儀，曾建議父親在臺大校門口買房子，結果父親認為太荒蕪而未採納他的意見。⁴¹⁷

城南的文教空間，不斷擴及至大學周邊，（圖）為城南文化空間的延展的範疇，從原古亭一帶，向南延伸到包含師範大學、臺灣大學的大學城區。



圖片說明：筆者根據調查結果所繪。

這些原本是城南邊緣的大學區域，因都市的擴張而逐漸中心化，在作家文人和大學學者們的筆下，城市的遽變令人驚嘆：

四分之一的世紀，我眼見臺北長高又長大，腳踏車三輪車把大街小巷讓給了電單車計程車，半田園風的小城變成了國際化的現代立體大都市。⁴¹⁸

再對照前述臺北在戰後三十年內地價的上漲情形，因而我們可以發現，一地之價值，不見得僅僅在於商業潛能，甚至文化長遠的價值，人文環境亦可以主導經濟市場。以臺灣大學為中心，涵蓋師範大學、師範學院等區的城南大學城區，以兼具知識與教育的主導場域形式，隨著都市擴張與精英人口之聚集，亦形構出一個具有新興思潮、自由而開放的文化主導場域，它同樣參與大半部份的臺灣文壇，並且持續影響著當代臺灣文壇。

⁴¹⁷ 趙天儀，〈我的學習路程〉，收入柯慶明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114。

⁴¹⁸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頁 188。

1948 在廈門街創刊的《創作》月刊，是師範大學師生共同主持的刊物，當時社會主義思想在知識份子間蓬勃發展，表現在文學創作的風格亦如此，此即反映知識青年對於文學與社會的理想，⁴¹⁹《創作》月刊出版為期不長，但仍具有一定之編輯規模。⁴²⁰ 然而影響臺灣文學發展最重要的，為 1956 年由臺大教授夏濟安、吳魯芹、明華書局創辦人劉守宜，和香港的林以亮先生合辦的《文學雜誌》以及夏濟安在臺大外文系的學生於 1960 年代創辦的《現代文學》，這兩份以臺灣大學文學院為主的學院派文學刊物，發揮了主導臺灣文學場域的影響力。

《文學雜誌》雜誌社址在發行人劉守宜的寓所中，即城南的同安街內。余光中曾述及當年，巷中經常有夏濟安、吳魯芹的蹤跡：「那一帶的斜巷窄弄，也常聞夏濟安、吳魯芹的咳唾風生，夏濟安因興奮而羞赧的臉色，對照著吳魯芹泰然的眸光」⁴²¹。《文學雜誌》廣泛介紹西方現代派理論，並刊登西方和臺灣的現代派作品，對文壇產生重要之影響。經由夏濟安的引領，在當年提攜了許多文藝青年投入文學創作，例如陳世驥、夏志清、思果，以及夏濟安的學生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李歐梵等人。之後夏先生赴美，他的學生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發起的 1960 年創刊的《現代文學》雜誌，也曾在城南編輯發刊，雜誌囊括了眾多青年作家，也影響了臺灣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興起。⁴²²

第三節 從寄居到定居：知識份子的地方文化認同

在探討以大學學院為主的文化場域時，需將之和上一章所述的文人圈文化場域視為同樣的文化體系。即使一般習慣會將學院的和民間的文人團體作一番區別，然而在城南的文化現象，因學院和民間彼此之間聯繫頻繁的文化生產網絡，加以在相互支援與合作之下，雙方所呈顯之文學成就皆不容忽視。「場域」可被

⁴¹⁹ 《創作》月刊第一期發刊詞：「本刊內容是以創作為主的，在形式和編排方面，我們儘量使它活潑和輕鬆，我們絕對不扳起道學的臉孔，我們也不談論天下大事，不登官樣文章，我們介紹文學名著及探討研究文學的實際理論外，願意儘量的去寫社會上血淋淋的現實，並深入民間及社會每一角落，為無數窮苦無告的人們，作正義的聲援，以冀取得社會的同情，而作積極的改進。」

⁴²⁰ 《創作》月刊於 1948 在本區廈門街創刊，編輯部設於本區浦城街 6 巷 11 號。戰後初期，不少大陸人士來臺灣從業、觀光或應聘任教職，而《創作》月刊，主要是以在臺灣的大陸籍師生為主的一份刊物，於 1948 年 4 月 1 日創刊，同年 9 月停刊，前後半年，出版 1 卷 6 期 4 本，為臺灣戰後初期大學生文學之文藝創作保留重要文獻，其內容多樣包含創作，散文、詩歌、報告文學、翻譯、文藝理論、雜文、批評、介紹、劇本、木刻、漫畫，撰稿者多為當年大陸來臺的臺大、師大知名學者與省立師範學院（今臺灣師範大學）學生，如臺靜農、周學普、李霽野、錢歌川、黎烈文、何佶、高亞偉、潘守先、許志儉、許世瑛、章仕開、黃肅秋、趙景深等人。

⁴²¹ 余光中，《日不落家》（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頁 130。

⁴²² 以臺大外文系學生組成的「現代文學社」為核心編輯群的《現代文學》，包括：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等臺大外文三年級學生，雜誌於 1960 年創刊，直到 1973 年的第五十一期才停刊，前後共歷十三年，期間曾以廈門街 113 巷 8 號作為發刊地。雜誌的編輯群，前後屆都不乏今日知名的作家，例如葉維廉、叢甦、劉紹銘、金恆杰，以及王禎和、杜國清、鄭恆雄等，而曾在此刊發表的作者之眾，幾乎日後知名的作家都曾在此雜誌上發表過作品，例如余光中、李昂、施叔青、林懷民、黃春明、陳映真、楊青矗、七等生等人，雜誌系統性地介紹了西方現代主義的理論和作品，亦造就了一批作家，這些作家受西方文學的影響，為臺灣文學開發出新的文學語言與書寫技巧。

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形構（configuration）。文化場域位置的型塑，與行動者加強於具特定位置的社會行動，或機構之間的決定性因素之中，而得到客觀的界定。⁴²³ 以大學為中心的文化場域，和該地區的文友圈作家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參與文化之生產與傳播過程，一直到生活圈的彼此照應與協助，學院與民間經常維繫著頻繁的文化行為，因而兩者之間應視為是各自具有特色，但又連結成相繫鍊帶狀的同一文化場域。試從以下圖示說明，城南許多文教區域緊密繫聯，此區間密集與文化教育相關之文人、社團、機構與文化事業據點，彼此串聯，呈現出具有特色的文教區域性格。



圖片說明：筆者根據調查結果所繪。

《現代文學》的創辦，乃惠於《文學雜誌》的啟迪，亦受到臺灣大學文學教育的導發，成為 1960 年代臺灣最重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學雜誌。⁴²⁴ 梅家玲

⁴²³ Patrice Bonnewina 等原著，李猛、李康等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1998)，頁 133~134。

⁴²⁴ 白先勇在〈《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一文中，即指出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其實是《現代文學》的先驅，關於《文學雜誌》與臺灣學院派雜誌傳統的開創，即其對《現代文學》的影響，參見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收入《臺灣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 (2006.02)，頁 61-104；以及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收入《現文因緣》(臺

指出，夏濟安及其所創辦的《文學雜誌》，善用了「臺灣大學」此一負有人才培育與學術研究雙重重任的教育空間，及其所提供的特殊資源與社會資本，促成當時文化場域的改變，而它又回饋到學院教育，使教育空間與文化場域在相生相成的互動之間，彼此對話交融。⁴²⁵ 此一觀點有助於我們從城南的空間角度，來探討學院中的教育成果，是如何透過教師與學生之間、以及教師和文化界，還有學生與文化界之間的彼此交流，而形塑出城南兼具學院思想與文人氛圍的文化場域。無庸置疑的，大學是國家擁有最稀少的、最有價值的人力資本的寶庫，大學擁有的學術人才，對於國家和社會產生廣泛的效益，並且對一國之人文、科學的發展至關重要，這些學術資本皆是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⁴²⁶ 透過城南空間的社會運作，使學院師生的教學成果轉換為文化出版品，而此教育空間對於文化場域的介入，亦使學院與文化界維持良好互動，因而在城南帶起整個文壇的主導優勢。

臺大的教職員眷舍多位於城南溫州街、青田街及瑞安街一帶，使得大學學者們因地緣相近的緣故，而經常有彼此交流關照的機會，而學院中的文學事業，在大學師生們之間的頻繁互動之中，帶動城南充滿學院文化的氣質與氛圍。例如，趙元任先生來臺大講學時，亦住在牯嶺街錢思亮先生的宿舍，並傳斯年校長宿舍比鄰；胡適之先生即寄住在錢先生家，梅月涵先生也同住於此。⁴²⁷ 黎烈文居於金華街的日式高級住宅中，顏元叔偶爾會去拜訪他，⁴²⁸ 葉慶炳和夏濟安在溫州街五十八巷十八號的單身宿舍對門而居。⁴²⁹ 葉慶炳敘及當年的單身生活：「每到星期六傍晚，有節目的當然興致勃勃的鎖上房門出去了，沒有節目的，也往往整裝出發，做有約會狀，其實不過搭零南公車到西門製造人潮，然後再搭零南回來而已」，葉慶炳當時閱讀的小說，都是夏濟安從溫州街口的一家租書店裡租來、免費供應給他看的。⁴³⁰ 1974年，葉慶炳先生投入《中外文學》，參與編務，為期一年十個月，負責古典文學論文編輯，並與當時任教於外文系的教授們開辦了「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時與葉先生往來頻繁的外文系教師，為擔任前後任社長兼主編的顏元叔與侯健。⁴³¹ 林文月先生是葉慶炳先生同事，葉先生結婚時，林女士擔任男方介紹人，為求方便，新娘即安頓在林女士家，在那裡化妝、登車。登車時，林女士的外子郭豫倫親自為葉慶炳夫婦燃放鞭炮。⁴³² 個性瀟灑的臺先

北：現文，1991），頁8~9。

⁴²⁵ 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臺灣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6.02），頁61-104。

⁴²⁶ Sheila Slaughter & Larry L. Leslie, (1997) *Academic Capital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⁴²⁷ 葉慶炳，〈給陳若曦〉，收入《我是一枝粉筆》（臺北：九歌，2007），頁89。

⁴²⁸ 顏元叔，〈懷念黎烈文教授〉收入何寄澎、劉龍勳編，《親情、愛情、友情》（臺北：長安，1981）。黎先生的家一直在金華街，如今雖是前後高樓遮掩，十多年前，那一帶十分幽雅。黎先生住的是一幢日式房屋，有院子，有花木，客廳裡陳設雅緻。

⁴²⁹ 葉慶炳，〈給陳若曦〉，收入《我是一枝粉筆》（臺北：九歌，2007），頁36~39。

⁴³⁰ 葉慶炳，〈給陳若曦〉，收入《我是一枝粉筆》（臺北：九歌，2007），原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6年5月1日。

⁴³¹ 葉慶炳，〈給陳若曦〉，收入《我是一枝粉筆》（臺北：九歌，2007），頁106~110。

⁴³² 葉慶炳，〈給陳若曦〉，收入《我是一枝粉筆》（臺北：九歌，2007），頁128。

生，經常徒步往來於城南附近的街巷中，找文友、找同事甚或找酒友談天交遊，在〈何子祥這個人〉一文中，提及當年他徒步訪友喝酒的情形，筆中流露著當年文人任真自性地在這文化氛圍濃厚的空間中，怡然自得過著純樸生活的逸緻閒情：

我是三十五年秋應臺灣大學聘來臺灣的。那兩年臺灣頗安靜，我和卓如常在傍晚時從溫州街十八巷走到泉州街二巷子祥家討酒吃，當時馬路好走，不特沒有機車，也極少有大小汽車。醉了走回家，出泉州街，經福州街，達羅斯福路，轉和平東路，可以踉蹌而行。」⁴³³

後來何子祥換了宿舍，與臺靜農家衡宇相望，臺教授幾乎每天都去看他。⁴³⁴ 林文月教授在〈溫州街到溫州街〉回憶同住在城南溫州街的鄭騫教授與臺靜農教授的情誼，許多臺大教員宿舍都在大學附近，教授之間經常往來，交誼誠摯而深厚：

從溫州街七十四巷鄭先生的家到溫州街十八巷的臺先生家，中間僅隔一條辛亥路臺先生家，步調快的話，大約七、八分鐘便可走到，即使漫步，最多也費不了一刻鐘的時間。但那一條車輛飆馳的道路，卻使兩位上了年紀的老師視為畏途而互不往來頗有年矣！早年的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臺灣大學的許多教員宿舍便散布其間。我們的許多老師都住在那一帶。閒時，他們經常會散步，穿過幾條人跡稀少的巷弄，互相登門造訪，談天說理。⁴³⁵

學院中緊密的文人交遊，藉著近距離的空間互動，交織出一場又一場的人文激盪。除了學者之間的交誼和往來之外，還有師生之間跨世代的深厚交誼，使得文化與思想的塑成，從學院教育空間擴展到整個生活範疇與文化場域，激發起學院中年輕學子的文學理想，尤其是重視人文教育，強調學術獨立自由的臺灣大學。⁴³⁶ 在那個學風純樸的年代裡，學者們樹立了崇高的人文典範，實踐教育的核心價值，並時時以至真至誠和青年學子互動，除了傳道授業解惑之外，也讓學生從學習到他們生活中的文化素養與人格風範，因而當時代的學子們，總有滿腹熱情與高亢的理想，紛紛以大學為己任、奉文學為至上，在追求生命真理與思想自由的文化道路上，也為臺灣文學開闢出嶄新的路向。

⁴³³ 臺靜農，〈何子祥這個人〉，收入何寄澎、劉龍勳編，《親情、愛情、友情》，（臺北：長安），1981年，頁80。

⁴³⁴ 臺靜農，〈何子祥這個人〉，收入何寄澎、劉龍勳編，《親情、愛情、友情》，（臺北：長安），1981年，頁95。

⁴³⁵ 林文月，〈從溫州街到溫州街〉，收入《林文月精選集》，頁128-136。

⁴³⁶ 臺大的人文教育重視自由思想的風氣，乃受傅斯年校長在戰後辦學治校理念之蔭澤，傅斯年深受自由主義影響，注重以人文為本的教育，並倡議學術獨立，引進北大自由校風，特別是文學院，當年許多北大名師都來此任教，「國內碩彥咸集北校，風雲際會盛極一時」，參見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臺灣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6.02），頁66~67。

林文月回憶她 1952 年考取臺大中文系的年代，當時系上同學只有十一位，人數比系裡的老師還少，整個系就像一個大家庭：「我們時常在課外向老師們討教請益，除了課室、辦公室，甚至還到溫州街、青田街或瑞安街的臺大教員宿舍拜訪。我們和老師們所談的話題，往往會從課業、學術而稍稍轉移到一些個人的、生活的層面……而我們學生在課室內或課室外所感受學習到的卻也除了學問之外，還包含了師長們的人格典範」⁴³⁷，此外，每學期舉辦的班際郊遊，師長們也往往參與，和學生分享快樂，師生們一起到碧潭泛舟、圓通寺登山、參觀南港研究院，甚至因為臺教授與故宮副院長莊尚嚴先生的舊識，師生有機會到霧峰北溝國寶庫臨近觀賞毛公鼎；⁴³⁸ 鄭清茂也說當年中文系學生們偶爾會結伴去打擾臺靜農先生和鄭騫先生；⁴³⁹ 葉維廉也懷念他在臺大外文系就讀時，夏濟安教授不只在課堂上，連平日在宿舍也是對學生來者不拒，熱情地鼓勵學生並傳授新知：

我個人得益最多的還不是在教室內，而是在經過瑠公圳兩岸杜鵑的展紅和飄柳的垂綠到溫州街他那堆積如山至沒有坐立地方不到十方尺的斗室的庭訓。他對我們這些求知慾強的學生可謂另眼相看，來者不拒，跟我們聊，不停地把收到的新書，從桌上桌下床上床下翻出來給我們看。最使我個人感激的，是他彷彿是無限量的鼓勵。⁴⁴⁰

陳若曦因為實在太喜歡小說了，忍不住想去請教侯建老師，因而在大三升大四暑假時，找了一個同學，貿然闖到教員宿舍，東問西問地找到了侯宅，當時「正巧炎炎夏日，他的孩子在戶外泡水玩，濺得一地都是水，而老師忙著吆喝、收拾，汗衫短褲也沾上水，情況頗為狼狽」，⁴⁴¹ 大學思想的開放，使學生與教師之間較無芥蒂，而學生總是帶著無窮的求知慾，向老師叩門求教，師生之間互動頻繁，而生活也是貼切而真實。當然有時老師會主動提攜鼓勵學生，譬如葉慶炳先生會把國文課學生陳若曦的作品偷偷拿給了夏濟安修改，請夏先生將文章刊登在《文學雜誌》上，⁴⁴² 白先勇帶著陳若曦到溫州街的宿舍第一次拜訪了夏老師，受了老師的鼓勵。⁴⁴³ 在出國唸書前，陳若曦到葉慶炳先生宿舍辭行，葉慶炳先生用

⁴³⁷ 林文月，〈我以臺大人為榮〉，收入柯慶明主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40~41。

⁴³⁸ 林文月，〈我以臺大人為榮〉，收入柯慶明主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40~41。

⁴³⁹ 鄭清茂，〈臺大瑣憶〉，收入柯慶明主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47。

⁴⁴⁰ 葉維廉，〈回憶那些克難而豐滿的日子——懷念夏濟安老師〉，收入柯慶明主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90。

⁴⁴¹ 陳若曦，〈懷念外文系的師長〉，收入柯慶明主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134。

⁴⁴² 葉慶炳，〈給陳若曦〉，收入《我是一枝粉筆》（臺北：九歌，2007），原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6 年 5 月 1 日，頁 38、52。

⁴⁴³ 陳若曦，〈懷念外文系的師長〉，收入柯慶明主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 135。

摩托車載她回家，沒想到車剛出住處的溫州街五十八巷，陳若曦不小心摔下來了，輕微碰傷，即使事經十多了年，葉先生仍歉疚地記得這段往事；⁴⁴⁴ 此外，「現代文學」社夏濟安教授的徒子徒孫們，也經常到他溫州街的宿舍聽老師高談闊論，李歐梵回憶道，「夏先生有時講得興起。就會拿一本英文名著向我們節拆內中某段某句的妙處。他房間裡到處是書，連床上床下都是，他又不停地抽煙，抽完就把煙蒂隨手擲到窗外」；⁴⁴⁵ 白先勇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是他拿著作品找了夏濟安老師，受到夏老師肯定並且刊登在《文學雜誌》上；⁴⁴⁶ 王文興在臺大外文就讀時，即蒙炙於黎烈文教授的教誨，黎先生對他十分溫慈，在王文興回國初任外文系講師時，黎先生慷慨地把他寬敞舒適的研究室借給他使用；⁴⁴⁷ 外文系的英千里老師更是名士派作風，教授英詩的他，不拘小節，喜歡找臺大女生跳舞，回來太晚碰到宿舍關門，會抱起女生幫她翻牆過去。⁴⁴⁸

在那個思想經常受政治禁錮的年代，學院內在自由主義的傳統之下，毅然不顧外在的紛擾，堅持保衛著學術自由的思想與人文教育的核心價值，而教師們的性格即使不盡相同，但學院承續了五四以來的自由學風，教授們生活任真率性，為人敦厚誠樸，但又嚴謹治學，尤其臺灣大學自由開放的風氣，使知識菁英們在學院的庇護之下，文學行動獲得各方支持與鼓勵，因而不斷孕育新一代的知識青年們，而這些青年知識分子，除了將熱情化為一篇篇的文學作品之外，又因空間地利之便的因素，也經常與城南的文友圈彼此交流往來，因而在教育空間與文學場域的交相支援與互涉之中，在城南構築出兼具學院與民間文化人的文學主導勢力。

去年夏天在西雅圖，和葉珊談起臺灣詩選之濫，令人窮於應付，成了「選災」。葉珊笑說，這麼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我該編一本「古亭詩選」，他呢，則要編一本「大安詩選」。⁴⁴⁹

在臺北，總覺得自己是「城南人」，不但住在城南，工作也在城南。國內最具規模的三座學府全在城南，甚至南郊；北起麗水街，南迄指南山麓，我的金黃歲月都揮霍在其中。思潮文風，在杜鵑花簇的迷錦炫繡間起伏迴盪。當時年少，曾屢過多少至美的青睞青眼，西去取經，分不清，身是唐吉珂德或唐僧。對我而言，古亭區該是中國文化最高的地區，記憶也最密。

⁴⁴⁴ 葉慶炳，〈給陳若曦〉，收入《我是一枝粉筆》（臺北：九歌，2007），原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6年5月1日，頁41。

⁴⁴⁵ 李歐梵，〈現代主義文學的追求——外文系求學讀書記〉，收入柯慶明主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153~154。

⁴⁴⁶ 白先勇，〈驀然回首〉，收入《驀然回首》（臺北：爾雅，1987），頁65~78。

⁴⁴⁷ 王文興，〈前輩的成就〉，收入柯慶明主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124。

⁴⁴⁸ 陳若曦，〈懷念外文系的師長〉，收入柯慶明主編，《臺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頁133。

⁴⁴⁹ 余光中，《日不落家》（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頁187。

即連那「家巷」的左鄰右舍，前翁後嫗，也再植物一般悠久而遲緩的默契裡，相習而相望，相近而相親。⁴⁵⁰

「藍星詩社」即是一個跨學院與民間的文學社團，就讀臺大外文系的余光中，與覃子豪和等人於 1954 年成立的「藍星詩社」⁴⁵¹，主要同仁有余光中、鍾鼎文、夏菁、蓉子、鄧禹平等，後來加入的有羅門、周夢蝶、張健、向明、龔虹、楚戈、吳宏一等，社員中，有學院中的大學生、有詩人，有文化工作者，當然也有軍中作家，因而容納不少當代詩壇菁英，並多為現代詩論戰的健將，亦主導當時臺灣現代詩的發展，而詩社也位於城南廈門街 113 巷，另與詩刊有合作關係的《公論報》與「林白出版社」也在城南。同時也有許多大學生們，透過中國文藝協會寫作班認識一些軍中文友，軍中青年與大學文藝青年相互提攜交流，以澎湃的熱血共劃文學版圖，原本僅在文藝協會附近聚會，後來文友圈擴大，人數愈來愈多，因而集結四路英雄群聚於臺北公園附近的田園咖啡室：

每週末想泡在一起的人數愈來愈多，洛夫、羊令野、一夫、張拓蕪、秦松、管管、張默，加上臺大的陳若曦、鄭秀陶、劉大任，中興大學的王渝、洛冰，師大的張淑芳，政大的劉延湘，大夥兒就只有以臺北公園為中心了，而公園附近的「田園咖啡室」是聯絡中心兼集散地。大部份時間是在公園或野外廝混，但節目仍舊，一直維持漳州街清談、朗誦詩、喝酒、和罵不在的人為樂事之傳統。清談的內容，無非都是文學和詩。忍不住時就唱歌，但歌手都是辛鬱、商禽、高麗梆子（老許）擔任，老朋友紀弦有時也唱一點祖母時代的舊歌，其裝模作樣的戲劇效果很叫座。⁴⁵²

此外，由於城南有臺大、師大、師院三所大學，不論是學院學者抑或熱衷於文藝創作的學生，其日常生活範圍不脫離此區，尤其是公務人員與教授宿舍，多聚集於此地，因而志同道合的知識青年文藝社群組織容易群聚於此，且在那個青年們提倡愛國、熱血與心繫文學的時代，彼此容易激發出亮眼的文藝傑作。

當然，大學教授與文友圈文化人士的交遊亦極為普遍，像齊邦媛、林文月、……即是林海音的摯友，也經常參加文友圈的聚會，另外，文友圈的各項出版雜誌與文學副刊，經常是由學院中的學者撰稿，交由出版社進行出版企劃，或由主編主動向大學教授們邀稿，以充實稿源，例如《自由中國》經常有殷海光等人的專欄、劉守宜和夏濟安經常往來共同經營《文學雜誌》、林海音的「純文學出版社」，以及隱地的「爾雅出版社」，也出版眾多許多學院中作家們的文學作品，文學出版社與學院之間的頻繁往來，亦不僅僅限於戰後的城南，如同前述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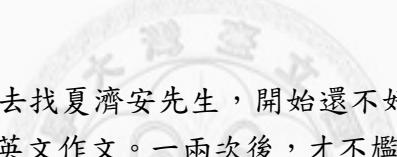
⁴⁵⁰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頁 190~191。

⁴⁵¹ 1954 年到 1964 年，是藍星的十年黃金期，社員主導了當時的臺灣詩壇，並多為現代詩論戰的健將。1964 年到 1984 年間，詩社由羅門、蓉子夫婦經營維繫，社員偶有交流，1982 年《藍星詩刊》由林白出版社贊助復刊，由羅門擔任社長，向明主編。

⁴⁵² 楚戈，〈八千里路雲和月〉，收入《再生的火鳥》（臺北：爾雅，1995），頁 154。

學院作者、編者，以及文化事業經營者，原本就是一個緊密相繫的社會網絡系統：文人與學院作家進行創作，將作品交由編輯採稿後，再由出版社進行出版；而出版的作品在文化界與學院之間流傳，於是開始有學院或文化界的評論者，對於作品進行評介與回應，同樣這些文學批評作品，再經編輯及出版網絡之後，又回饋至文化界及讀者大眾之中。

尤其需留意的現象是，作品在透過一套具學術標準的批評與討論之後，優秀的佳作因此被區分而凸顯，透過學院與文化人士對於文學作品的不斷討論與品評，文化界逐漸對於文學作品的優劣評價有了漸進的共識，而文學更能因此不受外在政治因素的過度干預，逐漸擁有文學界自主性的評介標準。當然，從空間的角度來看，城南更擁有這樣的文化奧援，創作者與評論者經常擁有文學對話的機會與場合，年輕的創作者經常有機會遇到文學家與評論者，一方面欽佩於文學家與學者的崇高文學位置，另一方面在頻繁接觸中，可能學院中學者的一句佳評，會深刻影響一位年輕作者一生的創作意志，使這些年輕作家較不容易放棄文學創作的堅持，而持續不斷地進行創作。白先勇年輕時，也是在一種擔心自己被夏濟安先生宣判文章「死刑」的戰戰兢兢之下，最後獲得教授的鼓舞，因而影響他持續筆耕不輟：



……自己貿貿然便去找夏濟安先生，開始還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來，藉口請他修改英文作文。一兩次後，才不尷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說放到他書桌上去。我記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煙斗吸得呼呼響……，我的心一直在跳，好像在等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當時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寫作生涯要多許多波折，因為那時我對夏先生十分景仰，而且自己又毫無信心，他的話，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一褒一貶，天壤之別。夏先生卻抬起頭對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這篇小說我們要用，刊登《文學雜誌》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⁴⁵³

作家、學者、編輯與文化界人士群聚在城南，一方面因熟識而互相提供資源，並容易彼此提攜、拔擢；另一方面因為空間與文化資源的充裕，作品出版流通管道眾多，曝光率高，加以評介者亦經常是作者的熟識，文章一出，評介邀約亦容易成稿，於是一篇佳作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成名。因此此一文化生產—消費—再生產—再消費的文學閱讀與評介網絡，在城南透過民間與學院之間的交誼與聯繫之間，彼此相生相成，而形塑了文化場域的主導勢力。

戰後的政治情勢，使兩岸人民皆無可遁逃地經歷了大時代的劇變，不論是外省人面臨骨肉相隔、流離失所的國仇家恨；或是本省人的認同困頓與迷惘、在語言和文化的錯位中拼湊支離破碎的國族想像。整個時代的社會變遷，影響到整個

⁴⁵³ 白先勇，〈驀然回首〉，收入《驀然回首》（臺北：爾雅，1987），頁65~78。

國族的前途，也同時在人們心中不斷糾結困頓，使人們必須去接受生命扭曲的事實，以及連帶產生身體的錯位、空間的錯位以及精神的錯位等文化和價值體系的變遷。文學作為文化體系的內涵之一，當然在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遷中，許多文學作品於是帶著濃烈的鄉愁、思親的悲慟，以及文化的陌異感接連見世。因而我們可以理解的是，戰後二十多年間，人們在身處一個崩毀欲裂的國族敘述主體中，為何不斷地沉吟著家國、鄉愁與人生命運價值的文學筆調。社會愈是變遷迅速，愈是發展未卜、愈是價值不明的環境，愈可能產生強大的懷舊情懷，作家們於是在這劇變的環境中，用文字書寫這動蕩不安的時代，以及對昔時故土家園的種種懷念。

然而，即使再如何混亂無序的時代，生活總是要真實地走下去，城南的知識份子們，在逐漸覺知到政府一路高唱的反攻大陸、復興中華的國族願望，已愈行愈遠而難以實現之時，開始俯視自身當前所在、此一最真實而存在的空間時，才驚覺到也對它產生濃厚的情感，只是從前總不認為異域可以為家，在暫時居所裡，累積了數十年、甚至已孕育新一代又一代的空間認同之後，於是「不再歇腳就是了」，這裡原來也是「家」，一個累積大半生精采記憶的地方。城南宿舍，索性就這麼居住下去吧：

臺北市龍坡里九鄰的臺大宿舍，我於一九四六年就住進來了。當時我的書齋名之為歇腳盦，既名歇腳，當然沒有久居之意。身為北方人，於海上氣候，往往感到不適宜，有時煩躁，不能自己，曾有詩云：「丹心白髮蕭條甚，板屋楹書未是家。」然憂樂歌哭於斯者四十餘年，能說不是家嗎？於是請大千居室位我寫一「龍坡丈室」小匾掛起來，這是大學宿舍，不能說落戶於此，反正不再歇腳就是了。⁴⁵⁴

戰後應傅斯年校長之聘來臺大中文系教書、原本無意久居臺灣的臺靜農先生，在歇腳臺灣數十載之間，此期間培育英才無數，在這海隅之島，累積了他生命最豐富沉鬱的時代，大學是這些菁英學者們的家，不論在課堂或研究室，抑或溫州街巷裡的宿舍，在這大學生生活圈所環繞的文化網絡空間裡，生活中所有吸呼吐納與言行倫儀，都在大學空間裡了，他們在這裡進行著閱讀與教學，也在這裡不斷思索與書寫，並且和大學週遭一切人際網絡中的交涉與情誼，以及文化生產的社會空間網絡，都緊緊地繫聯在一起，成了認同且親密歸屬的地方，「大學」，對他們而言，不再只是一個人生的過渡，或只是一個可以前赴教學、任教求職的地方。在大學裡，許多教授、甚至這些教授的孩子們，大半生都沒離開過大學生生活圈，下一代菁英在城南持續傳承了上一代所賦予與經營的文化與教育志業，在這樣一個思想自由的文教環境裡，使學院中的作家們擁有多思想的空間，將滿懷熱情與理想，以及生活中各種心靈觸發，都寫進文學作品中。

戰後城南地區的菁英份子們，在歷史的特殊情境下，藉由個體和社會、實踐

⁴⁵⁴ 臺靜農，《龍坡雜文》(洪範，1988年8月)，頁1。

和結構之間不斷辯證的形成過程，逐漸對這地理空間產生了地方感。所謂地方感，以文化地理學的角度來說，是一種自主心靈的產物，由心靈自由詮釋經驗的世界——記憶、意義，以及自主意向所產生之自主的情感。這種地方感不受力使特殊權力關係所影響，也不受到那些受社會、經濟限制的行動和思想所影響——即使人文地理學者在闡釋「地方感」的時候，偶爾也會涉及社會、相互主體性的溝通、意義的共識、社會地位及社會條件等被用作個體經驗的背景因素。⁴⁵⁵

城南的大學學院作家、民間文人圈甚至黨政體系文藝圈之間，在不斷變化的文化意識與結構歷程的交互開展，以及與不斷辯證的實踐行為相互交織之中，即使文學理想與意識型態有著各別的差異，但相同的是，這些文人們對於城南此一得天獨厚、有機的文化空間，都逐漸產生了地方感：

有那麼一座城，多少熟悉的面孔，由你的朋友，你的同學，同事，學生所組成，你的粉筆灰成雨，落濕了多少講臺，你的藍墨水成渠，灌溉了多少報刊雜誌。四個女孩都生在那城裡，母親的慈骨埋在近郊，父親和岳母皆成了長青的喬木，植物一般植根在那條巷裡。有那麼一座城，錦盒一般珍藏著你半生的腳印和指紋，光榮和憤怒，溫柔和傷心，珍藏著你一顆顆一粒粒不朽的記憶。家，便是那麼一座城。⁴⁵⁶

這一座滿載著作家生命中大半輩子記憶的城，已不再是陌生的海隅之都，它承載了作家身體所及之處的所有記憶與空間。我們可以理解的是，家與身體有著緊密關係，家是人的延伸，就像是皮膚或是第二層衣服一般，它不僅遮蔽與保護，並且也揭露和展示。⁴⁵⁷ 對於城南的文人菁英們而言，城南這個空間，或者說，他們在城南的家，是他們身體詮演空間的延伸，揭露並且展演了他們的澎湃的心靈，亦同時塑造了空間的文化價值。身體是個人的地方、區位或位址，⁴⁵⁸ 作家們以身體「閱讀」城南空間，而空間承載了作家們的身體記憶：

廈門街，水源路那一帶的彎街斜巷，拭也拭不盡的，是我的腳印和指紋⁴⁵⁹。

每次回到臺北，重踏那條深長的巷子，隱隱，總踏起滿巷的迴音，那是舊足音醒來，在響應新的足音？廈門街，水源路那一帶的彎街斜巷，拭也拭不盡的，是我的腳印和指紋。每一條窄弄都通像記憶，深深的廈門街，是

⁴⁵⁵ Crang, Mike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4)，頁 88。

⁴⁵⁶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頁 189。

⁴⁵⁷ 原見 Carsten, J. and Hugh-Jones, S.(eds) 1995: *About the House: L Strauss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轉自 Linda McDo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頁 125-126。

⁴⁵⁸ Linda McDo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頁 48。

⁴⁵⁹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文中一再提及作者居住於廈門街，對此區產生濃厚的情感，對於臺北，余先生自嘲自己是患了「臺灣相思」。

我的迴聲谷。⁴⁶⁰

余光中對於城南一帶的書寫，著墨甚多，城南的地理記憶在他的作品中屢屢被喚起，並透過作家交疊的空間與歷史印象，以浪漫溫潤的文采，被重新建構，而讀者亦藉著作家之筆，探索並想像這饒富文學意味的地方，彷彿文學家聚居的街巷，總是充滿著靈氣，沃養著文學創作的花園，作家們住過、流連、甚至踱步吟行的地方，幾乎成了現代文學的地理名詞。作家們在城南的空間參與，串聯起連續性構成和再構成的地方感，透過日常行為模式的施為，連結了時間和空間，生成出有意義的社群活動，因而城南這個地方（place），被文人作家們視為一個具有意義、意象或感覺價值的中心，⁴⁶¹ 像是一個不斷召喚生命記憶的回聲谷，在細窄而長的街巷裡，載滿了作家們的文學身世：

臺北盆地是一個大回聲谷，則廈門街的巷子是一條曲折的小回聲谷，響著我從前的步聲。我的那條「家巷」，一一三巷，巷頭連接廈門街，巷尾通到同安街，當然仍在那裡。這條窄長的巷子，頗有文學的歷史。

這家，是住出來的，也是寫出來的。八千多個日子，二十幾番夏至和秋分，即連是一片沙漠，也既已住成家了。多少篇詩和散文，多少部書，都是在臨巷的那個窗口，披一身重重疊疊深深淺淺的綠蔭，吟哦而成。我的作品既在那一帶的巷閭孕化而成，那條小街，那些曲巷也不時浮現在我的字裡行間，成為現代文學裡的一個地理名詞。⁴⁶²

一個具有意義的地方，例如作家筆下被賦予現代文學意義的地理空間，是一個經由人的居住、以及經常性活動的涉入，以及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累積過程，透過文化意象、觀念及符號等等意義的給予，以及充滿意義的「真實的」經驗或動人事件，或是社群的認同感、安全感及關懷的建立，而被賦予人文意義，於是地方不僅只有地理意義，它亦成為人們生命核心價值的依託：

……近半輩子在其中消磨，母親在其中謝世，四個女兒和十七本書在其中誕生，那一帶若非我的鄉土，至少也算是我的市井、街坊、閭里或故居。

⁴⁶⁰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頁187。

⁴⁶¹ 在 Allen Pred (1983) 的〈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文中指出，地方（place）不僅是一個有情感附著的客體，亦是某個主體（筆者按：在地社群、居住於此地之人群等）的客體，它是一個令人感覺到充滿意義的地方。Allen Pred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Behavior*, Vol, 13 No.1, March, p.45~68. 中文譯者為許坤榮，文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1993），頁86。

⁴⁶² 余光中：《日不落家》（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頁130。

若是我患了夢遊症，警察當能在那一帶將我尋獲⁴⁶³。

我大部分作品都在廈門街的這條長巷裡寫成，無論來世我化蝶化鶴，這裡都是我心血的所託所依。⁴⁶⁴

臺北城南，逐漸成了作家們除了對中國大陸濃濃的鄉愁之外，另一個在臺灣島上空間認同的依歸，而廈門街更隱藏著余光中對母親、妻子、女兒、外孫的四代情緣，作家從「身體」開始，以廈門街的家為基點，去經驗所處的空間，而城南空間構成並連結作家的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也組織起人與人之間頻繁的文學活動，以及作家永生難忘的空間記憶與文學想像。余光中的詩作，經常可見廈門街的影子，例如詩作〈月光曲〉，詩人寫廈門街在月光下縣長而唯美的夜景：廈門街的小巷纖細而長／用這樣乾淨的麥管吸月光／涼涼的月光／有點薄荷味的月光。⁴⁶⁵ 而廈門街家中的斗室，也成為他與妻彼此情愛交合的空間基點：

三十五年前有一對紅燭／曾經照耀年輕的洞房／——且用這麼古典的名字／追念廈門街那間斗室／迄今仍然並排地燒著／仍然相互眷顧地。

地方和文學的相互結構，尤其在城南這個相對較於自由無拘的人文空間中，更容易醞釀出優秀的文學作品。文化地理學一般認為，文學塑造人群的地理想像，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論是**地方經驗的文學意義**，抑或是**地方意義的文學經驗**，都是文化創造與破壞過程的一部份。⁴⁶⁶ 城南作家即將身體所經驗的空間過程，透過文學的想像與地景的描述，創造了地方經驗的文學意義，例如王文興的小說《家變》，其場景即是來自於他從小所居住在城南同安街的日式建築「紀州庵」：⁴⁶⁷

他們底家是一座舉行平舍。他初入時覺得像火車長車廂一樣。這屋舍共有兩間寢室，室前隨有一道大廊，廊前一排落地玻璃溜門。室後還有一條細窄走廊，廊邊是兩扇玻璃正窗，外邊有兩棵桂花木。⁴⁶⁸。

住居場景被作家從記憶裡攝取並且書寫，而此文學作品不僅用以描述地方的產物、亦不僅只是在地理學的客觀知識中提供情感性的主觀感受，重要的是，它亦提供了體察世界的方式，展示出住民品味、經驗與知識的廣闊地景。⁴⁶⁹ 文學不

⁴⁶³ 余光中：《日不落家》（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頁131。

⁴⁶⁴ 余光中，〈剖出年輪三十三〉，《余光中詩選 1941-1981》（臺北：洪範，1981），序文頁6。

⁴⁶⁵ 余光中：〈月光曲——杜布西的鋼琴曲〉，《余光中詩選：1949~1981》（臺北：洪範，1981）。

⁴⁶⁶ 文學是受該地方的社會所脈絡支撐，又繼而反過來支撐這個脈絡的創作。例如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藉由那曾經是金都的淒美與惆悵，延續鄉村衰落的主題，作家書寫大時代的悲情，以及沒落的家族與暗啞的村莊，每個場景傳導了憂傷，村落因時代氛圍而衰頹，但卻透過作家的書寫，召喚了地方的情感，勾起人們對於九份淒迷浪漫的歷史記憶。

⁴⁶⁷ 本處為筆者採訪王文興先生之口述紀錄。

⁴⁶⁸ 文本請參見王文興：《家變》（臺北：洪範，1978）。

⁴⁶⁹ Crang, Mike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4），頁76。

僅是描繪區域和地方，它亦協助創造了地方，大多數人是透過作家的書寫，來了解那個地方，而不是親身接觸，文學作品書寫城市的意義，不僅在於描繪或敘述城市的事物，更重要的是，文學以不同於實體建設的方式，建構了城市。儘管文學的地方書寫具有主觀性，但這主觀性即表達了地方與空間的人文意識與社會意義。⁴⁷⁰ 透過作家對於空間地景的描寫，將地方經驗賦予文學意義；同時，文學意義亦回饋了地方，賦予地方意義更豐富的文學經驗，而城南的文學空間，就是在這樣的交相回饋之下，成為一個有機的文學生產空間。



⁴⁷⁰ 參見 Crang, Mike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4)。

總結

臺灣文化場域隨著歷史的空間過程不斷變遷，透過各種權力的相互交涉，使文化本身也具有高度支配的能量。文化的空間形式存在著核心——邊陲的關係，愈靠核心愈擁有文化宰制權，而愈近邊陲則需面臨資源不足的競爭。臺灣文學在歷史上文化場域的變遷與競逐之中，佔了極重要的發聲位置，透過城市空間與文化場域的分析與關涉，我們將更容易理解文化現象背後所蘊涵的社會網絡過程，以及文學主導場域的空間轉化過程，而有助於開展臺灣文學歷時性研究的社會空間議題。

傳統社會的文化核心區位，經常伴隨著經濟優位區域而生，因而早期臺北街莊文化場域的生成，經常循著經濟資本——行政治理——教育文化逐一具備的樣貌成形。傳統的社會網絡，由下而上的民間力量，高於由上而下的政治治理能力，而此一現象則反應在文化場域的變遷之中，即哪個區位掌握了經濟，等於掌握了文化支配權力。本論文在第二章提出，民間社會區域之間的結盟，不僅繁榮了結盟區之經濟實力，也同時促成文化主導場域之生成。大稻埕及大龍峒的經濟／文化雙核心場域，可做為經濟與文化場域共構而主導的樣貌。

傳統中國政治上的文化治理，乃透過空間概念做為教化範式，清廷在臺北府城內設官衙、寺廟，以及儒教機構，以構築文化空間形式來進行文教統治。而此一中國傳統的文化場域，隨著清廷割臺、日本殖民統治而重新解構，日本以現代化國家概念的治理方式，重新塑造集權而統一的臺北城市空間。

殖民政府透過空間資源不平均的分派，來達成政治權力的行使與支配，使臺灣人在與日本人隔離的差異空間裡，感受到各種不平等的待遇。而文化的弔詭之處，即壓抑在哪裡，反抗也在哪裡。臺籍菁英人士在他們所居住的大稻埕地區，透過空間與社會網絡的形塑，密集進行各種文化活動，使臺灣文化藝術在此區裡蓬勃發展，促成大稻埕成為臺灣文化主導場域，也影響了日治時期臺灣文藝的走向與發展。

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化呈現多元而紛雜的現象，城市空間尚待重組，外省人紛紛取代了日本人的位置，城市因大量人口的移入，而產生各種空間、社會、以及文化問題，族群之間面臨文化交鋒，政治亦動盪不安，臺灣文化不斷面臨挑戰。

1950 年代以後，國民黨政府以強勢的政策，掌握了文化主導權勢。由於國語政策的全面推行，加以官方主控了文化支配權力，因而以外省人為主導的臺灣文化場域，在臺北城南醞釀產生。城南知識份子的力量，使得城南的文化主導能量，在面臨官方的壓力之中，產生多元而豐富的文化含蓄能量，緩解了官方單一而刻板的霸權的論述。城南文化空間所形塑的文化氛圍，使得官方的、民間的、學院的所有文化能量，都融攝在此一文化場域之中，塑造出一種蘊涵文化氣質、自由思潮與人文風尚的空間氛圍，而此一氛圍，於是主導了當代臺灣文學與文化的走向。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一) 文學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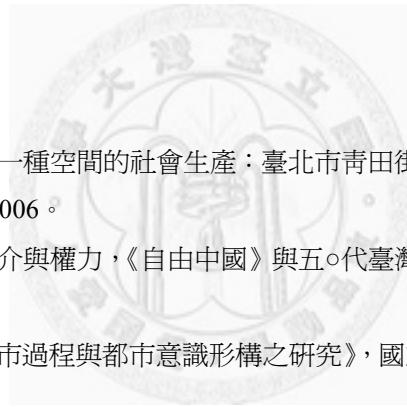
1. 何凡，《何其平凡：何凡散文》，臺北：三民，2002。
2. 何寄澎、劉龍勳編，《人生、家國、鄉愁》，臺北：長安，1981。
3. 何寄澎、劉龍勳編，《親情、愛情、友情》，臺北：長安，1981。
4. 李瑞騰、夏祖麗編，《一座文學的橋：林海音先生紀念文集》，臺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籌備處，2002。
5. 余光中，《日不落家》，臺北：九歌，1998。
6. 余光中，《五行無阻》，臺北：九歌，1998。
7. 余光中，《余光中詩選：1949~1981》臺北：洪範，1081。
8. 余光中，《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
9. 林海音，《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1984。
10. 林海音，
11. 夏祖麗，《人間的感情：感人的真實故事》，臺北：純文學，1985。
12. 夏祖麗，《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臺北：天下遠見，2000。
13. 傅孟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臺北，天下遠見，1999。
14. 楚戈，《再生的火鳥》，臺北：爾雅，1995。
15. 葉慶炳，《我是一枝粉筆》，臺北：九歌，2007。
16. 臺靜農，《龍坡雜文》，臺北：洪範，1988。
17. 蔡文甫，《天生的凡夫俗子：蔡文甫自傳》，臺北：九歌，2001。
18. 隱地，《漲潮日》臺北：爾雅，2002。
19. 隱地，《綺君的世界》，臺北：爾雅，1985。

(二) 學術專著：

1. 《北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臺北：內政部，1995。
2. 《臺北市發展史》，臺北：臺北市文獻會，1983。
3. Crang, Mike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2004。
4.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臺灣今昔之旅（臺北篇）》，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9。
5. 王志弘，〈地方意象、地域意義與再現體制：1990 年代以降的文山地區〉，《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8 期，2005。
6. 王英州等撰稿，《瞻前顧後：臺北的絕版、復刻與新生》，臺北：臺北市新聞處，2001。
7. 王鴻楷指導，《臺北市大安區大學里地區發展計劃：大學里地區發展計劃報告書》，臺北：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2002。
8. 朱萬里，《臺北市都市建設史稿》，臺北：工務局，1954。
9.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中華民國臺灣圖書出版市場研究報告》，1998-1999。

10. 何寄澎，《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臺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建會，2000。
11. 吳美枝，《臺北咖啡館：人文光影紀事》，臺北：臺灣古籍，2007。
12. 李志銘，《半世紀舊書回味 1945-2005：從牯嶺街到光華商場》，臺北：群學，2005。
13. 周世明等編，《臺北市區里界說》，臺北：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編，1991。
14. 林淇濬，《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01.10。
15. 林煥堂編，《最新臺北市全圖》，臺北：大眾，1960。
16. 徐裕健計畫主持，《臺北市都市發展歷史地圖集》，臺北：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997。
17. 高傳棋，《穿越時空看臺北：臺北建城 120 週年：古地圖 舊影像 文獻 文物展》臺北市文化局出版，2004。
18.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編，《臺北市古亭區社會調查初步報告》，1965。
19. 張訓嘉等著，《艋舺百年風華 1905-2005 年艋舺人物風土》，臺北：臺灣英文雜誌，2004。
20. 張瑞成，《光復臺灣之籌畫與受降接收》，臺北：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0。
21. 張誦聖，《文化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2001。
22. 張慧玲、古碧玲，《臺北市文化地圖》，臺北：臺北市政府新聞處，1998。
23. 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2004。
24. 許麗芩、王雅慧，《臺北城市相簿》，臺北：北市新聞處，2005。
25. 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書局翻印，1993，二版。
26. 陳正祥、段紀憲，《臺灣之人口》，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1。
27. 陳光輝著，《臺北市社會變遷因素之研究》，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67。
28. 陳紀瀅，《百年來中國文藝的發展》，臺北：重光文藝，1977。
29.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出版社，1979。
30. 喻肇青計畫主持、吳威廉等協同主持，《臺北市歷史街區暨歷史性建築發展自治條例之研擬》，臺北：臺北市政府市發展局，2001。
31. 湯熙勇、陳怡如，《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臺北市文獻會，2001。
32. 黃武達，《日治時代（1895-1945）臺灣近代都市計畫之研究論文集》，臺北：臺灣都市史研究室，1996.12。
33. 黃武達，《日治時期臺北市之近代都市計畫》，臺北：臺灣都市史研究室，1997。
34. 黃武達編撰，《追尋都市史之足跡：臺北「近代都市」之構成》，臺北：北市文獻會，2000。
35. 黃河計畫主持、劉維公協同主持，《臺北市文化指標調查分析報告》，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4。
36. 雷魯，《古地圖臺北散步：一八九五清代臺北古城》，臺北市：果實出版，2004。
37. 漢寶德等撰文、鄧南光等攝影，《臺北老地圖散步》，臺北：大地地理，2000。
38. 臺大人口研究中心編，《人口問題與研究》，1975-1976。
39.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臺北市要覽》，1953。
4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編，《臺北市都市發展紀要》，1971.1。
41.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編，《臺北市十年來施政統計》，1977。
42. 臺北市政府建設局編，《臺北市改制二十年建設統計分析專輯》，1987。

43. 臺北市政府秘書室編，《一年來的臺北市政》，1954。
44. 臺北市政府秘書室編，《臺北市政概況（1950）》，1950。
45. 臺北市政府秘書室編，《臺北市政概況（1953）》，1953。
46. 臺北市政府新聞處編，《臺北市改制二十年》，1977。
47. 臺灣省政府衛生處編，《臺灣之人口與家庭計劃》，1968。
48. 臺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編，《臺灣地區、臺北市、高雄市及臺灣省各縣市、鄉鎮市區人口統計資料彙編》，1994-1997。
49. 臺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編，《臺灣地區縣市鄉鎮區人口統計資料彙編》，1997-1998。
50. 趙苗玲，《臺北城的故事》，臺北：臺北市政府新聞處，1993.6。
51.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臺灣古籍，2006。
52. 劉可強主持，《市定古蹟紀州庵修復調查研究委託技術服務案報告書》，臺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5(未出版)。
53. 龍冠海主編，《臺北市古亭區社會調查報告》，臺北：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1957。
54. 薛月順，《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臺北：國史館，1996。
55.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運作模式的轉變》，臺北：左岸文化出版，2005。



（三）學位論文：

1. 左翔駒，《古蹟保存作為一種空間的社會生產：臺北市青田街的日式宿舍保存運動》，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6。
2. 林淇濬，《意識形態・媒介與權力，《自由中國》與五〇代臺灣政治變遷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論文，2002。
3. 曾旭正，《戰後臺北的都市過程與都市意識形構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4. 楊佳嫻，《論戰後臺灣外省小說家作品中的「臺北/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5. 徐裕健，《都市空間文化形式之變遷——以日據時期臺北為個案》，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研究所建築與城鄉組博士論文，1993。
6. 廖春生，《臺北之都市轉化——以清代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四）單篇論文：

1. 中村元哉，〈緩和與統制間的擺盪——戰後國民政府的言論政策（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近代中國》152，臺北市：近代中國雜誌社，2002.12，頁185-206。
2. 王櫻芬，〈業餘音樂社團與政府介入：以戰後臺灣南管樂界為例〉，《民俗曲藝》141，臺北市：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3.9，頁95-167。
3. 江如海，〈陳夏雨、楊英風與戰後臺灣現代雕塑的起源〉，《現代美術學報》7，臺北市：臺北市立

- 美術館，2004.5，頁 95-129。
4. 池田鳳姿著、陳藻香譯，〈《臺灣的家庭生活》點滴及戰後初期的臺灣・艋舺〉，《臺灣文學評論》5:2，臺南縣：私立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2005.4，頁 30-43。
 5. 何力友，〈戰後臺灣中等師資之搖籃——臺灣省立師範學院（1946-1955）之研究〉，《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42，臺北市：臺灣教育史研究會，2005.12，頁 26-30。
 6. 何義麟，〈「民報」——臺灣戰後初期最珍貴的史料〉，《臺灣風物》53:3，臺北縣：臺灣風物雜誌社，2003.9，頁 173-184。
 7. 何義麟，〈媒介真實與歷史想像——解讀 1950 年代臺灣地方報紙〉，《臺灣史料研究》24，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5.3，頁 2-24。
 8. 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出版事業發展之傳承與移植 1945-1950〉，《臺灣史料研究》10，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7.10，頁 3-24。
 9. 何鳳嬌，〈戰後神社土地的接收與處理〉，《臺灣風物》54:2，臺北縣：臺灣風物雜誌社，2004.6，頁 105-137。
 10. 何鳳嬌，〈戰後接運旅外臺胞返籍初探〉，《臺灣風物》50:2，臺北縣：臺灣風物雜誌社，2000.6，頁 155-191。
 11. 何鳳嬌，〈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社有地的接收與處理〉，《國史館學術集刊》7，臺北縣：國史館，2006.3，頁 257-295。
 12. 吳文星，〈戰後初年在臺日本人留用政策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3，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5.6，頁 269-285。
 13. 吳明勇，〈戰後臺灣史學的政治處境〉，《史耘》5，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9.9，頁 141-159。
 14. 吳嘉陵，〈臺灣公共藝術的興起——從二次戰後到七〇年代〉，《現代美術》98，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2001.10，頁 46-54。
 15. 呂文翠，〈一種精神分析的讀法：戰後臺灣現代性主體的詮釋焦慮〉，《華夏學報》37，臺北縣：私立華夏工業專科學校，2003.5，頁 128-134。
 16. 李文環，〈戰後初期（1945-1947）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駐臺海關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臺灣史研究》13:1，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6.6，頁 99-148。
 17. 李文環，〈戰後初期臺灣關貿政策之分析（1945-1949）下〉，《臺灣風物》50:1，臺北縣：臺灣風物雜誌社，2000.3，頁 69-106。
 18. 李季樺，〈戰後日本有關臺灣史料中的日文自傳、回憶錄概介〉，《臺灣史料研究》，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8.5，頁 46-56。
 19. 李承嘉，〈臺灣戰後初期（1949-1953）農地改革政策形成之研究〉，《中山學術論叢》16，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98.6，頁 81-114。
 20. 李泰翰，〈戰後臺灣的「再戰鬥化」——以 1953.「暑期青・戰鬥訓練」為例〉，《史匯》5，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2001.8，頁 69-85。
 21. 孟祥瀚，〈戰後運臺之日本賠償物資研究〉，《興大歷史學報》10，臺中市：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2000.6，頁 21-57。
 22. 林玉茹，〈地方知識與社會變遷——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臺灣文獻》50:4，南投市：臺灣省文

- 獻委員會，1999.12，頁 235-289。
23. 林果顯，〈戰後臺灣統治體制的再思考——威權體制的理論與適用〉，《現代學術研究》13，臺北市：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2004.12，頁 45-88。
24. 林秋敏，〈臺灣省新運婦女工作委員會與戰後初期臺灣婦女工作〉，《國史館學術集刊》3，臺北縣：國史館，2003.9，頁 283-302。
25. 林虹妤，〈戰後的省營商業銀行——以彰化商業銀行為例（1945-1957）〉，《史匯》3，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1999.4，頁 204-233。
26. 林翠鳳，〈鄭坤五《九曲堂時文集》與臺灣戰後初期的時局時政〉，《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5，臺中市：私立東海大學文學院，2004.7，頁 249-284。
27. 邱貴芬，〈從戰後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臺灣文學史的敍述〉，《中外文學》29:3=338，臺北市：中外文學刊社，2000.7，頁 313-335。
28. 施佳瑩，〈戰後臺灣文學史的建構與女作家小說下〉，《國文天地》19:3=219，臺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2003.8，頁 64-69。
29. 施佳瑩，〈戰後臺灣文學史的建構與女作家小說上〉，《國文天地》19:2=218，臺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2003.7，頁 70-74。
30. 柯榮三，〈兩張「臺灣文學史年表」中的小問題——關於吳漫沙「莎秧的鐘」，兼談其戰後遭到查禁〉，《國文天地》18:4=208，臺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2002.9，頁 71-76。
31. 柳書琴，〈跨時代跨語作家的戰後初體驗——龍瑛宗的現代性焦慮（1945-1947）〉，《臺灣文學學報》4，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8，頁 73-105。
32. 高郁雅，〈戰後國民黨新聞機構的企業化嘗試（1945~1949）〉，《輔仁歷史學報》16，臺北縣：輔仁出版社，2005.7，頁 211-238。
33. 張詩宜，〈戰後初期女性創作中婚戀自主的呈現——以林海音、潘人木、徐鍾珮為例〉，《國文天地》20:4=232，臺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2004.9，頁 91-98。
34. 張榕庭，〈戰後臺灣民族精神教育研究〉，《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29，臺北市：臺灣教育史研究會，2003.10，頁 14-25。
35. 梅家玲，〈性別論述與戰後臺灣小說發展〉，《中外文學》29:3=339，臺北市：中外文學刊社，2000.8，頁 128-139。
36. 莊惠惇，〈國族的流行體系——戰後初期臺灣雜誌文本中的主流論述〉，《史匯》3，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1999.4，頁 35-72。
37. 莊惠惇，〈戰後初期臺灣的雜誌文化（1945.8.15-1947.2.28）〉，《臺灣風物》49:1，臺北縣：《臺灣風物》雜誌社，1999.3，頁 51-81。
38. 莊嘉玲，〈文學見證的傷痕——談戰後小說中臺籍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及其意義〉，《臺灣人文（師大）》7，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2002.12，頁 1-22。
39. 莊嘉玲，〈戰後臺灣作家小說中的戰爭經驗〉，《臺灣人文（師大）》6，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2001.12，頁 73-94。
40. 莊嚕綺，〈臺灣戰後四年（1945-1949）現代戲劇的發展概況〉，《民俗曲藝》151，臺北市：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6.3，頁 185-253。
41. 許育銘，〈戰後留臺日僑的歷史軌跡——關於澠谷事件及二二八事件中日僑的際遇〉，《東華人文學

- 報》7，花蓮縣：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2005.7，頁 151-185。
42. 許芳庭，〈戰後初期臺灣婦女團體與婦運議題〉，《臺灣史料研究》15，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6，頁 19-43。
43. 許俊雅，〈對戰後臺灣文學中主體意識的觀察〉，《文訊》168，臺北市：文訊雜誌社，1999.10，頁 47-50。
44. 許倬雲，〈第二次世界戰爭—戰後六十年的回顧〉，《歷史月刊》211，臺北市：歷史智庫出版，2005.8，頁 48-52。
45. 許維宗，〈在光復之影下—戰後初期龍瑛宗的文學活動（一九四五、八、十五日本投降—一九四七、二、廿八「二二八」上）〉，《文學臺灣》34，高雄市：文學臺灣雜誌社，2000.1，頁 116-150。
46. 許維育，〈在光復之影下—戰後初期龍瑛宗的文學活動（一九四五、八、十五日本投降—一九四七、二、廿八「二二八」下）〉，《文學臺灣》34，高雄市：文學臺灣雜誌社，2000.4，頁 231-257。
47. 陳幼鮀，〈戰後日軍日僑在臺行蹤的考索上〉，《臺灣史料研究》14，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12，頁 2-32。
48. 陳幼鮀，〈戰後日軍日僑在臺行蹤的考察—戰後初期日軍日僑在臺記事年表〉，《臺灣史料研究》16，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12，頁 94-120。
49. 陳幼鮀，〈戰後日軍日僑在臺行蹤的考察下〉，《臺灣史料研究》15，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6，頁 65-98。
50. 陳明臺，〈戰前和戰後臺灣國策文學之比較研究〉，《文學臺灣》29，高雄市：《文學臺灣》雜誌社，1999.1，頁 109-133。
51. 陳亮州，〈戰後禁止日產移轉日期爭議初探〉，《臺灣風物》51:3，臺北縣：《臺灣風物》雜誌社，2001.9，頁 73-90。
52. 陳建忠，〈從皇國少年到左傾青年：臺灣戰後初期（1945-1949）葉石濤的小說創作與思想轉折〉，《臺灣文學學報》8，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6，頁 33-62。
53. 陳建忠，〈徘徊於「祖國認同」與「臺灣認同」之間—戰後初期臺灣文化的重建與頓挫〉，《島語：臺灣文化評論》，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3.3，頁 22-36。
54. 陳建忠，〈尋找臺灣詩的航向—試論戰後多次現代詩論戰的時代意義〉，《文學臺灣》36，高雄市：文學臺灣雜誌社，2000.10，頁 175-216。
55. 陳建忠，〈發現臺灣：日據到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史建構的歷史語境〉，《臺灣文學評論》1:1，臺南縣：私立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2001.7，頁 117-150。
56. 陳美蓉，〈戰後臺灣公營事業檔案之徵集與鑑定初探〉，《檔案季刊》4:1，臺北市：檔案管理局檔案季刊社，2005.3，頁 126-146。
57. 陳純瑩，〈戰後臺灣經濟警察之研究（1947-1960）〉，《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報》2，臺北市：國立臺灣科技大學，2006.3，頁 151-182。
58. 陳康芬，〈「中國文藝協會」社群與戰後臺灣五〇年代反共文學機制的形成〉，《淡水牛津臺灣文學研究集刊》6，臺北縣：私立淡水工商管理學院臺灣文學系，2004.8，頁 153-172。
59. 陳康芬，〈戰後臺灣五〇年代反共文藝論述的政治觀〉，《中國文化月刊》302，臺中市：中國文化月刊雜誌社，2006.2，頁 89-113。
60. 陳景峰，〈戰後臺灣戲院接收過程間的爭議〉，《史匯》5，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 2001.8，頁 111-128。
61. 陳湘琴，〈日治至戰後時期臺灣都市細部規劃法制的功能與特性之變遷歷程（1895-1976）〉，《都市與計劃》32:3，臺北市：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2005.10，頁 253-275。
 62. 彭瑞金，〈文學家的回憶錄語文學回憶錄〉，《臺灣史料研究》11，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8.5，頁 2-13。
 63. 彭瑞金，〈戰後的臺灣小說〉，《國文天地》16:7=187，臺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2000.12，頁 61-67。
 64. 彭瑞金，〈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路向之爭」的真相探討〉，《文學臺灣》51，高雄市：文學臺灣雜誌社，2004.7，頁 230-259。
 65. 曾健民，〈「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關於陳芳明的戰後文學史觀的歷史批判〉，《聯合文學》195，臺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1，頁 128-140。
 66. 游維真，〈1945-1952.臺灣戰後初期惡性通貨膨脹之成因與肆應：金融面之探討〉，《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37，臺北市：中國歷史學會臺灣大學文學院，2005.7，頁 287-323。
 67. 游鑑明，〈當外省人遇到臺灣女性：戰後臺灣報刊中的女性論述（1945-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7，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3，頁 165-224。
 68. 湯熙勇，〈「戰後旅日臺灣人的國籍轉換與國家意識重建：以日本東京澀谷事件（1947）為中心的分析」分支計畫簡介〉，《亞太研究論壇》27，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5.3，頁 245-247。
 69. 湯熙勇，〈日治到戰後初期臺民參與軍務之經驗及其影響（上）〉，《臺北文獻直字》137，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9，頁 151-185。
 70. 湯熙勇，〈日治到戰後初期臺民參與軍務之經驗及其影響（下）〉，《臺北文獻直字》138，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1.12，頁 149-187。
 71. 湯熙勇，〈恢復國籍的爭議：戰後旅外臺灣人的復籍問題（1945-194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2，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5.6，頁 393-437。
 72. 黃秀政，〈戰後臺灣方志的纂修，1945-2005〉，《臺灣文獻》57:3，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6.9，頁 289-345。
 73. 黃俊傑，〈戰後臺灣文化變遷的主要方向：個體性的覺醒及其問題〉，《歷史月刊》144，臺北市：歷史智庫出版，2000.1，頁 86-92。
 74. 黃英哲，〈魏建功與戰後臺灣「國語」運動（1946-1948）〉，《臺灣文學研究學報》1，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5.10，頁 79-107。
 75. 黃惠禎，〈承先與啓後：楊逵與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系譜〉，《臺灣文學學報》 8，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6，頁 1-32。
 76. 黃裕元，〈戰後臺語流行歌曲唱片的興衰（1945-1970）〉，《臺灣風物》54:1，臺北縣：《臺灣風物》雜誌社，2004.3，頁 91-125。
 77. 楊墀，〈不滅的青春：記南海路五十四號「臺北美國文化中心」〉，《大趨勢》10，臺北市：臺灣英文雜誌社，2003.10，頁 14-23。
 78. 葉龍彥，〈臺灣戰後之初的補習班（1945.10 至 1946.12）〉，《臺北文獻直字》157，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6.9，頁 31-46。
 79.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3，臺北縣：國史館，2003.9，頁 201-227。

80. 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留用的日籍師資〉,《國史館學術集刊》6,臺北縣:國史館,2005.9,頁145-192。
81. 歐素瑛,〈戰後初期臺灣中等學校之學風與訓育(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2,臺北縣:國史館,2002.12,頁210-244。
82. 歐素瑛,〈戰後臺灣大學的接收與改制——以師資的留用與招聘為中心〉,《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32,臺北市:臺灣教育史研究會,2004.4,頁2-13。
83. 歐素瑛,〈戰後臺灣大學留用的日籍師資〉,《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28,臺北市:臺灣教育史研究會,2003.8,頁2-12。
84.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出版業(1945-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9,臺北縣:國史館,2006.9,頁145-181。
85.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1945至1949.〉,《國史館學術集刊》5,臺北縣:國史館,2005.3,頁209-251。
86. 蔡錦堂,〈戰後初期(1949-1950)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初探——以「中央日報」記事分析為中心〉,《淡江史學》15,臺北縣:淡江大學歷史學系,2004.6,頁253-288。
87. 鄭梓,〈戰後北臺灣地方政制之變革——以「臺北州」到「臺北縣」為例〉,《臺灣史研究》6:1,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9,頁93-131。
88. 賴信真,〈書寫女性生命〉,《臺灣史料研究》11,臺北市: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8.5,頁14-22。

日治時期都市計劃史料



1. 《臺北市案內,臺北市地形圖》臺北:臺北市案內,1929。
2. 《臺北市案內》附頁,臺北市地形圖。臺北:臺北市役所,大正十五年版,1928。
3. 《臺北市概況》,臺北:臺北市役所,1939。
4. 《臺北市十年誌》臺北:臺北市役所,1932。
5. 《臺北市町名改正案內》臺北:南國出版協會,1920。〈臺北市區計畫街路及公園圖〉,《臺北州報》765號,1932。
6. 《臺北市六十餘町案內》,臺北:世相研究社出版部,1928。
7. 《臺北序誌》,臺灣:臺灣日日新報社,1919。
8. 橋本白水,《島の都》臺灣:南國出版協會,1926。
9. 臺北市役所,《臺北市政二十年史》,臺北:臺北市役所,1940。
10. 野口保興,《帝國大地誌》,成美堂書店、目黑書店,1915。
11. 安良城一,《五十音順職名入臺北市民住所錄 内地人ノ部》,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68。
12. 安良城一,《臺北市民住所錄》,臺北:住所報社,1942。
13. 臺北郵便局編,《臺北市新舊町名蕃地番戶對照表》,1922。